

應用倫理評論

第 52 期 2012 年 4 月

目次

專題論文

「兩岸三地華人社會幸福狀況的探討」專題

- 葉保強 / 專題按語
- 1 葉保強 / 幸福的追尋乃發展之道
- 21 石丹理 / 香港社會的生活素質
- 55 邢占軍 / 從宏觀角度探討生活質量
——對中國大陸幸福指數相關研究的總結與反思
- 83 陳嘉鳳、周才忠 / 臺灣民眾主觀快樂幸福感之樣貌與未來之發展方向
- 115 楊文山、王乃琳 / 臺灣與香港生活與婚姻幸福感的比較研究
- 141 李瑞全 / 醫藥之良好狀態 (wellbeing) 之分析：
生活品質、生活質量與生命質素
- 153 蕭振邦 / 臺灣環境生活品質之幸福指標理念探究
——以主觀幸福理論為進路
- 173 徐佐銘 / 論國家公園與幸福人生的關聯：
以陽明山國家公園與台江國家公園為例
- 203 李凱恩 / 寵物對人類健康所可能帶來的正面影響
——兼論寵物飼養的道德爭議

專題按語

本專題刊登的文章，除了〈幸福的追尋乃發展之道〉一篇外，都是曾在 2012 年 3 月 3 日由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主辦的兩岸三地華人社會幸福狀況探討之會議上發表過的論文。會議主要目的是以包括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的多學科視角，從不同面向探討華人社會的幸福情況，認識其組成、原因及與探討相關的政策意涵。參與會議包括兩岸三地研究幸福及生活品質的心理學、社會學及人文學科等專家學者。

專題特約編輯

葉保強

2012 年 4 月 20 日

幸福的追尋乃發展之道*

葉保強**

摘 要

本文以國家幸福為主軸，說明這個理念及相關的計量準則的重要性，簡介一些與幸福有關的計量系統，及三地在這個領域的發展近況，探討追尋國家幸福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問題。同時，本文簡述制定國家幸福政策。

關鍵詞：幸福、國家幸福、幸福指標、幸福計量系統

* 本文部分內容取材自曾於 2007 年 11 月兩岸三地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國家幸福的追尋與計量」論文。

**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

一、導言——國家幸福的理念

近年全球社會對什麼構成現時地球上 70 億人口的美好生活展開了廣泛的討論，其中一個重要議題是——分散在全球的 190 多國家或地方的人民要過著那一種生活？生活在什麼的政治、經濟、社會、或生態環境下才算是美好的生活？「國家幸福(良好狀態)」(well-being of nations) 這個理念企圖將這個議題聚焦。國際組織的官員、各國的政治領袖、政策官員、研究人員與及非政府組織的領袖對這議題雖各有不同的看法，但逐漸形成了一個共識：現時流行的量度國家發展的準則——國內生產毛額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無法客觀展示人民的幸福，因此要發展另一計量準則及系統，來更完備及客觀地呈現人民幸福的各個方面。本文以國家幸福為主軸，說明這個理念及相關的計量準則的重要性，簡介一些與幸福有關的計量系統，及三地在這個領域的發展近況，探討追尋國家幸福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問題。

二、追尋幸福的案例——不丹與加拿大

2005 年 10 月在加拿大新蘇格蘭省 (Nova Scotia) 的聖法蘭西斯西菲亞大學 (St. Francis Xavier University) 舉辦了會議，議題是國家與人民幸福的關係。與會者包括了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統計學家、企業領袖及政府官員，從不同的角度探討國家如何可以促進人民的幸福。會議的主要目標是檢討現時流行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幸福 (well being) 觀念，重新提出一個內容更為豐富的幸福觀念。與會者都一致認為主導二十世紀的幸福觀念太過重視物質及消費，製造了很多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不良的後果，威脅著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的發展。與會者的共識是，二十一世紀需要一個嶄新的幸福觀念，更全面地照顧到真正對人類有價值的東西，作為政府施政及規劃未來的重要指引。追尋幸福的國家中，除了一些先進的國家如加拿大及紐西蘭外，還包括了貧窮的小國不丹。

1972 年不丹當時剛登基的國王王卓（King Wangchuk），深感落後國家的面對問題之如此棘手，主要原因是那些國家只關注經濟發展，而對國家發展其他重要的地方忽視掉了。於是，國王向政府官員提出挑戰，要求他們研究制定一個量度國家發展的準則——國民幸福總值（National Gross Happiness），來取代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這個普遍被使用來量度國家經濟狀況的指標，並以此準則作為國家發展優先次序的準則，規劃發展藍圖及制定相關的政策。不丹人的幸福觀跟西方富裕社會的人民的想法不同，不丹人的幸福包含了很多西方觀念沒有的東西，物質的快樂只佔一小部分，而跟自然及其他國民保持和諧在不丹有相當的分量。不丹人信佛，幸福觀念自然受佛教影響，非佛教國家不見得容易接受這種幸福觀念。

不丹之外，其他的先進的富有國家如加拿大及紐西蘭都有類似的政策及活動。加拿大政府及學界近年正研制一個國家幸福指標——加拿大幸福指標（Canadian Index of Well-being, CIW）——目的是要對國家的幸福做一個較完整及全面的表述，因此會在經濟要素之外加入其他重要的因素，以充份反映一個健全國家所應有的元素或性質。¹通過這個指標，國民可以對國民的整體幸福有一個通盤的認知——他們現時的處境比以前的處境究竟變好還是變壞？要回答這個問題單靠經濟方面的指標，如國內生產總值，顯然是不足的，國家的其他面向要加入是自然不過的事了。一個適當計量國民幸福的指標，有效地將對人類及自然有益的因素跟那些有害的活動區分開來，用來反映國民的真正的生活品質，及協助維護自然資源的保育。此項法令責成有關機構要制定及定期出版一組有關國民、社區及生態系統的經濟、社會及環境各個面向的幸福的指標。指標包括 64 個指標分佈在 8 個領域：民主參與、社區活力、生

¹ 全國參與這項計劃的包括了加拿大各省的專家學者及有關機構，包括 Statistics Canada, Health Council of Canada,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Living Standards, Environment Canada State of the Environment, Canadian Policy Research Networks Quality of Life Indicators,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University of Northern British Columbia (BC), Sustainable Calgary (Albert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nitoba), University of Ottawa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Health。

活水平、國民健康、環境、教育、時間使用、休閒及文化活動。簡言之，加拿大幸福指標是用來量度公民的整體的生活品質。其實，加拿大國會在 2003 年通過了一項名為「加拿大幸福量度指標法」(Canada Well-being Measurement Act)，協助推動建立國家幸福指標的研制與執行。²法令的精神是，政府所要計量的東西，應是國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若只計量金錢的交流（國民生產總值），便會造成施政的偏差，環境品質、社會質素及文化元素便會受到忽視。相反地，若政府對環境社會文化品質等項目同樣視為進步的元素，就會重視它們甚至給予適當的計量，在制定政策時便不會輕忽它們。受到這些國家的啓示，法國、英國及日本最近亦相繼開始構建國家幸福指標。馬英九政府在總統大選獲得連任後亦宣示要在 2012 年底公佈台灣的幸福指標結果，追尋幸福之風似乎勢不可擋。

三、為何要制定國民幸福指標？

GDP 這個計量準則是計算了在一國家的一段時間內所生產出來的產品及服務的總和（並沒有計算這些產品及服務被用到其他生產輸出的數量），這些產品服務包括了消費產品服務、政府服務及投資產品，GDP 是一項包含相當廣泛的量度準則。撇開其中不少的技術問題，就算在計算經濟狀態下 GDP 這個量度準則會遇到一個重要的問題。在計算 GDP 時，每一項目有相對價格及加上權重。在市場交換中，價格反映了生產者的邊際成本及消費者的邊際效益，產品的價格是消費者對要購買的產品的價格願意支付的金錢。相比之下，政府對人民提供的服務，尤其是教育及醫療，所帶給社會的效益則難加以計量。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難以計量的項目卻對經濟非常重要。

² 這項法案的國會議員佐敦（Joe Jordan）在 2000 年 3 月 27 日向國會提出，並陳述了草擬這項法案的背景及法案之目的。

人民幸福的許多面向是 GDP 所沒有計量到的。例如，當環境污染嚴重，令國民生病，要接受醫療，醫療費用就會算進了國內生產毛額，國內生產毛額會因此而增加，但人民的健康卻剛好相反！同樣的道理，社會治安不佳，家家戶戶經常失竊，人民要增購防失竊設備、重新補回被偷的財物、被捕的小偷在法院受審及被關到獄中，這些的成本都成爲了國內生產毛額的一部分。再者，嚴重的天災所造成的財物及人命的損失，保險公司要做賠償所付出的巨額金錢，會令 GDP 的總數飆升。問題是，這些令國內生產毛額數字上升的項目並不會爲人類帶來幸福，而是人們痛苦及生活緊強的來源。此外，GDP 完全沒有將志工工作、沒有給付的工作、閒暇時間的價值，及自然環境資源計算在之內。由此可見以國內生產毛額之升降作爲反映國家幸福高低是何其的誤導了。

爲了提供一個更完備的計算系統，有人就提出另類的量度準則，如本國淨生產（Net Domestic Product）或國家所得（National Income）。除此之外，聯合國近年制定的人文發展指標（Human Development Index）是一個較廣及較能將幸福其他重要的項目都計算在內的量度準則。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研究幸福，包括經濟上的幸福與一般的幸福的關係（Osberg and Sharpe 2002b; Osberg and Sharpe 2003），³人文資本及社會資本跟國家幸福的關連（OECD 2001）等。

一個較爲完備地辨認、紀錄及評估人民的生活滿足程度的計量系統，應符合以下的條件——（1）避免 GDP 將所有問題都混在一起所引起的偏差，這個系統應能將國家在可以避免發生的問題上（如污染、治安敗壞）所花的費用，跟在有價值的東西上花的費用兩者區分開來。（2）作爲一個收支平衡財務表，表述產品從自然中製造出來後所導致的資源耗損。（3）認定及計算如養育子女、照顧老人及自願社區工作這些沒有給付的工作。（4）提供資源帳目（resource account）及污染存庫（pollution

³ L. Osberg and A. Sharpe, "The Index of Economic Well-being' Indicators," *The Journal of Social Health* 1 (2002): 24-62; L. Osberg and A. Sharpe, "Human Well-being and Economic Well-being: What Values Are Implicit in Current Indices," *CSLS Research Report Number 2003-04* (2003).

inventories)，紀錄社會的生態健康。(5) 紀錄及監督其他的幸福項目，包括產品的耐用性、就業滿意情況、所得分配、罪案、教育品質、醫療品質、壓力、閒暇及其他對幸福有重要關連的項目。總之，人類社會現時需要新的理念及準則，來客觀及全面展示人民生活的狀態，及以此作為計劃及評估國家發展及治理的準則。

四、有關幸福的計量系統

幸福不單只是一個觀念，同時是可以計量的。依這個認識，學者專家在過去二十年制定了一些有關幸福的計量系統。這些計量系統，不一定用「幸福」這個名詞來表述，而是用如「生活品質」、「人文發展」、「社會進展」等名詞來表述的計量對象。這些理念雖然不盡相同，但涵義有很大的重疊。這一節簡要介紹一些主要與幸福相關計量系統(Well-being related measures)(Hagerty et al. 2001)。⁴

(一) 世界衛生組織生活品質指標(WHOQOL)

世界衛生組織制定的生活品質指標的內容很廣泛，包括了一個人的身體健康、心理狀況、獨立層次、社會關係、個人信念及他們跟自然環境的重要面向的各種關係，包含了個人對這些方面及生活其他面向的看法。生活品質包括了 6 大領域——身體、心理、獨立層次、社會關係、環境及精神。生活品質指涉一個包含在文化社會環境脈絡之內的主觀評估，即，人們在文化及價值系統內就他們的目標、期望及關心事項之下對自己生活狀態的判斷。

⁴ M. R. Hagerty, R. A. Cummins, A. L. Ferriss, K. Land, A. C. Michalos, M. Peterson, A. Sharpe, J. Sirgy and J. Vogel, "Quality of life indexes for national policy: Review and agenda for research,"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55 (2001): 1-96.

（二）經濟幸福指標（Index of Economic Well-being）

這個指標的理念是——社會的經濟幸福／良好狀態建基在平均消費流量的水平、生產物品的總體累積、個人所得分配的不平等及對未來所得的不安全性之預期。加諸在指標不同成份的加權，視乎不同觀察者的價值會有所改變。指標的 4 個成份是——每人的有效的消費流量；社會累積的生產資源存量的淨值；貧窮及不平等；及跟失業、疾病、家庭破碎及老年貧窮而來的經濟不安全。

（三）聯合國人文發展指標

（United Nation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

這個指標（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0）由 3 個基本變項——壽命、知識及所得——所組成。每一個變項有最高及最低的數值，每一個變項的最高及最低數值被選出來後，用一個計算公式將之變為由 0 到 1 的值，然後取其平均值，即人文發展指標 HDI。壽命是指由出生起算的預期生命期，是就這一參照年起計到死亡之間的人們的平均壽命。知識變項是包含了成人識字率及成人人口入學的年期。人文發展這個觀念反映了人們選擇的擴大過程。人們所必需的東西包括了一個頗長及健康的生命，獲取知識及能取得資源支持一個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這個涵義逐漸擴大到包括其他領域，如政治、經濟及社會自由，與創造力及生產力，個人自尊及人權等範圍的選擇。

這個指標有一明確的政策目標——評估發展趨勢及國與國之間的比較，同時提供一個時間序列來監測走趨。指標的優點包括它以一個數字來表述，其所包含的 3 個領域亦是以數字表述。指標雖然沒有包含人類生命的所有面向，但所納入的都是生命中重要的面向。指標只陳述客觀的量度，沒有加入主觀的量度。這指標的不足是，對政策改變的反應緩慢。例如，一個計劃的執行及其反應之間的時間差。

(四) 咸明斯生命品質量表

(Cummins'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Life Scale)

這計量系統包含了 7 個領域——物質幸福、健康、生產力、親密關係、安全、社區及情緒幸福。每一領域有 3 個客觀量度及 2 個主觀量度，每個領域的 3 個客觀量度的數值是可以加起來的，而 7 領域的相加值取得單一的客觀幸福數值。每一領域的一個主觀量度是一個滿意的量度（分 7 級），其他則是重要性量度（分 5 級），滿意度與重要性兩數字的乘積是該領域的主觀數值，而 7 項乘積加起來得到一個單一的主觀幸福的量度值。這 7 個領域捕捉了在 32 個研究所報告的領域的 83%，很好的證明計量系統的有效性。

(五) 麥高諾北美洲社會報告

(Michalos' North American Social Report)

這報告對加拿大及美國從 1964 到 1974 年之間的生活品質作比較，用了 12 個領域 126 項社會指標。這 12 個領域包括人口結構；死亡；疾病；健保；犯罪與執法；政治及組織；科學與科技、教育、娛樂；自然環境及資源；運輸及通訊；居住；經濟及道德；及社會習俗等。每一個指標都有每年的實數值及流動值，實數值是指一個指標的現時的數量（如現時的暴力罪案率），而流動值是現時實數的改變。

(六) 狄納基本及高級指標

(Diener's Basic and Advanced Index)

這個指標（Diener 1995）有兩個成分指標——基本生活品質指標及高級生活品質指標，以客觀的生活品質準則來衡量不同國家的狀態，但只有高級指標內同時包含了一項主觀指標。「基本」、「高級」這兩個名詞是指分別應用到發展中國家及已發展國家的量度差別（scales'）

differentials)。指標採用了一組跨文化的普遍價值 (Schwarz 1992)，⁵包括自我紀律、社會正義、享受生活、成功、環境保護。這些價值代表了人類的 3 個普遍的要求——滿足生理需求、協調式的社會互動、群體的生存及福利需求。以這一組價值為基本建立了 7 個領域——層級、控制、情緒自主、知性自主，平等主義承擔、和諧、及保守主義，這 7 個領域各包含 2 個變項，一個變項納入基本指標，另一個變項納入高級指標。前者是用來表示如生理需求及安全等較低層次的需求，後者則表示例如尊重及幫助他人等較高層次的需求。換言之，每一指標都包含了 7 個變項。將這 7 個變項的每一個標準化的值相加起來得到一個數值。

(七) 美國人口幸福指標

(The American Demographics Well-Being Index)

指標報導了由 1996 年 2 月到 1998 年 12 月的數據，雖然指標包含的年度由 1990 年 4 月到 1998 年 7 月。指標用了 5 個複合指標來展示人民的幸福。這套指標由綺色佳大學 (Ithaca College) 的 Elia Kacapyr 教授研發出來，由他維護及做報告，每月公佈結果。

這 5 個複合指標包含消費者態度、所得及就業情況、社會及自然環境、休閒、生產力及科技等，5 個指標由以下的 11 個基本指標組成 (每個都有加權)：

消費者態度——消費者信心指標、消費者期望指標

所得及就業機會——每人真實可使用的所得、就業率

社會及自然環境——頻危物種數目、罪案率、離婚率

休閒——168 小時減去每周工作時數、每人花在休閒的真實支出

生產力及科技——每單位勞動力的工業生產、每單位能源的工業生產

⁵ S. H. Schwarz, "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 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 in M. Zanna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5 (Florida: Academic, Orlando, 1992).

（八）荷蘭生活環境指標

（ The Netherlands Life Conditions Indicators ）

指標由荷蘭社會及文化規劃辦公室制定，目的是要反映那些政府政策可以影響所及的領域的情況。指標在 1974 年推出之後，每年都有報告。這個指標以一個單一指標來表述（1997 年的值是 100），包括了以下領域——居住、健康、購買力、休閒活動、流動性、社會參與、體育活動、假期、教育及就業。

（九）德國社會指標系統（ German Social Indicator System ）

德國在上世紀 70 年代中期制定一個社會政治決策及指標系統，內容包括了社會指標系統，自 1978 年以來，指標不斷地更新及由社會指標部作進一步的擴展。最新的版本包含了 13 項生活領域——人口、社會經濟地位及主觀階級認同、勞動市場及工作生活、所得及所得分配、產品服務的供應及消費、運輸、房屋、教育、健康、參與、環境、公共安全及犯罪情況、休閒與媒體消費。

（十）紐西蘭幸福指標

紐西蘭量度國家幸福的 9 個領域包括健康、知識技能、有薪資的工作、經濟生活水平、公民與政治權利、文化認同、自然環境、安全、社會聯繫。每一領域內，以不同的指標來陳述重要的面向。紐西蘭將國家的好狀態的各個面向在每年出版的《社會報告》公佈，利用這份報告，人民及政府可以除了了解最近的幸福之實情外，同時可以了解及監察整個國家及不同的族群的一些重要狀況的趨勢。

（十一）社會進步加權指標

（ The Weighted Index of Social Progress, WISP ）

這指標由美國學者艾提斯（Richard Estes）在上世紀 70 年代制定的。社會進步加權指標要量度不同社會的幸福。這套指標包括了 40 個

指標，分爲 10 個領域——教育、健康狀況、婦女地位、軍費支出、經濟（包括就業及所得分配），人口結構、環境、社會動亂（social chaos）（政治權利、貪污、戰犯、難民）、文化多元、及社會福利等。人口超過 100 萬的國家都是調查對象。

艾提斯的另一個調查是針對上世紀 90 年代各國的社會進步狀況。根據其指標被調查的國家被分爲 4 組，得分最多的第一組（WISP > 100）包括了北歐國家。跟著的第二組（91-100）是富有的西歐國家，及匈牙利。雖然美國人均的所得是最高的，卻被排在第三組內（81-90）。原因是美國的貧窮率非常高及社會服務嚴重不足，就所調查的國家中只有蘇聯的貧窮率高過美國。

最新的一個調查將包括了 2000 年的數據。這個指標的特色是加權，而加權本身涉及調查者的價值判斷。不同指標的選擇及不同的加權都反映了價值。而這些價值的正當性會是引起爭論的重點。

（十二）幸福地球指標（Happy Planet Index, HPI）

指標由英國的新經濟基金會（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NEF）制定，目的是計量人們在沒有破壞地球的狀況下的壽命及幸福日子。指標綜合了生命預期壽命、人們生活滿意調查及對自然資源消耗（能源及土地等）的數字。這個指標放重在自然環境上，因此接近地球赤度的國家如哥倫比亞及哥斯突尼加等得分較高，德國排行 81 而美國則在 150 位。

（十三）英國的國內進展計量

（Measure of Domestic Progress, MDP, UK）

這個計量系統是從經濟指標（內容包括消費者支出等）中扣除社會成本（包括不平等、意外事故、犯罪情況、家庭崩壞）及環境成本，自然資源消失等面向。根據這個指標。英國在上世紀 70 年代中期的得分達到頂，跟著就下降到 80 年代中期而一直未能再回頂端。

(十四) 真實進步指標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GPI)

這套指標由美國私人研究機構「重新定義進步」(Redefining Progress)所制定。GPI 指標類似英國的 MDP, 包括個人消費加上家務的價值, 固定投資的淨值及消費耐用物品服務的值, 上下班交通, 濕地消失, 非再生資源的消失及其他的成本等。若跟同期的 GDP 相比, 美國的 GPI 自 1980 年是長期滯留不進, 但 GDP/capita 卻有 55% 的增幅。

(十五)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生活質素指數 (CUHK Hong Kong Quality of Life Index)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在 2003 年編製了「中大」香港生活質素指數, 用來分析及評估香港的生活素質。由 2003 年起, 每年公佈一次數據。「中大」香港生活質素指數是一個合成指數, 由 3 組分類指數, 合共 21 個指標組成, 包括: 壓力指數、生活滿意程度指數、新聞自由指數、報紙批評指數、政府表現指數及經濟現況指數。其餘 15 個指數的數據, 均取自政府及有關機構。

五、兩岸三地有關幸福的活動

兩岸三地近年分別展示對與幸福相關議題的關注。香港自 1980 年代後期開始展開對香港的生活品質的調查及研究, 其後組成了一個來自大學的學者專家的研究團隊, 執行「社會指標」長程計劃, 對香港人的生活品質作定期調查研究並公佈調查報告。社會指標計劃所涵蓋的領域及各領域內的指標, 隨著時間的變遷有著變化, 但大致上都包括了構成香港社會中重要的面向, 如家庭生活、社會網絡、社會福利、居所、健康、閒暇、工作、社會流動、人民對政治及法律的看法等。換言之, 現代社會中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面都包括在社會指標之內。上文提及的中文大學學者專家制定的香港生活質素指數是這方面的最新發展。

中國大陸方面，近年媒體經常報導各式各樣的「幸福指數」調查結果，「國民幸福」、「人民幸福感」、「人民主觀幸福」、「幸福指數」等名詞逐漸在社會上流行起來，國民幸福及幸福指數成爲社會的熱點。中國社會科學院最新的調查顯示 2005 年有 72.7%的城鄉居民表示生活幸福，這個數字比 2004 年下降了 5 個百分點。其他的調查機構，包括中國社會調查所的調查都發展貧窮跟人民幸福有密切的關連——55%城市居民及 66%的農村居民認爲貧窮導致不幸福。（新華網 2006/07/27）另一方面，中國社會調查所的 2005 年調查顯示，47.6%居民對生活表示滿意，比 2004 年上升了 8.7%。這次調查用了 6 個綜合指數——職業聲望、幸福感、家庭生活、安全感、社會保障和社會參與等指標來計量居民對生活的滿意程度（新華網 2005/12/31）。學術方面，相關的研究包括研制居民主觀幸福指數，對城市居民的幸福調查（邢占軍 2002, 2004）。⁶

政府方面，國家統計局近年正研究制定一套相關的幸福指數，表示國民幸福已受到國家的關注。同時，北京市統計局亦在研制有關的指數；此外，山東省及深圳市分別開展了市民的幸福調查。（新華網 2006/09/21）⁷

近年中國的經濟的高速發展帶來了嚴重環境污染及貧富差距問題，已引起政府的深切關注，及認識到只重視經濟增長而忽略環境保育及社會發展是有偏差的，醒悟到國家要長治久安，社會要和諧安穩，必須將保持經濟增長及提高人民的幸福兩者取得平衡。一些較全面紀錄國家平衡發展的理念及計量工具，如幸福指數及其他相關國家發展的計量準則就應運而生。

社會上，人們對經濟發展與人民幸福之間的關係展開了討論——經濟發展是否帶來人民幸福的提升？以國民生產總值或國內生產毛額等

⁶ 邢占軍，〈中國城市居民幸福感量表的編制〉，《香港社會科學學報》23（2002）：151-189；邢占軍，〈城市居民的主觀幸福感影響因素〉，《新東方》11（2004）：19-24。

⁷ 2006 年 9 月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在記者會公佈，將會推出幸福指數、人的全面發展指數、地區創新指數及社會和諧指數，以回應國家發展的需求。

計量指標來呈現國家發展是否夠全面及客觀？這些常用的經濟指標能否客觀反映人民真正的生活品質？能否同時呈現人民的幸福？參考了外國的研究成果，人們開始質疑純用經濟指標來計量國家發展的客觀性。

台灣方面，有關方面近年亦有類似的活動。例如，人們熟悉的與幸福有關的「痛苦指數」由失業率及通脹所構成，雖然沒有用「幸福」這語詞但仍可算是一種粗鬆的偏向經濟的幸福指標。其他的主流商業雜誌做的調查是直接用「幸福」這個名詞的。《天下雜誌》在過去幾年都會做「幸福縣市調查」及公佈結果，主要是採用一些客觀的指標作為評比的準則。幸福調查所採取的指標包含了 5 大領域——經濟力、環境力、廉能力、教育力、社福力，5 領域包含了共 37 個指標。除了一項指標詢問被訪者對所屬城市施政滿意程度是屬於主觀指標外，其餘的指標都屬於客觀指標。《遠見》所做的調查，亦是與幸福相關的。

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於 2006 年 8 及 9 月期間做了一個幸福調查，發現民眾的幸福分數平均為 6.8 分，但有接近 5 成受訪者表示「不夠快樂」，特別是個人對未來經濟情況感到憂慮，及對未來一年的台灣表示不盡樂觀。中華經濟研究院受經建會委託編製「國民幸福毛額」，包括了 4 大類指標——1.公平及永續的社會經濟發展，以計量包括民眾家庭經濟狀況、經濟機會與市場公平、社會福利與永續發展等；2.文化價值提升，包括教育程度、文化及媒體水準與宗教自由等；3.自然環境保護；4.優良治理，包括社會安全、平均壽命及政府施政等（聯合報 2007 年 1 月 22 日，A12）。⁸

學術研究方面，有關於台灣人在不同的領域下的幸福感（Tsou and Liu 2001），⁹也有關於華人社群中的職場幸福（Ip 2006, 2009a, 2009b）

⁸ 這套國民幸福毛額及 2006 年的國民幸福調查報告均未公開發表，人們只能從報章上得知這個消息。

⁹ Meng-wen Tsou and Jin-tan Liu, "Happiness and Domain Satisfac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 (2001): 269-288.

的研究。¹⁰本人 (Ip 2007; 葉保強 2007) 在 2007 年的 4 月 5 月期間做了一個台灣人民對幸福的看法及對個人及國家生活幸福程度的調查, 部分調查結果在 11 月 10 日的國家與幸福國際研討會上作學術報告。本人其他有關幸福研究的成果, 包括有關華人幸福觀兼具理念及實證成份的研究 (Ip 2011),¹¹以及將幸福連結到商業倫理方面的論述 (Ip 2010)。¹²

六、討論——與幸福有關的問題

本節討論兩個與國家幸福有直接關係的問題——價值與幸福的關係, 及國家幸福與政府治理準則。

(一) 價值與幸福

不同國家所採用的幸福計量系統無疑受其文化中的幸福觀念及所伴隨的價值所影響, 因此, 什麼是國民的幸福肯定受到這幸福觀及相關的計量準則的影響。不同國家的人民對什麼是幸福有明顯的差異, 例如, 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先進工業國家會將物質生活的滿足感視為幸福的很重要的元素; 相比之下, 不丹或印度這些國家會將精神生活的滿足給予優先的位階, 其餘的國家可能將物質及精神的滿足的比重作各式各樣的安排。這些優先次序的排列都受到相關價值如物質主義、精神主義、效益主義、德性主義等價值觀的影響。這些建基在不同價值觀上的幸福觀都會直接影響相關的幸福計量準則的構建, 及依這些準則而來的

¹⁰ P. K. Ip, "Workplace Well-being in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ties - Towards a Construct," in P. K. Ip (ed.)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Wellbeing of Nations - A Cross-Cultural Dialogue* (Jhongli: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2006a), S3-1, pp.1-32; P. K. Ip (ed.)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Wellbeing of Nations - A Cross-Cultural Dialogue* (Jhongli: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2006b); P. K. Ip, "Well-being of Nations -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Social Indicator Research* 91 (2009a): 1-3; P. K. Ip, "Developing a Concept of Workplace Well-being for Greater China," *Social Indicator Research* 91 (2009b): 59-77.

¹¹ P. K. Ip, "Concepts of Chinese folk happiness," *Social Indicator Research*, 104 (2011): 459-474.

¹² P. K. Ip, "Business Ethics and Well-being of Nations, Is there a Connec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95 (2010): 97-110.

幸福狀態的陳述。因此，某一國家依幸福計量準則取得很高的排名，卻可能在另一幸福計量準則下取得很低的排名。例如，幸福地球指標的計量會將很多流行的計量結果倒轉過來。反之亦然，在這個指標下排名很前的可能在別的計量準則下被排到後面去。

雖然文化及價值影響了人們對幸福的看法，不同國家各有不同的幸福觀，問題是，這些不同國家的幸福觀是獨一無二，無法比較的？還是可以互相比較？是否有一套跨文化的幸福觀？由此引伸，不同國家的人民的幸福狀態是否獨一無二，還是可以互相比較？一種跨文化的幸福狀態是可以共同存在不同國家的人民身上？

（二）客觀幸福與主觀幸福

上文討論過的一些指標，有些是採取客觀的指標，包括失業率、通脹、自殺率等來計量人民幸福狀況的，有的則採用人民的主觀滿意感來計量國家的幸福情況，有些計量系統則混合了兩者。究竟那一類的計量系統是最合適？這問題當然不容易回答。不過，回到幸福的基本面，也許可以提供一點指引。基本上，一個國家或地方的幸福應包含兩方面——（1）該國家或地方的實際情況，及（2）該國家或地方的人民如何利用這些條件來生活，後者包含了人民對所居住的環境的想法及感覺，以及他們實際的行為。就兩大方面而言，有四個不同的狀況。（1）人們的生活條件良好，人們都正確地認知及感受到這些條件，並對它們表示滿意，同時會作出適當的行為。（2）生活條件惡劣，人們都正確地認知及感受到這些條件，並對它們表示不滿意，同時會作出適當的行為。（3）生活條件惡劣，人們都錯誤地認知及感受到這些條件，並對它們表示滿意，同時作出不適當的行為。（4）生活條件良好，人們都錯誤地認知及感受到這些條件，並對它們表示不滿意，同時作出不適當的行為。

（Michalos 2006: 2-3）¹³

¹³ A. C. Michalos, "Developing a Canadian Index of Wellbeing," in P. K. Ip (ed.),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Wellbeing of Nations – A Cross-Cultural Dialogue* (Jhongli: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2006), pp. KS-1, pp.1-23.

（三）幸福指標與國家治理

不少的幸福指標的制定都有政策目標，用作紀錄或評估人民對政府在不同領域上施政的滿意程度，或用作政府在規劃未來政策的重要準則。以加拿大的幸福指標為例，其政策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要以指標來客觀及完整地呈現人民生活品質的各個面向，以作為政府政策實施效果的評鑑準則，同時亦為政策的制定、規劃、檢討、修改或加強提供重要的參考數據。在社會層面上，將幸福指數作定期的公佈，可讓人民了解國家及自己的生活狀況，並以此認知來作出適當的行為。

七、結語

由於受到全球資本主義的影響，主導二十世紀的幸福觀念太偏重於物質滿足及產品消費，由此產生的行為及政策，將人類社會推向不能持續發展的困境。藉著今天的地球暖化、能源短缺等危機，人們逐漸感受到不平衡的經濟發展及過度物質主義的弊端，開始重新反思人類在這個發展困境下何去何從的問題，而這同時是探討什麼是人類美好生活、國民的幸福真正涵義的絕好時機。¹⁴

參考書目

- Argyle, M., 1999, 'Causes and Correlatives of Happiness', in D. Kahneman, E. Diener, and N. Schwarz, eds., *Well-Being: The Foundations of Hedonic Psycholog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p.353-371.
- Aristotle, 1999, *Nicomachean Ethics*, T. Irwin, second edition tran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 Co.

¹⁴ 本文的部分資料取向「國家幸福的研究」研究計劃，此計劃由國立中央大學「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劃」資助。

- Booyesen, F., 2002, "An overview and evaluation of composite indices of development,"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59: 115-151.
- Cummins, R. A., 1996, "The domains of life satisfaction: an attempt to order chao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8: 303-328.
- Diener, E., 1995, "A value based index for measuring national quality of lif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6: 107-127.
- Diener, Ed. and Suh, E. M., 1999, "National Differences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D. Kahneman, E. Diener, and N. Schwarz (eds.), *Well-Being: The Foundations of Hedonic Psycholog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p.434-450.
- Hagerty, M. R., Cummins, R. A., Ferriss, A. L., Land, K., Michalos, A. C., Peterson, M., Sharpe, A., Sirgy, J. and Vogel, J., 2001, "Quality of life indexes for national policy: Review and agenda for research,"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55: 1-96.
- Ip, P. K., 2006a, "Workplace Well-being in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ties – Towards a Construct," in P. K. Ip (ed.),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Wellbeing of Nations – A Cross-Cultural Dialogue*, Jhongli: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S3-1: 1-32.
- Ip, P. K. ed., 2006b,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Wellbeing of Nations – A Cross-Cultural Dialogue*, Jhongli: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 Ip, P. K., 2009a, "Well-being of Nations –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Social Indicator Research* 91: 1-3.
- Ip, P. K., 2009b, "Developing a Concept of Workplace Well-being for Greater China," *Social Indicator Research* 91: 59-77.
- Ip, P. K., 2010, "Business Ethics and Well-being of Nations, Is there a Connec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95: 97-110.

- Ip, P. K., 2011, "Concepts of Chinese folk happiness," *Social Indicator Research*, 104: 459-474.
- Kahneman, D., Diener, E. and Schwarz, N. eds., 1999, *Well-Being: The Foundations of Hedonic Psycholog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Michalos, A. C., 1980, *North American Social Report, Vol. 1: Foundations, Population and Health*, Reidel: Dordrecht.
- Michalos, A. C., 1991, *Global Report on Student Wellbeing, Vol. 1: Life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 Verlag: Springer.
- Michalos, A. C., 2006, "Developing a Canadian Index of Wellbeing," in P. K. Ip (ed.),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Wellbeing of Nations – A Cross-Cultural Dialogue*, Jhongli: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pp. KS-1, pp.1-23.
- Osberg, L. and Sharpe, A., 2002a, "An Index of Economic Well-Being for Selected OECD Countries," *The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Series* 48, Number3, September 2002, pp.291-316.
- Osberg, L. and Sharpe, A., 2002b, "The Index of Economic Well-being' Indicators," *The Journal of Social Health* 1: 24-62.
- Osberg, L. and Sharpe, A., 2003, "Human Well-being and Economic Well-being: What Values Are Implicit in Current Indices," *CSLS Research Report*, Number 2003-04.
- Sharpe, A. and Arsenault, J.-F., 2006, *Living Standards Domain of the Canadian Index of Wellbeing*, Toronto: Atkinson Charitable Foundation.
- Schwarz, S. H., 1992, "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 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 in M. Zanna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5, Florida: Academic, Orlando.

Tsou, Meng-wen and Liu, Jin-tan, 2001, "Happiness and Domain Satisfac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 269-288.

Veenhoven, R., 1993, *Happiness in Nations: Subjective Appreciation of Life in 56*

Nation 1946-1992, Rotterdam: Erasmus University Press.

邢占軍，2002，〈中國城市居民幸福感量表的編制〉，《香港社會科學學報》23：151-189。

邢占軍，2004，〈城市居民的主觀幸福感影響因素〉，《新東方》11：19-24。

新華網，2005/12/31，〈民調顯示：2005 年中國公眾總體幸福感提高〉，UR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2/31/content_3993565.htm。(2007/08/20 瀏覽)

新華網，2006/07/27，〈幸福指數與和諧社會的關係研究〉，URL=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6-07/27/content_4883569.htm。(2007/08/20 瀏覽)

新華網，2006/09/21，〈國家統計納入幸福指數 各地方政府展開排名爭奪〉，URL=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9/21/content_5118227.htm。(2007/08/20 瀏覽)

葉保強，2007，〈「台灣民眾的幸福觀念及幸福感受」研究報告〉。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未出版)

香港社會的生活素質*

石丹理**

摘要

本文探討香港的生活素質。首先，敘述了香港生活素質的各個資料來源。第二，通過各學科已發表的研究，總結出香港生活素質研究的特點。第三，本文描述了香港現有的三個大型研究（社會發展指標研究計劃、社會發展指數及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生活素質指數）。

通過分析，本文得出以下觀察：a) 1997年後香港生活有所改善；b) 整體生活素質逐步提高，但有些社會群體的生活素質並無改善；c) 1997年後主觀生活素質下降；d) 可觀察到預示香港生活素質下降的信號；e) 主觀生活素質與許多社會心理因素有關；f) 從某些指標上看，香港的生活素質高於內地；及 g) 不同研究的結果相互矛盾。最後，本文概述了一些研究方法上的問題，希望引起各方關注，深思香港未來生活素質研究的方向。

關鍵詞：生活素質、幸福感、香港、評估

* 本文中有關香港社會發展指數（SDI）的調查結果，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提供，作者謹在此致謝。

**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座教授；香港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顧問教授；澳門鏡湖護理學院榮譽教授；美國肯塔基大學醫學院客座教授

一、前言

或許，沒有其他研究課題比「生活素質」(quality of life, 簡稱 QOL) 更能吸引到眾多研究者的目光。在不同學科的研究領域中，研究者都會涉及「生活素質」或「幸福」(happiness) 等課題。¹雖然生活素質有諸多不同的定義，但研究人員普遍認同這個概念包含了多個層面，包括物質、生理、社交、情緒和生產力狀況。此外，亦有研究者認為，「客觀」生活條件以及個人「主觀」感受也是「生活素質」的主要組成部分。本章會以 Veehoven²的觀點為基礎，從客觀生活狀況、個人主觀感受和對社會的感知等方面去探討香港社會的「生活素質」或「幸福感」。

一份有關華人地區生活素質的研究報告指出，現有文獻存在數個研究缺口，³這些缺口包括：

缺口 1：現有的有關生活素質的文獻對家庭生活和心靈素質的重點著墨並不充足。

缺口 2：探討兒童以及青少年期的生活素質研究相對較少。

缺口 3：有關華人地區生活素質的研究相對較少。

缺口 4：針對身處經濟不利環境人士生活素質的研究相對較少。

缺口 5：雖然不同學科的研究人員都會進行過有關生活素質之研究，但在不同領域生活質素的研究者並無太多交流，為不同學科提供交流的臺階也為數不多。

缺口 6：同一研究領域內比較不同國家生活素質的研究項目並不常見。

¹ D. T. L. Shek, Y. K. Chan and P. S. N. Lee, "Quality of Life in the Global Context: A Chinese Respons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1(1-3) (2005): 1-10.

² R. Veehoven, "Happy Life-expectancy: A Comprehensive Measure of Quality-of-life in Nation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9(1996): 1-58.

³ 同註 1; D. T. L. Shek, "Quality of Life of Chinese People in a Changing World,"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5(3) (2010): 357-361.

缺口 7：在如何評定整體生活素質的方面，目前仍有爭議：究竟客觀指標（如官方統計數據），還是主觀指標（如意見調查）能更準確地表現整體生活素質？

由於現今以華人社會（包括香港）為研究對象的「生活素質」研究相對較少，因此需要對現有的研究進行反思。⁴故此，本文有以下目的：第一，略述有關香港生活素質的主要資料來源，包括香港政府、商業機構、本地與國際非政府機構以及學術機構。第二，探討大型研究資料庫內所涵蓋有關香港的生活素質研究之特徵。第三，描述三個生活素質研究計劃，包括社會發展指標研究計劃（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Project）、社會發展指數研究計劃（Social Development Index Project）以及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生活素質指數研究計劃（CUHK Hong Kong Quality of Life Index Project），包括趨勢數據的結集。最後，文章將陳述對香港生活素質研究的主要觀察。

二、有關香港生活素質的資料來源

（一）由政府以及官方機構收集的生活素質資料

文獻回顧顯示，有數個政府部門及相關的組織進行生活素質研究。首先，不同的政府部門（特別是政府統計處）會整理香港社會發展的統計資料，並出版有關統計資料的研究報告。第二，各政策局和官方機構會定期進行研究，考查香港居民對香港社會的看法。例如，廉政公署會定期調查市民大眾對於香港貪污嚴重性的看法。第三，許多生活素質研究都由政府內的諮詢委員會負責進行。例如青年事務委員會曾就香港「雙失青年」問題的出現進行了數個研究，以瞭解這些青年的生活素

⁴ H. W. Chua, A. K. W. Wong, and D. T. L. Shek (in press, a), "Hong Kong (Settlement)," in *Encyclopedia of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edited by A. Michalos (Germany: Springer).

質。⁵同時，青年事務委員會對於香港年青人的情緒、生活素質、參與公民活動的程度以及社交網絡等普遍性論題也一直進行著研究。⁶最後，檢討兒童死亡個案先導計劃的檢討小組委員會曾進行研究探討在港引致兒童死亡的主要原因。⁷

（二）由商業機構收集的生活素質資料

許多有關香港生活素質的研究都是由商業機構進行的。例如，香港的美國商會定期利用生活素質、新聞自由和自然環境素質等指標來進行商業前景調查。⁸另一項由香港加拿大商會和香港城市大學合作的研究計劃則進行了一個「香港持續發展指數」的調查。⁹於 2003 年進行的一項基線調查顯示，香港最急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1) 教育制度；2) 維持經濟健康；3) 健康及衛生；4) 環境保護；5) 關懷社會和有道德的雇主；6) 城市規劃；7) 社區精神和健康；8) 人口政策；9) 公民自由和人權；以及 10) 和中國內地的融合。

此外，一些國際商業機構也會在香港進行生活素質研究，特別是在經濟信心和消費者信心的方面。例如萬事達卡¹⁰會定期在亞太區進行消費者信心調查 (Master Index of Consumer Confidence)。另一例子是由

⁵ D. T. L. Shek and B. M. Lee, “‘Non-engaged’ Young People in Hong Kong: Key Statistics and Observ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olescent Medicine and Health* 16(2) (2004): 145-163.

⁶ Commission on Youth, *Benchmark Study on Civic Engagement and Social Networks of Youth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me Affairs Bureau,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05).

⁷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Final Report of the Review Panel of the Pilot Project on Child Fatality Review* (Hong Kong: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10).

⁸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Hong Kong, *2004 Business Outlook Survey* (Hong Kong: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Hong Kong, 2004);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Hong Kong, *Third Annual Survey Focuses on Air Pollution and Remedies* (Hong Kong: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Hong Kong, 2008).

⁹ C. Francis, 2008, “Environment, Education Top Hong Kon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CityU News Centre Website, URL = <http://www6.cityu.edu.hk/puo/CityUMember/Story/Story.aspx?id=20081120170308>. (2011/12/28 瀏覽)

¹⁰ Master Card, 2010, “Masterindex of Consumer Confidence,” MasterCard Worldwide Website, URL = http://www.masterintelligence.com/upload/257/24/3hongkong_cc.swf. (2011/12/30 瀏覽)

ACNielsen¹¹所做的全球消費者信心指數調查（Global Consumer Confidence Report）。

（三）由本地非政府機構進行的生活素質研究

許多本地非政府機構也進行過香港生活素質的調查。在社福界，不少社會福利機構都曾研究過社會上不同群體的生活素質，包括有特殊需要人士的生活素質。例如，香港青年協會¹²在一個有關 80 後對生活素質看法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大部分受訪者對於貧富懸殊以及社會流動性都有所擔憂。其他由非政府機構進行的生活素質研究之範圍亦包括香港成年人的心理健康。例如，石丹理（Daniel Tan Lei Shek）與曾潔雯（Sandra Tsang）¹³曾對育有弱智孩子的父母進行普遍健康問卷調查，以瞭解他們的精神健康狀態，結果顯示 23.8%的受訪父母可被界定為「有心理風險」。而另一項採用中文普遍健康問卷對香港在職父母進行調查的研究結果，¹⁴亦顯示 26.5%的參與者可被視為表現出過度的心理症狀。

（四）由國際非政府機構進行的生活素質研究

在國際非政府機構所進行的研究中，有不少將香港與世界上其他地區的生活素質資料進行了比較。例如，由世界銀行編制的世界發展指標可以反映出不同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如收入和貧困的分佈情況。¹⁵類似的研究還包括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出版的「人類發展報告」，其中詳

¹¹ ACNielsen Company, *Global Consumer Confidence Report, 3rd Quarter 2011* (New York: The Nielsen Company, 2011).

¹² Commission on Youth, *Longitudinal Study on Civic Engagement and Social Networks of Yout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me Affairs Bureau,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10).

¹³ D. T. L. Shek and S. Tsang, *Care-givers of Preschool Mentally Handicapped Children in Hong Kong: Their Stress, Coping Resource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Hong Kong: Heep Hong Society for Handicapped Children, 1993).

¹⁴ D. T. L. Shek and J. W. K. Mak, *A Study of Life Stress of Working Parent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 1986).

¹⁵ Union Bank of Switzerland, *Prices and Earnings: A Comparison of Purchasing Power around the World* (Zurich: Union Bank of Switzerland, 2006).

述了世界上不同地區的社會狀況。在 2011 年的人類發展報告¹⁶中，香港的人類發展指數（0.898）在 187 個地區中排名第 13，相對其在 1980 年（0.708）、2000 年（0.825）和 2005 年（0.850）的指數均為高。此外，香港亦獲界定為一個高度人類發展的地區。

一些國際非政府機構也曾研究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生活素質。新經濟基金會¹⁷的一項近期研究顯示，香港在 178 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 88。雖然香港人的平均壽命相對較長（81.6 歲，在數據編碼的交通燈顯示方式中屬綠色區域），但香港人對生活的滿意度僅有中等程度，數字為 6.6（在數據編碼的交通燈顯示方式中屬黃色區域）。

（五）由學術機構進行的生活素質研究

在香港的生活素質研究種類繁多，大致具有以下特點。第一，許不同的學科，包括經濟、醫學、地理、心理、社會學、社會工作和教育，都有過生活素質方面的研究。¹⁸第二，目前的生活素質研究涵蓋了生活素質許多不同的方面，包括客觀生活素質、¹⁹主觀生活素質²⁰以及對社會狀況的看法。²¹在心理健康的研究中也會探討各種心理症狀和正面精神健康。第三，學術機構曾進行有關總體人口、²²在不同生命階段的群

¹⁶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2009).

¹⁷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The Happy Planet Index* (London: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2006).

¹⁸ D. T. L. Shek, Y. K. Chan, and P. S. N. Lee, editor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Series (vol. 25):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in Chinese, Western and Global Contexts*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2005).

¹⁹ Y. K. Chan, C. C. A. Kwan, and D. T. L. Shek, "Quality of Life in Hong Kong: The CUHK Hong Kong Quality of Life Index,"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1(1-3) (2005): 259-289.

²⁰ D. T. L. Shek, "Economic Stress, Emotional Quality of Life, and Problem Behavior in Chinese Adolescents with and without Economic Disadvantag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1(1-3) (2005a): 363-383.

²¹ S. K. Lau, M. K. Lee, P. S. Wan, and S. L. Wong,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2004*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5).

²² 同註 21。

體²³和有特別需要的人群²⁴的生活素質研究。第四，部分研究專門探討香港人的生活素質，而有些則會拿香港的生活素質和其他國家的作出比較²⁵。那麼，由學術機構進行的香港生活素質研究在概念和方法上有何特徵？表 1 總結了可以在大型學術資料庫內檢索到的有關研究資料：可以看出，在華人社會中有關「生活素質」的研究相對西方社會為少。為瞭解在港進行的生活素質研究之性質，石丹理和李德仁（Tak Yan Lee）²⁶分析了已出版並收入大型學術資料庫（包括 PsycINFO、Sociological Abstracts、Social Work Abstracts、Eric、Medline 和 CINAHL）的有關香港生活素質的論文。從此評述中，我們可以發現幾個特徵。首先，現有已出版並能於大型資料庫中找到的研究材料大部分都是實證研究性資料。第二，已出版的研究材料大部分都從微觀角度來定義生活素質，例如從心理健康和主觀生活素質的角度來作出定義。第三，大部分已出版的研究材料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以量化的方法為主。第四，在研究的人生階段方面，生活素質的研究對象大部分為成年人和年長者。第五，對總體人口的生活素質研究中，研究有特別需要人士（例如癌症病人和智障人士）的生活素質研究相對較多。最後，現有研究很少直接比較香港和其他國家的生活素質。不過，由於一些研究生活素質的學者可能並沒有將他們的研究稱為生活素質研究，我們應當審慎詮釋上述觀察。一個簡單例子是，許多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研究員都不會將自己的研究分類為生活素質研究，雖然心理健康是生活素質的一部分。

²³ A. Lau, and K. McKenna, "Self-perceived Quality of Life of Chinese Elderly People in Hong Kong," *Occupational Therapy International* 5(1998): 118-139; 同註 20。

²⁴ A. Lau, and K. McKenna, "Perception of Quality of Life by Chinese Elderly Persons with Stroke,"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An International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24(2002): 203-218.

²⁵ D. T. L. Shek, B. M. Lee, and J. T. W. Chow, "Trends in Adolescent Suicide in Hong Kong for the Period of 1980 to 2003," *The ScientificWorldJOURNAL* 5(2005): 702-723.

²⁶ D. T. L. Shek and B. M. Lee,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Quality of Life (QOL) Research in Hong Kong," *The ScientificWorldJOURNAL* 7(2007): 1222-1229.

三、包含趨勢數據的生活素質研究計劃

(一) 社會發展指標研究計劃

(The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Project)

社會發展指標研究計劃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及香港大學負責進行，旨在探索香港居民在 1997 年前後的生活素質及社會健康狀況。為此目標，該研究計劃從 1998 年開始，展開了一系列社會指標的調查，至今已完成了共 8 個主要的調查研究。²⁷

社會發展指標調查著重「主觀」生活素質感受而非「客觀」生活狀況，因此調查集中在主觀生活素質上，主要研究香港居民對自己生活各方面的感受、看法、價值觀以及期待。每項調查基本上分為兩個部分。所有受訪者均須回答第一部分，即關於受訪者對生活素質看法的一些核心問題。而在第二部分，受訪者中的不同次樣本則回答按特別主題分門別類的各個單元的問題。

「社會發展指標研究計劃」問卷的核心分為幾個部分，其中最主要的部分為受訪者的主觀健康，問題圍繞著 20 個生命範疇、9 個個人生活

²⁷ S. K. Lau, M. K. Lee, P. S. Wan and S. L. Wong,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88*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1); S. K. Lau, M. K. Lee, P. S. Wan and S. L. Wong,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0*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2); S. K. Lau, M. K. Lee, P. S. Wan and S. L. Wong,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3*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5); S. K. Lau, M. K. Lee, P. S. Wan and S. L. Wong,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5*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7); S. K. Lau, M. K. Lee, P. S. Wan and S. L. Wong,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7*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9); S. K. Lau, M. K. Lee, P. S. Wan and S. L. Wong,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9*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1); S. K. Lau, M. K. Lee, P. S. Wan and S. L. Wong,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2001*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 S. K. Lau, M. K. Lee, P. S. Wan and S. L. Wong,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2004*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5).

以及 11 個社會狀況等方面展開。受訪者被問及他們對每個特定範疇的滿意度，並要求從 5 個等級中選擇他們滿意的程度（即：「非常不滿意」、「不滿意」、「普通」、「滿意」或「非常滿意」），而對題目沒有意見或不願回答的受訪者可揀選沒有等級的選擇項目（「不知道」或「不願作答」）。個人生活的 9 個方面包括家庭生活、教育程度、健康狀況、財政狀況、工作、與朋友的關係、與親戚的關係、居住環境以及空暇時間。社會狀況的 11 個方面則為整體經濟狀況、公眾秩序、整體政治狀況、香港政府的表現、交通、房屋、醫療服務、教育、社會福利、就業狀況以及康樂設施。問卷最後有一項評估受訪者對生活整體滿意度的問題，以及一項詢問受訪者快樂生活最基本元素（健康、心境平和、金錢、子女孝順、自由、愛、婚姻和家庭、事業、物質享受、社會貢獻或其他）的問題。

雖然評估 20 個生命範疇的問題涉及健康的不同方面，研究亦探討影響整體生活素質的要素。事實上，有關 20 個生命範疇的問卷答案已被整合，並建構出計算香港受訪者整體健康快樂感的生活素質量表。²⁸

此外，「社會發展指標研究計劃」問卷的核心部分亦包括了以下問題，例如對大眾傳媒的滿意度；對三年後生活素質的預期；認為香港的社會問題有多嚴重以及解決這些問題有多迫切；如何看待香港和中國大陸關係愈加密切的優劣影響等。

（二）社會發展指數（Social Development Index, SDI）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開展了對香港社會發展指數的研究。與社會發展指標研究計劃不同，社會發展指數的研究不包括對主觀生活素質的研

²⁸ S. M. Shen and Y. L. Lai, "Social Well-Being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1988-1997," in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7*, edited by S. K. Lau, M. K. Lee, P. S. Wan, and S. L. Wong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9), pp. 1-37.

究，而是採用客觀指數來瞭解香港人的生活素質。²⁹Richard Estes 負責進行的第一次社會發展指數研究（即 SDI-2000），³⁰建立了 SDI 的框架和資料庫。此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成立了社會發展專責委員會，由 Richard Estes 擔任 2002 至 2005 年的委員會主席。³¹迄今為止，該委員會共發表了 6 份社會發展指數報告（SDI-2000、SDI-2002、SDI-2004、SDI-2006、SDI-2008 及 SDI-2010）。

社會發展指數研究最初的目標有以下幾項（SDI-2000）：1）建立一個分析工具，以評估香港特別行政區多年來社會、政治和經濟上需要的改變；2）分析香港 19 年（1981 年至 2000 年）來正面與負面的發展趨勢；3）評估香港「歷史上屬於弱勢群體的人口」之生活素質，包括婦女、長者、兒童、年輕人和低收入家庭；4）以東亞地區內外的社會為參考，評估香港的社會發展模式；及 5）與香港有關各方合作，促進香港社會和經濟更平衡的發展。³²

SDI-2000 的發展有賴研究人員、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和一專家小組的合作。綜合各方（例如專家小組）的意見和經過初步工作後，包含了不同指標的 14 個範疇（即 14 個分類指數）的香港生活素質指數終告完成。揀選哪些有關指標放進分類指數內有幾個準則，包括表面效度、建構效度、可靠性、代表性、準確性、時效性、可用性以及跟其他任何適用的國際和比較分析所採取方法的可比性。³³

²⁹ R. Estes, "Quality of life in Hong Kong: Past Accomplishments and Future Prospect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1(2005): 183-229;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Soci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The Unfinished Agenda*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2000).

³⁰ R. Estes, "Quality of Life in Hong Kong: Past Accomplishments and Future Prospect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1(2005): 183-229.

³¹ H. W. Chua, A. K. W. Wong and D. T. L. Shek, in press, "Social Development Index (SDI)," in *Encyclopedia of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edited by A. Michalos (Germany: Springer).

³² 同註 30。

³³ 同註 30。

社會發展指數包含了 14 個範疇（即 14 個分類指數）共 47 個指標的資料。這 14 個分類指數分別為：公民社會分類指數（4 個指標）、政治參與分類指數（3 個指標）、國際化分類指數（3 個指標）、經濟分類指數（3 個指標）、環境素質分類指數（4 個指標）、藝術和娛樂分類指數（4 個指標）、體育及康樂分類指數（3 個指標）、科學和技術分類指數（2 個指標）、教育分類指數（3 個指標）、健康分類指數（6 個指標）、人身安全分類指數（3 個指標）、房屋分類指數（2 個指標）、罪案和公共安全分類指數（4 個指標）及家庭凝聚力分類指數（3 個指標）。

除以上 14 個分類指數外，SDI-2000 亦涵蓋了有關香港「歷史上屬於弱勢群體的人群」特定人群的分類指數，包括婦女地位分類指數（5 個指標）、低收入分類指數（5 個指標）、兒童地位分類指數（7 個指標）、青少年地位分類指數（7 個指標）及長者地位分類指數（7 個指標）。雖然這些分類指數可讓我們更全面地瞭解香港各個人口組別的生活素質，但並沒有包括在綜合社會發展指數評分的計算中。

同時，社會發展指數研究也採用了既往的主觀生活素質資料來進行對比，其中 1981 年、1986 年、1991 年、1996 年和 1998 年的資料用於 SDI-2000 分析的基礎。每個時間點的不同香港生活素質指標均以標準加權分數表達，1991 年為基準值，設為 100，具體包括：1）香港整體狀況指標以；2）14 個 SDI 分類指數內的分類指標；3）5 個特定人群（「歷史上屬於弱勢群體」的人群）分類指數內的分類指標來表達。

有兩種方法可以研究香港生活素質一直以來的「轉變」。第一，就不同時間點（例如 1981 年、1986 年、1991 年、1996 年和 1998 年）14 個分類指數內的分類指標對香港發展作出橫切面分析，可以大概瞭解生活素質在這段時間內的轉變。第二，利用趨勢值來評估香港從 1986 年至 1996 年期間社會發展的轉變，例如可以將 1998 年的趨勢值（即 T-1998 數值）與 1986 年至 1996 年這個基準時期的值進行比較計算。這些數值可為社會發展指數 14 個分類指數分別提供長期發展轉變速度的估計。值得注意的是，基於專家小組的意見，綜合社會發展指數和分類指數值

是以統計加權指數來計算的。社會發展指數此後的報告（SDI-2002、SDI-2004、SDI-2006、SDI-2008 及 SDI-2010）也有製作類似的指數和加權指數。

SDI-2008 的結果有數個重要發現。³⁴首先，香港社會發展穩步上升。與 1991 年（分數=100）、1996 年（分數=122）、1998 年（分數=129）、2000 年（分數=139）、2002 年（分數=144）和 2004 年（分數=158）比較，2006 年的社會發展指數綜合評分爲 170。第二，以 1986 年至 1996 年爲基準年，除家庭凝聚力這方面外，2006 年的其他各個方面都錄得正面的社會發展轉變。第三，儘管社會發展的各個範疇都有進步，值得關注是，家庭凝聚力大幅下跌。最後，研究 SDI-2000、SDI-2002、SDI-2004、SDI-2006 和 SDI-2008 的分類指數所得出的社會發展趨勢顯示，兒童、年輕人和低收入家庭等特定人群的發展在所有社會發展指數報告中都錄得負面結果。最新發表的社會發展指數（SDI-2010）研究顯示，上述趨勢依然存在。例如在家庭凝聚力方面，SDI-2010 錄得最大的下跌。³⁵

（三）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生活素質指數

與使用官方資料或調查數據進行研究的「社會發展指標研究」計劃及「社會發展指數」不同，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生活素質指數等研究同時採用客觀和主觀的資料及數據，研究較爲全面。建立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生活素質指數旨在：（1）測量和監察 21 世紀香港的生活素質；（2）團結有關各方共同參與促進香港的生活素質；（3）爲政策制定者和社會提供有用的香港生活素質統計資料；及（4）引起公眾對生活素質這類課

³⁴ H. W. Chua, A. K. W. Wong and D. T. L. Shek, "Soci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Development Issues Identified by Social Development Index (SDI),"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5(3) (2010): 535-551.

³⁵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Soci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The Unfinished Agenda*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2000).

題的關注。³⁶這一指數有 3 個分類指數（社會文化分類指數、經濟分類指數和環境分類指數），共包括 21 個具體指標。

社會文化分類指數有 10 個指標，包括標準死亡率（每 1000 標準人口）、出生時預期壽命、健康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GDP）的比例、須呈報的傳染病的發病率、壓力指數、整體生活滿意指數、新聞自由指數、新聞批評指數、政府表現指數以及整體罪案率。經濟分類指數有 7 個指標，包括住房負擔能力比率（每年平均可負擔的樓價）、租金指數、失業率、當前經濟狀況指數、實質工資指數、教育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GDP）的比例以及本地大學第一個學位課程和研究生課程的年齡參與率。最後，環境分類指數（4 個指標）由空氣指數、水質指數、噪音指數（每 1000 人）和都市固體廢物回收率組成。

每個分類指數都有一個綜合生活素質分數。這 3 個分類指數的生活素質分數加起來就能得出綜合生活素質分數。研究以 2002 年為基準年，當年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生活素質指數為 100。如某年的指數超過 100，即可認為該年香港的生活素質高於 2002 年。如指數低於 100；則該年香港的生活素質低於 2002 年；如指數等於 100，即可認為該年香港的生活素質與 2002 年相當。在 3 個分組中，社會文化分類指數在綜合指數內所佔比例最大，環境分類指數比例最小。這些分類指數可用於深入研究公眾關注的一些重要領域，而綜合指數則反映整體生活素質。

在 21 個指標中，有 6 個由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編製，分別為壓力指數、整體生活滿意指數、新聞自由指數、新聞批評指數、政府表現指數以及當前經濟狀況指數，所有指標均測量個人主觀感受。其中，4 個香港中文大學生活素質指數（壓力、新聞自由、政府表現和整體生活滿意指數）基於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的一項調查資料編製。該調查以概率抽樣方法在 18 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中選出受訪者，

³⁶ 同註 19。

並根據結構式問卷以電話（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等方式對受訪者進行訪問。

最新公佈的 2010 年香港中文大學生活素質指數中，可得到數個較為重要的觀察。首先，從整體生活素質上看，2008 年後的 3 年普遍下降。第二，在分類範疇方面，雖然社會分類指數（由 2009 年的 46.24 升至 2010 年的 51.14）和環境分類指數（由 2009 年的 23.77 升至 2009 年的 24.51）的生活素質分數上升了，但經濟分類指數（由 2009 年的 31.51 跌至 2010 年的 28.53）則惡化了。第三，有 8 個指標相較 2001 年為差，包括醫療公共開支、新聞自由指數、政府表現指數、負擔能力比率、實質租金指數、實質工資指數、公共教育開支及空氣指數。

四、香港生活素質研究所得的主要觀察

如果一個普通人問香港人的生活素質是「好」還是「不好」，「幸福」還是「不幸福」，我們會作何回答？鑑於生活素質的多面性（例如個人、家庭和社會生活素質）及其所包含的不同概念，這個問題並不易回答。而不同的研究所採用的方法也不同，令問題更加複雜化。在本節，作者將嘗試從現有的香港生活素質研究中找出主要的觀察，特別是從趨勢資料得到的觀察。

（一）觀察一：1997 年後香港生活素質有所改善

不同的資料來源顯示香港人的生活素質在過去十多年內穩步改善。首先，從 2011 年人類發展報告中的人類發展指數（由 1980 年的 0.708 到 2011 年的 0.898）中可以看出，香港一直在逐步發展。此外，香港也被列為人類「極高度」發展的一個地方。第二，反映多年來整體社會發展的標準社會發展指數評分亦顯示出，香港整體生活素質穩步提高。1991 年和 2008 年的標準權重社會發展指數得分分別為 100 和 172。至於社會發展指數的各個分類指數，除家庭凝聚力外，大部分範疇都有所改善。最後，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生活素質指數的結果進一步顯示，歷年

來整體生活素質均有所改善：整體生活素質指數得分於 2002 年為 100，於 2006 年為 108.93，儘管近年得分輕微下降。簡而言之，從主要包含官方統計資料的重要國際和本地資料庫上看，香港生活素質一直在逐步改善。

（二）觀察二：雖然香港整體生活素質不斷改善， 但某些社會群體的生活素質有所下降

社會發展指數顯示兒童、青少年和低收入家庭的發展歷年來有所惡化。這些觀察表明，雖然香港的整體生活素質在過去 20 年來逐步改善，但有些群體卻未能從中獲益。據青年事務委員會³⁷的資料顯示，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年輕人比例在過去 10 年間有所增加。1991 年居住在低收入家庭的 15 至 19 歲青少年的百分比為 11%，而此百分比在 2000 年攀升至 18.3%。對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人群的統計資料，亦顯示香港年輕人的貧窮問題越來越嚴重。³⁸根據社會福利署的資料，從 1996 年到 2002 年，領取綜援的年輕人數大幅上升，2002 年的數字為 40,694；³⁹領取綜援的年輕人佔領取綜援人士總人數百分比由 1996 年的 5.7% 上升至 2002 年的 9.0%。申請學生資助辦事處學校書簿津貼計劃的中小學生人數也反映出年輕人的貧窮問題。社會發展指數（2010）的數據亦指出，兒童分類指數由 SDI-2000 的負 70 持續下降至 SDI-2010 的負 294。整合幾個資料來源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到過去幾年經濟上處於劣勢的年輕人人數有所增加。

正如石丹理⁴⁰在討論香港社會壓力的文章中所做的總結，「整體並不等於不同部分的總和」。也就是說，現有的流行病學研究和官方統計雖

³⁷ Commission on Youth, *Youth in Hong Kong: A Statistical Profile 2002 (Appendix)* (Hong Kong: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03).

³⁸ 同註 37。

³⁹ 同註 7。

⁴⁰ D. T. L. Shek, "Social Stress in Hong Kong," in *Social Development Index*, edited by J. Est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67-181.

然可以讓我們對總體人群廣泛面對的社會壓力有一個大概的認識，但這些資料不一定能讓我們清楚地瞭解社會上一些特別群體所面臨的社會壓力。

（三）觀察三：1997 年後，主觀生活素質下跌

從社會發展指標研究計劃⁴¹的結果可以看到，香港人主觀生活素質在 1997 年後有所下降。過去 10 年，雖然香港人均生產總值逐漸上升，但整體生活滿意度卻朝相反方向發展。⁴²換言之，經濟狀況的改善並沒有提升香港人的主觀生活素質。香港大學民意調查計劃⁴³定期調查公眾對香港各方面發展的看法，其統計資料亦有類似的發現：與 1997 年收集到的結果相比，2006 年的受訪者認為香港在民主、自由、繁榮、穩定、公平、文明和法治等方面均較差。

（四）觀察四：各種預警信號提示未來香港生活素質可能會下降

我們發現不同的研究結果都預示了未來香港生活素質下降的風險。首先，社會發展指數清楚指出，家庭凝聚力下降是一個重要問題。事實上，在社會發展指數的各個報告（SDI-2000、SDI-2002、SDI-2004、SDI-2006、SDI-2008 及 SDI-2010）中，家庭凝聚力是唯一一個下跌的指標。第二，社會發展指標研究計劃的受訪者認為，教育、失業、收入不均、貪污和健康服務等範疇均有所惡化。第三，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生活素質指數發現，在健康方面的公共開支佔香港人均生產總值的比例、新聞批評指數、以及香港人的房屋負擔能力指數都有所下降。

⁴¹ S. K. Lau, M. K. Lee, P. S. Wan and S. L. Wong,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2004*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5).

⁴² 同註 40。

⁴³ Public Opinion Poll Program, 2006, *Social Indicators Surveys 1-6/987 to 7-12/06*, URL = <http://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socind>. (2012/03/03 瀏覽)

雖然香港總是為其歷年來的經濟增長而自豪，但越來越多跡象顯示，香港的收入不均問題越來越嚴重。例如，反映貧富懸殊的堅尼係數，其數值歷年來明顯上升（由 1971 年的 0.430、1976 年的 0.429、1981 年的 0.451、1986 年的 0.453、1991 年的 0.476、1996 年的 0.518，到 2001 年的 0.525，以及 2011 年的 0.533）。⁴⁴此外，由於香港的經濟轉型過程步履艱難，中年失業始終構成香港的一大社會問題。

再者，有研究者認為香港人為實現「經濟奇蹟」所付的代價並不小。近期一項有關香港人工作時數的研究發現，香港勞動人口的工作時數為全世界第二高⁴⁵。此外，有研究結果亦顯示，香港人，尤其是香港青少年的自殺率逐漸上升。⁴⁶同時，研究發現，香港人的精神健康問題亦非常普遍。據香港健康情緒中心估計，12%的香港人表現過度抑鬱症狀、10%的人有社會焦慮症狀（10%），7%的人存在身心症狀。⁴⁷

最後，亦有研究顯示香港家庭生活素質值得關注，這與社會發展指數研究中家庭凝聚力下降的結果一致。近期，石丹理等人⁴⁸在一份比較香港和上海在育兒以及父母與青少年關係素質方面的研究報告中指出，香港青少年比上海青少年受到較少的父母行為控制、較高的父母心理控制和較差的親子關係素質。

（五）觀察五：個人的主觀生活素質與不同系統的因素有關

既往有關主觀生活素質的研究已發現數個與主觀生活素質相關的因素類別。首先，部分個人因素與主觀生活素質相關。例如，年齡與青

⁴⁴ Commission on Poverty, 2006,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of Poverty*, URL = http://www.cop.gov.hk/eng/income_disparity.htm. (2012/03/03 瀏覽)

⁴⁵ 同註 15。

⁴⁶ 同註 25。

⁴⁷ Hong Kong Mood Disorders Center, 2006, *Surveys on the Emotional Health of Hong Kong People*, URL = <http://www.hmdc.med.cuhk.edu.hk/report>. (2012/03/03 瀏覽)

⁴⁸ D. T. L. Shek, X. Y. Han, and B. M. Lee, "A Comparative Study on Perceived Parental Control Processes and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al Qualities Among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and Shanghai," *Society* 26(2006): 137-157. (In Chinese)

少年的絕望感呈線性正相關；⁴⁹女性相比於男性，家庭生活素質普遍較高；⁵⁰對未來的樂觀感與個人對自己和環境範疇的滿意度呈正相關。⁵¹

主觀生活素質亦與不同的生態因素有關。首先，大量文獻指出，不同的家庭因素，例如家庭運作和養育子女的過程都會影響香港青少年的主觀幸福感。⁵²第二，研究發現人際關係因素（例如社會資本，包括社交支持）與個人心理健康有關。⁵³第三，宏觀社會因素與主觀生活素質密切相關。研究結果顯示，經濟不利環境和貧窮與青少年心理健康相關。⁵⁴此外，客觀社會階層及主觀社會階層亦影響主觀生活素質。

（六）觀察六：從某些指標上看，香港的生活素質 高於中國內地

不同方面的數據顯示，香港的生活素質比中國內地的生活素質為佳。根據世界人類發展報告⁵⁵，香港的人類發展指數比中國內地為高。香港屬於「極高」人類發展的地區，而中國內地只屬「中等」。第二，現有自殺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內地的自殺率高於香港。⁵⁶其中，中國農

⁴⁹ D. T. L. Shek and T. Y. Lee, "Hopelessness in Chinese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Demographic and Family Correl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olescent Medicine and Health* 17(3) (2005): 279-290.

⁵⁰ D. T. L. Shek, "Chinese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Family Functioning: Personal, School-related, and Family Correlates," *Genetic, Social, and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128(4) (2002a): 358-380.

⁵¹ S. L. Wong and V. Zheng, 2005, "Social Anticipation and Social Reality," in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2004*, edited by S. K. Lau, M. K. Lee, P. S. Wan, and S. L. Wong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p. 285-328.

⁵² D. T. L. Shek, "Paren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 Longitudinal Study in a Chinese Context," *Genetic, Social, and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125(1) (1999a): 27-44; D. T. L. Shek, "Paternal and Maternal Influences on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Chinese Adolescents," *Genetic, Social, and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125(3) (1999b): 269-296.

⁵³ D. T. L. Shek, "Interpersonal Support and Conflict and Adjustment of Chinese Adolescents with and without Economic Disadvantage," in *Advances in Psychology Research* vol. 18, edited by S. P. Shohov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02), pp. 63-82.

⁵⁴ 同註 25。

⁵⁵ 同註 16。

⁵⁶ 同註 25。

村地區的高自殺率令人尤為震驚。第三，部分比較研究採用現有內地學者發展出的生活素質指數，發現香港的生活素質高於中國內地。例如，一份基於中國內地學者發展出的 16 個指標的報告指出，在整體社會發展方面，香港排名第 25 位，而中國內地僅排名第 66 位。⁵⁷

（七）觀察七：不同研究的結果並不一致，甚至相反

以上觀察綜合了不同研究的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現有的各種生活素質研究得出的結論並非完全一致，甚至相反。雖然客觀生活素質測量標準顯示香港生活素質有所改善，但主觀生活素質研究的結果恰恰相反。例如人類發展指數和社會發展指數得出的結論非常正面：香港的生活素質不但整體較高，而且在過去 20 年中有顯著的改善。然而，社會發展指標研究計劃的結論則表明，儘管香港歷年來經濟持續增長，市民卻感到越來越不滿。另一例子是雖然教育範疇的社會發展指數顯示多年來香港的教育一直在進步，但市民對教育制度滿意度卻有所下降。⁵⁸最後一個例子與貪污有關。2006 年，香港的國際透明清廉指數⁵⁹在 193 個國家中排名第 15 位，但有研究表明，76% 的受訪公司認為他們在過去五年中曾因競爭對手行賄而蒙受業務損失。⁶⁰

（八）值得注意的研究方法問題

現有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真實」反映了香港的生活素質？在我們詮釋現有研究結果時，有幾個研究方法上的問題值得注意。首先，要看

⁵⁷ Z. F. Zhu, "New Measures to Assess Social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and Social Benefits of Social Indicators," in *New Frontiers of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edited by S. K. Lau, P. S. Wen, M. K. Lee, and S. L. Wong (Hong Kong: Hong Kong, 1996).

⁵⁸ S. K. Lau, M. K. Lee, P. S. Wan, and S. L. Wong,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2004*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5).

⁵⁹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06, *The 2006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URL = <http://www.infoplease.com/ipa/A0781359.html>. (2012/03/03 瀏覽)

⁶⁰ Control Risks and Simmons and Simmons, 2006,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ttitudes to Corruption – Survey 2006*, URL = http://www.controlrisks.com/PDF/corruption_survey_2006_V3.pdf. (2012/03/03 瀏覽)

現有主要生活素質文獻中所採用指標能否代表香港人的生活素質。如果假定我們可以通過定量的方法如實反映生活素質的發展趨勢，那麼下一個要問的問題就是應該如何挑選指標。社會發展指數中採用的指標是基於詳細的文獻回顧和專家小組的意見。對此，持批評意見的學者可能會質疑這樣的指標過於著重專家片面的意見而無法充分表達弱勢群體的想法；著重實證的研究者可能會質疑所選的指標是否具有足夠的代表性和有效性；建構主義學派的研究者可能會質疑採用官方統計資料能否充分反映社會發展的多變性。而對於社會發展指標研究計劃中採用的生活素質指標，學者們亦可質疑為何社會公義、人民的心靈素質、社會和諧以及全球化等重要範疇並沒有包括在主觀幸福感的測量範圍內。

與主觀生活素質研究最相關的一個挑戰就是——主觀生活素質這個概念及其組成部分（主要來自享樂主義）是否適用於中國人？傳統儒家思想認為，理想的人生並非建基於個人滿足感，而是個人是否履行了五倫的職責。佛教思想亦認為理想的人生不在於個人的滿足，而在於犧牲和承受苦難。傳統道家思想也認為理想的人生不應僅僅基於個人對生活的滿足，而是應建基於個人、他人和自然之間的和諧。此外，華人社會總體上以集體主義為導向，而主觀生活素質的概念建基於自我，「一個自主的人」，因此，主觀生活素質對中國人來說究竟有多重要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論題。⁶¹

第二個研究方法上的問題，是生活素質測量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程度。最基本的問題是，現有研究大多採用單一指標去評估生活素質的不同方面。以社會發展指標研究計劃為例，該研究只採用了數個單一指標去評估不同個人範疇（例如和朋友、家人、親戚等關係的滿意度）和環境範疇（例如交通和香港政府）的滿意度。顯然，用單一指標簡單、方便，但它們的可靠性和有效程度則很難確定。雖然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已

⁶¹ H. Markus and S. Kitayama,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8(1991): 224-253.

得出了評估生活素質的綜合指標，⁶²遺憾的是這些綜合指標並沒有在之後的調查和分析中得以廣泛應用。經典測驗理論認為，觀察所得的評分包括三大部分：真實得分、隨機誤差的得分以及反映系統誤差的得分。如果主觀生活素質採用單一指標，則隨機誤差和系統誤差對得分的影響較大，因此我們應審慎對待以單一指標計算出來的研究結果。

第三個有關研究方法的問題是：生活素質的測量工具在華人社會的驗證研究是否充分？縱觀現有文獻可以發現，除少數例外⁶³，現有生活素質測量工具的本土化驗證研究不多，特別是以一般人群為樣本的研究。而專門用於測量中國人心理社會功能的方法和工具亦很少見⁶⁴，包括對生活素質的測量。⁶⁵顯然，該領域未來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發展和驗證適用於本地的生活素質測量工具。

第四個研究方法的問題與數據的整合有關。觀察香港生活素質文獻可以發現，很少文獻嘗試整合有不同來源和以不同方法收集的生活素質資料。回顧香港三大生活素質資料庫：社會發展指標研究計劃主要以調查收集主觀生活素質資料，社會發展指數研究計劃則主要利用官方統計資料，而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生活素質指數就結合了以電話訪問收集回來的主觀生活素質資料，以及從官方統計數據收集而來的客觀生活素質資料。

第五個研究方法問題與對生活素質水平和改變的詮釋有關。目前有兩種方法用於測量一段時間內生活素質的水平和改變。第一種方法是首先挑選一個特定年份或時段作為「基準年」，之後的年份就基於基準年

⁶² 同註 28；A. M. H. Siu and D. T. L. Shek,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Problem Solving and Indicators of Interpersonal and Family Well-being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1(2005): 517-539.

⁶³ A. Lau, R. A. Cummins, and W. McPherson,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ross-cultural Equivalence of the Personal Wellbeing Index,"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2(2005): 403-430.

⁶⁴ D. T. L. Shek, editor, "Special Issue: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Chinese Communities,"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12(4) (2002): 485-581.

⁶⁵ 同註 1。

的情況解釋為向正面或負面發展。社會發展指數就採用了這個方法，每個分類指數基準分都設定為 100，以 1986 年至 1996 年的生活素質為依據來研究趨勢資料。同樣，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生活素質指數亦採用了這個方法，設定綜合 QOL 的基準分為 100。第二個方法是基於受訪者回答的描述來詮釋生活素質的「高」、「低」。例如如果受訪者「非常同意」自己與家人的關係較好，研究則會得出此人有較高的家庭生活素質的結論。這個方法通常用於評估主觀生活素質的研究。

顯然，以上兩種方法都存在局限性。第一種方法可以幫助研究者發現生活素質「相對」的改變，但這一改變完全取決於以哪個時間段作為基準，因此，其結論非常隨意。第二種方法的問題則在於其主觀性，存在應用常模參照模式還是標準參照模式來詮釋資料的問題。

從哲學的層面來看，也許最令人疑惑的是如何基於所選的生活素質指標來定義為一個「正面」或「負面」的社會。例如，離婚率上升代表社會的負面發展嗎？我個人認為是，但女權主義者可能並不這麼認為，而認為離婚象徵了女性的解放。同樣地，科學和科技的進步代表社會的正面發展嗎？一個世紀以前我們可能會這樣認為。然而，當我們發現自己的工作時間也隨著科學與科技的進步逐漸增加，電腦和互聯網的出現讓我們可以 24 小時地不停工作，我們就會開始思索社會發展的真正含義。這些都取決於對一個重大問題的思考——價值的取向和選擇，這對如何詮釋香港主要生活素質資料庫的研究結果至關重要。

第六個研究方法問題與現有主觀生活素質調查的回應率有關。分析發現，社會發展指標研究計劃各項調查的回應率都不太高，而且有越來越低的趨勢：1988 年、1990 年、1993 年、1995 年、1997 年、1999 年、2001 年和 2004 年的調查問卷回應率分別為 62.7%、59.2%、54.9%、56.4%、50%、48.4%、51.1% 和 46.9%。Babbie 曾提出，⁶⁶「一般認為，用於分析和報告所需的最低回應率為 50%。60% 或以上的回應率屬於

⁶⁶ E. Babbie, *Survey Research Methods* (Belmont,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好，而 70%或以上的回應率則屬於很好」(第 182 頁)。以此作為一粗略的指引，1999 年和 2004 年調查的回應率不足，而其他年份的調查回應率也不高。

最後一個研究方法上的問題在於質性研究方法對探討香港人生活素質研究的作用。⁶⁷檢閱現有香港生活素質文獻可以發現，研究大多採用定量的研究方法。這些社會調查(如社會發展指標)和次級資料分析(如社會發展指數)可以得出香港生活素質的「客觀」剖面和發展趨勢圖，但這些「硬梆梆」的資料能恰當地反映出香港人真實鮮活的生活嗎？正如定性研究者所說，除了記錄現實中主流的聲音和靜態的一面之外，聆聽被忽略的「聲音」，觀察動態的一面亦同樣重要。而且，有「豐富描述」的個人經歷能幫助研究者進一步瞭解香港生活素質中最真實的方面。此外，根據社會建構主義的觀點，香港人生活素質的概念、評估和詮釋所包括的社會論述過程也十分重要，需要納入研究討論的範疇。

參考書目

- ACNielsen Company, 2011, *Global Consumer Confidence Report (3rd Quarter 2011)*, New York: The Nielsen Company.
-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Hong Kong, 2004, *2004 Business Outlook Survey*, Hong Kong: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Hong Kong.
-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Hong Kong, 2008, *Third Annual Survey Focuses on Air Pollution and Remedies*, Hong Kong: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Hong Kong.

⁶⁷ M. K. Lee, "Qualitative Social Indicators," in *Changing Chinese Societies: Social Indicators Analysis*, edited by S. K. Lau, P. S. Wen, M. K. Lee, and S. L. Wong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8), pp. 3-18.

- Babbie, E., 1998, *Survey Research Methods*, Belmont,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 Chan, Y. K., Kwan, C. C. A., and Shek, D. T. L., 2005, “Quality of Life in Hong Kong: The CUHK Hong Kong Quality of Life Index,”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1(1-3): 259-289.
- Chua, H. W., Wong, A. K. W., and Shek, D. T. L., 2010, “Soci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Development Issues Identified by Social Development Index (SDI),”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5(3): 535-551.
- Chua, H. W., Wong, A. K. W., and Shek, D. T. L., in press, a, “Hong Kong (Settlement),” in *Encyclopedia of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edited by A. Michalos, Germany: Springer.
- Chua, H. W., Wong, A. K. W., and Shek, D. T. L., in press, b, “Social Development Index (SDI),” in *Encyclopedia of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edited by A. Michalos, Germany: Springer.
- Commission on Poverty, 2006,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of Poverty*, URL = http://www.cop.gov.hk/eng/income_disparity.htm.
- Commission on Youth, 2003, *Youth in Hong Kong: A Statistical Profile 2002 (Appendix)*, Hong Kong: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 Commission on Youth, 2005, *Benchmark Study on Civic Engagement and Social Networks of Youth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me Affairs Bureau,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 Commission on Youth, 2010, *Longitudinal Study on Civic Engagement and Social Networks of Yout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me Affairs Bureau,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 Control Risks and Simmons and Simmons, 2006,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ttitudes to Corruption – Survey 2006*, URL = http://www.controlrisks.com/PDF/corruption_survey_2006_V3.pdf.

- Estes, R., 2005, "Quality of Life in Hong Kong: Past Accomplishments and Future Prospect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1: 183-229.
- Francis, C., 2008, November 20, *Environment, Education Top Hong Kon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CityU News Centre, URL=<http://www6.cityu.edu.hk/puo/CityUMember/Story/Story.aspx?id=20081120170308>.
- Hong Kong Mood Disorders Center, 2006, *Surveys on the Emotional Health of Hong Kong People*, URL=<http://www.hmhc.med.cuhk.edu.hk/report>.
- Lau, A., Cummins, R. A., and McPherson, W., 2005,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ross-cultural Equivalence of the Personal Wellbeing Index,"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2: 403-430.
- Lau, A. and McKenna, K., 1998, "Self-perceived Quality of Life of Chinese Elderly People in Hong Kong," *Occupational Therapy International* 5: 118-139.
- Lau, A. and McKenna, K., 2002. "Perception of Quality of Life by Chinese Elderly Persons with Stroke," *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An International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24: 203-218.
- Lau, S. K., Lee, M. K., Wan, P. S., and Wong, S. L., 1991,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88*,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au, S. K., Lee, M. K., Wan, P. S., and Wong, S. L., 1992,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0*,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au, S. K., Lee, M. K., Wan, P. S., and Wong, S. L., 1995,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3*,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au, S. K., Lee, M. K., Wan, P. S., and Wong, S. L., 1997,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5*,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au, S. K., Lee, M. K., Wan, P. S., and Wong, S. L., 1999,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7*,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au, S. K., Lee, M. K., Wan, P. S., and Wong, S. L., 2001,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9*,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au, S. K., Lee, M. K., Wan, P. S., and Wong, S. L., 2003,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2001*,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au, S. K., Lee, M. K., Wan, P. S., and Wong, S. L., 2005,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2004*,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ee, M. K., 1998, "Qualitative Social Indicators," in *Changing Chinese Societies: Social Indicators Analysis*, edited by S. K. Lau, P. S. Wen, M. K. Lee, and S. L. Wong,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p. 3-18.
- Markus, H. and Kitayama, S., 1991,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8: 224-253.
- Master Card, 2010, *Masterindex of Consumer Confidence*, URL=http://www.masterintelligence.com/upload/257/24/3hongkong_cc.swf.
-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2006, *The Happy Planet Index*, London: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 Public Opinion Poll Program, 2006, *Social Indicators Surveys 1-6/987 to 7-12/06*, URL=<http://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socind>.

- Shek, D. T. L., 1999a, "Paren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 Longitudinal Study in a Chinese Context," *Genetic, Social, and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125(1): 27-44.
- Shek, D. T. L., 1999b, "Paternal and Maternal Influences on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Chinese Adolescents," *Genetic, Social, and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125(3): 269-296.
- Shek, D. T. L., 2002a, "Chinese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Family Functioning: Personal, School-related, and Family Correlates," *Genetic, Social, and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128(4): 358-380.
- Shek, D. T. L., 2002b, "Interpersonal Support and Conflict and Adjustment of Chinese Adolescents with and without Economic Disadvantage," in *Advances in Psychology Research* vol. 18, edited by S. P. Shohov,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pp. 63-82.
- Shek, D. T. L. (Ed.), 2002c, "Special Issue: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Chinese Communities,"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12(4): 485-581.
- Shek, D. T. L., 2005a, "Economic stress, Emotional Quality of Life, and Problem Behavior in Chinese Adolescents with and without Economic Disadvantag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1(1-3): 363-383.
- Shek, D. T. L., 2005b, "Social Stress in Hong Kong," in *Social Development Index*, edited by J. Est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67-181.
- Shek, D. T. L., 2010, "Quality of Life of Chinese People in a Changing World,"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5(3): 357-361.
- Shek, D. T. L., Chan, Y. K., and Lee, P. S. N., 2005a, "Quality of Life in the Global Context: A Chinese Respons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1(1-3): 1-10.

- Shek, D. T. L., Chan, Y. K., and Lee, P. S. N. (Eds.), 2005b,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Series (vol. 25):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in Chinese, Western and Global Contexts*,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 Shek, D. T. L., Han, X. Y., and Lee, B. M., 2006, "A Comparative Study on Perceived Parental Control Processes and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al Qualities Among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and Shanghai," *Society* 26: 137-157. (In Chinese)
- Shek, D. T. L. and Lee, B. M., 2004, "'Non-engaged' Young people in Hong Kong: Key Statistics and Observ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olescent Medicine and Health* 16(2): 145-163.
- Shek, D. T. L. and Lee, B. M., 2007,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Quality of Life (QOL) Research in Hong Kong," *TheScientificWorldJOURNAL* 7: 1222-1229.
- Shek, D. T. L. and Lee, T. Y., 2005, "Hopelessness in Chinese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Demographic and Family Correl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olescent Medicine and Health* 17(3): 279-290.
- Shek, D. T. L., Lee, B. M., and Chow, J. T. W., 2005, "Trends in Adolescent Suicide in Hong Kong for the Period of 1980 to 2003," *The ScientificWorldJOURNAL* 5: 702-723.
- Shek, D. T. L. and Mak, J. W. K., 1986, *A Study of Life Stress of Working Parent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
- Shek, D. T. L. and Tsang, S., 1993, *Care-givers of Preschool Mentally Handicapped Children in Hong Kong: Their Stress, Coping Resource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Hong Kong: Heep Hong Society for Handicapped Children.
- Shen, S. M. and Lai, Y. L., 1999, "Social Well-being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1988-1997," in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7*, edited by S. K. Lau, M. K. Lee, P. S. Wan, and S. L. Wong, Hong

-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p. 1-37.
- Siu, A. M. H. and Shek, D. T. L., 2005,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Problem Solving and Indicators of Interpersonal and Family Well-being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1: 517-539.
-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10, *Final Report of the Review Panel of the Pilot Project on Child Fatality Review*, Hong Kong: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2000, *Soci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The Unfinished Agenda*.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06, *The 2006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URL=
<http://www.infoplease.com/ipa/A0781359.html>.
- Union Bank of Switzerland, 2006, *Prices and Earnings: A Comparison of Purchasing Power Around the World*, Zurich: Union Bank of Switzerland.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2009,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 Veehoven, R., 1996, "Happy Life-expectancy: A Comprehensive Measure of Quality-of-life in Nation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9: 1-58.
- Wong, S. L. and Zheng, V., 2005, "Social Anticipation and Social Reality," in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2004*, edited by S. K. Lau, M. K. Lee, P. S. Wan, and S. L. Wong,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p. 285-328.

Zhu, Z. F., 1996, “New Measures to Assess Social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and Social Benefits of Social Indicators,” in *New Frontiers of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edited by S. K. Lau, P. S. Wen, M. K. Lee, and S. L. Wong, Hong Kong: Hong Kong.

表 1 以不同搜索字詞在主要資料庫搜索所得的生活素質研究項目數字

資料庫及搜索字詞	2012 年 1 月			
	在任何地方檢索		作為關鍵字詞進行檢索	
	所有發行者	同行評審期刊	所有發行者	同行評審期刊
PsycINFO				
「QOL」	5687	5163	4367	3950
「QOL」及「香港」	259	239	57	55
「生活素質」	83841	73007	32265	26815
「生活素質」及「香港」	3100	2716	217	207
Sociological Abstracts				
「QOL」	277	219	231	178
「QOL」及「香港」	20	18	6	6
「生活素質」	7682	5154	4985	2745
「生活素質」及「香港」	277	256	62	56
Social Work Abstracts				
「QOL」	34	32*	-	-
「QOL」及「香港」	4	1*	-	-
「生活素質」	653	591*	-	-
「生活素質」及「香港」	12	11*	-	-
Medline				
「QOL」	12085	12041*	12071	12027*
「QOL」及「香港」	146	146*	81	81*
「生活素質」	105926	101838*	104984	100901*
「生活素質」及「香港」	789	783*	376	372*
ERIC				
「QOL」	183	156	183	156
「QOL」及「香港」	5	5	5	5
「生活素質」	6239	1979	6232	1977
「生活素質」及「香港」	41	35	40	35

*因資料庫並未提供同行評審期刊的資料，故根據所有期刊可檢索到的文獻數目而定

Quality of Life in Hong Kong

Daniel Tan-Lei SHEK*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issue of quality of life in Hong Kong. First, the different sources of data pertinent to the quality of life of Hong Kong are described. Second,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published QOL studies stored in major databases in different academic disciplines,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of quality of life studies in Hong Kong are identified. Third, three existing projects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Project, Social Development Index and the CUHK Hong Kong Quality of Life Index) involving the collection of trend data over time are described.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findings generated from this database and other quality of life studies, several observations pertinent to the quality of life of Hong Kong are outlined. These observations include the followings: a) there has been progress in the quality of life in Hong Kong after 1997; b) despite overall progress, some social groups do not show much improvement; c) 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 has dropped after 1997; d) warning signals about declining quality of life in Hong Kong are emerging; e) there are many

* Chai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PRC; Professor, Center of Public Policy,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PRC; Profess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PRC; Advisory Professor,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PRC; Honorary Professor, Kiang Wu Nursing College of Macau, Macau, PRC; Visiting Professor, Division of Adolescent Medicine,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Kentucky Children's Hospital, University of Kentucky, College of Medicine, Kentucky, USA.

psychosocial correlates of the 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 f) quality of life in Hong Kong is better than quality of life in mainland China based on some indicators; and g) different studies display different and sometimes even contradictory results. Finally, several methodological issues pertinent to the study of quality of life in Hong Kong are outlined, which provide some food for thoughts regarding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in Hong Kong.

Keywords: assessment, happiness, Hong Kong, quality of life

從宏觀角度探討生活質量——對中國大陸 幸福指數相關研究的總結與反思

邢占軍*

摘 要

自上世紀 50 年代中期開始，宏觀層面的生活質量研究在西方興起並逐漸進入決策者視野。80 年代以後中國大陸研究者開始從宏觀層面探討生活質量。進入新世紀、特別是 2006 年以來，大陸宏觀層面生活質量研究進入新的階段，幸福指數逐漸成爲學界、媒體和各級決策者關注的熱點。本文在系統考察中國大陸宏觀層面生活質量研究的基礎上，對幸福指數相關研究進行系統的梳理與反思，探討幸福指數的含義、研究價值、測量方法和政策功能，思考當前和今後該研究領域有待關注的一些問題。

關鍵詞：生活質量、幸福指數、幸福感、公共政策

* 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進入新世紀以來，特別是 2006 年以來，「幸福指數」(well-being index) 引起了大陸學界、媒體、決策面和公眾的廣泛關注。一些媒體不斷地拋出有關幸福指數的話題，不同層面的決策者對幸福指數普遍給予了相當積極的回應，公眾則通過各種媒介特別是互聯網表達著對幸福指數的複雜心態。來自社會的各種不同反應極大地推動了學界對幸福指數的研究。從學界來看，儘管幸福指數在大陸看似一個新的話題，其實大陸學者對與之相關問題的研究卻已走過了 30 多年的歷程。從某種意義上講，大陸幸福指數相關的研究，幾乎與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相伴而行，只不過在不同階段其對決策面的影響程度不同而已。到了今天，隨著中國大陸邁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改革和發展的目標定位需要進行新的調整，幸福指數的價值和意義越發凸顯。本研究擬在系統梳理大陸幸福指數相關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幸福指數的含義、研究價值、構建方法和政策功能等基礎問題，並對今後幸福指數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些問題加以思考。

一、大陸幸福指數相關研究 30 年的歷程

在考察大陸幸福指數研究歷程之前，首先要對作為討論前提的相關議題加以限定。對於幸福的科學研究，大致有兩種研究視角，一種是從個體微觀角度出發，主要為臨床心理、工商管理、社會工作以及教育管理等相關領域研究者所關注。這類研究的目的是在於提升針對個人或群體的心理治療、心理輔導、組織管理水準，以幫助個體更好地康復、更好地適應社會、更幸福地工作和生活。另一種視角則基於社會宏觀的角度，研究者主要來自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經濟學和公共管理學等領域。這類研究所針對的是社會發展的目標導向以及對特定社會進步與發展狀況的評價，其目的是在於幫助不同層面的社會決策者更好地進行公共決策，以增進民眾的福祉，使民眾享有美好的生活。毫無疑問，這兩種研究取向所討論的問題是密切相關的，但是由於出發點不同，所採用的研

究策略和方法也相差迥異。自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大陸學者對幸福的科學研究絕大部分集中在前一種取向，特別是其中與臨床心理相關的研究，國外常常用「與健康有關的生活質量」(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¹加以概括。這一研究方向至今在大陸仍然保持著強勁的發展勢頭，但其所涉內容顯然不包括在本文所討論的議題之中。

幸福指數在大陸研究文獻中出現的時間很短，從《中國學術文獻總庫》檢索到的第一篇題名含有幸福指數的文獻是發表在《人口與市場分析》1997 年第 1 期上²，是一篇編譯自美國期刊上的科普類文章，嚴格地講稱不上「研究」。與幸福指數相關度最高的術語「生活質量」(quality of life) 在大陸文獻中首次出現是 1980 年，要比「幸福指數」早得多。儘管與「幸福指數」相比，以「生活質量」為題名的文獻大多基於個體微觀角度，但其中不乏社會宏觀層面的研究³。另外兩個與生活質量相關度很高的術語，分別是「滿意感」(life satisfaction)、「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首次在大陸文獻中出現的時間也早於「幸福指數」。為此，本文對大陸幸福指數研究歷程的考察合乎邏輯地向前追溯，宏觀層面的生活質量研究（含滿意感和幸福感研究）也包含其中。分別以「生活質量」、「滿意感」、「幸福感」、「幸福指數」為題名對《中國學術文獻總庫》中的《中國學術期刊網路出版總庫》、《中國學術輯刊全文資料庫》、《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和《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進行檢索，共得到 1980-2011 年期間屬於宏觀層面生活質量的有效文獻

¹ 「與健康有關的生活質量」經常被定義為：特定的醫療條件或治療對一個人實際的或者所預期的身體、情緒和社會方面良好感受的影響程度，參考 D. F. Cella, "Measuring quality of life in palliative care," *Seminars in Oncology* 22 (1995): 73-81。

² 這篇題名中含有「幸福指數」文獻標題為〈構建幸福指數〉，編譯自 *American Demographics* (1996) 上的一篇文章。通過對《中國學術文獻總庫》的題名檢索發現，大陸第一篇題名含有「幸福感」的文獻出現在《世界知識》第 13 期（1991）上，標題為〈富裕的日本人缺乏幸福感〉，是一篇科普類文章，介紹的是日本的相關研究。第一篇題名含有「生活質量」的文章發表在《國外社會科學》第 11 期（1980），譯自韓國期刊《政經文化》第 1 期（1980）。

³ 根據文獻檢索分析，題目中含有「生活質量」且屬於社會宏觀層面的研究，大約占到該類文獻總量的 28%（參見表 1）。

4223 篇（表 1）。下面以這些文獻為基礎，對大陸 30 多年幸福指數研究的歷程加以梳理：

表 1 通過題名檢索的歷年發表的幸福指數相關論文統計

發表年份	生活質量	滿意感	幸福感	幸福指數	合計
1980	1 (1)				1 (1)
1981	1 (1)				1 (1)
1982	0				0
1983	2 (2)	1 (1)			3 (3)
1984	1 (1)	0			1 (1)
1985	3 (3)	1 (1)			4 (4)
1986	2 (2)	0			2 (2)
1987	7 (5)	0			7 (5)
1988	7 (3)	1 (0)			8 (3)
1989	9 (8)	1 (0)			10 (8)
1990	18 (6)	1 (1)			19 (7)
1991	18 (7)	1 (1)	1 (1)		20 (9)
1992	26 (12)	0	0		26 (12)
1993	33 (13)	0	1 (0)		34 (13)
1994	55 (18)	2 (2)	0		57 (20)
1995	76 (37)	1 (0)	1 (1)		78 (38)
1996	97 (18)	1 (1)	3 (3)		101 (22)
1997	102 (34)	2 (2)	4 (4)	1 (1)	109 (41)
1998	136 (29)	5 (4)	6 (4)	0	147 (37)
1999	153 (47)	6 (1)	6 (4)	0	165 (52)
2000	217 (43)	1 (0)	6 (5)	0	224 (48)
2001	267 (54)	5 (4)	3 (3)	0	275 (61)
2002	333 (60)	9 (8)	26 (19)	0	368 (87)
2003	485 (75)	14 (6)	54 (33)	1 (0)	554 (114)
2004	672 (80)	7 (4)	56 (38)	6 (3)	741 (125)
2005	868 (119)	18 (11)	100 (77)	17 (16)	1003 (223)
2006	1058 (117)	30 (16)	154 (101)	51 (36)	1293 (270)
2007	1067 (139)	31 (15)	279 (213)	62 (40)	1439 (407)
2008	1187 (128)	26 (9)	371 (322)	69 (52)	1653 (511)
2009	1312 (130)	15 (6)	481 (414)	53 (43)	1861 (593)

發表年份	生活質量	滿意感	幸福感	幸福指數	合計
2010	1631 (144)	16 (6)	546 (466)	79 (50)	2272 (666)
2011	1591 (138)	20 (12)	707 (579)	164 (109)	2482 (838)
合計	11435 (1474)	215 (111)	2805 (2287)	503 (350)	14958(4222)

注：表中的資料是分別以「生活質量」、「滿意感」、「幸福感」、「幸福指數」為題名在《中國學術文獻總庫（1980-2011）》相關資料庫中檢索到的各類文獻的篇數，其中括弧內的資料是排除了個體微觀研究視角以及報導、傳記、書評、資訊等類型的文獻後，真正意義上屬於社會宏觀視角的幸福指數相關研究，占檢索到文獻總量的 28%

（一）引進起步階段（1980-1990）

這一階段的文獻以引介國外相關研究成果為主。檢索到的 35 篇文獻中有 20 篇屬這類文獻，或直接譯自國外期刊、或介紹國外研究、或對國外研究加以綜述，涉及到的國家或地區包括美國、（前）蘇聯、英國、（前）聯邦德國、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韓國、澳門等，其中有 7 篇出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期刊《國外社會科學》。大陸第一篇以「生活質量」為題的文獻討論的是韓國 80 年代社會發展中所面臨的人口學意義上的社會問題，作者認為其中老齡化和勞資關係問題「同未來的人的生活質量將有密切的聯繫」⁴，儘管沒有查到這篇文獻的引用記錄，但卻有這標誌性意義，從此生活質量問題逐漸引起大陸學界的關注。不僅如此，該文還暗合了後來大陸一度出現的「人口生活質量」的提法。這一階段引用較多的一篇文獻是譯自 *Annual Sociology Review* 的一篇文獻（K.蘇斯耐、G.A.費舍，1987），該文以美國和加拿大 1975-1985 年間生活質量研究的文獻為基礎，對生活質量的含義、測量、理論以及生活質量與公共政策關係等問題進行了梳理和討論。作者指出「有關生活質量的經驗研究表明，研究內容一直在人們生活的客觀方面（如食物和居住）和主觀方面（如態度和感情）之間徘徊」⁵，但他們顯然站在了美國生活質量研究中一直占主導地位的主觀方面一邊，花費較多篇幅介

⁴ 尹鐘周，〈人口學與生活質量〉，《國外社會科學》第 11 期（1980），頁 49。

⁵ K.蘇斯耐、G.A.費舍著，唐仲勛、葉南客譯，〈「生活質量」的社會學研究〉，《國外社會科學》第 10 期（1987），頁 58-63

紹了生活質量主觀方面的經驗研究和理論進展，該文還提到了美國生活質量研究者坎貝爾等人對生活質量的經典定義「生活幸福的總體感覺」。該定義一段時間內對大陸幸福指數相關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大陸研究者對宏觀層面生活質量的研究和探索，是從上世紀 80 年代初開始的。較早的探索可以追溯到 1983 年國家統計局起草的社會統計指標草案風笑天，2007)。⁶1986 年北京市推出的《首都社會發展戰略若干問題研究報告》將生活質量作為評價社會發展的重要方面，包含人均年文娛性消費支出、每萬人口擁有醫院床位數、自由支配時間比率、環境綜合指數等 22 項客觀指標（陶冶，1994）。⁷這一階段最有影響的相關研究是美籍華裔社會學家林南與天津和上海兩家社科院合作完成的。他們的研究主要強調生活滿意感，這一點明顯受到了美國學界更為強調生活質量主觀方面的影響。林南與天津社科院合作採用因素分析法和結構方程模型法，通過測量人們對生活各方面的感受和滿意程度，提出了生活質量的結構模型，並採用天津市的調查數據對模型進行了驗證（林南、王玲、潘允康等，1987）。⁸在另外一項研究中，林南和盧漢龍（1989）將生活質量界定為人們對社會環境的滿意程度和對生活的全面評價。⁹一些研究者將側重點放在了客觀指標方面，在著重介紹國外生活質量客觀指標研究的同時，嘗試對大陸客觀生活質量評價的內容和方法進行探討（郭慧珍，1987；王成岐，1989；胡雪萍，1990）。¹⁰按照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設想，1981-1990 年是中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的第一步，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決溫飽問題。這一階段大陸從上到下關注點都在發展經濟，因而與幸福指數密

⁶ 風笑天，〈生活質量研究：近三十年回顧及相關問題研究〉，《社會科學研究》第 6 期（2007），頁 1-8。

⁷ 陶冶，〈關於生活質量和主觀指標研究〉，《上海綜合經濟》第 9 期（1994），頁 19-21。

⁸ 林南、王玲、潘允康等，〈生活質量的結構與指標〉，《社會學研究》第 6 期（1987），頁 73-89。

⁹ 林南、盧漢龍，〈社會指標與生活質量的結構模型探討〉，《中國社會科學》第 4 期（1989），頁 75-97。

¹⁰ 郭慧珍，〈關於我國居民生活質量指標體系的探討〉，《經濟科學》第 6 期（1987），頁 78-89；王成岐，〈生活質量測定方法〉，《統計研究》第 2 期（1989），頁 41-45；胡雪萍，〈如何評估我國的生活質量〉，《消費經濟》第 6 期（1990），頁 52-55。

切相關的生活質量主觀方面的研究並未引起決策面的足夠注意。圍繞著各級決策者關注的重點，同時也考慮到資料的可得性和政策的有效性，政府有關部門以及有關政策研究機構更為重視那些能夠體現社會發展的客觀指標。而這種態勢反過來又影響了學界的研究走向。但毫無疑問，這一階段宏觀層面生活質量的引進和探索，深深地影響著大陸今天的幸福指數研究。

（二）探索成長階段（1991-2000）

1991 年以後，大陸學界對宏觀層面生活質量的研究逐漸升溫，通過《中國學術文獻總庫》檢索到 1991-2000 年間相關文獻 292 篇，儘管已接近上個階段的 9 倍，但總量並不大。生活質量客觀方面和主觀方面的研究，沿著各自的方向在不斷推進，一些研究者試圖對這兩個方面加以整合。從文獻類型看，這一階段的文獻涉及到生活質量研究的多個分領域和多個特定群體生活質量的研究，研究者們圍繞著生活質量的概念和評價方法等一些基本的問題進行思考並展開討論，較為深入而系統地瞭解了國外生活質量相關研究的狀況與走勢，出現了以幸福指數為題的文獻。研究者們的探索努力使得宏觀層面生活質量研究領域在大陸不斷拓展。

按照鄧小平的設想，1991-2000 年是中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的第二步，目標是到 20 世紀末國內生產總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水準達到小康水準。從上世紀 90 年代起，原國家計委、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統計局和農業部等單位開始對中國小康問題進行細化，各種小康標準逐漸提出，其中生活質量被視為小康評價指標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1991 年國家統計局等 12 個部門的研究人員組成了課題組，推出了由 16 個基本檢測和臨測值構成的小康社會指標。中國社會科學院也推出了衡量社會發展的社會指標，將生活質量作為評價地區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建立了由 23 個指標構成的地區生活質量評價指標體系

(朱慶芳, 1992)。¹¹目前全面小康標準仍然是國家統計局和相關政府部門關注的焦點問題。小康指標體系的編制無疑大大增強了社會和決策面對生活質量問題的關注,這類指標的編制基本上沿循的是客觀指標的傳統。在此期間一度產生較大影響的是一批人口經濟學研究者所推動的「人口生活質量」研究(馮立天, 1995a),¹²這類研究對生活質量的界定遵循了國際上主客觀結合的趨勢,但是在具體指標設定時採用的仍然是生活質量的客觀評價指標。一些研究者試圖從全球視角來考察大陸的生活質量狀況,這類用於國際比較的生活質量評價涉及的也是生活質量的客觀方面。朱國宏(1993)採用教育、健康、營養、平等、環境 5 個方面 8 個指標對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 9 個國家的生活質量進行了測算。馮立天(1995b)採用所編制的指標體系對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 58 個國家和地區的生活質量進行了核算與比較研究。趙彥雲等(2000)編制了包括 9 大類 34 項指標生活質量指標體系,對中國大陸和 40 多個主要國家的生活質量進行了比較研究。地區層面的生活質量研究也開始出現,一些研究者從客觀方面分別對遼寧營口、吉林、江蘇等地的生活質量進行了量化研究(舒樵, 1991; 歷復魁, 1995; 黃潤龍, 1997)。

生活質量主觀方面的研究在這一階段也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明顯滯後於客觀生活質量研究,對決策面的影響也相對較弱。在這個階段出現了一個與主觀生活質量密切相關的術語「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段建華(1996a)發表在《心理學動態》上的一篇論文從心理學角度梳理了國外的幸福感研究,其中大多著眼於宏觀層面。儘管一些學者對生活質量的主觀方面給予了相當的關注(陳義平, 1993; 陶冶, 1994; 李新家, 1995; 詹天庠、陳義平, 1997),¹³但在這一階段沒

¹¹ 朱慶芳,〈小康社會指標體系及 2000 年目標的綜合評價〉,《中國社會科學》第 1 期(1992),頁 103-120。

¹² 馮立天,〈中國人口生活質量研究〉,《人口與經濟》第 6 期(1995),頁 7-14。

¹³ 陳義平,〈兩種生活質量評估方法的比較分析〉,《廣東社會科學》第 3 期(1993),38-45 頁;李新家,〈論評價生活質量的指標和影響生活質量的因素〉,《湘潭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5 期(1995),頁 52-55;詹天庠、陳義平,〈關於生活質量評估的指標與方法〉,《中山大學學報論叢》第 6 期(1997),頁 26-34。

有出現全國範圍的主觀生活質量量化研究。幾項影響較大的量化研究都是針對特定地區的居民，這些研究者主要採用滿意感指標分別對北京、西安、揚州、廈門、武漢等城市居民主觀生活質量進行了調查研究（盧淑華、韋魯英，1991；胡榮，1996；易松國、風笑天，1997）。¹⁴有關幸福感的研究則主要集中在大學生和老年人等特殊群體（段建華，1996b；劉仁剛、龔耀先，2000；何瑛，2000）。¹⁵

進入 90 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大陸學者主張將生活質量的主觀指標和客觀指標加以結合，以全面反映生活質量狀況。盧淑華和韋魯英（1991）在對北京、西安、揚州三市進行生活質量模式的實證研究中，不僅引入了客觀指標，而且增加了「參照標準對主觀生活質量指標的影響」這個仲介變量，提出了三級主客觀指標作用機制的理論模型。¹⁶葉南客（1992）在對蘇南城鄉居民生活質量進行評估時採用了消費水準、消費結構、生活方式和社會感受 4 類指標，力圖將主客觀指標加以結合。¹⁷李凌江等人（1995）在對湖南省社區居民生活質量進行考察時也試圖將主客觀指標結合，採用了包括軀體功能、心理功能、社會功能和物質生活 4 個維度的生活質量問卷。¹⁸風笑天等人（2000）總結指出，單用主觀指標或單用客觀指標都難以全面地瞭解和測量生活質量的真實狀況，而各種具體的客觀生活質量指標在解釋人們主觀的「滿意度」方面是無能為力的。生活質量主客觀指標結合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大陸學者在上世紀 90 年代所做的探索沒有取得明顯的突破。

¹⁴ 盧淑華、韋魯英，〈生活質量與人口特徵的比較研究〉，《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3 期（1991），頁 58-69；胡榮，〈廈門市居民生活質量研究〉，《社會學研究》第 2 期（1996），頁 82-87；易松國、風笑天，〈城市居民主觀生活質量研究〉，《華中理工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3 期（1997），頁 82-85。

¹⁵ 段建華，〈總體幸福感量表在我國大學生中的試用結果與分析〉，《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第 1 期（1996），頁 56-57；劉仁剛、龔耀先，〈老年人主觀幸福感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第 2 期（2000），頁 73-78；何瑛，〈重慶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狀況及其影響因素〉，《重慶師專學報》第 2 期（2000），頁 35-38。

¹⁶ 盧淑華、韋魯英，〈生活質量與人口特徵的比較研究〉，《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3 期（1991），頁 58-69。

¹⁷ 葉南客，〈蘇南城鄉居民生活質量評估與提高戰略〉，《中國社會科學》第 3 期（1992），頁 135-148。

¹⁸ 李凌江、楊德森、郝偉等，〈社區人群生活質量研究〉，《中國行為醫學科學》第 2 期（1995），頁 58-61。

以上是 1991-2000 年間大陸生活質量研究的主要內容。除此之外，這一階段大陸的生活質量研究也出現了細化的傾向，一些更為具體的生活質量研究領域開始在文獻中獨立出現，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老年生活質量研究。如前所述，我們檢索到的第一篇以「生活質量」為題名的文獻就涉及到韓國的老齡化問題。進入 90 年代以後，隨著大陸許多城市老齡化步伐的加快，老年人生活質量引起了研究者更多的關注（葉南客、唐仲勛，1993；潘祖光、王瑞梓，1995；趙細康，1997；張智敏，1999；姜晶梅等，2000）。¹⁹研究者所涉獵的另外一些具體領域包括：婚姻家庭生活質量（盧淑華，1992、易松國、風笑天，1999）、²⁰青年生活質量（葉南客、李芸，1992；吳曉剛，1993）、農民生活質量（陳長華，1993）、文化生活質量（黃志秋，1997）、閒暇生活質量（王雅林、車路光，2000），等等。²¹

與本文議題聯繫最為緊密的一篇文獻出現在這一階段，那就是《市場與人口分析》1997 年第 1 期刊發的〈構建幸福指數〉。該文編譯自《美國人口統計學》（*American Demographics*）雜誌，原作者 Kacapyr 是一位經濟學者。這不是一篇學術論文，只是一篇介紹該雜誌推出〈美國人口統計學幸福指數〉的短文。這篇文獻為讀者提供了以下幾個方面的資訊：（1）現有的經濟發展指標（例 GDP、CPI）不能反映國民的生活質量和幸福程度，而一些用來評價生活質量的其他指標與 GDP 一樣，只

¹⁹ 葉南客、唐仲勛，〈老年生活質量探索〉，《社會科學戰線》第 1 期（1993），頁 130-137；潘祖光、王瑞梓，〈中國老年人口生活質量研究〉，《人口研究》第 3 期（1995），頁 34-40；趙細康，〈農村老年人生活質量主觀評價分析〉，《人口與經濟》第 6 期（1997），頁 15-20；張智敏，〈城市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問題〉，《市場與人口分析》第 6 期（1999），頁 36-38；姜晶梅、韓少梅、張孔來，〈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質量綜合評價〉，《中國衛生統計》第 6 期（2000），頁 29-30。

²⁰ 盧淑華，〈中國城市婚姻與家庭生活質量分析〉，《社會學研究》第 4 期（1992），頁 84-91；易松國、風笑天，〈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質量主觀指標結構探討〉，《上海社會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第 1 期（1999），頁 136-144。

²¹ 葉南客、李芸，〈當代青年生活質量的評估〉，《青年研究》第 1 期（1992），頁 22-25；吳曉剛，〈當代青年的工作生活質量〉，《社會科學》第 5 期（1993），頁 44-48；陳長華，〈江蘇農民生活質量評價與比較〉，《江蘇社會科學》第 1 期（1993），頁 113-132；黃志秋，〈論文化生活質量的內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第 5 期（1997），頁 17-22；王雅林、車路光，〈非在業群體閒暇生活質量考察〉，《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3 期（2000），頁 89-98。

考慮了國民生活的某個側面；(2) 美國人口統計學幸福指數是一種複合指標，涵蓋了收入和就業機會、生產力和技術、休閒、消費者態度、社會和物質環境等 5 大領域，每個領域都由兩三個要素組成，能夠全面衡量國民的幸福狀況；(3) 該指數從 1990 年 4 月開始測試，以這次測試的數據為基點，記作 100，以後每個月的數據與之比較，就可以反映美國生活質量的走勢；(4) 由於包含了很多價值判斷，測量幸福指數十分艱巨，需要不懈地努力。這篇短文堪稱是普及幸福指數常識的一篇很好材料。²²

(三) 快速發展階段 (2001-2011)

進入新世紀以後大陸宏觀層面的生活質量研究呈現出快速發展的態勢。2001 年是大陸「新三步走」戰略的起始年，隨著小康目標的實現，²³大陸社會財富積累達到了新的水準，但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仍然較大，一些社會問題（例如，貧富差距拉大、環境污染、食品安全、價值缺失等）也突顯出來。社會對生活質量問題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學界對生活質量的研究也越發深入。在這一階段，生活質量客觀方面的研究出現了明顯的進展，誕生了第一家生活質量研究機構——武漢大學生活質量研究與評價中心，出現了一批有影響的客觀生活質量評價研究成果，對主觀生活質量的研究明顯增多，發展勢頭甚至超過了客觀生活質量，大陸學者與國外生活質量研究者的聯繫也大大加強。從 2005 年至今，幸福指數成爲大陸宏觀層面生活質量研究的熱點。

²² 伊里亞·卡派爾，〈構建幸福指數〉，《市場與人口分析》第 1 期（1997），頁 61-62。

²³ 根據鄧小平的估算，人均 GDP 達到 800-1000 美元是中國小康水平的標誌性指標。他提出，到上世紀末「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 800 至 1000 美元，進入小康社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 68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 732）。2000 年大陸國內生產總值爲 89404 億元人民幣，按照當時的匯率折算人均 GDP 首次超過了 800 美元。「新三步走」戰略在 1997 年召開的中共十五大上首次正式提出，在 2002 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上最終形成。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 2000 年翻一番，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從 2010 年到 2020 年是第二步，到 2020 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比 2000 年翻兩番的目標；從 2020 年到 2050 年是第三步，基本實現現代化。伊里亞·卡派爾，〈構建幸福指數〉，《市場與人口分析》第 1 期（1997），頁 61-62。

2001 年以後大陸生活質量客觀方面的研究不斷深入。周長城等追蹤國內外生活質量研究的最新進展，對大陸客觀生活質量指標構建的理論依據、測量方法、權重分配、專家效度等進行了分析與思考（周長城、吳淑風，2001；周長城、饒權，2001；周長城、袁浩，2002a；周長城、袁浩，2002b）。²⁴彭念一、李麗（2003）構建了包含收入狀況、社會安全、教育狀況、健康狀況、資源與環境、城市環境和社會服務等 8 個子系統 21 類指標構成的生活質量客觀指標體系，並採用該指標體系對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 44 個國家的居民生活質量進行測算。²⁵范柏乃（2006）構建了由 30 個指標構成的城市居民生活質量指標體系，對大陸 31 個省會城市居民客觀生活質量進行了測試。²⁶李正龍（2008）編制了包含收入、消費、居住條件與生活環境、醫療條件、工作機會與社會保障 5 大類 15 項指標的居民生活質量指標體系，對大陸 31 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客觀生活質量進行了測試。²⁷這類研究一般採用專家主觀評定與客觀統計數據分析相結合的方法篩選指標，採用加權賦值法確定指標的權重，層次分析、相關分析、因數分析等統計方法得到了普遍的運用。

這一時期研究者們對生活質量的主觀方面給予了相當程度的關注（邢占軍，2002；苗元江、余嘉元，2003；王凱、周長城，2004；陳惠雄、劉國珍，2005），主觀生活質量研究發展迅速。²⁸大量的研究針對的

²⁴ 周長城、吳淑風，〈建立人民生活質量指標體系的理論依據〉，《武漢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3 期（2001），頁 381-384；周長城、饒權，〈生活質量測量方法研究〉，《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第 10 期（2001），頁 74-77；周長城、袁浩，〈專家的觀點可靠嗎？對國內生活質量綜合指數建構問題的探討〉，《社會科學研究》第 1 期（2002），頁 100-106；周長城、袁浩，〈生活質量綜合指數建構中權重分配的國際視野〉，《江海學刊》第 1 期（2002），頁 94-99。

²⁵ 彭念一、李麗，〈我國居民生活質量評價指標體系與綜合評價〉，《湖南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5 期（2003），頁 21-25。

²⁶ 范柏乃，〈我國城市居民生活質量評價體系的構建與實際測度〉，《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 4 期（2006），頁 122-131。

²⁷ 李正龍，〈居民生活質量的統計分析與綜合評價〉，《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第 1 期（2008），頁 102-107。

²⁸ 邢占軍，〈中國城市居民主觀幸福感量表的編制〉，《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 23 期（2002），頁 151-189；苗元江、余嘉元，〈幸福感評估技術發展〉，《中國心理衛生雜誌》第 11 期（2003），頁 786-787；王凱、周長城，〈生活質量研究的新發展：主觀指標的構建與應用〉，《國外社會科學》第 4 期（2004），頁 38-42；陳惠雄、劉國珍，〈快樂指數研究概述〉，《財經論叢》第 3 期（2005），頁 29-36。

仍然是大學生、老年人等特殊群體，研究者採用的工具往往直接來自國外。這種缺憾是顯而易見的，一些研究者嘗試編制適合於中國居民的主觀生活質量評價工具。筆者從體驗論幸福感理論出發，在整合國內外已有研究的基礎上，編制了由 54 個項目組成的「中國城市居民主觀幸福感量表」，從知足充裕體驗、心理健康體驗、社會信心體驗、成長進步體驗、目標價值體驗、自我接受體驗、心態平衡體驗、人際適應體驗和家庭氛圍體驗 10 個方面對大陸民眾主觀生活質量加以測量（邢占軍，2002）。陳惠雄、吳麗民（2006）基於快樂感因數圈理論編制了由社會狀況、個體狀況、收入狀況、親情狀況、人際狀況、職業狀況 6 個方面構成的主客觀結合的快樂指數量表。²⁹苗元江等（2009）在整合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基礎上編制了「綜合幸福感問卷」，該問卷包括 1 個指數（幸福指數）、2 個模組（主觀幸福感與心理幸福感）、9 個維度（生活滿意、正性情感、負性情感、生命活力、健康關注、利他行為、自我價值、友好關係、人格成長），共 50 個項目。³⁰研究者們還對收入、職業、性別、年齡等與主觀生活質量的關係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實證研究（孫鳳，2007；王秋、邢占軍，2008；羅楚亮，2009；邢占軍，2011）。³¹

第一篇以「幸福指數」為題名的文獻出現在 1997 年，此後長達 6 年的時間裡沒有再檢索到有效的相關文獻。然而從 2005 年開始，幸福指數逐漸成為大陸宏觀層面生活質量研究的一個熱點。有關幸福指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探討幸福指數的含義、由來、政策功能和現實意義。研究者們從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公共管理學等角度對幸福指數進行了介紹，對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劉偉、蔡志洲，

²⁹ 陳惠雄、吳麗民，〈國民快樂指數調查量表設計的理論機理、結構與測量學特性分析〉，《財經論叢》第 5 期（2006），頁 1-7。

³⁰ 苗元江、朱曉紅、陳浩賓，〈從理論到測量：幸福感心理結構研究發展〉，《徐州師範大學學報》第 2 期（2009），頁 128-133。

³¹ 孫鳳，〈性別、職業與主觀幸福感〉，《經濟科學》第 1 期（2007），頁 27-32；王秋、邢占軍，〈年齡與城市居民主觀幸福感關係的初步研究〉，《學習與實踐》第 6 期（2008），頁 85-91；羅楚亮，〈絕對收入、相對收入與主觀幸福感〉，《財經研究》第 11 期（2009），頁 79-91；邢占軍，〈我國居民收入與幸福感關係的研究〉，《社會學研究》第 1 期（2011），頁 196-246。

2005；邢占軍，2005b；相子國，2005；姜奇平，2005；沈傑，2006；王俊秀，2006；楊緬坤，2007；左學金，2010），在這類文獻中出現頻率較多的是不丹王國的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和美國行為經濟學家 Kahneman 的幸福研究。³²二是構建幸福指數的指標體系並進行測試與應用。莊連平、李晶（2008）採用相關分析的方法構建了由工作條件、休閒條件、不平等、社會關係、社會福利、心理福利、授權、政治自由、經濟穩定、政治安全、環境條件等 11 個大類構成的廣義幸福指數指標體系。³³王慧紅、陳楠（2008）借鑒英國的幸福星球指數編制了由生活滿意度、預期壽命和生態足跡構成的中國幸福指數，並利用能夠獲得的數據對大陸 31 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居民幸福指數進行了核算。³⁴羅四軍、莊成傑（2008）從經濟發展水準、人口與就業結構、人民生活水準和生活環境水準四個方面構建了國民幸福指數評價指標體系，運用變異係數法和距離綜合評價法對大陸 1998-2006 年國民幸福指數進行了測度。³⁵一些研究者則在地區層面上對居民幸福指數進行了測算（吳啓富，2008；林洪等，2011；萬樹，2011）。³⁶

³² 劉偉、蔡志洲，〈經濟增長與幸福指數〉，《人民論壇》第 1 期（2005），頁 39-41；邢占軍，〈談談幸福指數〉，《光明日報》2005 年 12 月 6 日第 5 版；相子國，〈經濟學中的財富與國民幸福指數〉，《民主》第 11 期（2005），頁 16-17；沈傑，〈從 GDP 崇拜到幸福指數關懷〉，《江蘇行政學院學報》第 3 期（2006），頁 65-70；王俊秀，〈什麼是幸福指數〉，《今日中國論壇》第 11 期（2006），頁 55-58；楊緬坤，〈政府績效評價：公共管理效益指數研究〉，《當代財經》第 9 期（2007），頁 25-29；左學金，〈中國未來發展和幸福指數〉，《社會觀察》第 2 期（2），頁 10-11。

³³ 莊連平、李晶，〈基於相關性分析的廣義國民幸福指數的構建〉，《統計教育》第 8 期（2008），頁 36-40。

³⁴ 王慧紅、陳楠，〈中國幸福指數的構建〉，《商業經濟與管理》第 6 期（2008），頁 74-74。

³⁵ 羅四軍、莊成傑，〈基於距離綜合評價法的我國國民幸福指數 NHI 測評〉，《財經理論與實踐》第 5 期（2008），頁 112-114。

³⁶ 吳啓富，〈北京市居民幸福指數的編制方法及變動分析〉，《現代商貿工業》第 12 期（2008），頁 117-119；林洪、曲博、溫拓，〈國民幸福理論與廣州國民幸福研究〉，《城市觀察》第 1 期（2011），頁 145-157；萬樹，〈安徽省幸福指數的構建與實證分析〉，《華東經濟管理》第 1 期（2011），頁 24-27。

二、對幸福指數研究中的幾個基礎問題的思考

通過第一部分的梳理，我們可以大致釐清大陸幸福指數研究的來龍去脈以及所關注的議題。經過了 30 多年的發展，大陸幸福指數相關研究雖取得了一些進展，但一些基礎性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這是導致幸福指數研究難以深入且遠遠不能滿足現實需要的根本原因。本部分就幸福指數研究中最為突出的核心概念界定、指標構建方法以及政策功能定位等基礎問題加以探討。

（一）關於幸福指數的概念界定

儘管幸福指數在大陸已經是一個炙手可熱的術語，但當我們深入地考察時卻發現，研究者們對這個概念的理解卻可能相去甚遠。有研究者認為，國民幸福指數核算的是社會幸福總值，很難用一個像衡量產出水準的 GDP 那樣的指標來加以度量，但是可以用一種傳遞或替代的方法用一些客觀指標對幸福加以間接的計量（藺豐奇，2006）。³⁷有研究者從美國生活質量研究始作俑者 Galbraith 的觀點出發，認為「居民的幸福綜合指數既與本地的經濟發展水準有關，也與居民周圍的生存環境以及公共福祉環境有關，每一方面都只能構成反映居民生活質量高低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只有把二者有機結合起來，才能真實反映居民的生活質量狀況」（李楨業，2008）。³⁸有研究者受 199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Amartya Sen 觀點的影響，從人的自由發展能力擴展的角度理解幸福，認為「基於自由發展視野構建幸福指數體系時，面對的就是擴展人類發展指數的問題」（朱成全、王毅霖，2009）。³⁹以上研究者顯然都是從客觀角度對幸福指數加以界定。另外一些研究者堅持上世紀 70 年代以來美國宏觀生活質量研究的主流傳統，從主觀體驗和感受出發對幸

³⁷ 藺豐奇，〈從 GDP 到 GNH：經濟發展價值座標的轉變〉，《人文雜誌》第 6 期（2006），頁 78-84。

³⁸ 李楨業，〈城市居民幸福指數的省級差異〉，《社會科學研究》第 3 期（2008），頁 41-48。

³⁹ 朱成全、王毅霖，〈自由發展視野下幸福指數體系的構建〉，《南京社會科學》第 11 期（2009），頁 97-102。

福指數界定。例如，沈傑（2006）認為「幸福感是人們對生活狀況的一種主觀感受。而幸福指數，就是衡量這種感受具體程度的主觀指標數值」。⁴⁰吳啓富（2008）從美國幸福指數研究者 Diener 的觀點出發，認為「主觀幸福感主要是指人們根據自己的價值標準和主觀偏好對於自身生活狀態所做出的滿意程度方面的評價。居民幸福指數就是衡量人們這種感受的主觀指標」。⁴¹還有研究者從主客觀結合的角度界定幸福指數。例如，王慧紅、陳楠（2008）受幸福星球指數研究的影響，從生態的角度對幸福指數加以界定，認為幸福指數是體現「人類幸福生活的生態效應的指標」，⁴²提出了由人均預期壽命和生態足跡⁴³兩個客觀指標以及生活滿意度這個主觀指標構成的幸福指數公式。

筆者最初對幸福指數進行界定主要採用的是主觀視角。認為幸福是與「美好」聯繫在一起的，對它至少可以有兩種理解：一是指美好的生活；另一種理解是指人們的主觀感受和體驗。幸福指數所針對的幸福，顯然接近於人們對幸福的後一種理解，也可以稱之為幸福感。幸福感是體現人們主觀生活質量的核心內容，幸福指數則是反映人們主觀生活質量的核心指標。幸福感是由人們所具備的客觀條件以及人們的需求價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產生的個體對自身存在與發展狀況的一種積極的心理體驗（邢占軍，2005a）。⁴⁴後來筆者對這種體驗作了進一步說明，提出幸福感是滿意感、快樂感和價值感的有機統一。這個界定被大陸相關研究者較多引用。隨著研究的推進，筆者在界定幸福指數時採用了主客觀結合的視角，對原來的幸福指數定義做了相應的修正，提出「幸福指數是生活質量的核心指標」。生活質量反映的是人的存在質量，即在特定社會中人們的各種需要得以滿足的程度和水準，它集中表現為人們所

⁴⁰ 沈傑，〈從 GDP 崇拜到幸福指數關懷〉，《江蘇行政學院學報》第 3 期（2006），頁 65-70。

⁴¹ 吳啓富，〈北京市居民幸福指數的編制方法及變動分析〉，《現代商貿工業》第 12 期（2008），117-119。

⁴² 王慧紅、陳楠，〈中國幸福指數的構建〉，《商業經濟與管理》第 6 期（2008），頁 70-74。

⁴³ 生態足跡被認為是一種度量可持續發展的高度綜合的複雜指標。它是衡量在人口與經濟規模條件下，維持資源消費和廢物消納所必需的生物生產面積。

⁴⁴ 邢占軍，〈心理體驗與幸福指數〉，《人民論壇》第 1 期（2005），頁 31-33。

享有的生存與發展方面客觀福利狀況以及所體驗到的幸福感水準(邢占軍、劉珍, 2011)。⁴⁵今天看來,對幸福指數的界定還遠未到位,大陸研究中出現的對概念的界定上的爭議,反映了幸福指數評價內容的複雜性,在特定情況下人們的主觀體驗與客觀條件可能會比較一致,但在更多情況下又可能不盡一致或者很不一致。這一點已經得到了國外許多實證材料的驗證(Sirgy & Michalos et. al., 2006)。⁴⁶儘管對生活質量的具體含義存在著諸如條件論、能力論、效用論、體驗論等不同的理解,但有一點已經為大多數研究者所認可:幸福指數考察的核心內容是生活質量。如何以生活質量為基礎,進一步就幸福指數界定達成共識,是目前大陸幸福指數研究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二) 關於幸福指數的指標構建

與幸福指數概念界定密切相關的另外一個基礎性問題是評價指標構建,其實指標構建與概念界定很難完全區分開來,一般而言指標構建必然要以概念界定為基礎或者在指標建構的過程中形成概念。但對大陸幸福指數研究進行考察時,卻經常發現一些研究者在構建幸福指數評價指標或指標體系⁴⁷時核心概念缺位,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指標構建的過程大致包括評價指標的初步提出、指標的篩選、權重的確定以及指標的試用等環節。

與國外幸福指數評價研究類似,大陸比較規範的幸福指數評價研究在指標構建時一般也採用兩種研究視角。一種研究視角基於演繹的邏輯。研究者從特定的理論出發,提出符合該理論的評價指標體系模型,以此為依據編制相應的項目作為備選,然後利用所能獲取的數據資料,

⁴⁵ 邢占軍、劉珍,〈幸福指數與幸福城市建設〉,《中國城市經濟》第1期(2011),頁25-27。

⁴⁶ M. J. Sirgy, A. C. Michalos, A.L. Ferriss et.al., "The quality of life (QOL) research move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6 (2006): 343-466.

⁴⁷ 大陸研究者在最初探討幸福指數時曾介紹過美國 Michigan 大學 Inglehart 教授主持的全球價值研究項目組所採用的單項目幸福感評價指標(劉偉、蔡志洲, 2005),這曾經是美國主觀生活質量研究中一度採用較多的方法,但後來在規範的學術研究中一般很少採用。這種方法仍然被一些研究者或研究機構所採用,但大陸宏觀層面上的幸福指數評價研究者一般不認可這種測量方法。

對假設模型進行擬合度檢驗。根據檢驗的情況，對模型進行修正並增減項目，利用新的數據再對修正後的模型進行檢驗。直到獲得理想的評價指標體系。這種視角屬於典型的概念驅動研究。另一種研究視角則基於歸納的邏輯。研究者首先通過文獻搜集或對質性研究取得的經驗資料的整理，盡可能全面地列出從各個角度體現幸福指數內容的項目作為備選指標，利用所能獲取的數據資料，對項目進行測量學分析與篩選，這個過程一般需要在不同的數據資料支撐下進行多輪，直到選取理想的項目並建構起理想的評價指標體系。這種視角屬於典型的數據驅動研究。就目前來看針對幸福指數指標構建的這兩種研究視角都存在一些明顯的問題。從第一種研究視角的相關文獻中，很難發現有說服力的理論依據以及相應的理論假設，當然這與核心概念界定不到位密切相關。不僅如此，對理論模型進行驗證的數據也存在相當的問題。第二種視角下的研究一般著眼於幸福指數主觀指標的構建，但前期的質性研究卻往往不到位，由於幸福指數所考察的內容（特別是其中的主觀內容）明顯受到文化背景和社會發展程度等因素的影響，缺乏紮實的現場研究必然影響研究的效度。

在指標權重確定方面，有研究者主張對幸福指數指標做等權重處理，但大多數研究者主張進行加權處理。大陸研究者對幸福指數指標進行加權處理的方法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主觀構權，採用最多的是基於專家評價的層次分析法。與德爾菲法相比，這種方法操作起來更為便利，但與德爾菲法一樣專家評價的效度和信度難以得到保證。第二種是客觀構權法，這種方法建立在統計數據或調查數據的基礎上，對數據資料的質量要求很高。常用的統計方法有主成分分析法、回歸係數法、變異數法等。第三種方法是主客觀結合構權法。將指標權重確定分階段進行，在不同的階段分別採用主觀構權或客觀構權方法。在筆者主持的大陸居民幸福指數客觀指標的構建中，採用了一種主客觀結合構權法：層次—主成分分析法。該方法的基本思路是首先用層次分析法對專家評價進行量化分析，確定各個具體指標的初步權重，然後應用主成分分析法

對標準或處理後的統計數據進行分析，利用因素負荷資訊獲得各指標的最終權重（邢占軍等，2011）。⁴⁸這種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專家調查和統計數據（或者居民調查數據）兩種資源，但原有的制約問題仍然存在。筆者認為，要解決好這些問題，一方面要建立穩定可靠的生活質量研究專家隊伍，這些專家可以來自學術界也可以來自實際工作部門，要作為一個統一的項目組長期存在；另一方面要千方百計保證統計數據和調查數據的質量。

（三）關於幸福指數的政策功能

第三個需要討論的基礎問題是幸福指數的政策功能。大陸剛開始關注幸福指數之時，曾經有過對幸福指數研究是否超前的質疑，到目前為止，大陸學術界對幸福指數的研究價值幾乎已經沒有什麼爭議了。但是，對於幸福指數可以發揮怎樣的政策功能卻存在著不同的看法。爭議的焦點之一是幸福指數是否可用作政績考核指標。改革開放以來，相當長的時期內大陸對各級政府的考核以 GDP 為導向，這種導向的弊端已經越來越明顯。幸福指數引入後，有人力主將幸福指數作為考核政績的指標，認為「只有當它正式成為考核政府政績的參考指標時，才能發揮應有的指揮棒作用」（余元洲，2006）。⁴⁹也有學者明確反對將幸福指數作為政績考核的指標，認為幸福指數研究不僅缺乏理論和方法論基礎，而且其自身的特點也決定了不宜作為政績考核指標（楊緬坤，2007）。其實從國際上看，近年來法國、英國、日本等國家的決策者都明確提出要將幸福指數作為政策導向，然而迄今為止學界對幸福指數政策功能的探討卻並不到位。

從公共政策的角度看，幸福指數指標大致可以發揮以下三種政策功能：一是目標導向功能。作為一種政策分析工具，幸福指數指標可以體現人類社會發展終極目標的實現程度，彰顯了以人為本和可持續發展的

⁴⁸ 邢占軍等，《公共政策導向的生活質量評價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1年）。

⁴⁹ 余元洲，〈以幸福指數做政績考核指標有何不宜〉，《學習月刊》第11期（2006），頁35-36。

政策理念，是對經濟增長中人的價值的肯定，可以改變以往發展中存在的「見物不見人」的偏向。特別是指標設計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目的性，為更高水準的幸福社會建設提供目標導向。在發揮目標導向功能作用時，應當特別注意主觀指標與客觀指標可能存在相背離的情況，找到改善民眾客觀生存發展條件和提升民眾幸福感的最佳結合點。二是監測診斷功能。與 GDP 指標不同，幸福指數指標更多發揮的是診斷功能。幸福指數的著眼點不在於指示特定社會已經達到了多麼幸福的水準，而是要診斷特定社會在發展的進程中，有哪些因素可能會偏離民眾的期待、削弱民眾的幸福。我們可以通過幸福指數對幸福社會目標實現的程度進行有效監測，診斷在推進幸福社會建設中可能存在的各種問題，並為相應的公共政策調整提供科學的依據。三是考核評價功能。儘管近年來 GDP 作為政績考評工具在各國遭到了普遍的質疑，但幸福指數指標卻不太可能完全取代 GDP 等指標，應當將其與 GDP 等指標相互補充。在用作政績考評工具時，必須對 GDP 與幸福指數的功能與作用加以區分。一般而言，幸福指數指標、特別是幸福感指標更適宜用作約束性指標，不能不切實際地追求幸福指數的增長率。應當警惕「幸福陷阱」的存在，即因民眾需求層次的改變，幸福指數不隨 GDP 等指標的增長而同步增長，甚至可能出現暫時的下降。

參考書目

- 王成岐，1989，〈生活質量測定方法〉，《統計研究》第 2 期，頁 41-45。
- 王秋、邢占軍，2008，〈年齡與城市居民主觀幸福感關係的初步研究〉，《學習與實踐》第 6 期，頁 85-91。
- 王俊秀，2006，〈什麼是幸福指數〉，《今日中國論壇》第 11 期，頁 55-58。
- 王凱、周長城，2004，〈生活質量研究的新發展：主觀指標的構建與應用〉，《國外社會科學》第 4 期，頁 38-42。

- 王雅林、車路光，2000，〈非在業群體閒暇生活質量考察〉，《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科版）》第3期，頁89-98。
- 王慧紅、陳楠，2008，〈中國幸福指數的構建〉，《商業經濟與管理》第6期，頁74-74。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04，《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左學金，2010，〈中國未來發展和幸福指數〉，《社會觀察》第2期，頁10-11。
- 朱成全、王毅霖，2009，〈自由發展視野下幸福指數體系的構建〉，《南京社會科學》第11期，頁97-102。
- 朱國宏，1993，〈生活質量綜合指數問題初探〉，《經濟學家》第2期，頁98-106。
- 朱慶芳，1992，〈小康社會指標體系及2000年目標的綜合評價〉，《中國社會科學》第1期，頁103-120。
- 李凌江、楊德森、郝偉等，1995，〈社區人群生活質量研究〉，《中國行為醫學科學》第2期，頁58-61。
- 李新家，1995，〈論評價生活質量的指標和影響生活質量的因素〉，《湘潭大學學報（哲社版）》第5期，頁52-55。
- 李楨業，2008，〈城市居民幸福指數的省級差異〉，《社會科學研究》第3期，頁41-48。
- 李正龍，2008，〈居民生活質量的統計分析與綜合評價〉，《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第1期，頁102-107。
- 余元洲，2006，〈以幸福指數做政績考核指標有何不宜〉，《學習月刊》第11期，頁35-36。
- 沈傑，2006，〈從GDP崇拜到幸福指數關懷〉，《江蘇行政學院學報》第3期，頁65-70。
- 何瑛，2000，〈重慶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狀況及其影響因素〉，《重慶師專學報》第2期，頁35-38。

- 邢占軍，2002，〈中國城市居民主觀幸福感量表的編制〉，《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 23 期，頁 151-189。
- 邢占軍，2005a，〈心理體驗與幸福指數〉，《人民論壇》第 1 期，頁 31-33。
- 邢占軍，2005b，〈談談幸福指數〉，《光明日報》12 月 6 日第 5 版。
- 邢占軍，2011，〈我國居民收入與幸福感關係的研究〉，《社會學研究》第 1 期，頁 196-246。
- 邢占軍、劉珍，2011，〈幸福指數與幸福城市建設〉，《中國城市經濟》第 1 期，頁 25-27。
- 邢占軍等，2011，《公共政策導向的生活質量評價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
- 林洪、曲博、溫拓，2011，〈國民幸福理論與廣州國民幸福研究〉，《城市觀察》第 1 期，頁 145-157。
- 林南、王玲、潘允康等，1987，〈生活質量的結構與指標〉，《社會學研究》第 6 期，頁 73-89。
- 林南、盧漢龍，1989，〈社會指標與生活質量的結構模型探討〉，《中國社會科學》第 4 期，頁 75-97。
- 周長城、吳淑風，2001，〈建立人民生活質量指標體系的理論依據〉，《武漢大學學報（社科版）》第 3 期，頁 381-384。
- 周長城、饒權，2001，〈生活質量測量方法研究〉，《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第 10 期，頁 74-77。
- 周長城、袁浩，2002a，〈專家的觀點可靠嗎？對國內生活質量綜合指數建構問題的探討〉，《社會科學研究》第 1 期，頁 100-106。
- 周長城、袁浩，2002b，〈生活質量綜合指數建構中權重分配的國際視野〉，《江海學刊》第 1 期，頁 94-99。
- 吳啓富，2008，〈北京市居民幸福指數的編制方法及變動分析〉，《現代商貿工業》第 12 期，頁 117-119。
- 吳曉剛，1993，〈當代青年的工作生活質量〉，《社會科學》第 5 期，頁 44-48。

- 易松國、風笑天，1997，〈城市居民主觀生活質量研究〉，《華中理工大學學報（哲社版）》第3期，頁82-85。
- 易松國、風笑天，1999，〈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質量主客觀指標結構探討〉，《上海社會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第1期，頁136-144。
- 風笑天，2007，〈生活質量研究：近三十年回顧及相關問題研究〉，《社會科學研究》第6期，頁1-8。
- 姜奇平，2005，〈國民幸福指數的測度——如何量化“人民滿意不滿意”程度〉，《互聯網周刊》第8期（2005），頁54-56。
- 胡雪萍，1990，〈如何評估我國的生活質量〉，《消費經濟》第6期，頁52-55。
- 胡榮，1996，〈廈門市居民生活質量研究〉，《社會學研究》第2期，頁82-87。
- 苗元江、余嘉元，2003，〈幸福感評估技術發展〉，《中國心理衛生雜誌》第11期，頁786-787。
- 苗元江、朱曉紅、陳浩賓，2009，〈從理論到測量：幸福感心理結構研究發展〉，《徐州師範大學學報》第2期，頁128-133。
- 相子國，2005，〈經濟學中的財富與國民幸福指數〉，《民主》第11期，頁16-17。
- 范柏乃，2006，〈我國城市居民生活質量評價體系的構建與實際測度〉，《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4期，頁122-131。
- 段建華，1996a，〈主觀幸福感概述〉，《心理學動態》第1期，頁46-51。
- 段建華，1996b，〈總體幸福感量表在我國大學生中的試用結果與分析〉，《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第1期，頁56-57。
- 張智敏，1999，〈城市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問題〉，《市場與人口分析》第6期，頁36-38。
- 孫鳳，2007，〈性別、職業與主觀幸福感〉，《經濟科學》第1期，頁27-32。
- 姜晶梅、韓少梅、張孔來，2000，〈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質量綜合評價〉，《中國衛生統計》第6期，頁29-30。

- 陶冶，1994，〈關於生活質量和主觀指標研究〉，《上海綜合經濟》第 9 期，頁 19-21。
- 莊連平、李晶，2008，〈基於相關性分析的廣義國民幸福指數的構建〉，《統計教育》第 8 期，頁 36-40。
- 葉南客，1992，〈蘇南城鄉居民生活質量評估與提高戰略〉，《中國社會科學》第 3 期，頁 135-148。
- 葉南客、李芸，1992，〈當代青年生活質量的評估〉，《青年研究》第 1 期，頁 22-25。
- 葉南客、唐仲勛，1993，〈老年生活質量探索〉，《社會科學戰線》第 1 期，頁 130-137。
- 黃潤龍，1997，〈江蘇人民生活質量的比較研究〉，《南京人口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第 1 期，頁 6-17。
- 黃志秋，1997，〈論文化生活質量的內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第 5 期，頁 17-22。
- 郭慧珍，1987，〈關於我國居民生活質量指標體系的探討〉，《經濟科學》第 6 期，頁 78-89。
- 陳長華，1993，〈江蘇農民生活質量評價與比較〉，《江蘇社會科學》第 1 期，頁 113-132。
- 陳惠雄、劉國珍，2005，〈快樂指數研究概述〉，《財經論叢》第 3 期，頁 29-36。
- 陳惠雄、吳麗民，2006，〈國民快樂指數調查量表設計的理論機理、結構與測量學特性分析〉，《財經論叢》第 5 期，頁 1-7。
- 陳義平，1993，〈兩種生活質量評估方法的比較分析〉，《廣東社會科學》第 3 期，38-45 頁。
- 馮立天，1995a，〈中國人口生活質量研究〉，《人口與經濟》第 6 期，頁 7-14。
- 馮立天，1995b，〈中國人口生活質量與國際比較〉，《人口學刊》第 6 期，頁 3-15。

- 舒樵，1991，〈營口市居民生活質量調查〉，《社會科學輯刊》第3期，頁31-40。
- 彭念一、李麗，2003，〈我國居民生活質量評價指標體系與綜合評價〉，《湖南大學學報（社科版）》第5期，頁21-25。
- 詹天庠、陳義平，1997，〈關於生活質量評估的指標與方法〉，《中山大學學報論叢》第6期，頁26-34。
- 萬樹，2011，〈安徽省幸福指數的構建與實證分析〉，《華東經濟管理》第1期，頁24-27。
- 楊緬坤，2007，〈政府績效評價：公共管理效益指數研究〉，《當代財經》第9期，頁25-29。
- 趙細康，1997，〈農村老年人生活質量主觀評價分析〉，《人口與經濟》第6期，頁15-20。
- 趙彥雲、李靜萍，2000，〈中國生活質量評價、分析與預測〉，《管理世界》第3期，頁32-40。
- 潘祖光、王瑞梓，1995，〈中國老年人口生活質量研究〉，《人口研究》第3期，頁34-40。
- 劉仁剛、龔耀先，2000，〈老年人主觀幸福感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第2期，頁73-78。
- 劉偉、蔡志洲，2005，〈經濟增長與幸福指數〉，《人民論壇》第1期，頁39-41。
- 盧淑華、韋魯英，1991，〈生活質量與人口特徵的比較研究〉，《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第3期，頁58-69。
- 盧淑華，1992，〈中國城市婚姻與家庭生活質量分析〉，《社會學研究》第4期，頁84-91。
- 歷復魁，1995，〈吉林省社會生活質量的預測與分析〉，《人口學刊》第6期，頁47-59。
- 韓淑麗，1992，〈城鎮居民生活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的建構〉，《財經問題研究》第5期，頁55-59。

- 羅四軍、莊成傑，2008，〈基於距離綜合評價法的我國國民幸福指數 NHI 測評〉，《財經理論與實踐》第 5 期，頁 112-114。
- 羅楚亮，2009，〈絕對收入、相對收入與主觀幸福感〉，《財經研究》第 11 期，頁 79-91。
- 藺豐奇，2006，〈從 GDP 到 GNH：經濟發展價值座標的轉變〉，《人文雜誌》第 6 期，頁 78-84。
- Cella, D. F., 1995, "Measuring quality of life in palliative care," *Seminars in Oncology* 22: 73-81.
- Sirgy, M. J., Michalos, A. C., Ferriss, A. L. et.al., 2006, "The quality of life (QOL) research move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76: 343-466.
- 伊里亞·卡派爾，1997，〈構建幸福指數〉，《市場與人口分析》第 1 期，頁 61-62。
- 尹鐘周，1980，〈人口學與生活質量〉，《國外社會科學》第 11 期，頁 49。
- K.蘇斯耐、G.A.費舍著，唐仲勛、葉南客譯，1987，〈「生活質量」的社會學研究〉，《國外社會科學》第 10 期，頁 58-63。

To Explore the Quality of Life from a Macro Point of View: A Review on the Well-Being Index Study in Mainland China

Zhanjun Xing^{*}

Abstract

Since the mid-1950s of the last century,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at the macro level rise and gradually into the policymakers' perspective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1980s, researchers from mainland China began to explore quality of life at macro level. Entering the new century, and especially since 2006, the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in mainland China entered into a new stage. The well-being index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a, the media and the policymakers. Based on examining the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at macro level in mainland China,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meaning of well-being index, its measurement and policy functions, and think about some concerned problems in current and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quality of life, well-being index, subjective well-being,
public policy**

^{*}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Shandong University, Professor

臺灣民眾主觀快樂幸福感之樣貌與 未來之發展方向

陳嘉鳳*、周才忠**

摘要

本文透過歷年國內外多個調查研究的結果，呈現臺灣民眾主觀快樂幸福感與社會支持網絡的概況、趨勢、縣市分析及其與經濟的關聯性。並嘗試理解生活中的八大層面對於民眾快樂幸福感的預測模式。同時探討民眾面對困境時的因應方式和求助行為。最後，參照國際組織或重要國家的幸福政策、指標或社區方案，從心理學的角度，提出有效提昇民眾主觀快樂幸福感的政策導向與實務作法，以期真正實踐「幸福臺灣」的政治口號。

本文呈現：(1) 陳嘉鳳等(2010)在2008年10月至2009年1月間進行臺灣25縣市近兩萬民眾的主觀快樂調查發現，51.5%的人自評是快樂的。中研院兩項調查結果也顯示，臺灣近年自評整體生活快樂的民眾皆佔人口中的大多數。(2) 臺灣的離島與東部民眾顯著比北部、中部與南部地區的民眾要來得快樂。各縣市的個人可支配所得的最高與最低數值相差近一倍之多，但其卻沒有反應在民眾快樂程度的增加上。每月收入多寡較影響到中低薪資者的快樂程度，但對月薪超過七萬元者其邊際效益就減低了。(3) 影響民眾快樂幸福感的鉅觀因素包括社會、經濟與治安層面，微觀因素包括社區、教育、家庭與個人層面，而工作層面則同時歸屬於鉅觀與微觀因素。其中，又以微觀因素對民眾的快樂幸福

*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

**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兼任助理

感有較高的預測力。(4) 臺灣近十年的人均 GDP 增幅超過兩成，民眾生活滿意度卻呈小降。(5) 臺灣三成左右的人在生活上遇到困難或為事煩心時，其無法或不容易找到任何人幫忙、傾聽、聊一聊等。臺灣民眾遇到心理困擾、壓力或問題時，最會採取「找人聊天」方式去抒解或因應，而最常求助的對象除了「朋友家人」之外，就是職場上的同事和同學。「網友」是使用網路的受試民眾很多人會求助的新興對象。民眾找朋友或家人的可能性大概是去找專業機構的 15 倍。(6) 自覺快樂的人有顯著較高的比率會用積極面對、找人聊天、運動、旅遊散心、聽音樂、外出散步、彈奏樂器、爬山踏青、整理家務、跳舞、做瑜珈、禪修、種植園藝、閱讀書報、唱歌、信仰宗教等方式來紓壓。自覺不快樂的人則顯著較高的比例會採取吃東西、睡覺、工作、不理會、服用藥物、飲酒、抽煙、打電動、看電視、求神問卜、哭泣、聽天由命、獨處、上網、隱忍壓抑等方式來紓解壓力。(7) 青壯年(25-44 歲)是工作世界裡最重要的主力，但卻是快樂程度最低者。退休者的快樂程度反而是最高的。文末，作者提出衡量臺灣民眾主觀快樂幸福感的三個具體方向，以及有關民眾心理教育訓練、建構社會支持網絡和改善工作環境的未來幸福政策發展之建議。並從國外幸福政策與服務的實例，建議臺灣中央政府部門、縣市政府及社區層面的做法思考。

關鍵詞：快樂、幸福、主觀幸福感、生活滿意度、社會支持網絡、
幸福指標、幸福政策

一、前言

追求快樂幸福（happiness / well-being / subjective well-being / satisfaction with life）雖然是很多民眾活著的目的，但是政府施政的目標長期以來都放在追求經濟的成長。

以近二十年的經濟發展來說，臺灣已有傲人的成績，1991 年臺灣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簡稱人均 GDP）只有九千美元，如今已突破兩萬美元（行政院主計處，2012a）。但經濟的成長是不是同步也為人民帶來倍增的幸福感呢？根據「1981~2007 年『世界價值觀調查』」的研究結果，發現樣本中的 52 個國家之歷年「很快樂」人口比例的變化，只有 6 個國家是負成長的，其中，臺灣的降幅最大（Inglehart, Foa, Peterson & Welzel, 2008）。與亞洲國家（如南韓、印度與日本）相較，臺灣民眾的快樂程度則呈現下滑的趨勢（Veenhoven, 2011; Inglehart, Welzel & Foa, 2008）。

另外，生活滿意度也是檢驗人民快樂幸福與否的重要指標之一。根據現行國際評比的結果來看，臺灣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例如，2005 年美國蓋洛普民調顯示，在 27 個高所得國家的生活滿意度（對工作、婚姻、生活水準、健康等）排名中，臺灣位居倒數第四位（Arora, 2008）。2006 年英國新經濟基金會有關亞洲國家生活滿意度的調查發現，臺灣名列在不丹、汶萊、馬來西亞、新加坡、蒙古等國家之後（NEF, 2006）。然而，近三十年來，南韓與日本民眾的生活滿意度則呈上升態勢（Veenhoven, 2011; Inglehart et al., 2008）。

本文作者曾於 2008 年底調查全國 25 縣市（涵蓋 98% 鄉鎮市）將近兩萬民眾，雖然當時正值金融海嘯發生之際，臺灣的整體經濟與產業受創嚴重，但讓人驚訝的發現是一般民眾自覺的生活感受，還是偏快樂（占 51.5%）的這邊，大概只有 1/4 的人自覺比較不快樂（陳嘉鳳、林家興、鄭夙芬、黃秉德、曾春美、唐子俊，2010）。

從上述的資料可以看到或好或差的快樂幸福結果，所以，作者好奇這些年來臺灣民眾究竟覺得自己過得如何呢？尤其最近總統大選剛過，大家普遍聽到的都是對生活各層面的「無感」，因此政府開始強調未來要公佈「幸福指數」與推展「幸福經濟」。但只有知道民眾快樂幸福的現況，才有基礎判斷政府規劃推動的政策目標是否有效達成。

因此，本文希望整合國內外歷年的調查數據，看見臺灣民眾的快樂幸福感之真實樣貌，以及其與經濟發展之關係。並思考如何理解民眾主觀上會覺得快樂幸福的影響因素，及政策上可努力的方向。

二、調查結果之分析與討論

(一) 臺灣民眾快樂幸福感的現況及趨勢

1. 臺灣民眾快樂幸福感之現況

陳嘉鳳等（2010）在 2008 年 10 月至 2009 年 1 月底，全球發生金融海嘯期間，曾調查全國 25 縣市 360 個鄉鎮市區（占全國 98%）年滿 15 歲（含）以上之 19,517 位男女皆具的民眾。其對自己最近生活狀況之整體感受的快樂程度之平均分數為 4.43（1~7 的量尺），介於「沒特別感受」與「有點快樂」之間（如圖 1 所示）。超過五成（51.5%）的全體受試民眾對最近生活狀況的整體感受給予「有點快樂」及以上的評價。而自評不快樂者（有點不快樂、很不快樂及非常不快樂）約 1/4（24.4%）左右。基本上，它是一種偏右的鐘形分配，意謂外界環境雖然不佳，但相對來說，還是有較多的人可以「自得其樂」。

2. 臺灣民眾快樂幸福感之趨勢

依據中研院在 2004、2005、2007 及 2009 年進行的「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張荳雲、廖培珊，2008、2009）顯示（圖 2），近年來臺灣自評整體生活快樂（還算快樂、很快樂者）的民眾皆佔人口中的大多數，最高曾達到近九成（88.2%）。另外，中研院社會所楊文山主持的「社會意向調查」在 2007 至 2009 年的五次結果（SRDA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2011) (圖 3)，生活快樂的臺灣人最少也有七成左右 (69.2%)。國外各種自評快樂程度的研究結果，通常也都印證此一基本態勢 (Myers & Diener, 1995; Diener & Diener, 1996; Weiten, Lloyd, Dunn & Hammer, 2008; Helliwell, Layard & Sachs,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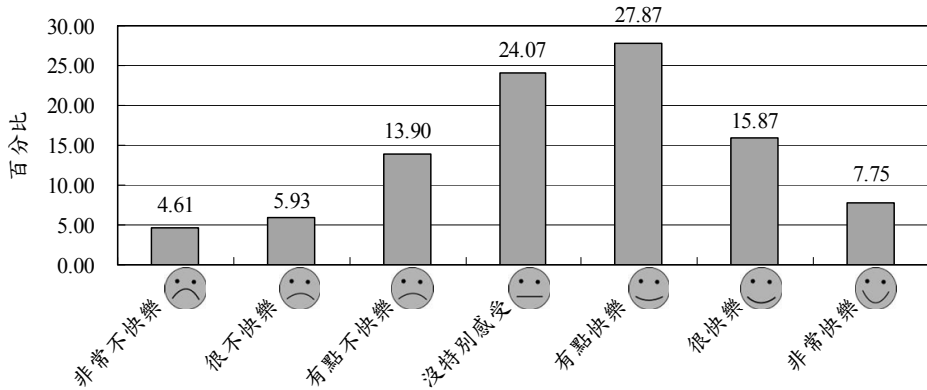


圖 1 全國 25 縣市受試民眾最近生活狀況的整體感受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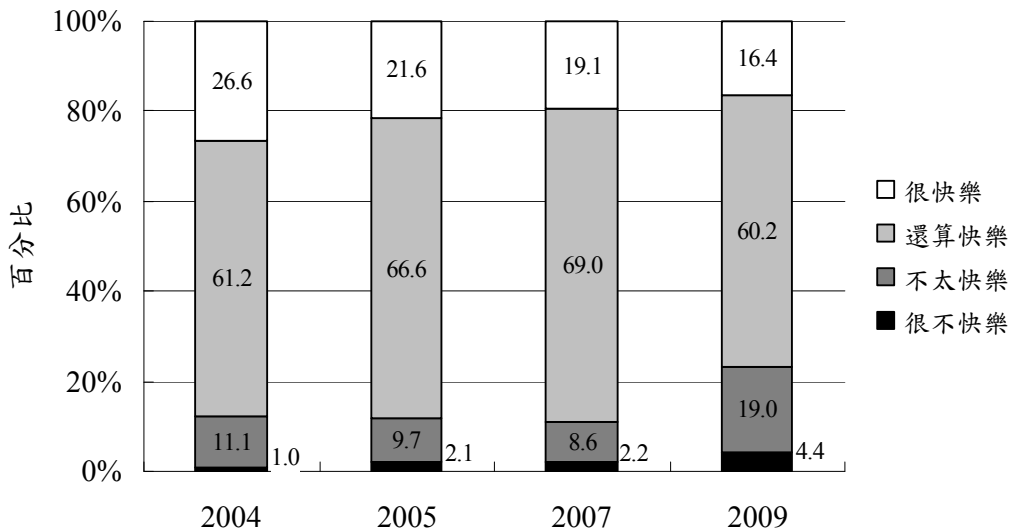


圖 2 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之民眾快樂分佈概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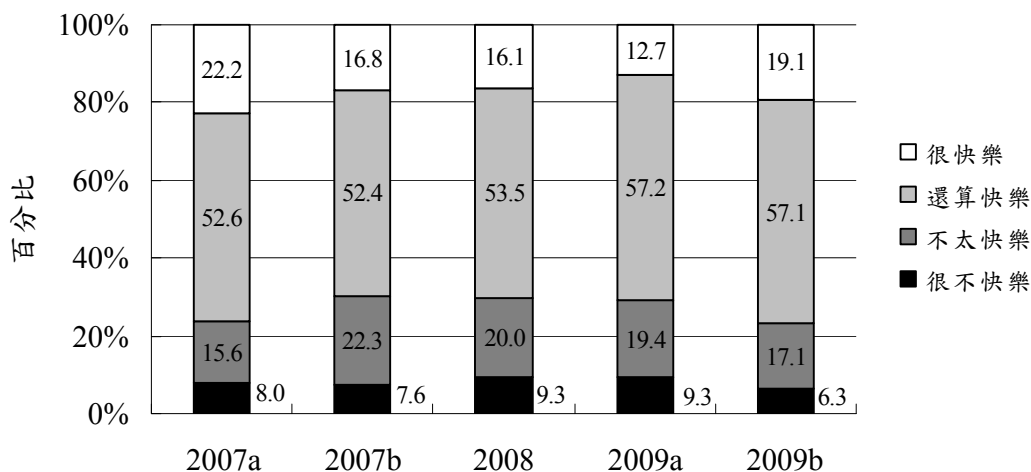


圖 3 臺灣社會意向調查之民眾快樂分佈概況

(二) 臺灣不同地區或縣市民眾快樂幸福感的差異 及其與個人所得收入之間的關聯性

1. 全國不同地區民眾快樂幸福感之差異

陳嘉鳳等(2010)的研究將 25 縣市受試民眾之居住地參考行政院主計處公佈之「中華民國統計地區標準分類」的區域分類方式(另加離島地區),劃分為五個區域。如圖 4 所示,平均來說,離島地區($M=4.79$)與東部地區($M=4.65$)的受試民眾顯著的比北部($M=4.36$)、中部($M=4.40$)與南部地區($M=4.42$)的民眾要快樂($F=25.655$, $p=.000$)。我們都知道離島或東部的經濟條件其實沒那麼好,但為何當地會有比較多的民眾對其整體生活狀況之主觀感受是不錯的?人均 GDP 與快樂之間的關係值得進一步深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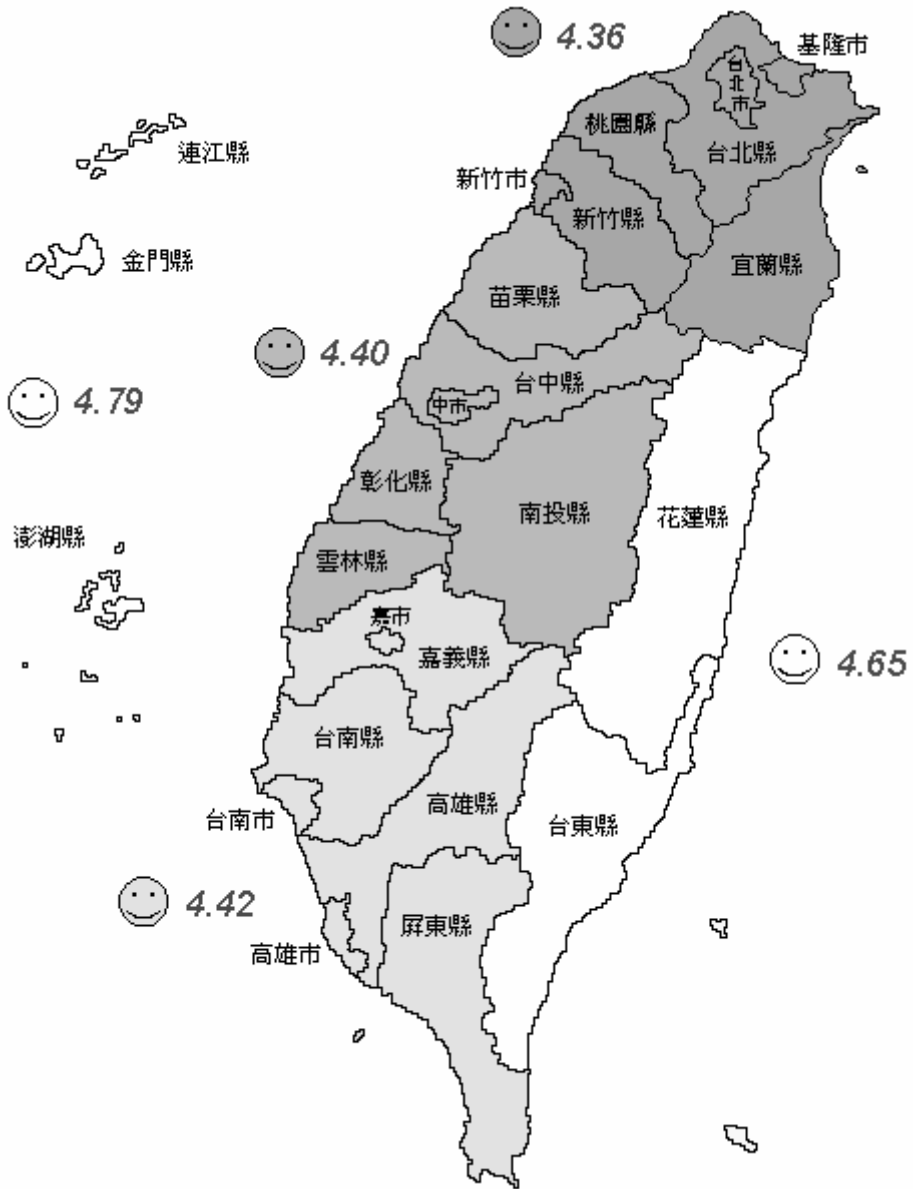


圖 4 臺灣不同地區民眾對其最近生活狀況之整體感受分佈圖

2.全國不同縣市民眾的快樂幸福感與個人平均所得之關聯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12b)「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統」所提供之改制前縣市別的 2008 年資料,臺灣 24 個縣市(連江縣獨缺該年數據,故不列入分析)的平均每人每年可支配所得,如圖 5 所示。由左方的最低縣市(196,147 元;M=4.58)依序向右排列至最高縣市(386,340 元;M=4.36),同時列出各縣市民眾快樂幸福感的平均值(陳嘉鳳等,2010)。圖中顯示,各縣市平均每人每年可支配所得的最高與最低值相差近一倍之多,但其卻沒有反映在民眾快樂程度的增加上。可見,民眾的快樂程度並未隨著個人所得增加而上昇,此意謂經濟的發展與物質的財富可能不是民眾快樂與否的唯一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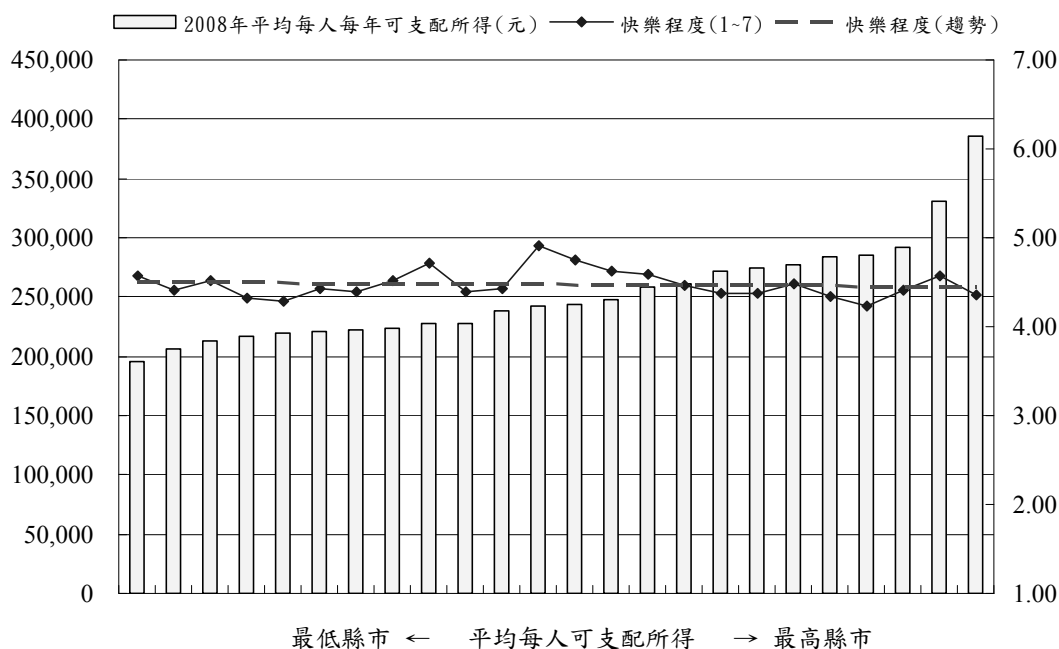


圖 5 台灣 24 縣市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與平均快樂程度的分佈

3.全國民眾快樂幸福感與個人每月固定收入的關聯

以陳嘉鳳等(2010)的全國調查資料來分析,每月不同收入(扣除無收入與不穩定者)的受試民眾其最近生活狀況的整體感受平均數分

佈，如圖 6 所示。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 Tukey HSD 事後比較發現，無論全體或不同性別的受試民眾，高收入者皆較收入較低者快樂。但每月收入為「7 萬元~9 萬元以下」者 ($M=4.86$) 與每月收入為「9 萬元(含)以上」者 ($M=4.88$) 的快樂程度差異已不明顯。由此可知，每月固定收入的多寡可能較影響到中低薪資者的快樂程度，但對月薪超過 7 萬元者，其邊際效益就減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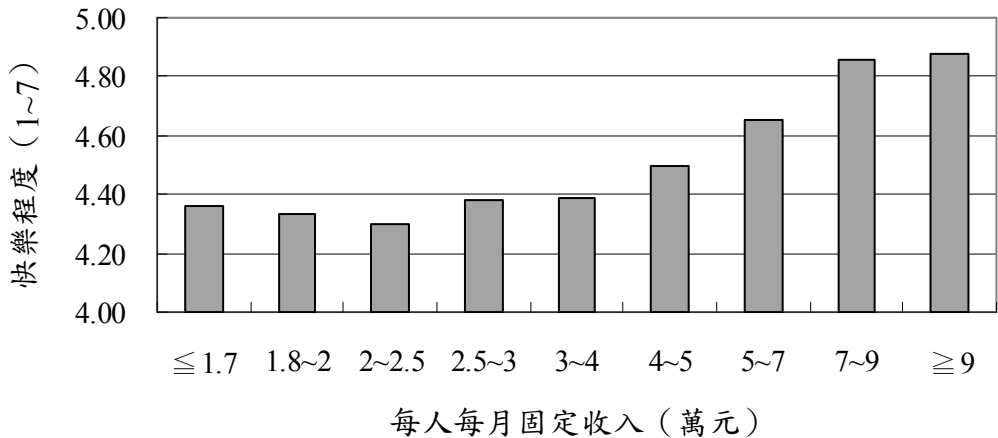


圖 6 臺灣 25 縣市受試民眾每月固定收入與快樂程度的關係

(三) 生活中的外在環境及與個人有關之各個層面 對民眾心理上的影響與其對快樂幸福感的預測

陳嘉鳳等 (2010) 在全國 25 縣市的調查中，請受試民眾就「社會」、「經濟」、「治安」、「工作」、「社區」、「教育」、「家庭」與「個人」等八個層面評定對其而言的壓力或滿意程度 (壓力程度-7 分←無特別感受 0 分→滿意程度 7 分)，如圖 7 所示。其結果發現，平均來說民眾對「家庭」($M=0.67$)、「社區」($M=0.11$) 與「個人」($M=0.07$) 層面相對有中性偏一點正面的感受，但「經濟」($M=-2.80$)、「治安」($M=-1.87$)、「社會」($M=-1.82$) 與「工作」($M=-1.71$) 層面則讓個人感受到相當程度的壓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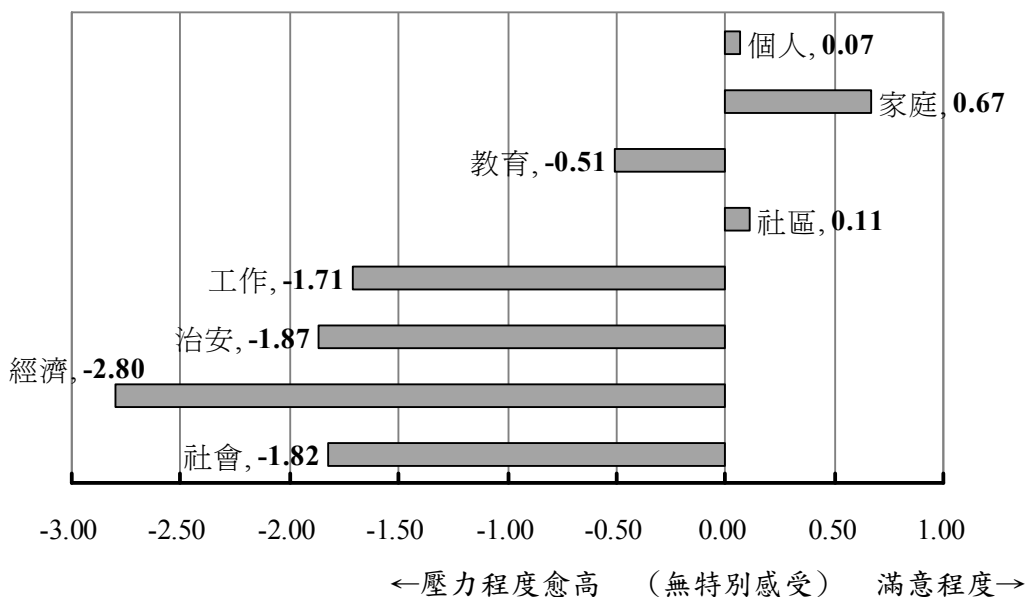


圖 7 生活中的外在環境與個人層面對民眾心理上的影響

進一步將所得資料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可抽取出兩個因素，分別為「鉅觀因素」與「微觀因素」，可解釋的變異量為 59.49%。鉅觀因素包括社會、經濟與治安層面，微觀因素包括社區、教育、家庭與個人層面，而工作層面則同時歸屬於鉅觀與微觀因素。然後，再利用結構方程模式 (SEM) 分析鉅觀因素與微觀因素對快樂幸福感的預測模式，結果如圖 8 所示。此模型的適配度相當理想 (CFI=.95；NNFI=.93；RMSEA=.14；SRMR=.06； $\chi^2(24, N=16032) = 6052.816, p < .00$)，也沒有出現任何不合理的數值。各觀測變項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40~.83 之間，皆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all ps < .00)。鉅觀因素與微觀因素的建構信度分別為 .80 與 .82。由以上結果可知，鉅觀因素 ($\beta=.13, p < .00$) 與微觀因素 ($\beta=.39, p < .00$) 都能顯著預測民眾的快樂幸福感，其中，又以微觀因素有較高的預測力。兩因素合併可解釋民眾快樂幸福感變異量的 23%。

因此，對影響民眾快樂幸福感的各種層面因素，優先值得關注的可能是與個人生活有較直接關聯的層面，這也是政策或服務介入可思考的

方向。如果民眾能夠把自己的部份，調整到比較好的狀況，或其家庭關係、居住的社區狀況能讓其滿意些，那麼民眾即便感覺外在環境的社會、經濟條件不是很理想，治安狀況不很好，其還是有可能主觀上覺得快樂幸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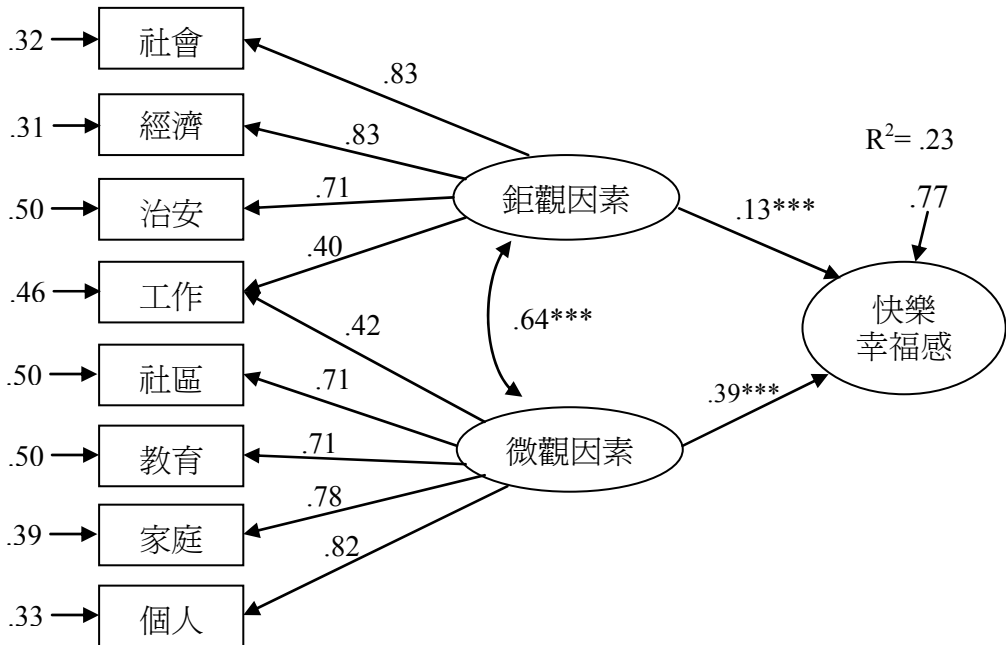


圖 8 生活的八個層面之鉅觀因素與微觀因素對快樂幸福感之預測模式

(四) 臺灣民眾生活滿意度與人均 GDP 的關係

近十年來，臺灣人均 GDP 由不到一萬五千美元（13,404 美元），逐年增加（僅 2008 年下降）至去年已突破兩萬美元，其增幅不小（22%）（行政院主計處，2012a），如圖 9 所示。然而，國人的生活滿意度趨勢（2002 年的 4.4、2007 年的 4.0、2009 年的 4.2）卻小降 5%（張荳雲、廖培珊，2008；傅仰止、杜素豪，2010）。易普索（Ipsos）最新公佈調查全球 24 國的「很快樂」民眾比例也與其人均 GDP（購買力平價）呈反比現象（The Economist, 2012）。可見，國家經濟成長並不保證也能同步提昇人民整體生活的滿意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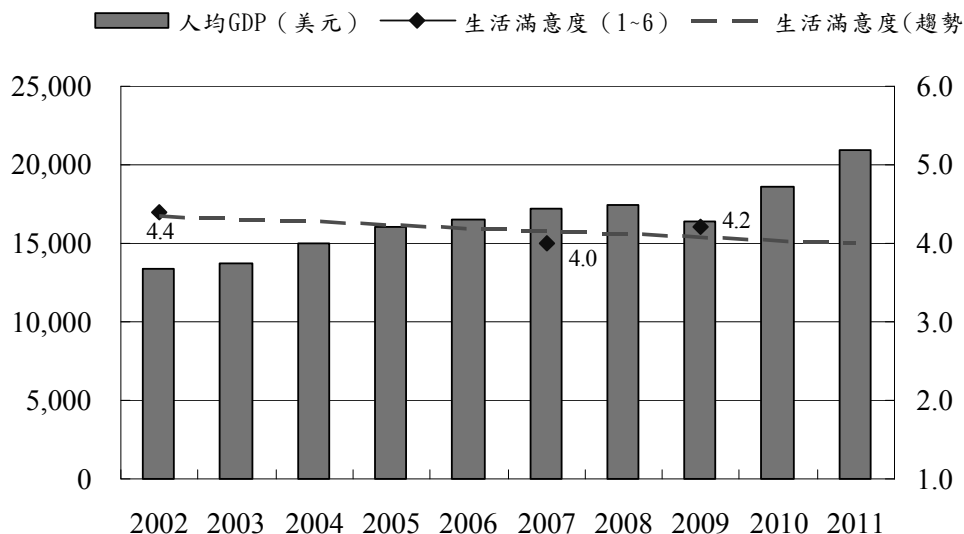


圖 9 臺灣近十年民眾生活滿意度與人均 GDP 的概況

(五) 和快樂幸福有關的因素：

社會支持網絡、個人因應策略及工作狀況

經濟成長並不是唯一影響民眾快樂幸福感的因素，如前所述民眾生活中的微觀因素，如家庭與社區建構的社會支持網絡、個人的因應策略及工作狀況，可能都是值得關注的會影響民眾快樂幸福感的因素。

1. 臺灣民眾的社會支持網絡之概況

臺灣民眾的社會支持網絡概況，可從 2002 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章英華、傅仰止、傅祖壇，2002)的結果看出一些端倪。如圖 10 所示，近三成(28.8%與 29.1%)的人認為自己在生活上遇到困難或為心事所煩心時，無法找到任何人可以幫忙或傾聽、聊一聊。中研院《社會意向調查》在 2008 年的調查(楊文山、瞿海源、蕭新煌、傅仰止、章英華、伊慶春，2008)也有類似結論，超過三成(32.6%)的人在自有煩惱或心事時，其不容易(很不容易、不太容易)找到家人以外的人來協助解決。

- 當生活上遇到困難時，是否一定有人可以幫忙？
- 當有煩惱或心事時，是否一定有人可以和您談您的煩惱或心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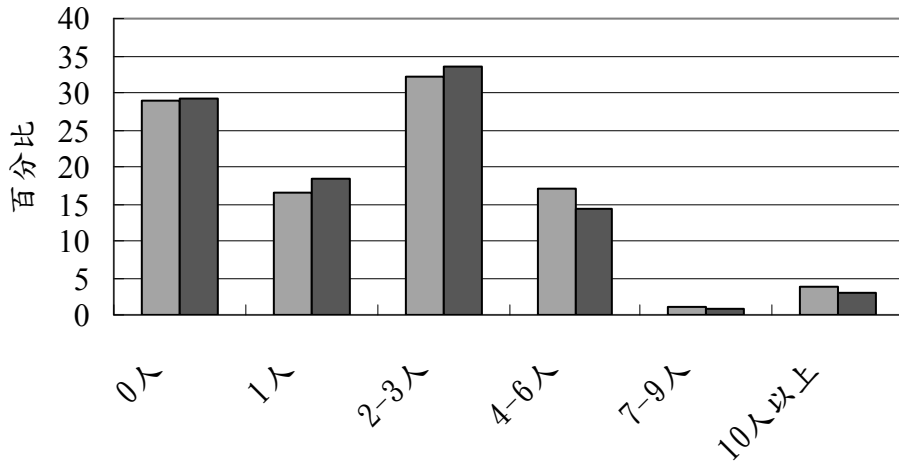


圖 10 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2002 年)

陳嘉鳳等 (2010) 的全國調查結果顯示，民眾在遇到心理困擾、壓力或問題時，最常會求助的對象，若以常用性加權之後的計算結果來看，前十名依序分別為朋友、家人、同事、親戚、同學、神、鄰居、宗教人士（廟祝、牧師、神父等）、網友與民俗療法者（神壇乩童、收驚等）。男女性別的受試民眾其最常求助的對象類別並無太大差異。除了大家熟知的求助對象，如朋友、親友家人、同事、同學外，「網友」是使用網路的受試民眾很多人會求助的新興對象。另外，會向專業助人機構求助的民眾並不多，無論心理諮商或治療機構（3.33%，排名 12）、心靈成長或潛能開發機構（2.01%，排名 14）、精神醫療機構（1.70%，排名 15）、民間助人機構（1.58%，排名 17）或社區心理衛生中心（1.15%，排名 22）的求助率都不高。民眾找朋友或家人的可能性大概高出去找專業機構的 15 倍。

2. 臺灣民眾的壓力因應策略之概況

人的生活中總免不了碰到一些困境或壓力。當民眾遇到這些狀況時，會用及常用的抒解或因應方式為何呢？根據陳嘉鳳等 (2010) 的研

究調查，若以常用性來加權計算，全體受試民眾最常使用的十項抒解或因應方式依序為找人聊天、睡覺、運動、看電視、聽音樂、旅遊散心、外出散步、獨處、信仰宗教與上網。其中，「找人聊天」在整體受試民眾中，使用的頻率遠遠超過其他可能的紓壓方式，利用「睡覺」與「運動」來因應壓力問題的頻率也很高。陳嘉鳳等（2010）的研究也發現，自覺快樂的人，相較於自覺不快樂的人，有顯著較高的比率會用積極面對、找人聊天、運動、旅遊散心、聽音樂、外出散步、彈奏樂器、爬山踏青、整理家務、跳舞、做瑜珈、禪修、種植園藝、閱讀書報、唱歌、信仰宗教等方式來紓壓。但是，自覺不快樂的人，相較於自覺快樂的人，則有顯著較高的比例會採取吃東西、睡覺、工作、不理會、服用藥物、飲酒、抽煙、打電動、看電視、求神問卜、哭泣、聽天由命、獨處、上網、隱忍壓抑等方式來抒解壓力。

從以上結果，可以發現不同快樂程度的人用很不一樣的方式去處理其心理困擾、壓力或問題。自評不快樂的很多人較常只是想辦法去處理問題引起的情緒，但很多時候它卻不是一種能真正有效解決問題的方法，例如自評不快樂的人則較會去睡覺、吃東西或去上網；而自評快樂的人，相對來說會有比較高比例的人會選擇用積極面對的方式。

總之，雖然所有的人都會碰到生活的困境，但是不同的因應策略，卻能明顯區分個人是否覺得快樂。而有希望的是壓力的因應策略是一項可訓練培養的能力。

3. 臺灣不同年齡與工作狀況的民眾快樂幸福之比較

綜觀陳嘉鳳等（2010）針對不同年齡與工作狀況的民眾快樂幸福之調查分析結果，如圖 11 與圖 12 所示，可發現，退休或家管者最為快樂，失業或兼職者（含打零工者）快樂程度顯著較低。另外，青壯年（25-44 歲）是工作世界裡最重要的主力，但卻是快樂程度最低者，其主要影響因素可能是工作壓力。當然這也是現代人生活當中非常普遍的現象。從這個觀點或可理解，為什麼臺灣本島各區域的快樂程度趨勢就屬北部比較低。

與經濟有關的職業場域其實是非常值得關心的心理衛生工作對象，因為多數的人都會花很長的時間投入工作，所以在職場上獲得的成就對其認同及自我價值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夠思考如何讓工作者在職場上獲得更多正面的結果，就不必老是在做後端三級的補救治療工作，那是花很多的精力，卻挫折感很高，成效也不大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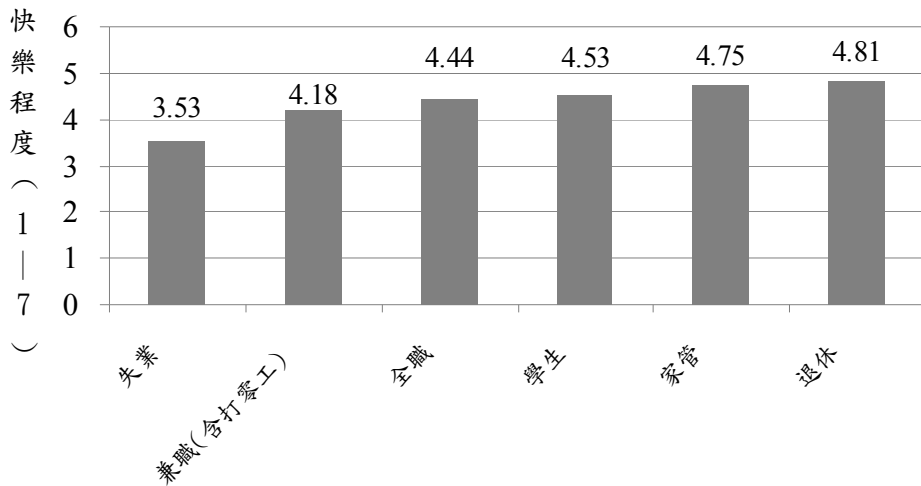


圖 11 不同工作狀況之全體受試民眾快樂程度之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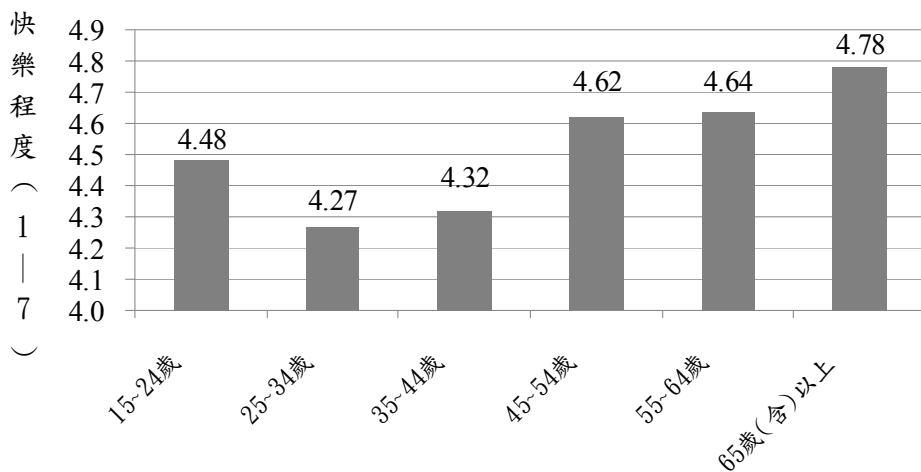


圖 12 不同年齡層之全體受試民眾快樂程度之分佈圖

三、衡量臺灣民眾主觀快樂幸福感的可行方向

瞭解民眾的快樂幸福樣貌之後，對於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而言，一定想知道有些什麼因素能影響民眾的快樂幸福感。目前許多國家及世界一些重要組織爭相嘗試建立幸福指標系統，其實就在回答此一提問。馬總統承諾一年之後要公佈的「幸福指標」也必須證明「幸福指標的變化能告知國人『民眾感覺的快樂幸福之變化』」。所以幸福指標的選擇，不是只從現有的社會福祉指標中隨意選取一些就可以以其變化來說民眾是快樂幸福的。這次總統大選，執政者從很多指標數字的變化，感覺執政成績很好，但民眾並不覺得自己比以前更幸福，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值得規劃幸福指標的行政單位深加思考。

由於一個人是不是快樂幸福，其決定權是在當事人自己，並不是政府當局或其他人說了就算的。所以，在探討民眾的快樂幸福這個議題上，是不可能不關心民眾的「『主觀』快樂幸福感」的。而這也反映在目前數個重要的幸福指標系統中。

借鏡世界各國的經驗，本節將討論幸福指標建構的可行方向：

(一) 幸福指標系統可以有不同層級、面向與群體之分，但仍需以民眾主觀快樂幸福感為依歸

目前，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歐美與亞洲一些國家所擬訂出的幸福指數，有針對國際組織、國家、城市或社區等不同層級的指標系統，有的更擴及社會正義、社區優勢（strength）、永續環境等範疇，或以兒童為對象（Parkinson, 2006; HRSDC, 2010; Gallup & Healthways, 2010; Veenhoven, 2011; UNDP, 2011; Musikanski & Graaf, 2011; ONS UK, 2011; Durand, 2011）。以 OECD 的「美好生活指數」（OECD, 2011）為例，其涵蓋了物質條件（居住、收入和財富、就業和薪資）與生活品質（社會聯繫、教育和技能、環境品質、公民參與和政府治理、健康狀態、主觀幸福感、個人安全、工作和生活平衡）兩大面向共 11 類指標。不丹的「國民幸福毛額」（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包含心理幸福感（生

活滿意度、正負向情緒、靈性)、健康(心理健康、自覺健康狀態、健康天數、障礙)、時間運用、教育、文化多元與韌性、良好的治理、社區活化(奉獻時間和捐款、社區關係、家庭、安全)、生態多元與韌性、生活水準等九大面向的幸福指標(Tshiteem, 2011)。澳洲的維多利亞州有20種來自不同層級或部門的「社區幸福指標系統」(DPCD Victoria, 2012),其主題涵蓋廣泛,包括人口與住宅、社會與多元文化特性、服務與設施、兒童與家庭、健康、不利位階、社區參與、社區優勢、包容接納、社會資本與網絡、市容美化、經濟、工業、交通運輸、永續環境與能源。

然而,這麼多的面向到底何者需要立即去努力或放在首要的目標呢?據OECD的世界各國民眾調查發現(Durand, 2011; OECD, 2012),在「美好生活指數」的11項幸福相關指標中,多數人最在意的是「主觀幸福感」的部份,其次是「健康」。而且,年輕人較重視「工作和生活平衡」、「收入」與「就業」三類,老年人則在意「健康」與「環境」面向。因此,國內主計單位如欲建構出一套讓全民「有感」的幸福指數,如何去確實瞭解民眾主觀快樂幸福感,可能是非常重要且迫切要做的事情。另外,也要考量到不同年齡層的偏好。

行政院主計處(2011)在《2010年社會指標統計年報》中,首度在各主要領域中選擇了一些客觀指標與OECD的34個先進國家比較,以呈現我國近十年來社會福祉或進步狀況的實際情形。這是一項相當難得的開展,但美中不足的是其未將生活品質等「主觀感受」指標納入該年報的探討範疇。政府常常覺得已經做了很多事情,為什麼民眾還是不滿意?政府如果能夠隨時掌握民眾的快樂或不快樂的感受實況,並進一步探討相關因素,然後再依據這些分析結果與公共政策產生緊密的連結,或規劃介入服務,或許有可能改變民眾的一些主觀感受。

(二)擬訂幸福指數應有一個全民參與的實證過程,可善用研究機構或在地組織的力量,並儘量做到完全透明且資訊公開

英國從 2010 年底由國家統計局（ONS）開始規劃以四年期程來建置「國家幸福指數」（ONS UK, 2011），而擬訂指數的過程完全透明且資訊公開，並隨時對外公佈相關結果報告（或預告發布日期），讓社會大眾能夠詳細知悉進展。ONS 非常看重民眾主觀快樂幸福感的部份，故先利用網路討論平臺讓廣大網友發表個人看法，並至全國各地的單位、組織或學校辦理百場討論會（參加者達 3 萬 4 千人）。ONS 已依據這些結論初步彙整出十大幸福指標面向，及進行第二波的各界徵詢工作（以會議或通訊方式，計 1800 人參與）。2011 年 4 月，ONS 亦曾透過 20 萬戶綜合家戶調查，以實證方式大規模測量民眾的主觀幸福感。此調查分析結果將會再跟其他客觀的社會指標結合，來發展「國家幸福指數」系統。由此過程可以看出英國統計部門是以「由下而上」的方式來擬定其國家的幸福指數。

美國西雅圖市在 2011 年由當地的永續組織進行全市的線上快樂調查（Sustainable Seattle, 2011）。加拿大的維多利亞市（卑詩省首府）也每兩年測量一次民眾的快樂及生活滿意度，並成立了幸福指標在地聯盟（PRI's The World, 2011）。

雖然總統馬英九先生已要求行政院在 1 年內提出「國民幸福指數」的具體作法（中央通訊社，2012），但過去臺灣各級政府主計單位較少常態性地收集或建立與幸福相關面向的客觀指標（陳嘉鳳，2010；陳嘉鳳、周才忠，2011），中央或地方政府至今亦尚未進行過大規模的民眾主觀幸福感調查（如快樂程度、生活滿意度等）。如今要在短短的數月之內，擬定出「國民幸福指數」，恐難周全思慮。因此，主計單位可即刻將與幸福相關的題項併入其他常態性調查（如全國人口及住宅普查、家庭收支調查、中老年狀況調查、青少年狀況調查等），或參酌國內相關研究機構或民間組織的類似快樂幸福調查結果。總之，不能只由施政單位自己主觀決定指標的內容，應有充分的科學實證基礎來確認指標的恰當性。

(三)發展互動式的國家幸福指標系統，以隨時掌握或有效預測民眾快樂幸福的現況或趨勢

美國蓋洛普市調公司建置的「蓋洛普與海斯威斯的健康指數」(Gallup & Healthways, 2010)，這是屬於互動式的資料庫系統，可即時查詢不同國家、地區、州別、城市的生活評估、情緒健康、身體健康、健康行為、工作環境等指標面向的概況或排名。蓋洛普累積的美國或各國調查樣本數高達數十萬份，其每天至少會固定訪問 1000 位以上的美國民眾，以提供單日、每月或全年的相關分析資料。蓋洛普網站也會不定期在該「幸福」網頁中公佈最新的主題分析文章或研究結果。OECD 的「美好生活計劃」互動指標網站 (OECD Better Life Initiative, 2011) 更設計了讓訪客評定指標相對重要性的功能，這樣一來，就可及時瞭解全國或不同群體民眾的看法。

未來，如果要每年皆定期公佈「國民幸福指數」的話，行政院主計總處應及早思索建置相關互動式指標系統的可能性，以利定期進行衡量國民快樂幸福概況、區域分布或生活滿意度，並即時做正確分析及精準預測。此除可提供政府各單位相關政策或服務之規劃參考外，亦能讓社會大眾知悉快樂幸福的現況，增加公眾對政策的參與程度。這些工作的落實與否，皆在檢驗臺灣政府是否真的願意「走出 GDP」(行政院主計處，2011)，而以全新的角度來建立快樂幸福的社會環境。

四、結論與未來幸福政策發展之建議

把提升多數民眾的生活幸福視為政府施政或國家發展的首要重點，這是當今的世界趨勢 (UN News Centre, 2011; Action for Happiness, 2011)。英國首相卡麥隆也曾宣示：「經濟成長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之一，但最終目的則在提昇人民的生活幸福」(WEF, 2012)。OECD (2011) 積極倡議「美好生活指數」的主要目的乃在於希望能長期督促各會員國真正落實提升幸福的公共政策。2012 年 1 月底，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

健康幸福議題理事會在瑞士達沃斯召開的年會中發表《幸福和全球性成功》報告 (WEF, 2012)，其內容亦討論影響人類快樂幸福生活的三大構念 (職場、家庭與社區) 及相關的重要目標方向。

臺灣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政府的主要施政目標都放在追求國家經濟的成長，或聚焦在自殺、災難創傷、物質濫用、犯罪偵防等問題的解決上 (陳嘉鳳、周才忠, 2011)，而不是提昇全民的快樂幸福感、生活滿意度或心盛 (flourishing) (Keyes, 2007)。如今，「快樂」、「幸福」竟成爲國家領導人、中央或縣市政府官員、政治人物經常掛在嘴上的流行語彙，希望這不只是空泛的政治口號與樣板文宣，而是政府及政治人物真正念茲在茲的施政重點。

根據前文關於民眾主觀快樂幸福感之樣貌及影響因素之分析，本節將針對調查研究結果討論政策可努力的方向與國外的幸福政策及服務可供借鏡之處。

(一) 提升臺灣民眾的主觀快樂幸福感之心理教育政策： 培養民眾「自得其樂」與「有效因應困境」的能力

從歷年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及社會意向調查、國外文獻及全球調查 (Helliwell, Layard & Sachs, 2012) 的結果，都可看到偏向快樂的鐘形分配趨勢，也就是自覺生活過得快樂的民眾還是多於覺得不快樂的人。就算在 2008 年底全球金融海嘯發生之際，新聞中呈現的景象似乎一片蕭條，但是 25 縣市調查結果讓人驚訝的是多數的民眾自覺的生活感受還是偏快樂這邊的 (陳嘉鳳等, 2010)。可見，雖然受試民眾確實感受到外在環境中的嚴重經濟危機，不過多數民眾還是有「自處之道」，因此能維持自覺尚且良好的心情感受。

由於對於生活無感或覺得不快樂的人在全國民眾中也有相當的比例，但是展望未來，世界經濟局勢仍然變化莫測，誰知下一波危機會何時到來；國內外的政治局勢經常也是變動不安的。這種詭譎現象，提醒政策規劃者，如果心理教育能夠從小開始或系統性的培養民眾的自處能

力或韌性 (resilience)，那麼即便生活在惡劣的外在環境中，自我還是可以維持某種程度的快樂幸福感的。

此外，陳嘉鳳等 (2010) 的調查結果也發現快樂與不快樂的人在使用困境因應策略上亦有差異。而壓力的有效因應策略絕對是可以透過教育訓練培養的能力。

(二) 建構社會支持網絡及改善工作環境

社會上常有人提到最近的痛苦指數提高，可能是指民眾主觀感覺到經濟的壓力很大，治安壓力也很大，或是其他層面 (社會和工作) 的很大壓力。我們從陳嘉鳳等 (2010) 的調查結果中，也可以看到這些現象。生命的困境與壓力雖然不會放過任何一種人，但民眾身處外在環境的良窳，尤其是與個人生活有較直接關聯的層面 (家庭關係或社區聯繫) 是否理想，決定是否足以支撐美好的生活。

以社區聯繫方面來說，諸多研究證實 (Wethington & Kessler, 1986; Matt & Dean, 1993; Holt-Lunstad, Smith & Layton, 2010; Crabtree, 2012) 擁有良好的社會聯繫有助於個人的生活適應、壓力緩衝、身心健康、延長壽命或獲得就業機會，以及帶動整個社會的友善信任、包容接納、公民參與、快樂幸福。「朋友」就是社會聯繫最重要的代表 (Eddy, Paap, & Glad, 1970; Gurin, Veroff, & Feld, 1960; Toro, 1986; Young, Giles, Jr., & Plantz, 1982)。再從紓壓的方式來看，「找人聊天」是最多人會使用的方式。如果把這兩個現象結合起來，就有一種很可以發展的心理衛生服務內容，就是去協助社區民眾變成別人的「有效」朋友。因為多數人都會是別人的朋友，要是有能力在跟別人聊天時，做一些對的事情 (相互支持、鼓勵等)，那麼人的很多困擾、問題或傷口都有可能解決或復原的。過往政府在施政上一直努力增設專業機構，希望提供更好的服務。但對民眾來說，碰到影響生活的疑難問題時，想到的往往不是這些專業機構，而是自然協助者 (natural helpers) (Ehrlich, D'Augelli, & Conter, 1981)。所以，經營每個人的「自然協助者的支持網絡」是個重要議題，

例如如何定期或有系統的讓所有做別人親朋好友的人都能扮演好支持的角色（如生命貴人），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由於世界經濟的變化讓許多人對未來的前景深感憂心。對於面臨的社會變遷與各項壓力（如經濟及工作因素）更勝於已往，而且又是家庭的支柱、職場的主力 and 社會的中堅的不夠快樂的青壯年世代，政府理應投以最大的關注。例如可以透過企業組織的改變，提供較為良好的工作環境；或透過心理教育，提升員工的自處或因應能力，使其在未來邁向退休或老年階段亦能維持較高程度的快樂幸福感和生活品質，如同 U 型幸福曲線的結論一般（Stone, Schwartz, Broderick & Deaton, 2010）。

（三）國外幸福政策與服務的做法及臺灣的思考

1. 中央政府部門

目前，澳洲新南威爾斯省的「心理健康促進與預防架構」，強調以提昇全民心理健康與幸福為目標（HIMH, 2010）；英國衛生部（Department of Health of England, 2011）推出新的心理健康政策白皮書，強調「跨政府部門」的合作行動，勾勒涵蓋所有人口的六大目標，以實質提昇全民的抗逆能力（resilience）與快樂幸福；英國財政部在最新出版的「綠書」裡，首度將測量主觀幸福感的方法列入建議政府各部門做為瞭解社會影響（如生活滿意度）時可採用的政策評估工具之一（HM Treasury UK, 2011）；美國聯邦政府最新發表《國家預防策略》的全文報告書（DHHS US, 2011），列出七項優先施政工作與相關評估指標，其中包括提昇全體人口的「心理和情緒的幸福感」；紐西蘭財政部在《致力促進紐西蘭人更高生活水準》研究報告（Treasury NZ, 2011）中，亦將主觀幸福感列入「生活水準架構」與相關測量指標，規劃具體改善所有民眾的社會聯繫（家人、朋友與社區）、生活品質與快樂幸福。

從以上國家施行「幸福政策」（well-being policy）的經驗來看，國內中央政府的各個部門應及早思索有哪些攸關民眾快樂幸福的政策及服務可以開始規劃及執行。各行政單位應該有專責的部門或人員來做跨

部門的整合工作，及研擬各項短期、中期、長期的施政計畫。提出的施政方向或重點，必須有學理或實證基礎，而不是「新瓶舊酒」地又把所有現行業務拼湊在一起。針對目前已擬訂的施政重點方向或優先項目必須依據最新幸福指標顯示結果做相關調整修正，因為民眾主觀認為會帶給其快樂幸福的做為可能跟政府官員或專家學者的認知有相當差異。另外，有一些需要配合的法律規章亦要立即著手修訂，以利追蹤評估與績效考核。

2. 縣市政府層面

對於提昇民眾的主觀快樂幸福感，不僅國家領導人或中央部會首長要關心，地方政府亦應負起重要的責任。目前在紐西蘭、澳洲、英國等地已有諸多成功經驗，其中英國的青年基金會曾結合地方政府進行在地幸福的三年創新實驗計畫，著名智庫的新經濟基金會也出版《地方政府扮演提昇幸福感的角色》報告（Michaelson, 2011），主要內容提及如何提供民眾更美好的生活環境及長期協助社區建立抗逆能力（resilience）。英國國民健康服務聯盟出版「公共心理衛生與幸福」研究報告（NHS Confederation, 2011），嘗試以在地機構的角度提供相關策略看法。這些相關政策或服務是針對所有縣市人口來規劃的，其重點不是只放在有問題的個人或群體，而且強調在地化觀點及創新作法。

陳嘉鳳等（2010）的全國幸福調查也曾選擇數個縣市做鄉鎮之間的比較，初步發現快樂或不快樂的鄉鎮呈現區域分佈。未來，值得進一步與學術單位、民間機構或社區發展組織合作，共同深入探討其居住環境與民眾主觀快樂幸福感之間的關係，以提供建構幸福城市之政策或服務參考。另外，縣市政府也可以去發掘每個鄉鎮市區的幸福特色，或設法找出最快樂幸福的地方、企業、學校、社區、家庭或個人等，舉辦「美好生活」相關的展示會、研討會、實地參訪等活動，以交流相關幸福經驗，發揮積極正向的影響力，進而有效提昇縣市整體民眾的主觀快樂幸福感及生活品質。

3. 社區層面

目前，如何提昇社區幸福感（community well-being）（Prilleltensky, 2011）儼然成爲一股國際潮流，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印尼、愛爾蘭、荷蘭等國的政府統計單位均建立了測量社會聯繫或社會資本的相關指標。針對這些支持網絡的評估結果，紐西蘭、澳洲與英國規劃了不同面向的社區幸福或心盛（flourishing）方案讓民眾能與人維持正向關係、面對壓力、貢獻社會及享受生活，而能過得更加快樂幸福及有意義。國內亦有學者（行政院內政部，2011）注意到此一新興趨勢，建議未來社區發展工作也能朝向「幸福社區」方向發展。這些都是政府未來在制定「國民幸福指數」之後，可以學習的相關政策或服務方案。

國內多個縣市其實已有類似「讓個人、家庭與社區同享快樂幸福」的方案或活動，只是沒有那麼明確的意涵及目標，或進行的時間非常短，也沒有人具體彙整出其實務模式，或評估對民眾主觀快樂幸福感的影響。因此，臺灣未來如能做一些修正或增加一般民眾參與的可能性，並結合社區需求及在地特色，利用龐大的非政府組織（NGO）的協作力量，及以往「社區總體營造」（劉立偉，2008）的深耕基礎，每個縣市試行發展能彰顯其需求特色的社區幸福方案，並進行交流與觀摩學習，臺灣建構幸福社區仍有相對發展的優勢。

參考書目

- SRDA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2011，〈2007~2009 年社會意向調查計畫〉，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URL=<https://srda.sinica.edu.tw/>。（2011/09/01 瀏覽）
- 中央通訊社，2012，〈新閣上路 總統勉打造安心內閣〉，中央社新聞網，URL=<http://www2.cna.com.tw/News/FirstNews/201202060058.aspx>。（2012/02/06 瀏覽）

- 行政院內政部，2011，《100 年度社區發展工作績效評鑑報告》，臺北：內政部。
- 行政院主計處，2011，〈2010 年社會指標統計年報〉，行政院主計處網站，URL=<http://www.dgbas.gov.tw/lp.asp?ctNode=3100&CtUnit=1033&BaseDSD=7>。(2011/12/01 瀏覽)
- 行政院主計處，2012a，〈國民所得統計常用資料〉，行政院主計處網站，URL=<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4616&CtNode=3566&mp=1>。(2012/02/01 瀏覽)
- 行政院主計處，2012b，〈家庭收支：平均每人每年可支配所得〉，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統網站，URL=<http://61.60.106.82/pxweb/Dialog/statfile9.asp>。(2012/02/01 瀏覽)
- 張荳雲、廖培珊，2008，《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五期第三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 張荳雲、廖培珊，2009，《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五期第四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 陳嘉鳳，2010，《以實證為基礎之心理健康政策初探》，教育部「大專校院研究人才延攬方案」。
- 陳嘉鳳、周才忠，2011，〈海峽兩岸建構幸福社會的契機及挑戰：社區心理學家的觀點〉，《第七屆華人心理學家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頁 136，臺北：中央研究院。
- 陳嘉鳳、林家興、鄭夙芬、黃秉德、曾春美、唐子俊，2010，《以民眾需求為基礎的全國 25 縣市政府心理衛生行政工作之規劃：從社會資源的運用、組織結構與專業人力資源及績效評核的角度切入 (2/2)》，行政院衛生署委託科技研究計畫。
- 章英華、傅仰止、傅祖壇，2002，《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四期第三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 傅仰止、杜素豪，2010，《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五期第五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楊文山、瞿海源、蕭新煌、傅仰止、章英華、伊慶春，2008，《2008 年第二次社會意向調查》，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劉立偉，2008，〈社區營造的反思：城鄉差異的考量、都市發展的觀點、以及由下而上的理念探討〉，《都市與計劃》，第 35 卷，第 4 期，頁 313-338。

Action for Happiness, 2011, *Happiness: A message to world leaders*, Action for Happiness Website, URL=<http://www.actionforhappiness.org/news/happiness-a-message-to-world-leaders>. (2012/01/10 瀏覽)

Arora, R., 2008, *A wellbeing report card for president Sarkozy*, Gallup Website, URL=<http://www.gallup.com/poll/103795/wellbeing-report-card-president-sarkozy.aspx>. (2012/01/15 瀏覽)

Crabtree, S., 2012, *Social Support Linked to Health Satisfaction Worldwide*, Gallup Website: URL=<http://www.gallup.com/poll/152738/Social-Support-Linked-Health-Satisfaction-Worldwide.aspx>. (2012/02/17 瀏覽)

Department of Health of England, 2011, *No health without mental health: A cross-government mental health outcomes strategy for people of all ages*, Department of Health of England Website, URL=http://www.dh.gov.uk/prod_consum_dh/groups/dh_digitalassets/documents/digitalasset/dh_124058.pdf. (2011/09/03 瀏覽)

DHHS US, 2011, *The National Prevention Strategy*,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Website, URL=<http://www.healthcare.gov/prevention/nphpphc/strategy/report.html>. (2011/09/01 瀏覽)

Diener, E. and Diener, C., 1996, "Most people are happy," *Psychological Science* 7: 181-185.

- DPCD Victoria, 2012, *Top twenty data sources for describing community wellbeing in Victoria*, Office for DPCD State Government of Victoria Website, URL=http://www.dpcd.vic.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03/92514/Top_twenty_data_sources_for_describing_community_well-being_in_Victoria_2012.pdf. (2012/02/01 瀏覽)
- Durand, M., 2011, *Setting the scene*, The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Measuring Well-Being and Fostering the Progress of Societies Website, URL=<http://www.measuring-well-being.asia/en/>. (2012/01/20 瀏覽)
- Eddy, W. B., Paap, S. M. and Glad, D. D., 1970, "Solving problems in living: The citizen's viewpoint," *Mental Hygiene* 54: 64-72.
- Ehrlich, R. P., D'Augelli, A. R. and Conter, K. R., 1981, "Evaluation of a community-based system for training natural helpers. I. Effects on verbal helping skill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9: 321-337.
- Gallup and Healthways, 2010, *The U. S. Well-Being Index*, Gallup and Healthways Well-Being Index Website, URL=<http://www.well-beingindex.com>. (2012/01/20 瀏覽)
- Gurin, G., Veroff, J. and Feld, S., 1960, *Americans View Their Mental Health: A Nationwide Interview Survey*, New York: Basic Book.
- Helliwell, J., Layard, R. and Sachs, J., 2012, *World Happiness Report*, The Earth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Website, URL=<http://www.earthinstitute.columbia.edu/sitefiles/file/Sachs%20Writing/2012/World%20Happiness%20Report.pdf>. (2012/03/29 瀏覽)
- HM Treasury UK, 2011, *HM Treasury and 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publish Green Book discussion paper on valuing social impacts*, Green Book news Website, URL=http://www.hm-treasury.gov.uk/data_greenbook_news.htm. (2011/09/02 瀏覽)

- Holt-Lunstad, J., Smith, T. B. and Layton, J. B., 2010,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mortality risk: A meta-analytic review," *Plos Medicine* 7: 1-20.
- HRSDC, 2010, *Indicators of Well-being in Canada*, Human Resources and Skills Development Canada Website,
URL=<http://www4.hrsdc.gc.ca/h.4m.2@-eng.jsp>. (2012/01/19 瀏覽)
- HIMH, 2010, *Building better mental health: A framework for the promotion of mental health and prevention of mental ill-health in NSW*, The Hunter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of Australia Website,
URL=http://www.himh.org.au/client_images/936497.pdf. (2011/09/02 瀏覽)
- Inglehart, R., Foa, R., Peterson, C. and Welzel, C., 2008, "Development, freedom, and rising happiness: A global perspective (1981-2007),"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3: 264-285.
- Inglehart, R., Welzel, C. and Foa, R., 2008, *Happiness trends in 24 countries, 1946-2006*, World Values Survey Website,
URL=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articles/folder_published/article_base_106. (2011/11/01 瀏覽)
- Keyes, C. L. M., 2007, "Promoting and protecting mental health as flourishing: A complementary strategy for improving national mental health," *American Psychologist* 62: 95-108.
- Matt, G. E. and Dean, A., 1993, "Social support from friends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elderly persons: Moderator effects of age,"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4: 187-200.
- Michaelson, J., 2011, *Local government and well-being revisited*,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Website,
URL=<http://neweconomics.org/blog/2011/11/25/local-government-and-well-being-revisited>. (2012/01/10 瀏覽)

- Myers, D. G. and Diener, E., 1995, "Who is happy?" *Psychological Science* 6: 10-19.
- NEF, 2006, *The Happy Planet Index*,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Website, URL=<http://www.neweconomics.org/publications/happy-planet-index>. (2012/01/20 瀏覽)
- NHS Confederation, 2011, *Public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 the local perspective*, The NHS Confederation Website, URL=<http://www.nhsconfed.org/Publications/reports/Pages/Public-mental-health-well-being-local-perspective.aspx>. (2012/01/12 瀏覽)
- OECD, 2011, *How's Life?, Measuring Well-being*, OECD Publishing.
- OECD, 2012, *OECD Yearbook 2012: Better Policies for Better Lives*, OECD Publishing.
- OECD Better Life Initiative, 2011, *Your Better Life Index*, OECD Better Life Initiative Website, URL=<http://oecdbetterlifeindex.org>. (2011/11/02 瀏覽)
- ONS UK, 2011, *Measuring National Well-being*,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of UK Website, URL=<http://www.ons.gov.uk/ons/guide-method/user-guidance/well-being/index.html>. (2012/01/10 瀏覽)
- Parkinson, J., 2006, "Establishing national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indicators for Scotland," *Journal of Public Mental Health* 5: 42-48.
- Prilleltensky, I., 2011, *Psychology and Social Justice: Linking Personal and Community Well Being*, Keynote address at the 2011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anadia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Association, Ottawa, Ontario, Canada.
- PRI's The World, 2011, *Measuring Happiness in Victoria, British Columbia*, PRI's The World News Website,

- URL=<http://www.theworld.org/2011/10/happiness-victoria-british-columbia>. (2011/10/03 瀏覽)
- Seaford, C., 2011, "Time to legislate for the good life," *Nature* 477: 532-533.
- Stone, A. A., Schwartz, J. E., Broderick, J. E. and Deaton, A., 2010, "A snapshot of the age distribution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PNAS Early Edition* 1-6.
- Sustainable Seattle, 2011, *The Seattle Area Happiness Initiative*, Sustainable Seattle Website, URL=<http://sustainableseattle.org/sahi>. (2012/01/17 瀏覽)
- The Economist, 2012, *Measures of well-being: Chilled out*, The Economist Website, URL=<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48213>. (2012/02/25 瀏覽)
- Toro, P. A., 1986, "A comparison of natural and professional help,"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4: 147-159.
- Treasury NZ, 2011, *The Treasury launches living standards framework*, The Treasury of New Zealand Website, URL=<http://www.treasury.govt.nz/publications/media-speeches/media/25may11>. (2011/09/01 瀏覽)
- Tshiteem, K., 2011, *Measuring well-being: Bhutan's pursuit of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The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Measuring Well-Being and Fostering the Progress of Societies Website, URL=<http://www.measuring-well-being.asia/en>. (2012/01/20 瀏覽)
- UN News Centre, 2011, *Happiness should have greater role in development policy - UN Member States*, UN News Centre Website, URL=<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39084&Cr=general+assembly&Cr1>. (2012/01/15 瀏覽)

- UNDP, 2011,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Sustainability and Equity: A Better Future for All*,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Website, URL=<http://hdr.undp.org/en/reports/global/hdr2011>. (2011/12/01 瀏覽)
- Veenhoven, R., 2011, *Happiness in Nations*, World Database of Happiness Website, URL=<http://worlddatabaseofhappiness.eur.nl>. (2011/12/01 瀏覽)
- WEF, 2012, *Well-being and Global Success*, World Economic Forum Website, URL=<http://www.weforum.org/reports/well-being-and-global-success>. (2012/02/02 瀏覽)
- Weiten, W., Lloyd, M. A., Dunn, D. S. and Hammer, E. Y., 2008, *Psychology Applied to Modern Life: Adjust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Belmont, CA: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 Wethington, E. and Kessler, R. C., 1986, "Perceived support, received support, and adjustment to stressful life event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7: 78-89.
- Young, C. E., Giles, Jr. D. E. and Plantz, M. C., 1982, "Natural networks: Help-giving and help-seeking in two rural community,"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0: 457-469.

臺灣與香港生活與婚姻幸福感的比較研究

楊文山*、王乃琳**

摘 要

本研究利用新發展的幸福感與生活滿意度測量指標，測量臺灣與香港地區一般民眾的幸福狀況，並探討有關婚姻與主觀幸福感的理論意涵，比較兩地幸福感測試結果。資料來源為 2010 年 12 月在臺灣與香港同時進行的「社會意向」電話訪問調查資料。幸福感與生活滿意度採用了國際幸福指數 (International Wellbeing Index, IWI) 作為測量兩地民眾婚姻與生活滿意度以及幸福程度的依據；去除樣本的遺漏值，最後分析的樣本數分別為台灣 1,238 人、香港 1006 人。根據線性統計迴歸分析，研究主要結果顯示：(1) 女性與男性相較，有較高的幸福感；(2) 臺灣與香港地區個人的婚姻狀況對於自評的幸福指數的影響力逐漸消失，但離婚則有較低的幸福感；(3) 自我認同的社會階級對於個人的生活幸福感較為重要，社會階級越高，幸福感越高；(4) 此外，個人對於社會公平認知、社會中對他人信任、未來社會、經濟發展是否樂觀與個人社會網絡相關的五個變項，對於個人自評的幸福指數有較大的影響；(5) 個人收入與是否接受大專以上教育程度，雖然是測量社經地位的重要指標，但與受訪者的主觀幸福感無明顯關聯。

關鍵詞：國際幸福指數、臺灣、香港、婚姻、幸福感、生活滿意度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助理

一、導言

社會科學文獻中對於主觀幸福感的研究有相當多的研究記載。不同國家或社會的研究均呈現出十分相似的研究結果：幸福感決定於理想期望與現實比較後的差距，當人們對於非物質層面，例如：個人發展或是社群生活的期望越高，則幸福感會較高（Ng 2002; Sing 2009）；已婚的人往往比從未結婚、喪偶或是離婚有較高主觀的幸福感（Glenn & Weaver 1979; Gove, Style & Hughes 1990; Mastekaasa 1994; Veenhoven 1984）；此外，社會中個人的自由度愈大，且能夠自由選擇生活方式，個人的幸福感與生活滿意度也會愈高（Welzel and Ingleheart 2010）。根據這些研究，學者發展許多理論來解釋日常生活、婚姻狀況等對於主觀幸福感的正向效應。例如，婚姻可以提供個人友誼（Glenn 1975），同時和人際親密感與情感上支持。然而，最近的研究發現挑戰了傳統有關於婚姻狀況與主觀幸福感間的因果關聯性。Glenn 與 Weaver（1988）研究發現，1972 到 1986 年間，美國已婚者與單身、喪偶或離婚者之間幸福感的差異明顯減少。隨後，Hidore et al.（1985）與 Lee et al.（1991）的研究發現也指出，婚姻狀況與幸福感的相關性逐漸變得較為薄弱。這些早期的研究發現，是否指出近年來由於家庭型態趨於多元化、社會對於婚前性行為態度較為開放，以及允許多樣開放的親密關係，婚姻狀態對於幸福感的重要性已逐漸消失，已婚者對於未婚或失婚者而言，主觀幸福感失去了重要性（Williams, 2003）？由於婚姻生活在個人生命歷程軌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一般成人的幸福感會不會受到婚姻生活的影響，成為相當重要的研究議題，也值得做進一步的探究（Elder 1996）。

近年來社會學家及人口學家發現，東亞國家的社會呈現出不婚或晚婚的趨勢（Jones 2003, 2009）。這種年輕人口晚婚、不婚的社會現象，普遍存在於受到儒家影響的東亞社會或東南亞社會的都會地區之間；傳統的儒家文化中的家庭延續與傳承，影響了社會大眾的家庭價值觀。過

去，受到儒家思想影響的東亞社會，傳統「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觀念使得婚姻在社會中是全面性的、普及化的，不論男、女在三十歲幾乎都已完婚。此現象顯示婚姻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制度之一，對於個人及社會都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性。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是臺灣以及香港的人民，都是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社會；不論香港或臺灣，目前均有相當高比例生育年齡的年輕人口未婚或晚婚。由於社會人口普遍晚婚與不婚的結果，臺灣或香港的生育率逐年降低，甚至成為世界上「超低生育率」的地區，這也意味著不婚或晚婚的現象可能影響未來的社會人口結構組成，臺灣、香港將迅速的老齡化，成為高齡化的社會。

再者，「文化」在跨社會的幸福比較研究中，呈現顯著且具有決定性的因素，對於生活品質及其變化的重要性也不斷的增加；而在國家與國家的比較中，文化因素則比經濟發展更重要，同時也解釋了人們對於生活品質感受的不同（Liao, Fu & Yi 2005）。不同於針對地區居民的幸福與生活滿意度的比較，其社會的經濟表現與文化因素則是同樣的重要。在儒家文化的集體主義延續傳承之下，東亞國家包括中國、韓國、日本皆有非常大的影響。有別於西方國家的個人主義，「好的生活品質」在東方的社會文化之下被解讀為對於相似觀點、需求、目標的感受與覺察，同時也可用於解釋每一個人們所存在的生活領域。「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相異性影響了跨社會及跨文化的比較：西方的個人概念是假定靠著個人的力量自力更生，而獲得自我滿足及生活幸福；中國社會的集體主義則是個人的幸福源自於且依賴著群體的幸福狀況。雖然香港與臺灣常被認為並非屬於完全傳統的中國文化，尤其香港深受英國殖民文化影響，但是兩社會都存有極相似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例如：孝道、家庭性別角色分工。除了文化的相似性，近十年還有許多研究都指出臺港兩地重要的社會差異反映出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的變遷。本文嘗試以臺港兩地相似的文化背景及社會差異相關重要性說明當地居民對於婚姻與生活品質的感受，並且驗證可能的社會因素對於主觀生活品質的影響。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香港與臺灣地區個人主觀幸福感與婚姻狀況的相關性以及利用新的幸福感測量指標測量臺灣與香港民眾的幸福感，並針對量表進行信、效度檢測。論文中將採用國際幸福指數（International Wellbeing Index, IWI）討論有關主觀幸福感的理論意涵，以及此幸福感測量理論與測量幸福感量表是否適用於臺港兩地民眾，同時比較兩地幸福感測試結果。此外，我們也希望此一研究結果有助於瞭解其他具有相似儒家傳統文化影響之社會，如日本或韓國，婚姻狀態中之影響不婚或是晚婚與幸福感間的相關影響因素。近年來這些東亞社會都有相似的人口問題，年輕人口的不婚、晚婚，與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以及日益嚴重的人口老化問題。本研究將利用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中心與臺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共同蒐集的 2010 年「社會意向調查」資料檔進行研究與分析。

二、文獻回顧

目前有關幸福感的研究，西方國家社會相當廣泛的使用國際幸福指數 IWI 作為測量個人主觀幸福感依據；目前僅有少數的研究（Huang & Xing 2005; Chen & Davey 2009）嘗試驗證 IWI 是否適用於中國地區的香港、澳門等地。Cummins（1995）以及 Cummins 和 Nistico（2002）在一系列的研究中，提出了所謂個人主觀幸福感的恆常穩定理論（theory of subjective homeostasis wellbeing）。個人幸福感恆常穩定理論假設個人生活滿意度會因為動態心理機制，或是個人特性等因素維持在一個固定的基準範圍內，就像是身體機能會維持體內平衡的過程，譬如：血壓或體溫會維持一定的限度與範圍內，來維持生理機能正常的運作。對應於一般生活事件，個人幸福感或生活滿意度可能在一定平均基準範圍之內上升或下降，但是在一段時間之後會回復到平均值基準，而成為常態的分布。這樣的個人幸福感與生活滿意度需要更多的實地研究，驗證在亞洲不同社會與地區的適用性；若個人幸福感與生活滿意度會依循體內恆常

穩定的平衡理論的論點運作，則沿用此一理論所發展幸福感測量指標在不同社會的使用，將會獲得一致的研究結果。本研究將利用 Cummins (1998) 所發展的主觀幸福感指標，在臺灣與香港做實地測試，而此一主觀幸福感測量結果應與 Cummins (1998) 與其他學者利用同一指標在其他地區之測量獲得一致性結果。

目前的研究文獻對於婚姻與個人主觀幸福感有相當多的研究成果。目前有兩個主要的理論假設，作為解釋婚姻如何影響主觀幸福的假說模型：社會因果關係假說 (social causation hypothesis) 與選擇假說 (selection hypothesis)。根據資源假說 (resource hypothesis) 因為已婚者擁有更多社會資源，無論在經濟條件、社會、心理情緒或是身體狀況，均對個人健康上產生正面的影響。過去的研究文獻發現，許多研究都強調婚姻對於已婚者的情緒、心理以及身體狀況相較於未婚人士都較佳 (Gove et al. 1990; Ross et al. 1990; Waite 1995; Waite and Gallagher 2000)。許多研究也強調婚姻對於個人的心理狀態與健康會產生正面的影響 (Bloom 1990; Ross et al. 1990; Waite and Gallagher 2000)。婚姻能夠透過親情、友情、性滿足以及彼此間的親密感，提供配偶雙方情緒上的滿足與幸福感 (Burgess and Locke 1945)。此外，已婚者的配偶也在情感上和心理上提供多樣的角色：例如，監控者、朋友以及愛人等角色。由於已婚者在社會、心理和經濟資源方面有較多的供給，婚姻也能夠促進並有助於身體健康以及長壽 (Ross et al. 1990)。在經濟益處方面，婚姻可以通過配偶一方或雙方的收入，提供彼此生活更多的收入與財務資源；同時婚姻生活也可以因為配偶雙方彼此獲得良好照護，增加雙方的健康；在飲食照料以及生病時所提供的照護，使得配偶一方罹病時獲得照顧，也因為婚姻中的資源較多，能夠購買較多的健康保險，增加醫療照護的可能 (Ross et al. 1990)。

另外一方面，選擇假說 (selection hypothesis) 則認為已婚與未婚者幸福感的差異並非婚姻單一因素的結果，而是個體因為具有高度幸福感者被「選擇」進入婚姻；不幸福的弱勢者或是身體健康狀況不好、經濟

狀況不佳，往往進入婚姻的機會較低。換句話說，心理與身體健康較佳的個人，更有可能在選擇婚姻配對的過程中，勝過其他弱勢競爭者進入婚姻 (Joung et al. 1998)，因此有較高的幸福感。總體而言，許多過去與最近的研究發現，婚姻與個人身體狀況與心理上的幸福感呈現正相關。

三、婚姻生活幸福感

社會的變遷通常會伴隨著社會制度的重新建構。婚姻，雖為一個最主要的社會制度，也可能因時間而改變。香港與臺灣，兩個深受傳統儒家思想影響的社會共享儒學的文化遺產「集體主義」取向，成為社會與人際關係組成的重要概念 (Diener and Lucas 2000; Eid and Diener 2001)。傳統上，受到儒家影響的社會並不像西方個人主義的社會，強調個人的滿足與幸福感；基本上，集體主義社會比較重視共有以及將群體目標置於個人目標之上。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婚姻在集體主義的理想上，主要是強調關於一個人的義務以及家庭的責任；未婚個人的挑戰來自於社會的審查與壓力，也就是說，單身未婚在東亞社會大多是含有負面的意涵。如前所述，由於儒家文化重男輕女，尤其是男孩通常有傳宗接代的責任，婚後又需與父母同住以及照護他們的老年生活；然而本世紀以來，青春期在個人生命歷程中的出現——也就是青春期階段的擴展——改變了傳統婚前、婚後父母與子女間的傳統角色義務關係。

不僅如此，社會對於單身不婚人士的期望已經改變；婚姻的意義做為一個社會制度本身也已經重新配置。一些學者認為，婚姻對於個人幸福感的顯著遞減是因為當今時代許多人際替代關係的興起 (Musick and Bumpass 2006)。根據 Anthony Giddens 的觀察，無論東方或西方，在「後現代社會」，去婚姻化的過程中出現了所謂「純粹關係」的親密人際關係架構，取代了許多其他形式的人際親密關係；這種關係被定義為一種親密的夥伴關係，夥伴關係的持續是因為關係夥伴間滿意的情緒回報

(Giddens 1991, 1992)。在後現代社會，個人的幸福感與生活滿意度，被作為衡量個人成就、情感滿意度以及自我發展 (Cherlin 2008:226) 的重要指標。換句話說，後現代社會中的親密關係被視為追求個人幸福感以及自我實現 (情緒以及心理的幸福感) 的重要價值，對於個人而言，其重要性勝過於家庭責任或是家族的延續傳統價值。因此，婚姻似乎已經不再是親密關係的先決條件；一般民眾對於婚前性行為態度的改變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過去婚前性行為不被允許，若不婚或晚婚，則性行為的管道有限。但是在性行為開放的現今社會，不婚或晚婚就不再做為對於不婚男性或女性的一種懲罰 (Oppenheimer 1988)。

伴隨著婚姻的去制度化，過去法律對於個人親密關係的選擇或控制也逐漸的鬆動。許多婚姻替代的人際親密關係隨之產生，像是同居或是同性婚姻就證明了婚姻規範觀念的改變，對於婚姻制度所帶來的衝擊。已婚與未婚同性戀和異性戀伴侶之間的在財政和司法的權益上的差異漸漸模糊與消失。舉例來說，法國的民事團結契約 (Civil Solidarity Pacts) 就允許未婚伴侶擁有與已婚夫妻大多數相同的權利與責任。非婚生子女也越來越普遍，同時被社會接受：在美國 20 世紀 90 年代，40% 的新生兒的母親來自於同居伴侶，而在英國是同居生子的數據大約是 60% (Ermisch 2001)。直到今天，未婚人口在一個親密非婚姻關係中，甚至比合法的已婚夫婦享有更多的社會和政治上的權力以及經濟特權。基於上述原因，單身未婚人口的生活品質與已婚者比較，應該不再有太大的差異。這種單身晚婚或拒婚的現象不僅僅出現在西方社會，近期也出現在過去幾乎完全婚姻的亞洲社會。

四、臺灣與香港的婚姻： 社經地位與性別意識型態轉移

儒家文化有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按照家族傳承慣例，長子成為家族的繼承人；相較於女性，男性一般有較高的社會、經濟以及政治地位。

根據儒家思想，女性的生命歷程是預先注定的：女性通常被認為暫時借住在她的原生家庭，在等待成年後離開原生家庭，結婚、生子、在丈夫的家中服侍自己的公婆（Borthwick 1985）。過去，儒家社會的女性被嚴格限制在家庭特定領域內，並在性別角色期待上受到高度地道德監控。這種缺乏機會的社會制度安排，使得婦女在生活中很少有除了早婚以外的機會與選擇。

近年來，傳統婚姻所扮演的角色已逐漸凋零，挑戰著在東亞傳統社會的婚姻普遍性以及象徵著老舊婚姻角色的規範。維持單身或從事親密關係的替代形式不再被視為違反社會規範與倫理道德。在香港和臺灣，不婚逐漸成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也尚有其他社會因素導致普遍不婚，例如：年輕人對於婚姻自主權的提升也是因素之一。越來越多人不婚與晚婚，間接導致婚姻制度的改變。舉例來說，在臺灣約有三分之二出生於 20 世紀 30 年代的已婚人口是完全由父母決定婚姻，但對於出生在 20 世紀 60 年代早期的人，這個數據已經降低到僅稍高於十分之一。由於初婚年齡的上揚，30 到 40 歲之間不婚的比例也逐年提升。即便是婚姻仍然是很普遍的社會制度，持續上升的婚姻年齡，意味著一部分的臺灣男性與女性在他們的成人初期的生命歷程中，有很大部分將維持單身的狀態（Thornton and Lin 1994:211）。

有哪些社會經濟因素的改變造成這種不婚與晚婚的婚姻的趨勢？根據 Gavin Jones（2003）的研究發現，在 1960 到 2000 年間，不婚比率與亞洲女性教育水準提升呈現正相關。同時由於亞洲受過教育的男性，往往喜歡娶比他們年輕以及比他們教育水準低的女性（Jones 2003:14），因此，近年來亞洲地區女性教育水準迅速提升的結果，受過高等教育女性與僅受過基礎教育的男性在婚姻市場中感受到婚姻的排擠效應。過去三十年東亞以及東南亞經濟穩定成長（Jones 2003, 2007; Jones and Gubhaju 2009），就業機會的增加與婦女教育機會提升，毫無疑問的會影響婦女的婚姻決定。此外，女性的經濟地位和教育水準的提升，進一步激化婚姻關係中性別平等的議題，這可能導致亞洲女性提高

她們在婚姻擇偶的過程中的期望 (Oppenheimer 1988)。如果她們沒有找到合適的伴侶，也導致了晚婚甚至決定不婚的現象 (Oppenheimer 1988)。

社會經濟學家主張，婚姻的維持是根據男性與女性其高度分化的性別角色，也是潛在的貿易夥伴 (Beckers 1974; Parsons 1949)。根據 Parsons 的觀點，這種性別角色的分離是一種婚姻穩定的必要性功能 (Parsons 1949)。然而，對於近期婚姻市場的變化，專業化的模式在婚姻似乎都過於簡單以及陳舊。婚姻的形式走向收入共擔模式，即夫妻雙方都有工作薪酬收入。職業婦女現在可以做為一個原生家庭的提供者，或是分擔自己的家庭支出不依賴於丈夫的財務支持。此外，女性也成為男性在工作上的競爭對手，以及開始有除了家庭以外的生活。相同地，男性也不再是基於家庭主婦的刻板印象尋求配偶；相反地，男性比有相似財政能力的女性更具有較高收入的潛力。

過去的研究已經顯示了性別平等跟婚姻生活中的平權以及家務勞動分工有顯著相關 (Lai 2000; Yi et al. 2000)。因此，男性、女性在就業機會中享受的平等機會，也會導致建立一個更平等夫妻關係，或是改變夫妻在婚姻關係中對於角色扮演認知與期望。女性可能認為進入有成就感的職業生涯，比進入傳統婚姻以及提升家庭生活更能夠達到自我實現 (Jones 2003: 19)。因此，教育水準的提升以及工作生涯不僅意味著必要和不可避免的晚婚，但也有助於重新平估兩性在私人以及公共領域的狀況。當今也有許多女性希望能夠像她們的男性同輩，積極參與社會取得經濟地位，以及扮演不同的社會角色。因此，不論對於男性或女性而言，是否結婚對於個人的健康與幸福感是否仍然具有正相關是值得探究的有趣問題，已婚人口相較於未婚人口而言，是否具有心理優勢或身體更健康？或者說，如果婚姻是可以選擇的，人們在生命歷程中的其他領域可以取得成就與幸福感，而決定不婚或晚婚？為了瞭解婚姻狀況，以及社會經濟條件對於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我們利用社會意向調查資料進

行以下研究，瞭解婚姻與主觀幸福感以及生活滿意度的關聯性與其影響因素。

五、資料與測量

本文資料來源引自 2010 年 12 月在臺灣與香港所進行的社會意向電話訪問調查。該調查目的在理解臺灣與香港兩地社會趨勢與一般民眾意向的歷年變遷趨勢。為利於比較研究，兩地的調查採用相同的問卷形式與抽樣架構，並以繁體中文書寫，只有在少數需突顯兩地差異時才使用各自方言來表述。臺灣地區的調查是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意向調查」執行；香港部分則是由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中心策劃。雙方研究團隊每年共同商討問卷內容。基本上，由臺灣研究團隊負責草擬問卷初稿，進而與香港研究團隊共同諮商後，確定兩地訪問問卷的最終版本。兩地的調查皆使用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ompute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System, CATIS），訪談 18 歲以上的成年人，並利用隨機方式選取電話號碼尾數末兩碼以及戶中抽樣，選取合適的受訪者。抽樣架構則參考臺灣與香港各地區的人口組成。完成一份訪談問卷大約需耗費 20 分鐘。

臺灣與香港慣常使用的語言不同，臺灣普遍使用北京話與福建話，香港則通用廣東話，因此訪員必須使用各地慣用的語言進行訪談。2010 年問卷納入 Cummins（2000）所發展普遍使用的九個社會幸福指數題項，藉以調查臺灣與香港地區一般民眾的生活品質與幸福感的狀況。其他問卷題項尚包括個人社會、經濟與人口變項、對兩地社會議題的看法、對人與制度的信任程度，以及對整體社會與個人生活的觀感。由於兩地調查皆採用相同的問卷形式，因此研究團隊可建構相同的量表與測量指標，直接比較兩地的調查結果。

以問卷調查中個人資料做為控制變項，包括「性別」（參考組=男性；1=女性）、「婚姻狀態」（參考組=未婚；1=已婚；2=離婚或分居；3=寡

居)、「年齡」(受訪者實際年齡)、「教育程度」(參考組=未滿大學；1=大學以上)、「全家收入」(真實收入)、「社會公平的認知」(參考組=公平；1=不公平)、「未來三年生活狀況會比現在好或差」(參考組=好；1=差)、「社會中對他人信任」(參考組=信任；1=一半；2=不可信任)、「未來社會發展」(參考組=樂觀；1=悲觀)、「未來經濟發展」(參考組=樂觀；1=悲觀)。為利於進行臺灣與香港兩地的比較研究，社會階級以下層階級做為參考組，區分為六個階級：下層階級、中下階級、中層階級、中上階級、上層階級與工人階級。此外，由於社會網絡在現代社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兩地問卷中亦包含了日常生活中是否與他人交談，從 1=常常與人討論事情到 4=幾乎沒有的連續變項。

(一) 國際幸福指數 (International Wellbeing Index, IWI)

本文利用國際幸福指數測量個人生活滿意度與幸福程度。國際幸福指數由澳洲心理學者 Cummins 所發展與建構，並由國際性學術社群「國際幸福研究團隊」(International Wellbeing Group) 所採納與實地測試作為研發改進的依據，目前已成為全球通用測量個人幸福感的指標，可跨文化測量個人主觀的生活品質程度。國際幸福指數可以提供測量個人幸福感的精確數據；同時並可調和東、西方社會或地區，在社會文化、經濟、政治與歷史等面向上的差異。該指數包含兩部分，分別是「個人幸福指數」(Personal Wellbeing Index, PWI) 測量個人層面的幸福感與生活滿意度，以及「國家幸福指數」(National Wellbeing Index, NWI) 以國家層面為指標測量個人的滿意度。

個人幸福指數包含九個項目：其中有個人生活水準 (living standard)；健康情況 (health)；個人成就 (life achievement)；人際關係 (personal relationships)；人身安全 (safety)；社群生活 (community life)；安全感 (security)；靈修 (spirituality) 等面向的個人主觀認知。國家幸福指數則是反映國家生活狀況的滿意度，也就是國家經濟狀況 (country's economic situation)、國家生活環境 (state of environment)、

社會狀態 (social conditions)、政府 (government)、商業活動 (business) 以及國家安全 (national security)。個人幸福指數普遍運用於全球各個國家，其問卷內容的設計體現了人們廣泛的生活層面，並適用於所有階級、國家與文化。目前個人幸福指數已翻譯成 16 種語言，全球超過 50 個國家的研究者皆曾使用。每一種版本的問項指標可根據不同團體的特定需求進行微調。本文的調查即引用個人幸福指數 PWI 中的 PWI-A 北京話與廣東話的兩種不同版本。本研究將採用社會意向中個人幸福指數作為分析比較臺灣、香港兩地個人幸福感以及婚姻與生活滿意度的依據。

個人幸福指數由單一問項擴展出一系列的問項，可用以測量不同社會的生活滿意度與幸福感，並能從特定的生活面向來定義與測量個人主觀的生活品質、滿意度與幸福感。個人幸福指數計算出來的數值可用來指稱生活滿意度概念的標準範圍，依據個人幸福指數的問卷設計可以算出各個項目的滿意度以及加總整體的生活品質滿意度。計算個人幸福指數的方法有兩種：方法一，若各指標分數範圍是相同的由 0-10，則將小數點右移，變成 0-100 (%SM)。方法二，當有些量表分數範圍是 1-7 分或是 1-10 分，若要比較則需採用換算公式，先將指標變成最低 0 到最高 X (0-X)，計算公式 $[(\text{Score}/X) * 100]$ ，便可計算出群體的平均數 (Lau et al. 2005)。Cummins (1995) 使用不同研究資料與西方國家比較，發現以一般人口作為測量對象，會有一個平均數值可以用來作為生活滿意度的標準值，稱為「黃金標準」(gold standard)，此數約為 $75\%SM \pm 2.5\%SM$ ，這是單以西方國家 (如美國、加拿大等) 所測出的數值。Cummins (1998) 後又納入其他不同地區的國家，進行生活滿意度的測量與比較，結果發現以國家平均值而言，生活滿意度的範圍大約是 $70\%SM \pm 5.0\%SM$ 。以西方國家而言，較高的邊界範圍是 $80\%SM$ ，較低則是 $70\%SM$ ；而若以全球的國家範圍來說，則約為 $80\%SM$ 至 $60\%SM$ 。本文參照個人幸福指數的九個項目設計出問項內容，此九個問項內容乃是測量個人幸福感的最小單位。我們可以各別分析受訪者在

每一個問項內容上所得的平均分數，或是將所有問項內容的分數進行加總。此一加總後的分數即是受訪者的個人自評幸福指數。

本文使用 Cronbach α 分別估算臺灣、香港以及全部問卷的內在信度。臺灣問卷的 Cronbach α 係數為 0.89、香港為 0.87，全部問卷亦為 0.88。因此本文的調查問卷具有相當高的內在信度。個人幸福指數的一個主要的特徵即是，在不同的國家與文化皆可產生一致的結果。根據 ANOVA 檢定結果，臺灣與香港的個人幸福指數並未具有顯著的差異。此外，無論臺灣抑或香港，已婚與未婚人口在每個問項內容上所得的平均分數亦未產生顯著性差異。

（二）分析策略

本文研究方法採統計迴歸分析，剖析臺灣與香港地區人口，其婚姻狀態與重要的社會、人口變項，對於個人自評幸福指數的影響。此外，納入部分的社會人口特徵做為控制變項，例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全家收入」與「社會階級」。再者，亦將個人對於「社會公平的認知」、「未來三年生活狀況」、「社會中對他人信任」、「未來社會發展」、「未來經濟發展」五個變項加以控制，本文預期以上變項與個人安全感有很大關聯，原因分述如下：第一，它們可預測主觀的幸福程度。若個人具有相當的安全感與自信，我們可以推論其具有較高的生活滿意度，且無論在心理、情緒或生理方面皆較樂觀。第二，由於華人社會普遍存在一種觀念，婚姻可視為人們取得社會、政治與經濟安全保障的一種方式，因此我們可以對照樣本觀察實際的婚姻狀態與生活滿意度之間的關聯。本文假設在較西化且成就導向的社會，例如香港，人們對於其生活傾向擁有較高的滿意度。

首先，分析全部樣本的性別、婚姻狀態與個人自評幸福指數的關聯。其次，模型納入部分社會人口特徵變項：年齡、教育程度、全家收入、社會階級，同時觀察這些社會人口特徵變項對於個人自評幸福指數

的影響。最後將所有的變項放入模型加以控制，剖析這些變項如何影響香港與臺灣個人自評幸福指數。

六、分析結果

本文將臺灣與香港地區，個人自評幸福指數的三個迴歸模型結果分列統整於文末表 1。依變項為個人幸福指數 (PWI)，為九大題項分數的加總。根據既有研究文獻的結果，本文擇取性別、婚姻狀態等變項並建構出三個迴歸模型，以預測個人自評的幸福指數。第一個模型將「性別」、「居住地」、「婚姻狀態」納入自變項。第二個模型則進一步納入社會人口特徵變項，包括「年齡」、「教育程度」、「全家收入」與「社會階級」。第三個模型便囊括所有的變項。

首先，檢視全部樣本的性別、居住地、婚姻狀態與個人自評幸福指數的關聯。第一個模型的 R-square 係數僅有 0.019，是一個相當沒有解釋力的統計模型。然而，性別、居住地、婚姻狀態的 P 值為 0.05，顯示臺灣與香港地區人們的自評幸福指數，女性比男性多 2.591 個單位、香港居民則比臺灣居民少 1.256 個單位、離婚者比未婚者少 5.622 個單位。第二個模型則進一步透過社會人口特徵變項，包括「年齡」、「教育程度」、「全家收入」與自我認定的「社會階級」四者，預測香港與臺灣地區居民個人自評幸福指數的情形。以上四個變項在模型二中僅「社會階級」達顯著水準，其中「中下階級」、「中層階級」、「中上階級」、「上層階級」、「工人階級」係數皆為正，因此自我認定的社會階級越高，則生活幸福感越高，隨著階級的提升則個人自評幸福指數越高。

雖然模型一與模型二的所有自變項與個人自評幸福指數皆具有明顯的關聯，但 R-square 係數均不高，因此是解釋力薄弱的統計模型。根據研究設計，第三個模型便進一步納入其他相關的重要社會發展與人際關係變項，其中有個人對於兩地社會公平性的看法、未來三年會比現在好或差、社會中對他人的信任、未來社會、經濟發展與是否與人討論事

情的社會網絡等。模型三中個人社會經濟與人口變項中的「婚姻狀態」，離婚或分居者有較低的幸福感，「居住地」的顯著性消失，臺灣與香港在控制其他相關變項後，居住地與個人幸福感的關聯性不再顯著。至於「年齡」與「個人收入」兩變項，年齡的增加會有較高的個人幸福感，表示隨著年紀增長個人自評幸福指數亦增加；但全家收入則與個人自評幸福指數無明顯關聯。第三個模型則是由既有的模型二再放入「社會公平的認知」、「未來三年的狀況會比現在好或差」、「社會中對他人的信任」、「未來社會發展」、「未來經濟發展」與「常常與人討論事情」等六個變項。模型三的 R-square 可解釋大約 31% 的變異量，是一具有高解釋力的迴歸統計模型。關於新增加的變項「社會公平的認知」，若認為社會不公平，則會有較低的幸福感；若認為社會中的他人不可信任，則個人幸福感指數較低；對「未來社會發展」或是「經濟發展」不樂觀兩個變項，皆具有較低的個人自評幸福指數。此外，不常常與人討論事情，就是社會網絡小，或是與他人接觸較少的個人也有較低的個人幸福指數。

七、結論與討論

從本文的統計分析模型中，可以觀察到一些有趣的現象。臺灣與香港婚姻對於個人自評的幸福指數的影響逐漸消失。臺灣與香港既同為華人社會，共享許多價值觀與文化規範，婚姻對於個人的幸福感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傳統的臺灣社會風俗，不允許一個女性超過 30 歲還未婚。華人社會以父權體制做為婚姻與家庭制度的基礎，重男輕女的觀念使資源不平等地分配予男孩和女孩。女性的弱勢社會經濟地位，以及缺少社會流動的空間，導致其無論在社會、政治或經濟方面皆必須仰賴丈夫。由於華人文化認為單身女性生命的終極目標就是尋個好歸宿，致使單身女性被汙名與妖魔化。「老女人」、「老處女」等詞彙皆是華人社會中用來描述超過 30 歲仍舊未婚的女子。

在臺灣，單身女性通常會不斷地被親友詢問其感情狀態，並催促結婚。即便媒妁之言在幾十年前已經不再普遍，但今日某些單身女性處於適婚年齡時，亦會選擇透過婚友社或親友介紹來尋覓如意郎君。也許臺灣單身女性所面臨的龐大的社會壓力，以及親友對婚姻狀態的「過度關心」，會是導致她們在社會中最不開心且幸福指數最低的一群。

過去研究顯示，香港地區的單身女性的幸福感指數比臺灣高。這也許是因為香港過去受到英國統治與地理文化的特殊性所造成。一方面，在大英帝國殖民下，香港深受西方文化價值觀所影響，例如：個人主義以及對核心家庭的偏好（Wong 2005）。婚姻是自由戀愛與個人選擇下的產物，而非對家庭或是社群的義務。因此，當香港的單身女性已達特定年齡仍未婚時，並不若臺灣單身女性遭受如此龐大的社會壓力，此外，社會亦接受女性將其時間精力投注於工作與職業而非家務。另一方面，香港男性歷年來即跨越邊境迎娶中國省份的新娘，例如廣州，導致香港婚姻市場長期的性別比例失衡，促使香港女性保持單身成爲一個普遍且持久的社會現象，於是香港女性並不因其單身狀態而焦慮不安。但是，臺灣、香港兩地在本研究中，單身對於個人幸福感的影響力逐漸消失，尤其臺灣地區的婚姻狀況對於個人幸福感的影響力已逐漸與香港一致，自我認同的社會階級對於個人的生活幸福感較爲重要。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研究結果是，與個人對於社會公平認知、社會中對他人信任、未來社會、經濟發展是否樂觀與個人社會網絡變項有關的五個變項，對於個人自評的幸福指數有很大的影響。其中「社會公平的認知」、「社會信任」、「未來社會、經濟發展」最具有明顯的效果。該四個變項與個人自評幸福指數皆有正向的關聯。接下來本文欲討論這些變項的重要性、其與女性幸福指數之間的關聯，及其對於香港與臺灣不同婚姻狀態的女性的的重要性。

社會學家發現，過去數十年單身育齡女性晚婚或不婚的比例穩定增加。此一現象與傳統華人文化有所出入。華人社會相當強調家族血脈的延續，特別重視婚姻與家庭的重要性。因此無論臺灣或香港地區，傳統

婚姻制度皆著重個人實踐與制度性目標的一致性。根據社會經濟學家的觀點，婚姻制度藉由細緻的性別角色區分，讓男性與女性在婚姻結盟的狀態下交換彼此所需（Beckers 1974; Parsons 1949）。傳統婚姻制度的功能，在於重塑男性與女性在社會中所位處的經濟與政治階層（Coontz 2004）。在過去的年代，女性的個人需求、渴望與滿足，僅是婚姻決策的次要考量。在大多數的歷史，華人社會的女性被教導著她們的幸福源自家庭與社會。但近幾年來東亞國家的婚姻型式逐漸發生轉變。儒家父權的性別意識型態、婚姻附屬於家庭的觀念，乃至於家庭角色（尤其是女性的角色）皆有所更迭（Chia, Allred and Jerzak 1997; Farris 1994）。此外，婚姻的制度性目標亦被個人理想所取代（Cherlin 2008; Giddens 1991, 1992）。對於今日年輕女性而言，婚姻不再是他人而是自己的事情。

根據本文的分析，香港與臺灣雖同為華人社會，但兩個社會中未婚與已婚的幸福指數卻逐漸趨近。因此，婚姻對於個人的意義以及婚姻型態與幸福指數的關係，會因個人所處社會經濟與地理文化脈絡的差異而產生不同的結果。本文特別強調「社會公平」與幸福感之間的關聯，這也是臺灣與香港兩地評估自我政治、社會與經濟地位的重要指標。華人社會中，婚姻對於女性的重要性在於丈夫所提供給妻子的經濟、政治與社會安全感的保障。故而當個人的經濟、社會角色以及地位與自我安全感息息相關時，我們可以主張一個人的安全感也許可能會影響其對於婚姻的選擇。父權體系中的女性，不僅缺乏經濟機會亦面臨龐大的社會壓力，使其只能受限於家庭生活，並且仰賴丈夫提供經濟來源。此一性別不平等的現象是華人社會婚姻制度的重要脈絡。

然而，當女性逐漸接受了生命中的許多可能，她們的生活便產生劇烈地改變。不若其祖母或母親受限於私領域，今日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樣擁有並享受多重的社會角色。Stephanie Coontz（2004）、Andrew Cherlin（2004）皆主張，女性參與勞動市場改變了婚姻的意義與本質。這一結論與本文的研究結果相符：個人與專業成就似乎讓香港的未婚女性滿意其現有的生活方式，因而成為幸福指數最高的一群。再者，醫療與生育

科技的進展，也徹底改變了透過婚姻延續家族血脈的華人社會傳統觀念。

本文研究發現與社會認知有關的五個變項「社會公平的認知」、「社會中對他人的信任」與「未來社會、經濟發展」與「是否與人討論事情」等變項最具有明顯的效果：皆與受訪者的幸福感呈正向關聯。此一分析結果與 Cherlin (2004) 的主張相同：一個人對於個人主義的評價會影響其對於婚姻制度的觀感。於先前的篇幅中，本文討論了這些變項如何體現公領域中性別趨於平等的現象，包括女性參與勞動力市場，以及女性有越來越多的機會可投入時間與資本以滿足個人需求與自我實現。個人主義導向的婚姻已經取代了傳統華人社會所強調的集體目標。此外，本文研究亦顯示，個人收入雖然是測量社經地位的重要指標，但與受訪者的主觀幸福感無明顯關聯。或許基於經濟獨立所帶來的安全感，並無法從個人金錢收入測量出來，而是展現於女性從工作中得到自信與成就感。

Paul R. Amato (2004) 進一步主張，華人社會的傳統婚姻制度將制度性目標與個人目標合二為一，此一做法具有本質上的矛盾。當西風東漸，個人主義思潮與西方媒體傳播至東方國家，衝擊著女性幸福與成就感源自婚姻的傳統觀念，使得制度性目標與個人目標產生歧異。今日的華人社會，以臺灣為例，依舊期待一位女性扮演著婚姻中妻子與母親的角色 (Chiang 2000, Xu and Lai 2004)。然而這些對於傳統女性角色的期待，卻和女性由教育或工作場域中所習得的性別平等與獨立觀念相衝突 (Mason and Jensen 1995)。因此 Peter McDonald (2000) 與部分學者認為，今日年輕女性幸福感較低以及不婚的現象，起因於內在性別平等觀念與外在家庭領域現實的不一致。對於傳統婚姻性別角色的不認同，可能是當今香港與臺灣地區女性不婚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同時婚姻對於個人幸福感的影響力也逐漸失去重要性。

表 1 臺灣、香港地區個人幸福感統計迴歸模型結果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常數項	56.731*	41.790*	54.007*
	(0.699)	(1.520)	(1.715)
性別 (男性=參考組)			
女性	2.591*	2.128*	1.365*
	(0.568)	(0.547)	(0.512)
地區 (臺灣=參考組)			
香港	-1.256*	3.510*	-0.435
	(0.578)	(0.698)	(0.737)
婚姻狀態 (未婚=參考組)			
已婚	0.273	-0.492	-0.470
	(0.663)	(0.761)	(0.709)
離婚	-5.622*	-4.701*	-3.449*
	(1.543)	(1.552)	(1.449)
寡居	-0.839	-0.315	1.506
	(1.569)	(1.683)	(1.592)
年齡		0.045	0.054*
		(0.024)	(0.022)
教育程度 (未滿大學=參考組)			
大學以上		0.201	-0.766
		(0.816)	(0.756)
全家收入		0.002	0.003
		(0.010)	(0.009)
社會階級 (下層階級=參考組)			
中下階級		7.064*	5.208*
		(1.173)	(1.131)
中層階級		11.353*	8.298*
		(1.099)	(1.076)
中上階級		15.747*	11.305*
		(1.151)	(1.130)
上層階級		22.041*	16.879*
		(1.468)	(1.412)
工人階級		4.222*	2.737
		(1.671)	(1.656)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社會公平 （公平=參考組）			
不公平			-5.049* (0.585)
未來三年狀況會比現在好或差 （好=參考組）			
差			0.065 (0.583)
社會中對他人信任 （信任=參考組）			
一半			-0.527 (0.653)
不可信任			-4.414* (0.648)
未來社會發展 （樂觀=參考組）			
悲觀			-3.479* (0.629)
未來經濟發展 （樂觀=參考組）			
悲觀			-1.742* (0.627)
常常與人討論事情			
常常→幾乎沒有			-0.869* (0.281)
R²	0.019	0.176	0.308
N	1974	1774	1704

參考書目

- Amato, P. R., 2004, Tension between institutional and individual views of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6, 959-965.
- Bloom, J. R., 1990, The relationship of social support and health.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30(5), 635-37
- Borthwick, S., 1985, Changing concepts of the role of women from the late Qing to the may fourth period. In D. Pong and E. S. K Fung (Ed.),

- Ideal and reality: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 1860-1949* (pp. 63-91).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Burgess, E. W. & Locke, H., 1945, *The family*.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Inc.
- Chen, Z. & Davey, G., 2009, 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 in Zhuhai City, South China: A public survey using the International Wellbeing Index.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1, 243-258.
- Cherlin, A. J., 2008, *Public and private families: An introduction* (pp. 215-257). New York: McGraw-Hill.
- Chia, R. C., Allred, L. J., & Jerzak, P. A., 1997, Attitudes toward women in Taiwan and China.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1, 137-150.
- Chiang, L.-H. N., 2000, Women in Taiwan: Linking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women's progress. *Women in Asia: Tradition, modernity and globalization* (pp. 229-246). Leornards, Australia: Allen & Unwin.
- Coontz, S., 2004, The world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6, 974-979.
- Cordon, J. A. F., 1997, Youth residential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Journal of Family Issue*, 18, 576-608.
- Cummins, R. A., 1995, On the trail of the gold standard for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5, 179-200.
- Cummins, R. A., 1998, A second approximation to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life satisfactio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43, 307-334.
- Cummins, R. A., 2000,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 An interactive model.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52, 55-72.
- Cummins, R. A. & Nistico, H., 2002, Maintaining life satisfaction: The role of positive cognitive bia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3, 37-69.

- Diener, E. & Lucas, R. E., 2000, Explaining differences in societal levels of happiness: Relative standards, need fulfillment, culture, and evaluation theory.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 41-78.
- Ellis, B., 1996, Leaving the nest, not! *Youth Studies*, 15, 34-36.
- Eid, M. & Diener E., 2001, Norms for experiencing emotions in different cultures: Inter- and intranational differenc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 869-885.
- Ermisch, J., 2001, Cohabitation and childbearing outside marriage in Britain. In L. L. Wu and B. Wolfe (Ed.), *Out of wedlock: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nonmarital fertility* (pp.109-139).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Farris, C. S., 1994, The social discourse on women's roles in Taiwan: A textual analysis. In M. A. Rubinstein (Ed.), *The other Taiwan: 1945 to the present* (pp. 305-329). Armonk, NY: East Gate.
- Galland, O., 1997, Leaving home and family relations in Franc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8, 645-670.
-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Cambridge: Polity.
- Gove, R. W., Style, B. C., & Hughes, M., 1990, The effect of marriage on the well-being of adult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1(1), 4-35.
- Huang, I. & Xing, Z., 2005, An initial research on the wellbeing index applied to citizens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al Science*, 114(5), 464-465.
- Jones, G. W., 2003, The "Flight from Marriage" in South-East and East Asia. *Asian MetaCentre For Popul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alysis*, 14.

- Jones, G. W., 2007, Delayed marriage and very low fertility in Pacific Asi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3(3), 453-478.
- Jones, G. W. & Gubhaju, B., 2009, Factors influencing changes in mean age at first marriage and proportions never marrying in the low-fertility countrie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5(3), 237-265.
- Joung, I. M., van de Mheen, H. D., Stronks, K., van Poppel, F. W., & Mackenbach, J. P., 1998,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health selection in marital transition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46(3), 425-435.
- Lai, S., 2000, November 10-13, *Marital dynamics and the division of domestic labor in contemporary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0 National Council on Family Relations Annual Conference, Minneapolis, MN.
- Mason, K. O. & Jensen, A. M., 1995, *Gender and famil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Donald, P., 2000, Gender equity,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future of fertility.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earch*, 17(1), 1-16.
- Musick, K. & Bumpass, L., 2006, Cohabitation, marriage and trajectories in well-being and relationships. California Center for Population Research On-Line Working Paper Series.
http://www.ccpr.ucla.edu/ccprwps/series/ccpr_03_06.pdf. Accessed May 23, 2009.
- Nave-Herz, R., 1997, Still in the nest.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8, 671-690.
- Ng, Y. K., 2002, The East-Asian happiness gap: Speculating on causes and implication.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7(1), 51-63.
- Oppenheimer, V. K., 1988, A theory of marriage timing.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3), 563-591.

- Parsons, T., 1949,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family. In R. Anshen (Ed.), *The family: Its function and destiny* (pp.173-301). New York: Harper.
- Ross, C. E., Mirowsky, J. & Goldsteen, K., 1990, The impact of family on health: The decade in review.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2, 1059-1078.
- Rossi, G., 1997, The nestling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 18, 690-708.
- Sing, M., 2009, The quality of life in Hong Ko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2, 295-335.
- Thorton, A. & Lin, H.-S., 1994, *Social change and the family in Taiwan* (p. 21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aite, L. J., 1995, Does marriage matter? *Demography*, 32, 483-507.
- Waite, L. J. and Gallagher, M., 2000, *The case for marriage: Why married people are happier, healthier and better off financially*. New York: Doubleday.
- Welzel, C. and Ingelart, Ronald F., 2010, Agency, values, and well-being: A human development model.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7(1), 43-63.
- Williams, Kristi, 2003, Has the future of marriage arrived? A contemporary examination of gender, marriag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44(4), 470-487.
- Wong, O. M. H., 2005, The soci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the age at first marriage among women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26(4), 529-550.
- Xu, X. and Lai, S.-C., 2004, Gender ideologies, marital roles and marital quality in Taiwa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5(3), 318-355.
- Yamada, M., 2001, Parasite singles feed on family system. *Japan Quarterly*, 48, 10-16.
- Yi, C., Lu, Y., & Pan, Y., 2000, Women's family status: A comparison of the family power structure in Taiwan and China. In C. D. H. Harvey

- (Ed.), *Walking a tight rope: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work and family* (pp. 91-116).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 Yieh, K., Tsai, K.-F. & Kuo, C.-Y., 1997,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Parasites' in Taiwan.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25(4), 527-539.

醫藥之良好狀態（wellbeing）之分析： 生活品質、生活質量與生命質素

李瑞全*

作為人民生活的幸福（happiness）與福祉或良好狀態（wellbeing）的構成部份，健康（health）是一個重要的因子。健康不但意謂一個人沒有病痛，也意謂一個人能追求自己所意欲的幸福的一種能力，健康本身好像不直接是一個人所意想的幸福。但是，如果從另一方面來看，不健康卻是構成一個人不幸福，也就是不在良好狀態的情況。健康所涉及的範圍實在非常廣泛，除了一個人之生物生理機能之健全與否之外，還有心理、精神，以至群體生活、價值等之健全與否，都可說是一個人的健康所包含的項目。如果放在群體中，則家庭、社會、國家、國際社會以致環境都是直接或間接涉及我們的健康的因素¹。我們的心理取向，如樂觀悲觀，及精神表現，如思考能力等固是健康的直接因子；其他人，即社群中其他人和社群的結構與制度都是我們的健康的因子，如不和睦的家庭、扭曲的社會價值與結構等，以及環境之惡化與不能持續發展等，自是影響我們的幸福與良好狀態的重要因素。此亦見出國家幸福指數或良好狀態指數（national wellbeing index）不是個個獨立指數的總和，而是一具有內部相關性的一整體性的評量，各個面相的指標和指數乃是評估這一整體的一些參數（parameter）而已。因此，各項指數之間

*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

¹ 由於本文以醫藥之良好狀態為題，其他因素，如此處所謂家庭、社會、國家、國際社會和環境等只論其影響於個體之幸福或良好狀態而言，這些因素本身自亦是直接影響每個人之幸福與良好狀態，也是國家良好狀態指標的重要成素，但這方面自另有專題的研究，不在本文之內。

須有一種一致性 (consistence) 或一貫性 (coherence) 的表現, 以顯示出整體的一種深層的統合性 (integrity) 與全體性 (holistic unity)。²

醫療所呈現的只是健康的一個面向, 也只是涉及個人及社群中的生物的、生理的、心理的與精神方面的健康問題。當然, 在醫學所涉及的這些方面的問題也受社會文化傳統價值的影響, 而使我們可以在不同的社會、文化、價值之下有不同的健康的意指。醫療的決定自然含有對病人之福祉的構想在內, 也常受病人或家屬的主觀價值的認可而有不同的選擇, 以致病人或家屬在相同的病況但不同的條件, 如經濟或家庭成員的狀況, 而有不同的抉擇。但醫療上所建構的可以較偏向良好狀態之客觀面為主。良好狀態的主觀面則容納了不同的個人與社群之文化、價值與哲學在內。本文所論以醫療上所涉及的健康服務為主, 文化、價值等則只在論述中必要涉及而略帶出, 詳論則要俟進一步的發展和擴展。

一、生活品質、生活質量與生命質素

眾所周知, 聯合國之世界衛生組織或世界健康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簡稱 WHO) 提出的健康的定義如下:

健康是一種物理的、精神的、社會的完整的良好狀態 (wellbeing), 而不只純然是沒有疾病或虛弱而已。³

由此可見健康是「良好狀態」的一種情況, 是建構國家良好狀態指數 (National Index of Wellbeing) 的一個重要指標。健康是一個人的生命

² 幸福或良好狀態乃是對生命的全面的討論, 所要求達到的是人類生命一全面的滿足 (先不管這種滿足提指感性的、理性的或神聖的等等), 是哲學家所探求的生命最終極的安頓的一個終極的議題。良好狀態指數既指表這樣的一種生命整體的狀態, 它顯然不只涉及單個的個人 (或原子式的個人, 即與他人可以毫不相干的個體), 而是把人所生活的廣義的社群: 家庭、社會、國家、世界與自然環境 (或天地) 都包括在內。此所以亞里士多德必須就全宇宙之目的 (telos)、康德必尋求永久和平、生命 (靈魂) 恆存、儒家、道家以至佛家之就天地萬物為一體, 而論人之終極之理想。此方面的整體的論述自不是一文或一書所可全部概括, 更不是此短文所能及萬分之一。

³ Preamble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轉引自 Norman Daniels, *Justice and Justific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ter 9, p.204。

狀況。健康常意謂一個人沒有疾病和殘障，因而健康也意謂沒有生病或失能。如果一個人不止一般所謂身心健康，而且在精神上與社會上都有著良好愉快的經驗，人際關係良好，自然是很幸福的人，也是身心靈都是很健康的人。但是，世界衛生組織這個健康定義常被批評為包含太廣，使得在現實上達成「健康」的標準成為不太可能之事⁴。因為，如此要求的健康狀態所包含的社會面是相當廣泛和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價值標準在內，例如，是否和如何把個人之社經地位、宗教依歸等納入考量之內，並不容易，更難以評斷如何之謂「健康」之良好狀態。因此，實難以根據此界定來論斷一個個體在此社會中是否得到良好狀態的結果。而一般在醫藥上則以生命質素或生活品質等詞來表述一個人之良好狀態。這是了解在醫藥方面所謂健康的一個重要成份，也比較能合理作出評估。

醫藥所提供的是救助與護佑我們的健康。在醫療服務中，病人之整體健康狀況是評估診斷、治療、術後等整個醫療過程是否達到病人的最佳福祉之依據。用以表述醫療所達到病人的幸福或良好狀態的重要指標常用「生活品質」、「生活質量」或「生命質素」來表示。此詞在英文中只是同一個語詞，即 *quality of life*。但卻有不同的中譯名。在台灣較流行的是「生活品質」，亦有用「生命質素」（生命素質），大陸則譯為「生活質量」。此不同的譯名實因該詞在英文的用語上亦有不同的意指⁵。在一般醫療論述中，一個病人的疾病狀況，常是指對此病的一種評價，如在生病中的痛苦、活動表現之能力和程度等，以及在醫療之後所取得的改善，在術後以及在更長的生活（以至死亡為止），所具有的生活上的情況，即有沒有改善或是否具有基本的生活的功能，如是否能行走、飲食、進

⁴ 參見 *Justice and Justification*, pp.185-186 討論。

⁵ Alex Michalos 曾指出學術文獻中 useful *quality of life* 指他所謂的 *subjective indicator*，而以 *social indicator* 指 *objective indicator*。參見 M. J. Sirgy, et al, "The Quality-of-life (QOL) Research Move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ocial Indicator Research* 76 (2006): 344-345。此詞在英語學界也有很多不同的用法，本文討論此詞主要較集中在生命倫理學的領域。

行群體活動等等基本的功能。此一用法較接近一般之生活品質方面的評估。

但此詞也常用到臨終病情上，如病人病情所帶有死亡威脅與生理上的痛苦，與術後在生存上所取得的品質，此時則指病人在生病中（常是惡性的臨終病況）生活的品質非常低，不但連最低度的生活功能都喪失或由於嚴重的病情或痛苦而近乎喪失，生命的價值除痛苦外已所餘無幾，即無法有所謂享受任何快樂或幸福的情況，病人只在難以承受的痛苦和痛苦不斷增加中苟延殘喘，以至死亡，而醫學上已無法加以任何改善的可能。此即意指病人此時的生命質素已極低，已近乎植物人或昏迷的人的狀況，無法有任何主動自動的活動可言。而且，病人的情況更糟的是帶有強烈而不可忍受的痛苦，可說是在極度痛苦中一直到為期不遠的死亡為止。換言之，在生命質素方面所涉及的是病人在生命價值上的評估，常涉及病人是否採取放棄治療、醫助自殺與安樂死等決策。此種評估不免涉及對人類生命價值、痛苦的代價、人格尊嚴等課題，不但有許多不同哲學與文化差異在內，也有個人之價值選取的因素。

此詞同時也含有估量病人在病中與在術後所得到的健康生活的日子有多久的意指。如一位癌症病人在接受與不接受手術或醫療之前後所享受到的生命質素如何，其中同時列進病人能享受上述這種質素有多久，愈長久則價值愈高，即愈值得或划得來。又或在器官移植上，如腎臟移植，醫院方面會評估兩位腎病病人在接受同一顆腎移植後的健康狀況，以及這種健康狀況可以維持多久（包括其壽命），此即把時間的量也列入其品質的計劃之內。西方一般所用以計算一個器官之有效使用期的用詞是 *quality-of-life-year* 或 *quality-adjusted-life-years* (*qalys*)，把有效使用年期也計算進去⁶。愈長的生命期則其生命質素愈得到改善。此

⁶ 在評估一種療程和器官對不同病人之效益上，也涉及對生命的評價。在醫療上的「成本效益」(*cost and benefit*) 的思考中，也有從估算一個生命在未來的日子中（即合理生命期限中）可以得到的財富，如工資收入，來估算一個人的生命的價值，此中所估算的包括金錢在現在與往後所合理地評估可以有的利息增加價值在內。此種計算常用在當事人受傷害因而不能工作所應得的賠償。此即所謂「折算的未來收入」(*discounted future earning*)。另一種評估生命價值是從個人或社群願意支付多少成本去救一個人來論斷。請參見 Tom L. Beauchamp & James F. Childress, *Principles of Biomedical Ethics*, fifth edition (Oxford:

中除了生命之質素之外，還同時含有量的意指，因此，可以用「生命質量」來表述此意。

依以上三詞的不同意涵而說，本文所探討的是以生活品質為主的醫藥在健康上所呈現的指標。在醫學上，評估一個病人之生活品質主要是評量病人在生理上、身體上、人際交往上，以及精神上的表現。例如在身體方面，一個病人之能否自己行動，是否需要輔助工具或他人的協助，是否只能在特定的空間，如家中或醫院中行動，以至不能下床無法動彈等。此是評量病人是否有殘障之傷害，因而使其生活品質受到限制，低於正常的標準。此在其他面相上亦復如此。這種評估有一定的客觀意義。但它是否即產生相應的良好狀態或幸福的評估，卻不一定。因為，許多經驗告知我們，對人生態度不同的人會對同一類事件有很不同的幸福與否的評估。而病人在一段時間之內適應了疾病所帶來的殘障或失能之後，卻很可以以樂天知命的態度，享受在適度的限制之內的最佳功能表現，因而仍可以得到高度的幸福的感受。此時，主觀的良好狀態與客觀的生命品質好像有一距離。由此可見生活品質與個人之需求與是否願意作出適應有一定的相關性，並非完全客觀的評量。一個人對於疾病與殘障之適應能力雖不必能很精確地評估，但也有一定的客觀評量。能力 (capability) 是一個人一個環境或狀態中所能選取的各方面的各種行動的綜集⁷。能力與個人之生活品質和個人的幸福感有密切的關係，而能力一詞的意指需作明確的分析，方可進一步確立生活品質的指標意義。

二、能力、生活功能、生命品質與幸福

布洛克 (Dan Brock) 在分析生活品質一詞在健康照護和醫藥倫理學之各種意指和理論之後，指出：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06-209。此種量化計算由死亡或避免死亡而反顯生命的價值基本上只就經濟效益上來評估，顯然相當偏面而難以恰當於生命價值的全面和多樣性的，以及不可量化的面相。

⁷ 此詞之精確用法和說明見下一節。

把基本的功能，行動者個特的功能，和個人特殊欲望之滿足包含在一個良好生活的論述之內，可以容許我們去認識它的規範上客觀的和規範上主觀的成分。⁸

布洛克所謂的基本功能乃是一般所謂客觀的表現，如具有足夠的能力去執行一般的生活功能，如飲食、居家活動、戶外行動、社交等；而行動者個特的功能則指每個人各自有的價值選取的偏好，如某種球類活動、義工、藝術創作等等，此則因人而異，而各自對自己所選取的活動有特殊賦予的價值和滿足；至於欲望的滿足則指一般的感性的欲望的滿足等。他實是借用沈恩（Amartya Sen）所提出的「能力論」（capacity theory）以表達生活上良好狀態，即生活品質的內容。

另一方面，醫療界對於病人之醫療前後的生活品質的評估也早已存在以功能來描述病人的健康狀況。此由於疾病常涉及某些器官之受傷失能，而醫療則是使其回復正常狀態，或用各種輔助的工具來補救其喪失的能力。沈恩之能力論原初是追問「平等什麼？」（Equality of what?），意在尋求一在羅爾斯（John Rawls）以公平機會說明社會公義之外，一個更合理的社會公平的實質意義。因為，保障了每個人的均等機會並不表示不同的個體真能享有同等機會，因為每個人可具有的資源與行使這些資源的能力（capacity）不盡相同。由此不同能力問題帶出個體之差異性，以及個體在運用資源上卻因能享用資源的能力有差別而實質上不平等。而能力乃是一組生活功能。由此而可以引用到生活品質的討論。沈恩指出：

一個人所享有的生活品質不純然是他所成就的而且也是當事人事實上所具有的選取機會的選項。⁹

⁸ Dan Brock, "Quality of Life Measures in Health Care and Medical Ethics," in Martha Nussbaum and Amartya Sen (ed.), *The Quality of Lif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pp.95-132.

⁹ Amartya Sen,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85), pp.69-70. 轉引自 Amartya Sen, "Capability and Well-Being," in Martha Nussbaum and Amartya Sen (ed.), *The Quality of Life*, p.34, n.11。原文有用“he or she”來表示兩性平等之意，但中文之「他」實是中性，男女共用，近人製造「她」字以譯英語之“she”而把「他」專屬男性，實為不當，故不譯為「他或她」。

在此需要先說明的是，沈恩用一般所謂的功能 (functionings) 是指一個人的一種狀態，即他在生活中所能做或能達成的事項。此如一個人的腳可以行走的功能，而如果受傷則不能如常行走或如嚴重地受傷以致不能行走等，則他的行走的功能即減低或喪失了。而沈恩進而界定他的「能力」概念如下：

一個人的能力 (capability) 反映出他可以達致的功能之不同組合，而由此組合他可以選取一集功能。¹⁰

沈恩的能力進路是建基於生活，以及生命中，各種我們日常所做的和所達成的事物的一個組合。我實際上做出的和達到是一方面是由於我在現在的情況中所具有的能力，一方面也只是我們具有的全部能力的其中一組的表現，此組表現與我們的能力和價值選取很有關係。所達成的即是我們心目中所意欲達到的價值。因此，在此種能力進路之下，一個人或病人的生活品質可以通過他所具有的可讓他達成他的價值的能力來作評估。

沈恩進而指出功能可大略分為兩類。有些功能是初階的或基本的 (elementary or basic functionings)，如有足夠的營養，良好的健康等。這也通常是所有人都普遍認同是重要而且必要的功能，因為很明顯的，如果一個人營養不良，或有惡疾等，就很難說是在良好狀態或幸福之中，也就說不上有良好的生活品質。有些功能則是比較複雜的，如達致個人的自尊，與社會上其他的人能互助合作，構成一整體等。這種功能的表現當然對我們的生活品質來說也是極為重要的，但也常是各有不同的選擇和畸輕畸重的要求和表現。沈恩認為在討論生活的品質時，我們不能避免要作價值或評價的選取，選取我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而運用我們的能力去實現出來。他稱此為一評價的空間 (evaluative space)，而能

¹⁰ “Capability and Well-Being”, p.31。原文有用“he or she”譯文只用「他」。

力進路基本上即是要去確認那些是有價值的對象，即在我們的功能能力之下我們在價值上認可的事物。¹¹

沈恩認為能力進路不同於效益論，不必只以行為之功效為具有價值，而可以涵蓋一些自身即具有價值的事物，如自由。沈恩論自由乃連著能力而言，認為純然提供均等之機會不足以證明人人有平等的自由，對於能力不足的人，自由機會即不是均等或平等地被享有的。能力是構成一個人的自由的重要部份。沈恩之觀點很有西方政治哲學中積極自由（positive freedom）的意味。由此，沈恩提出評價人類之利益時可以從兩個區分來分析，即個人的良好狀態（well-being）與行動者目標（agency goals），和成果（achievement）與達到成果之自由（freedom to achieve）。行動者目標指表人類的行動的能動性，此是人類的選取能力的表現，即是下一區分中的行動者之自由；由此選取而達到的結果乃是他的幸福或良好狀態，此即行動的結果，此即良好狀態之自由。而由此而有四種組合的情況，即，（1）「良好狀態之成果」（well-being achievement），（2）「行動者成果」（agency achievement），（3）「良好狀態之自由」（well-being freedom），及（4）「行動者之自由」（agency freedom）¹²。第一項目乃是生活品質的具體表現；第二項則反映人類作為行動者所具有的行動能力與意願之表現，所達到的指標確實是當事人所意欲達成的理想。第三項是指當事人可以在自己能力範圍內作出自由的選取，使得所達到的良好狀態乃是當事人自由選取的一個結果。最後一組則是指人類的價值特性在於具有自由選取的能動性，而此乃人類的自由之特性。簡言之，作為一個行動者，能達到自己能力即功能之理想，而有成果，此即是達到一種自願選取而且得以成功的良好狀態，即是達到一健康的水平。此即是當事人的生活品質的價值，也是可用以評估其價值之高低的指標。此四者之特點是不但把生活品質的主客觀面相都標示出來，更可以進一步

¹¹ “Capability and Well-Being”, pp.31-32.

¹² “Capability and Well-Being”, p.35.

具體展示生活品質的評量。以上是沈恩的能力理論用以說明良好狀態與自由選取之間的組合關係。

如果從能力觀點論生活品質，就良好狀態之成果與良好狀態之自由而言，所論述的比較是可客觀陳述和客觀比較的指標，客觀的成素居多，此可謂客觀的良好狀態 (objective wellbeing, OWB)。至於行動者之目標之達成與選取此等目標之自由，則多少較屬於主觀的良好狀態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因其中涉及行動者所作的價值評估與選取，如選取的良好狀態之水平，所達到的滿足程度，以及所感受到的限制，即對其自由與選取所具有的限制，都與當事人的主觀價值選取和感受有關。例如，一個人感受到挫折是自覺有能力而不能發揮 (夭折、受壓制、無機會等)，此時其應有的生活品質客觀上會降低，主觀上會感到不滿和不愉快。從良好狀態來說，幸福 (happiness) 屬於生活品質較為主觀方面的個人的感受為主。但從幸福方面來說，幸福也有指表客觀面的良好狀態或生活品質。但個人對所具有的生活品質也常有不同人之間的不同感受，因而有不同的判斷。米高盧斯 (Alex Michalos) 提出個人在幸福方面的主觀和客觀的社會指標 (social indicators)¹³ 可以有四種結合的方式：主客觀的計量結果都是好的；客觀計量是不好的，但主觀計量卻感到滿意；客觀計量是好的，而主觀計量則不好；主觀和客觀計量都不好。米高盧斯用天堂與地獄來描述這四種情形：第一種是真實的天堂、第二種是笨人的天堂、第三種是笨人的地獄、第四種是真正的地獄。他認為有這四種可能主要是病人之幸福與其主觀的認定其生命價值有關¹⁴。因此，學界提出「與健康相關之生活品質」(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之評估，希望能作出較客觀的評估。除了在社會學、心理學、管理等等有關生活品質的研究，直接間接涉及社會各種制度、教育、管理等等之論域，與健康之良好狀態距離較遠，非本研究之主旨外，有關與

¹³ 米高盧斯所提出的社會指標的主觀與客觀指標，積極與消極指標，以及研究所必須交待的最少有 15 項等之概念架構，對本文所關注的醫藥上的生活品質之研究極具參考價值。

¹⁴ M. J. Sirgy, et al, "The Quality-of-life (QOL) Research Move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p.349-450.

健康相關的生活質量的研究，所包含的範圍常遠超出一般醫藥之外，暫非本文所處理之範圍¹⁵。本文所關注的是有關健康之醫藥領域內的生活品質的研究。

值得在此一提的是，聯合國之世界衛生組織在 2004 年公布一份生命品質的測定簡表。此表¹⁶共有 26 條問題，內容主要是一般的基本功能，如生活作息、行動、疼痛、情緒等，與個人主觀感受生活品質和健康的狀況的評估。此中所涉及的大抵是沈恩所謂的基本功能之表現和主觀的評估，完全沒有涉及行動者的價值選取的能力與達致的良好狀態的表現。此簡表作用主要是測量當事人的健康方面的主觀良好狀態的一環，可作為構造幸福指標的一個起點。

三、醫藥上之生活品質之量化

在醫學上，生活品質常指治療前後病人的良好狀態為何，以作為醫療決定的依據¹⁷。但在生命倫理或醫療倫理的討論一般只著重醫療效果的量化評估，因而主要是上文所謂「生活質量」與「生命質素」的分析。在美國的調查中，醫師對疾病之生活品質的評估常較病人為低。¹⁸但由於美國社會重視病人之身體與生命自主權，病人對自身病情之主觀評估佔有主導性。因而，在醫療之生活品質之評估略偏向主觀的良好狀態的指標。布洛克列舉了美國臨床的三個主要的生活質素量表，指出這些量表主要都是評量病人之功能表現，而這些功能都是全人式的，照顧到病人

¹⁵ 近年的研究與發展，請參見 M. J. Sirgy, et al, “The Quality-of-life (QOL) Research Move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p.398-408。

¹⁶ 此表之中文譯名是「世界衛生組織生存質量測量簡表」(WHOQOL-BREF)，把 quality of life 譯為不常用之「生存質量」，但內文同一詞卻譯為常見的「生命質量」，並不一致。本文仍稱其所論為「生活質量」之量表。

¹⁷ 參見 Tom L. Beauchamp and James F. Childress, *Principles of Biomedical Ethics*, sixt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230-233。但此書之第 5 版有更詳細的討論，見 *Principles of Biomedical Ethics*, fift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06-214。

¹⁸ 參見 Albert R. Jonsen et al, *Clinical Ethics: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Ethical Decisions in Clinical Medicine*, seven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 Hill, 2010), p.117。

的身體、心理、精神、社群等方面。但布洛克也指出，這些評量主要是評量基礎的功能，而且主要在詢問病人的主觀感受，即主觀良好狀態之評估為主¹⁹。

布洛克認為客觀的功能表現與主觀的回應兩者可以各自獨立，並不可以互相取代。因此，生活品質的評估必須把兩者都包括在內。這一觀點也反映在上文米高盧斯所指出的主觀感受與客觀指標不一定吻合。但布洛克肯定這些主觀感受是每個人的幸福感受，即自評的良好狀態所在。因此，他提出的生活品質的評估要包括三方面，即基本功能、行動者個特功能，與特殊欲望的滿足。基本功能是一種第三者可以觀察到和較易達到一致判斷的項目。至於行動者個特的功能，可以指行動者所具有而又特別重視的功能表現，如一個藝術家對於手部的功能之重視，這方面的傷害或失能對於病人來說自是最影響其幸福和良好狀態的項目之一。至於病人自己個人特殊的欲望和滿足，此為個人的主觀價值取向的表現，如一個病人很可以以聽到某一大師的音樂為最大的滿足，也有病人感到只要活著就是最大的幸福。而這方面無疑是決定一個人感到是否處於良好生活品質的因素。換言之，布洛克之意是希望把病人的主觀與客觀意義的良好狀態都包括在內。

醫藥衛生中所採取的倫理態度與原則，較不能正視一些非效益的價值，如自由、尊嚴等，對於一個人的生活品質與良好狀態有重要的關係。正如一些觀察者所注意到的，感到自由和作出自己所選取的價值，可以彌補一個人在身體或生理上的失能或殘障。因此，若干基本功能的損傷並不一定嚴重傷害一個人的良好狀態的感受，即幸福的感受。同時，正如布洛克所已指出的，人類有適應的能力。一個人在最初受到疾病傷害或失能時，會有極大的生活品質下降的感受。但在接受現實為不可改變的情況，亦有病人自動調節自己的良好狀態的要求，作出妥協，因而可以維持一種合理的幸福的感受。此亦可以說明何以醫師作為第三者，由於不必接受病人較低之能力狀況，因此，醫師會對病人之生活品質有較

¹⁹ 參見 Dan Brock, "Quality of Life Measures in Health Care and Medical Ethics," pp.114-126。

病人為低的評估，因為，醫師並不認真感受病人在切身的情況中，病人有不得不接受現實的限制，因而採取比較低的良好狀態的要求，而對自己所處的情況和由此而有的生活品質作出相應的調整，而得出較積極和較願意接受的判斷。

目前初步的考察結果顯示，在醫藥上的生活品質的研究雖然不少，但仍未能把生活品質與個人之價值評估與生命理想連結起來，作一通貫的展示。我們可以借用沈恩的能力論把相應的多層次的價值發展出來，藉此作出一種可以評斷的主觀與客觀良好狀態的量表，進一步製成一國家良好狀態指數，以評估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醫藥的狀態。主觀的良好狀態之陳述，必連繫於個人之特殊的價值選取，此選取固然有個人之特有的經驗與所處之環境社群之遭遇而有個特的感受，但人自不免受同群之影響，而形成一共同的文化取向。一個人最親密的社群即是每人之家庭，家庭之擴大而組成具籠罩性的政治組織乃是國家。前者影響個人與家庭成員的相互關係，實直接影響及個人主觀良好狀態最深層的價值選取，後者則形成一國族之大體的文化與價值取向，較屬於客觀良好狀態之部份。個人之生活品質之評估所含有的主觀與乎普世的客觀的價值選取，須進至此方可相應而探知所評估之良好狀態或幸福之確實意指與意義。

臺灣環境生活品質之幸福指標理念探究 ——以主觀幸福理論為進路

蕭振邦*

前言

以目前學者專家所謂的後現代態勢（post-modern condition）來看，¹人們的生活大致已為工業化進程席捲，多數人也逐步喪失了特定之超越價值（transcendent values）信念的存在體驗（a existential），而所有的生活機轉及設想，都只能立基於人類有限能力的現實評估之上，且這些能力對一般人而言，卻多半是令人絕望的。對於那些深刻體驗到這種喪失存在信念的有識者而言，現代世界似乎已經走到了盡頭，人們已然進入了一個只能名之為「後現代」的新階段。²

這樣的態勢已發展有年，當前有識者莫不努力於重建新信念，並找尋維繫人類文明發展的根源支柱，其中，人類的幸福祈嚮就是一種重要支撐，在1950年代開始，學者專家即積極投入幸福理念的重建與追尋，並開始很實際地以嘗試釐定「幸福指標」及其測定操作，作為重建信念的主要經營。然而，「幸福指標」固涉及外在環境、人的內在期許，以

*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¹ 關於後現代概念之運用，本文正反並陳地參考以下之研究成果：Steven Best and Douglas Kellner, *Postmodern Theory: Critical Interrogations*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91); Christopher Norris, *What's Wrong with Postmodernism: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Ends of Philosophy*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0).

² Dabeny Townsend, *An Introduction to Aesthetic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7), p. 185.

及兩者間最終的調適統合，可以說，環境因子與人的主觀期許，都成爲「幸福指標」探究課題的重要內容。

更重要的是，當前世人莫不深受全球環境危機的衝擊，是以，在考量及追求人類本身的幸福時，必須一併考慮與處理相關的環境因素，特別是促進環境保護、訴求環保效能的「成本意願」(willingness to make trade-offs for environment)，而對應之研究操作也必須能在理念上、操作方法上反映出這方面的適當調整。基於這種理解，本文以臺灣地區的相關研究作爲考察實例，簡要論述研究者在釐定「幸福指標」時，環境因子與人的主觀期許之間的辯證發展梗概，並考察其中蘊涵的問題。

一、「幸福指標」探究的涵義

以 2009 年出刊的《社會指標研究》³爲例，目前社會學家提供的「幸福」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他們多半採取了個體與社會相互依賴的觀點，而經常著眼於個體與社會之間的利益衝突現象，進而探究兩者之間幸福共存(go together with)議題。⁴Veenhoven 教授透過「機會」(chance)的觀點，理論地區分了特定系統的四種「幸福」：(1) 好的外在條件——把焦點置於外在的機會上，處理環境的條件（有利的條件被視爲比不利的條件更爲「良好」[well]）；(2) 適當的內在功能——把焦點置於內在機會上，處理內在功能（有計畫地運作被視爲比導致傷害的運作更爲「良好」）；(3) 正向的外在效果——把焦點置於外在的結果，處理系統的環境效應；(4) 系統的維持——把焦點置於內在結果，處理系統本身的維持。

首先，藉由這項區分，Veenhoven 指出，把這個區分運用到生物有機體上，生存良好的機會即意味群落生境(biotope)與適宜性(fitness)，反之，生存良好的結果則指涉生態作用（外在結果）、有機體或物種的

³ Po-Keung Ip (Guest Editor),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91, No. 1 (March 2009).

⁴ 以下討論，參考：Ruut Veenhoven, "Well-being in Nations and Well-being of Nations: Is There a Conflict Between Individual and Society?,"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91, No. 1 (March 2009), pp. 5-21.

存活（內在結果）。若是運用於企業組織，生存良好的外在機會即體現為市場，反之，內在機會則是公司的資本；外在結果可用「公共財」(public wealth) 來指涉，而內在結果可用「私人利潤」(private profit) 來指涉。

其次，運用於個體上，機會則顯示了兩個潛在生活品質 (quality-of-life) 的變項：一者是環境的機會，指涉環境本身的可居性 (livability)，意指好的生活條件，通常，「生活品質」或「幸福」被人們依這個意思來使用，一般即稱之為「生活水平」(level of living)，然而，環境的「可居性」或「居止性」(habitability)，在特定調查脈絡多半被用來指涉「住宅的品質」(quality of housing)；再者是個人的機會，指涉個人活用 (exploit) 環境資源及對抗生活難題（特別是來自環境的挑戰者）的能力，一般即稱之為「生活能力」(life-ability)，而生活品質和幸福也常常被用來意指這種意思。

如上所述，「幸福」概念蘊涵了在特定環境中生活得好的意思。要獲得「幸福」，首先，其初階必須擁有一個能夠提供生活條件的環境，而且，人們必須具備運用這個環境之資源，以及解決環境可能相對帶來之各種難題的能力，就此階層而言，涉及的多半是有關「生活品質」的客觀面考量。其次，其進階則勢必涉及生活者的滿意及滿足問題，換言之，也就涉及了個人的主觀意願及其滿意度的評估。綜合這兩個階層來看，一如學者專家的提示，「好的生活」必須對應於它自身之外的某項善的期許，這也就假定了生活本身蘊涵了一種更高價值的追求。容或，此可謂之為「生活意義」(meaning of life) 的體現，換一個方式說，此即意味個人之主觀意義感 (subjective sense of meaning) 的追求。在學理上說，它就是人們特定之「真實的」切己性 (significance) ——人的意願及滿足感，它取代了單純的「生活上的實用性」(utility of life) 訴求。但要留意的是，各種外在實用性，並不需要依賴人的內在覺察，亦即，從特定觀點來看，對某人的生活方式有益的事，並不需要他們去知道才會發揮作用，這可以是一種外在的結果，反之，生活的內在結果(切

己性)即有意義之生命的延續,則需要人們覺察它、追求它,例如,長壽、快樂的有意義之生活,皆必須照應主觀上的意義建構。

其三,循上述理念發展而來的「幸福指標」研究,大致涵蓋了兩個不同的面相,而當前相關的研究成果的重點之一,即聚焦在「主觀幸福」(subjective well-being, SWB)概念本身的解惑及是否有可能客觀地測定的議題上。Robert A. Cummins 等人指出,⁵社會或國家決策制定者常常因為不了解主觀幸福(SWB)可以被理解及測定,而無法定出有效的決策,甚至,Cummins 等人提出了一種「主觀幸福原初穩定態理論」(the Theory of SWB Homeostasis)來說明回應環境挑戰與資源之連結的各種關聯的預測,並用來闡釋族群的幸福。主觀幸福原初穩定態理論提出的建議是,類比於人的體溫穩定態的維持,主觀幸福也被個體主動地控制與維持。同時,藉由外在與內在的緩衝(buffers)機制,譬如,正面經驗或負面經驗的交融,主觀幸福的各種變動程度可以被測定(也就是可以提供量化測定的客觀數據)。

最後,學者專家也留意且關注,幸福課題的探究必須區分且並重客觀指標(objective indicators)與主觀感受(subjective perceptions)。Pei-shan Liao 指出,⁶目前,生活品質在七大領域中被檢視:醫療服務、家庭財務、工作、教育、休閒、公共安全,以及環境品質。其中,每一個領域的客觀和主觀的評定等級,都被充分地對照與比較,譬如,環境品質客觀指標與居處環境的主觀滿意度是相互關連的。Liao 即以生活品質為核心討論了幸福指標的測定與運用。

如上所述,「幸福指標」研究蘊涵了「生活品質」的客觀條件探究,以及「好的、令人滿意的生活品質」的主觀滿意度探究。要之,從 Raymond

⁵ Robert A. Cummins, Anna A. L. D. Lau, David Mellor and Mark A. Stokes, "Encouraging Governments to Enhance the Happiness of Their Nation: Step 1: Underst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91, No. 1 (March 2009), pp. 23-36.

⁶ Pei-shan Liao, "Parallels Between Objective Indicators and Subjective Perceptions of Quality of Life: A Study of Metropolitan and County Areas in Taiwa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91, No. 1 (March 2009), pp. 99-114.

Bauer《社會指標》⁷出版以來，學界即開始建構社會指標系統來監測社會發展與變遷的趨勢，以及解釋其涵義，而且，目前各國政府也多半把這項工作納入國家政策制定的基本考量之中，而大致以「客觀生活品質」與「主觀生活品質滿意度」的調查作為釐定「指標」的主題。

二、臺灣環境及其生活品質之探究

（一）臺灣環境的人文特色及相關研究底景

從臺灣的現代發展歷史來看，二十世紀前半葉臺灣的發展受到日本帝國的殖民統治（1895-1945），而且，也在此時開啓了臺灣的現代化進程。⁸然而，半個世紀之後，殖民主義的步調即告結束，臺灣由撤退的國民政府接管，而揭開了中華民國政府與大陸共產政權之間的政治、文化、軍事與經濟的冷戰時代，臺灣的執政者則明白揭示以臺灣作為「反攻大陸跳板」的政策綱領，遂使脫離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臺灣進入一種變相的（日本帝國主義及國民黨雙義的）後殖民主義時代，⁹一直要到蔣經國執政，臺灣才確乎進入「發展成為自己家園」的現代化進程。¹⁰以上歷史發展進程及其實質內涵，是考量臺灣環境生活品質不可忽視的人文底景。

臺灣在揭開實質現代化發展努力之後，快速地由傳統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朝野各方莫不積極努力，期許臺灣早日邁入已開發國家之林。在這個過程中，經濟發展固是全台民眾重視的主軸，然而，與工業

⁷ Raymond Bauer (ed), *Social Indicators* (Cambridge, Mass.: M. I. T. Press, 1966).

⁸ 相關看法及發展實況，可以參閱：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初版）。

⁹ 相關看法，請參考：邱貴芬，〈後殖民的台灣演繹〉，輯於陳光興編，《文化研究在台灣》（臺北：巨流出版社，2000，初版），頁 85-318；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此外，後殖民主義的內涵及相關論議，請參考：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eds), *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Stephen Slemon, "The Scramble for Post-colonialism," in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edited by Bill Ashcroft, et a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 45-53.

¹⁰ 相關見解，請參考：廖炳惠，《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臺北：麥田出版社，1994，初版）。

化結合的經濟成長，也就不免帶給臺灣自然環境一定程度的衝擊。目前看來，自然環境遭到深度破壞，成為台灣經濟快速成長所付出的代價，而晚近則有永續發展的構想和因應之道開啓，並把相關考量納入幸福指標研究。

再者，原本臺灣就是一個島國，處於災變頻仍地區，地震、颱風造成的危害年年層出不窮，這些災變不僅是生活在臺灣的居民所要面對的嚴苛環境挑戰，災變本身造成的財務損失，以及影響所及的國家財政上的嚴重負擔，也都緊密地衝擊了臺灣人的生活品質，相關評估不能忽視這方面的影響。尤有進者，在地球暖化形成的全球性極端氣候之環境危機的衝擊下，臺灣甚至被列入天災高風險地區，¹¹而於 1994 年 6 月成立的處理臺灣發展與環境保護而隸屬政府單位的「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大致接手了這方面的防災及環境工作監督，但成效並不如預期般地彰顯。¹²這方面的問題也勢必需要再加強經營。

（二）本文關懷之幸福指標中的「環境意識」涵義

根據我的研究，目前無論是由學院的環境倫理研究，或一般民眾的環境保護訴求來看，其首要特質就是要適度釋出人類自身擁有的權益或利益，而把這些權益或利益轉嫁給環境及其非人類成員，通常，它正是所謂親／利環境行爲（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¹³的表現。要之，天

¹¹ 根據聯合國最新的調查和統計，臺灣為天災風險付出的代價極大，以美元計價的天災整體損失，臺灣名列全球第四，而且，亞太地區居民受天災衝擊的機率為非洲居民的 4 倍，更是歐洲及北美居民的 25 倍以上，換言之，就天災而言，臺灣正是「極高風險」國家。相關報導的詳細內容，見：林亨儀，2011 年 8 月 11 日，〈天災損失風險：台灣排第四〉，中央社新聞網，URL=<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811/5/2woah.html>。（2012 年 2 月 19 日瀏覽）

¹² 詳見：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全球資訊網，URL=<http://sta.epa.gov.tw/NSDN/INDEX.ASP>。（2012/01/02 瀏覽）永續發展委員會成立之後，陸續完成了「廿一世紀議程——中華民國永續發展策略綱領」、「永續發展行動計畫」、「台灣永續發展宣言」、「永續發展指標系統」、「台灣 21 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略綱領」、「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永續發展行動計畫」、「永續發展政策綱領」，可見政府單位對永續發展的重視，此可視為對環境保護、環境意識的一種積極回應。

¹³ 關於「親／利環境行爲」的詳細說明及討論，可以參閱：Linda Steg and Charles Vlek, "Encouraging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 An Integrativ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9 (2009), pp. 309-317, 或 Christopher F. Clark, Matthew J. Kotchen and Michael R. Moore,

災頻仍造成的環境實質破壞，固然會降低人們對環境的滿意度，要求人們為了保護自己的環境而釋出原本擁有的權益或利益，也會降低人們對環境的滿意度，而且，此中還包括了實際踐行環境保護所要付出的實質代價（譬如，為了防治環境汙染而減少了個人的收入），亦即，「成本意願」付出的代價。容或，這是當前研究者應該正視的「環境意識」之涵義。

假如臺灣幸福指標研究果真要照應前述環境意識，那麼當正視環境問題可能在指標釐定中衍生的問題，並且，嚴正地考量人與環境互動可能帶給環境本身的衝擊；面對這些環境衝擊衍生的負面效應，人勢必要付出的代價，以及循之換算的主觀滿意度及客觀良好度的損益比。扼要地說，基於環境倫理、環境保護的考量，必須一併處理環境權益與人類的福祉或利益衝突時如何處置的問題，而相關指標研究若要照應這項課題，其整套操作本身的「環境意識」之量表化必須作適度調整，才能真正給出能夠照應當前臺灣人實際處境的調查結果。

可以說，相對於以上「環境意識」所衍生的指標研究問題，其實就在於如何把前述「付出代價」及「主客觀量度的損益比」加入指標測定作業之中。目前，這項解題其實已經有積極實例可循¹⁴，亦即，不丹在調查其人民是否幸福及謀求相關環境改善之道時，提出了一種「國家幸福指數」（Gross National Happiness）調查量表，其中明確地把「保護自然環境」列為四大調查領域之一。¹⁵本文正是以不丹的國家幸福指數調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fluences on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Participation in a Green Electricity Program,”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3 (2003), pp. 237-246。

¹⁴ 程進發先生於 2012 年 3 月 19 日於本人主持的研究計畫「環境幸福理念及環境幸福指標探究」的工作坊中發表〈GNH 是不丹的，還是全球的核心價值？——從環境角度解題〉，即詳細例示與說明了相關「環境幸福指標」的改變。

¹⁵ Karma Ura, 2008, “Explanation of GNH Index,” The Centre for Bhutan Studies Website, URL=<http://gnhusa.org/wp-content/uploads/2010/04/Karma-Ura-Explanation-of-GNHf.pdf>。以及，Tashi Wangmo and John Valk, 2012, “Unedr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dicators of GNH,” The Centre for Bhutan Studies Website, URL=<http://www.bhutanstudies.org.bt/wp-content/uploads/2011/09/3-Influence-of-buddhism.pdf>。（以上皆 2012/04/05 瀏覽）這兩篇報告深入引介及討論了深受佛教影響的不丹國家幸福指數之內涵及其可能發展，其中闡釋的環境幸福指標可作為本文所提示的「環境幸福指標」的一種積極例示。

查中的「環境指標」作為把環境意識納入考量及調查操作的可參考之積極例示，¹⁶雖然，不丹與臺灣的國情不同，不丹的思考模式深受藏傳佛教思想的影響，而且，GNH 的一些指標並不容易量化，概念也不夠清晰，容或其客觀性更可能被質疑，但這些難道不正是當前幸福指標研究者該當繼續研究克服的問題嗎？因此，我暫時把它用來作為分判臺灣幸福指標研究是否果真把「環境意識」納入指標考察作業的一種參考系。

（三）現有國內外關於臺灣生活品質研究之梗概與檢討

對照前述強調的「環境意識」涵義來看，目前國內外幸福指標的釐定，大致上依循的是不斷修正而普獲認同的「人類發展指標」（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DI）模式，這項模式在 2011 年世界經濟與合作發展組統織（OECD）的報告，以及英國國家統計局《國家幸福指標測定什麼》的報告中有深入的引介與檢討，¹⁷譬如，《國家幸福指標測定什麼》中即揭示「幸福與更公平的財富分配、較大的社會機動性，以及能夠促使快速的生活步調趨緩有關」的新看法。過去有關臺灣幸福指標的研究，大致未契合此潮流，而多半未把相關「環境代價」的考量，置入指標評估之中，2010 年以後的調查研究則大大改觀。以下即分別簡要例示及討論一些具有不同代表性的研究：

¹⁶ 這些「環境指標」包括生態知識指標、生態退化指標、造林指標，略如以下調查項目：（1）與自然的嵌結關係；（2）公眾對環境政策的支持；（3）環境汙染問題；（4）政府對環境保護的努力；（5）農業用地的開發；（6）自然林地成長導致農地減少；（7）都市化；（8）水的品質；（9）空氣的品質；（10）交通運輸；（11）能源使用；（12）氣候變遷；（13）生物多樣性；（14）家庭垃圾；（15）農業用地的品質；（16）肥料使用；（17）農藥使用；（18）農業限制；（19）人類與野生動物的衝突。（15-17 項唯有有農地者才需要填答。）以上資料參見：Alejandro Adler Braun,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in Bhutan: A Living Example of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Progress*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9), pp. 101-110。另見：Alejandro Adler Braun, advised by Waheed Hussain,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in Bhutan: A Living Example of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Progress,” Whart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Website, URL=<http://www.schoolforwellbeing.org/download/GNH%20Paper%20Final.pdf>, pp. 54-63。（2012/04/15 瀏覽）

¹⁷ OECD, “How’s Life?: Measuring Well-being,” OECD Website, URL=http://measuring-well-being.asia/en/pdf/bd_e_2.pdf;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UK, “Measuring What Matters,” <http://www.ons.gov.uk/ons/guide-method/user-guidance/well-being/publications/measuring-what-matters--national-statistician-s-reflections-on-the-national-debate-on-measuring-national-well-being.pdf>.（以上皆 2012/01/14 瀏覽）

(1)曾敏傑,〈台灣主客觀生活品質變遷的探索(1989-1994)〉¹⁸(以下簡稱「〈曾文〉」):〈曾文〉主張主、客觀生活品質研究都能夠反映社會變遷的軌跡與趨勢,雖然,學者專家的研究均留意到主、客觀幸福指標的測定結果往往不一致(或肇因於過度重視環境實質條件,或肇因於兩者的「尺度不對稱」[scale discordances]),但兩種研究固不能偏廢。再來,〈曾文〉以1980年中央研究院召開「第一次社會指標會議」作為臺灣學術界開始關懷社會指標之測定議題的里程碑,從而引介了臺灣學術界關於相關指標研究的梗概,其一,在客觀生活品質研究方面,〈曾文〉論述了臺灣學界引用美國海外開發委員會的「實質生活品質指數」(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 PQLI,以識字率、嬰兒死亡率與預期壽命為主要換算指數)作為客觀生活品質實證研究的測定工具,而相關研究則都逼顯如何綜合相關數據來反映臺灣客觀生活品質變遷趨勢的議題。其二,在主觀生活品質研究方面,〈曾文〉以內政部「國民生活狀況調查」為主軸,來監測主觀生活品質的變遷,並把焦點置於「整體領域主觀生活滿意度變遷」、「主觀生活品質指標間的關聯」等探究。綜合來看,如〈曾文〉所示,一者,各項客觀研究雖然提列了詳細的實證研究數據,但並沒有說明測定的指標是如何選定的(例如,21項指標是如何釐定的);二者,在客觀指標中雖然列入了「生活環境」領域,也設定了「自然環境」指標,但是,並沒有考量到環境主義或環境意識在當前的深度影響,以致各項研究的「指標之有效性」可能受到質疑;三者,主觀生活滿意度調查工具區分,不論是「五分法」或「六分法」(例如,由「極滿意」……,到「極不滿意」),皆不能反映「滿意」本身的實質內涵,而且這些區分也不能直接看待為所謂的「指標」;四者,主觀滿意度調查的「領域」僅涵蓋「住宅環境狀況」滿意度調查,無法反映現時的「環境」觀點。總之,如〈曾文〉最後在結論中的提示「本文發現主客觀生活品質變遷不一致的情形,如主觀財務狀況滿意度隨著客

¹⁸ 曾敏傑,〈台灣主客觀生活品質變遷的探索(1984-1994)〉,《輔仁學誌》第35期(臺北:輔仁大學,2002),頁23-49。

觀實際所得改善而提昇，及主觀住宅環境滿意度隨客觀公共環境惡化而下降，顯示這段期間臺灣民眾經歷良好的主客觀所得改善，但卻也面臨主客觀環境品質的低下，而值得政府繼續投入更多努力在環境議題上」¹⁹，正好顯示「環境關懷」正是未來臺灣生活品質研究不可或缺的關鍵因子。

(2) 陸均玲，〈台灣地區生活品質研究概況〉²⁰（以下簡稱「〈陸文〉」）：由醫療的觀點切入「生活品質」的探究，展示的是政治大學資料中心搜尋引擎抓到的數據，其研究成果顯示碩博士論文及研究報告中「以『生活品質』為題之 35 篇論文報告，依研究對象進行分析……，發現有六成的研究以疾病為重點（54.3%以患者為對象，5.7%以病患照護者為對象）」²¹，從而總結這類以生活品質為題的研究，可歸為「與健康相關之生活品質研究」。除了這個類別之外，還有「都市或居民生活品質」研究——其中也涉及與健康（醫療、保健）相關的研究，以及「生活環境品質」的研究——涵蓋了環境客觀指標及居民主觀感受。〈陸文〉特別在檢討「目前健康生活品質研究的特徵」時指出，「當研究者關注於疾病對個人生活所造成的衝擊，容易將測量重點至〔置〕於個人之因應行為及主觀感受，而忽略與其相關環境之考量，所謂的環境包括有形的居住及生活空間，還有無形的法令規範或文化風俗習慣」²²，而其實〈陸文〉研究並沒有顧及環境意識的考量。

(3) 陳柏熹、王文中，〈生活品質量表的發展〉²³（以下簡稱「〈陳文〉」）：針對社會指標研究多半著重客觀分析，而忽視了個體主觀感受的缺失，試圖「發展出一套可以對生活品質主觀感受進行客觀測量的量表」²⁴。〈陳文〉也採納了 Norman M. Bradburn 《心理幸福的結構》²⁵的

¹⁹ 曾敏傑，〈台灣主客觀生活品質變遷的探索（1984-1994）〉，頁 46-47。

²⁰ 陸均玲，〈台灣地區生活品質研究概況〉，《中華衛誌》第 17 卷第 6 期（臺北：中華公共衛生學會，1998），頁 442-457。

²¹ 陸均玲，〈台灣地區生活品質研究概況〉，頁 445-446。

²² 陸均玲，〈台灣地區生活品質研究概況〉，頁 454。

²³ 陳柏熹、王文中，〈生活品質量表的發展〉，《中國測驗學會測驗年刊》第 46 輯第 1 期（臺北：中國測驗學會，1999），頁 57-74。

²⁴ 陳柏熹、王文中，〈生活品質量表的發展〉，頁 57。

見解，強調生活品質感受是一種情緒上的平衡狀態，亦即，個體對整個生活的快樂感或幸福感（well-being），而把研究鎖定在個人的「幸福」衡量上。〈陳文〉提示「客觀性的評估是對受試者的行為、經驗或其所處的環境特性作評估，如物理環境、睡眠時間、收入等；而主觀感受的測量是測量受試者對生活事件的主觀感受，如活力感、快樂感、滿意度等」²⁶，但是，生活品質的指標應該是客觀狀況的評估，還是主觀感受的衡量？〈陳文〉最後以「Rasch 模式」量表解決了這項困難。總的說來，〈陳文〉雖然定出了「環境領域」的 8 項合度指標²⁷，但與前述環境意識顯然還有認知上的差距。

（4）在眾多有關臺灣生活品質的研究中，有一篇研究特別顧及了現前的環境意識，此為吳珮瑛等撰〈台灣之生活品質、環境保護與所得水準關係的剖析〉²⁸（以下簡稱「〈吳文〉」），揭示了環境保護的環境主義或環境意識，並循永續發展主題闡釋了相關理念。〈吳文〉指出：「帶來高所得水準的都市化與工業化，所造成的環境汙染問題，似乎也隨著所得水準的提升而發生。因而，我們好奇過去每個研究所採用各不相同，事實上是涵蓋了錯綜複雜之生活品質的指標，是否可以用一個一般性的概念來加以詮釋，也就是當我們致力於狹義廣義、內在外在、主觀客觀的生活品質指標提升之時，是否有一個終極追求的目標？」又指出：「我們發現永續發展……所蘊含的內容與意義，正可以滿足這樣的需求」²⁹。容或，這是過去各項臺灣幸福指標研究中最積極把環境保護納入考量的研究之一。然而，〈吳文〉指出所謂的「環境因子」包括了

²⁵ Norman M. Bradburn, *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Chicago: Aldine Pub. Co., 1969).

²⁶ 陳柏熹、王文中，〈生活品質量表的發展〉，頁 60。

²⁷ 這些合度指標分別是：「我可以在目前的環境中生存」、「我能夠在我的生活環境滿足食、衣、住、行等基本需求」、「我不會為了生活環境的問題感到煩心」、「我對我的工作及居家環境大致滿意」、「我願意在我生活的環境中從事某些休閒娛樂活動」、「我能夠在我的生活環境中找到支援或協助」、「我能夠很自由、很放心的在我的生活環境中進行各種活動」、「我不會覺得我的生活環境中有任何問題」。參見：陳柏熹、王文中，〈生活品質量表的發展〉，頁 67-68。

²⁸ 吳珮瑛、劉哲良、蘇明達，〈台灣之生活品質、環境保護與所得水準關係的剖析〉，《全球變遷通訊雜誌》第 46 期（臺北：臺灣大學全球變遷研究中心，2005/06），頁 1-6。

²⁹ 吳珮瑛、劉哲良、蘇明達，〈台灣之生活品質、環境保護與所得水準關係的剖析〉，頁 1。

自然環境蘊涵的自然資源之品質或數量，也包括了人與環境互動後對人類所造成的結果，³⁰卻還是未能在指標中反映環境代價之付出，以及主觀滿意度及客觀良好度的損益比。

(5) 國內外期刊發表的有關臺灣幸福指標研究中，2005 年之後已明顯把與「環境問題」有關的考量列入幸福指標之釐定，譬如，在 2009 年出刊的《社會指標研究》中，Pei-shan Liao 的研究報告即在客觀與主觀指標中都把與環境汙染有關的「每日垃圾運輸」、「每月落塵量」等等考察列入，反映了一定程度的環境意識，不過 Liao 基於方法上的嚴格設限，並未能列入更多與環境因子有關的指標。³¹2012 年 2 月 24 日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召開的「環境：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 17 次研討會」，則有多篇研究報告調查了與環境保護有關的臺灣民眾親／利環境行爲，此如朱瑞玲、楊淑雯的〈台灣民眾的利環境態度與行爲：價值觀與罪感的影響〉³²，楊文山、施奕任的〈氣候變遷的認知與友善環境行爲：紀登斯困境的經驗測試〉等等，則反映了學者專家試圖把環境意識、環境保護的成本意願或擔負成本的行爲列入考量的努力，³³相信將會影響未來臺灣幸福指標的釐定工作。

由以上生活品質或幸福指標研究來看，過去大多數的研究都忽略了環境問題在臺灣幸福指標釐定中具有的重要性，甚至，已然意識到環境因子在指標測定時扮演的角色，卻礙於方法上的限制而致使指標或量表設計有可能與現實狀況脫節 (dislocated)，固有待加強。目前，臺灣政府在其永續發展政綱中即大量加入環境保護的考量及因應措施，或可作

³⁰ 吳珮瑛、劉哲良、蘇明達，〈台灣之生活品質、環境保護與所得水準關係的剖析〉，頁 3。

³¹ Pei-shan Liao, "Parallels Between Objective Indicators and Subjective Perceptions of Quality of Life: A Study of Metropolitan and County Areas in Taiwan," pp. 106, 107, 108.

³² 朱瑞玲、楊淑雯，〈台灣民眾的利環境態度與行爲：價值觀與罪感的影響〉，輯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編，《環境：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 17 次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2/02）。

³³ 楊文山、施奕任，〈氣候變遷的認知與友善環境行爲：紀登斯困境的經驗測試〉，輯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編，《環境：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 17 次研討會論文集》。

為一種參考。³⁴近年來臺灣學者也開始啟動與幸福指標相干的臺灣民眾的環境行為研究，相信其未來的發展及影響深可期許。總之，未來在釐定臺灣的生活品質或幸福指標時，勢必要展示其「環境關懷」（environmental concern），並把「環境價值」（environmental values）考量與「環境保護」（environmental protection）的行動代價之付出，完整納入幸福指標的釐定作業。

三、環境生活品質或幸福指標的涵義 及其主觀指標難題

基於以上討論，生活品質或幸福指標衡量，當然要重視生活環境呈現的客觀條件的制約，但是，在主觀感受或滿意度方面，所謂的生活上的「幸福」或「滿意」，顯然在計算上（calculating）必須把環境災變及環境保護該當付出的成本（成本意願、擔負成本）一併考量進去。簡言之，臺灣經歷了重大改變，時代特質及價值取向都已有所不同，譬如，工業化的衝擊、經濟泡沫化，以及後現代價值觀的影響，這些都應該納入生活品質或幸福指標的研究考量。關於這一點，Quentin Kidd 等人在〈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與環境〉³⁵（以下簡稱「Q文」）中展示了獨到的研究成果，他們指出，根據其研究顯示，環境主義同時出現在富有及中低收入國家之中，而且，後物質主義的（postmaterialist）價值與全球環境主義似乎並行而不悖。原本學者專家以為中低收入國家人民的表現，通常應該是被物質主義的（materialist）價值觀所主導（重視生存需求所致）；先進工業國家人民的表現，應該是被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所主導（生存需求的負擔相對為小）。然而，如研究結果所示，在先進工業國家與中低收入國家中，都展現了一定程度的後物質主義價值觀，而且，

³⁴ 相關詳細內容，可以參閱：行政院，〈台灣永續發展指標系統〉，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全球資訊網，URL=<http://theme.cepd.gov.tw/sustainable-development/main.htm>。（2012/01/18 瀏覽）

³⁵ Quentin Kidd and Aie-Rie Lee, "Postmaterialist Values and the Environment: A Critique and Reappraisal,"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78, No. 1 (March 1997), pp. 1-15.

也都與環境主義相互結合，甚至，有些中低收入國家所表現的環境關懷還高於先進工業國家的。

〈Q 文〉引用了 Ronald Inglehart 的價值變遷理論，提示個人的基本價值排序反映了他們自己的社會經濟環境，而社會環境的不斷變遷，個人的價值排序也由實質的維生和安全問題改變成與生活品質相關的關注。總之，不論是在先進工業國家或中低收入國家中，未來世代都將會遠較於物質主義的價值觀而更受到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的影響，但是，這種改變是緩進的，更且，一個社會的整體價值觀也並非完全由單一價值導向模式所決定。〈Q 文〉特別指出，一般識見常常以為開發中國家的人民不可能去關照他們的環境，但是，後物質主義的理論並不認為只有富裕的人和國家才會有環境關懷。

〈Q 文〉引用 Inglehart 的說法，凡是面對實質環境難題挑戰的國家，會更強烈地傾向於環境保護，但是，在既定社會中，擁有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人遠比擁有物質主義價值觀的人更重視環境保護，而且，人們對環境主義的支持也遠比受環境汙染水平本身的影響，更受到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影響，也因此，不受環境問題衝擊的工業先進國家也維持著相同程度的環境關懷。扼要言之，〈Q 文〉認為，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的核心特色就在於它展現了特定的「環境主義水平」，而且，可以明確定出四個「環境保護指標」(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ex)：³⁶

- (1) 我願意給出我的部分收入，假如我可以確定錢將被用在防止環境汙染上。
- (2) 我會同意加稅，假如額外的金錢是被用在防止環境汙染上。
- (3) 政府必須降低環境汙染，但它不要花我任何一分錢。
- (4) 保護環境與對抗汙染並不如人們所說的那樣急迫。

以上 (1) 和 (2) 是同意或強烈同意高度支持環境保護，(3) 和 (4) 是不同意或極不同意支持環境保護。

³⁶ Quentin Kidd and Aie-Rie Lee, "Postmaterialist Values and the Environment: A Critique and Reappraisal," p.7.

如上所述，可以明確發現，要維護人們的生活品質，勢必要覺察到個人有必要付出代價，亦即，需要降低原本維持生活水平的資源需求、減少自己的收入，甚至是降低個人理想中期許的幸福感。〈Q 文〉的研究顯示，不論是在先進工業國家或中低收入國家，這種重視環境保護的後物質主義價值觀都成為重要的趨勢。更重要的是，〈Q 文〉的研究強調，支持環境保護是由價值排序的逐漸改變導致的結果，而不是由客觀環境條件的改變導致的結果。

基於以上討論，如果我們要把當代環境問題極端受到重視的現況涵蓋進生活品質或幸福指標研究，就勢必需要把前述環境意識、環境主義納入指標考量之中，而這樣做時，我們也將會發現，不論是客觀條件或主觀感受的評判，都將與價值依據（或價值觀）脫不了關係。而且，一旦形成所謂的價值導向，那麼，這種「價值」其實可能同時涵蓋了「獲益」與「付出」兩個向度，就像環境保護一樣，我們勢必獲益，我們也必須付出。

綜合以上討論，可以說當人們重新反思生活品質或幸福指標問題時，應當不難發現其中可能隱含的兩個棘手問題，而這些問題有可能是以往研究者釐定各項指標時所忽略或無法處理者。

（一）主觀的必然性與普遍有效性難題

主觀感受之指標既然是主觀的，何以具有必然性？這個問題可以回溯 David Hume 《人性論》³⁷中的討論。要之，當 Hume 在說明觀念的連結原理時，他提出了因果關係原理，但卻否定了因與果之間的必然性。若是，為什麼我們會認為有「因果關係」呢？黃慶明曾針對這項議題提供他的論證。他指出，Hume 的「必然連結觀念」並非由理性而來，也不是由感性而來，人們並未發現任何性質可以據以把結果繫於原因之上，而使結果必然跟隨原因而來。人們只是發現作為「果」的事件，事實上的確是跟隨著作為「因」的事件而來。究其實，Hume 主張必然連

³⁷ David Hume, *Treaties of Human N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結觀念來自於反省（印象），就如同每當有 A 的「印象」時，我們「相信」B 會出現，而 Hume 正是要說明這種「信念」是如何形成的。如黃慶明所示，信念不同於單純的觀念，信念本身另外加上了特定的「設想方式」（*manner of conceiving*），而事實上，這就是一種態度上的不同。再者，由於信念深植人心，所以人們並不能自由地決定要相信什麼，Hume 把這種情況稱為「習慣」，而信念意指的就是某種印象的衝擊力已達到了「如同已親見」的強度，所以，「相信」得以成立。循此，主觀上的必然性就來自於如同已親見的信念，它意指絕不懷疑，並逐漸成為習慣。³⁸

假如主觀的必然性只是個人絕不懷疑的信念或習慣，那麼，如何量化信念？其中來自個人的差異又如何處置？而且，如果的確存在著極大的個人差異，任何主觀性研究「指標」是否具有普遍有效性？一如 Anne Anastasi 等人所提示的，在建立各項指標時，必須考量其可信度（*reliability*，意指衡量工具本身的準確性和精確性）和有效度（*validity*，意指衡量工具本身的敏感性和與其他工具操作的一致性），³⁹生活品質的滿意度調查如何建立其工具操作的有效性？這些困難是在釐定幸福主觀指標時必須加以克服的難題。

（二）品味與風格的難題

通常，生活品質或幸福的主觀指標本身即蘊涵了個體之主觀上的自主性因子，雖然，個體的存在原理是「存在先於其實現」（*exist prior to its fulfillment*），但個體的存在特質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不同的風格與品味而定。簡言之，所謂的「風格」可以是某人的生活屬性，擴大地說，也可以視之為其人的特色，而大致上它是一種「格式塔屬性」（*gestalt properties*），亦即，俱現（*concrecence*）或突現（*emergence*）；而所謂

³⁸ 黃慶明，〈休姆因果律的必然性〉，輯於林義正、郭博文、趙天儀主編，《曾天從教授百歲冥誕紀念集》（新北市：富春文化事業公司，2011，初版一刷），頁 364-389。

³⁹ Anne Anastasi and Susana Urbina, *Psychological Testing*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Hall Inc., 1997).

的「品味」則可以是某人回應其生活世界的獨特判斷力和愉悅感凝聚的特殊傾向。這兩者都密切關連著人對其生活世界的期許及回應方式，且形成為個人的主觀特色。

可以肯定的是，個人生活風格與品味將深深影響其生活品質的判定，每個人甚至以風格及品味來標記其生活，而充分展示其主觀存在之風味。如是，與生活品質或幸福指標研究有關的主觀滿意度調查，如何反映這方面的內涵？實際上，各種主觀存在風味都很難量化分析，是以，如果用一種可以客觀化的量表來計算這些因子可能發揮的影響力，有什麼意義呢？它的確有意義，亦即，以一種可數理計算或衡量的世界觀取代人存的感受世界觀。果爾如是，這樣得出的「滿意度」有可能距離人的存在實況很遠，而喪失了對人而言的切己性（*significance*）和風味。再者，由於脫離了品味與風格等自主性特質，也很難評估人們何據以有意願來面對生活上需要勉力進行的調適（譬如，付出環保代價），並反映出客觀區隔。面對這類困難，必須重新建構一個適切的測定生活品質之主觀滿意度或指標的理論，以便釐定恰當的衡量或測定幸福的主觀指標。

結語

首先，本文大致引介了幸福指標，並論述其涵義即在於：「客觀環境條件一人之生活能力」與「生活滿意度—主觀意義」之間的辯證。其次，本文也指出有關臺灣生活品質或幸福指標的研究，大致上都需要強調環境主義、環境意識，以及進行環境保護勢必要付出的生活代價，亦即，成本意願、擔負成本等方面的考量，以及在研究方法上突破環境因子之主觀滿意度客觀量化的難題。其三，本文例示、檢討了既有的有關臺灣幸福指標的一些研究，並進一步討論進行環境生活品質指標探究時，有可能相對釐定的「環境保護指標」，以及循此指標會衍生的關於

生活品質指標的考量重點。最後，本文指出了想要釐定生活品質或幸福指標可能遭遇的兩項難題。

最重要的是，生活品質或人的幸福的衡量，勢必不能忽視人置身其中的環境，除了如一般臺灣幸福指標研究照應到的客觀環境條件之外，更不能忽略人與環境互動可能帶給環境本身的衝擊，及面對這些環境衝擊衍生的負面效應時，人勢必要付出的代價，以及循之換算的主觀滿意度及客觀良好度的損益比。扼要地說，生活品質或幸福指標衡量，當然要重視生活環境呈現的客觀條件的衡量，但是，在主觀感受或滿意度方面，所謂的生活上的「幸福」或「滿意」，顯然在計算上（calculating）必須把環境災變及環境保護該當付出的成本一併考量進去。

最後要指出，本文在進行研究時深刻意識到哲學理念及其社會科學實務依據兩者間可能存在的意見分歧（gulf）及其解決之道的彼此角力，譬如，如何看待存在於 Jacques Derrida 與 John Maynard Keynes 之間的意見分歧？⁴⁰是否只能循「常識／常理」（common sense）觀點解決相關歧見？哲學有必要提出所謂的超乎常識的洞見嗎？相信這是值得再深入探究的一些課題，因為，誠如《國家幸福指標測定什麼》報告所指出的「假如你嚴肅看待幸福測定，相關測定及其指標必須有意義，而且要對一般人構成意義，他們正是需要在行動上被引導而有所改變者，而測定本身的目的並非重點」⁴¹，據此，「對一般人構成意義」意味著某種「常識化」是必要的，而「在行動上被引導」則又意味著需要某些超乎常識的洞察作為依據（譬如，價值上的依據）。再者，本文也要再呼籲把環境主義的意蘊加入臺灣幸福指標研究考量，這也是值得再深入研究的課題，因為，本文強調環境生活品質或幸福指標的釐定，還涉及了個人的

⁴⁰ 關於這項「意見分歧」的內容，請參閱：John Coates, *The Claims of Common Sense: Moore, Wittgenstein, Keyn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xi-xii, 7-8, 150, 172-174。

⁴¹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UK, "Measuring What Matters," <http://www.ons.gov.uk/ons/guide-method/user-guidance/well-being/publications/measuring-what-matters--national-statistician-s-reflections-on-the-national-debate-on-measuring-national-well-being.pdf>, p. 4. (2012/04/18 瀏覽)

主觀意願的問題，是以，相關調查研究固應重視一般民眾的客觀需求條件，但也要適度關注民眾之主觀滿足的生活意義之引導及教育寓意。

論國家公園與幸福人生的關聯： 以陽明山國家公園與台江國家公園為例

徐佐銘*

摘 要

臺灣共有八個國家公園，按成立的時間先後，依序是墾丁國家公園（1982年）、玉山國家公園（1985年）、陽明山國家公園（1985年）、太魯閣國家公園（1986年）、雪霸國家公園（1992年）、金門國家公園（1995年）、東沙環礁國家公園（2007年）、台江國家公園（2009年）。

儘管成立國家公園的兩大宗旨「生態保育」與「休閒遊憩」廣為人知，然而國家公園與幸福人生究竟有何關聯，論者並不多。本篇論文將以陽明山國家公園與台江國家公園為例，論證國家公園與幸福人生的關聯。作者將採取效益主義作為論述的基本進路，一方面正面顯示國家公園與幸福人生，在價值意義上的重要關聯，他方面則試圖化解效益主義本身所衍生的可能難題。在幸福人生的論述上，本文將借用正向心理學的研究成果，以收借鏡與啟發之效。

關鍵詞：國家公園、陽明山國家公園、台江國家公園、生態保育、
休閒遊憩、幸福人生、效益主義、正向心理學

* 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副教授

一、導論

臺灣共有八個國家公園，按成立的時間先後，依序是墾丁國家公園（1982 年）、玉山國家公園（1985 年）、陽明山國家公園（1985 年）、太魯閣國家公園（1986 年）、雪霸國家公園（1992 年）、金門國家公園（1995 年）、東沙環礁國家公園（2007 年）、台江國家公園（2009 年）。

這八個國家公園的陸域面積，佔了臺灣全島面積的 8.64%。¹光就面積來說，其重要性就不容忽視。然而，成立國家公園跟幸福人生究竟有何關聯，這個問題不但不易給予一個讓大多數人滿意的答案；而且跟許多哲學問題一樣，當我們嘗試去證成二者之間的正面關聯時，往往顯露出許多證成的反面難題。

儘管成立國家公園的兩大宗旨「生態保育」與「休閒遊憩」廣為人知，然而國家公園與幸福人生究竟有何關聯，論者並不多。本篇論文將以陽明山國家公園與台江國家公園為例，論證國家公園與幸福人生的關聯。作者將採取效益主義作為論述的基本進路，一方面正面顯示國家公園與幸福人生，在價值意義上的重要關聯，他方面則試圖化解效益主義本身所衍生的可能難題。在幸福人生的論述上，本文將借用正向心理學的研究成果，以收借鏡與啟發之效。

二、效益主義的進路

邊沁（Jeremy Bentham）在《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一書一開頭就說：「自然將人類置於痛苦（pain）與快樂（pleasure）這兩個具有支配力量的主人的統治之下。唯獨苦樂指示我們應該做什麼，正如決定我們

¹ 魏宏晉，《台灣的國家公園》，第二版（臺北縣：遠足文化，2010 年），頁 12。

將做什麼。繫於苦樂皇冠上的，一方面是對（right）與錯（wrong）的標準，另一方面則是因果鏈。」²

效益主義在倫理學史上，向來被歸類為快樂主義（hedonism）。儘管在希臘時期，就有不少知名的哲學家肯定追求快樂的價值；但我認為，邊沁上述極為精簡的論述，不但十分簡明扼要地掌握快樂主義的精髓，而且頗能幫助我們用來進一步地分析問題。我將邊沁的主張歸納成以下 P1 與 P2 兩個命題。

P1：人類事實上就是在追求快樂。

P2：人類應該追求快樂。

首先要說明的，在本篇論文中，我將主張快樂具有多元的性質，或說複合的性質。因此，我將把「避免痛苦」視為或歸類為「追求快樂」多元性質的一種。

熟悉後設倫理學的讀者立刻會發現，P1 是個「實然」（Is）命題，而 P2 則是個「應然」（Ought）命題。自從穆爾（G. E. Moore）在 1903 年《倫理學原理》一書裡批評快樂主義企圖根據「快樂」這個自然性質去定義「善」，犯了「自然主義的謬誤」（naturalistic fallacy）³以來，很多哲學家就深受穆爾的影響，拒斥快樂主義。拒斥的理由之一，是基於所謂「實然」在邏輯上導不出「應然」，或是說「實然」與「應然」之間，並不存在邏輯上的蘊涵關係。

我認為，穆爾指出「實然」與「應然」是不同的概念，的確是偉大的貢獻。我也認為，就嚴格的邏輯推論形式來說，「實然」的確並沒有蘊涵「應然」。然而，我認為，如果因為這點就放棄「實然」與「應然」之間的推論聯結的話，這個代價太高。本文將主張，犧牲一點邏輯推論的完美性，暫且接受從「實然」推論出「應然」過程中的「不完美的邏輯跳躍」，去換取「實然」與「應然」的推論聯結，是頗為合理的主觀

² Jeremy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7 [1823] [1789]), p.1.

³ G. E. Moore, *Principia Eth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903]), p.62.

評價。在這樣的「預設」下，我將邊沁上述的論述，用底下的有效論證的形式來表達。

- 論證 1
1. 如果做 X 事實上讓我們得到快樂的話，那麼我們就應該做 X。(P3)
 2. 做 X 事實上讓我們得到快樂。(P4)
 - ∴ 3. 我們應該做 X。(P5)

在這個論證中，結論 P5 是個「應然」命題，合乎道德判斷的命題性質。P4 是個「實然」的命題，有待經驗的檢證。P3 是個條件句，前件是「實然」命題，後件是「應然」命題。我認為，P3 命題是關鍵性的爭論點之一。就邏輯推論的形式而言，P3 要從前件推論出後件，的確含有不完美的邏輯跳躍。但如同前述，如果我們能夠暫且接受這個不完美的邏輯跳躍的話，我們就可以聯結「實然」與「應然」，提出「似真」或「頗為合理的」P3 命題。然後再訴諸經驗去檢證 P4 的真假，最後導出 P5 的「應然」命題。

讀者可能會質疑 P3 是否能夠成立。有人或許會說，行為 X 雖然讓 A 得到快樂，卻對 B 造成痛苦。關於這個質疑，我的回應如下。

無論就快樂主義的分支利己主義 (egoism)、利他主義 (altruism) 或效益主義來看，我認為這三者都沒有蘊涵主張要對他人造成痛苦。利己主義雖然可能導致自私自利的行為，此行為卻也不必然會對他人構成傷害。我們可以設想一個根據利己主義而行事的人，其行為的後果可能有底下不同的情況：

1. 利己卻傷人。
2. 利己且利他。
3. 利己無傷人且無利他。

我們大概會同意，除了第一種情況，亦即利己卻傷人的情況以外，一個利己主義者的行動後果如果是第二種或第三種情況的話，其快樂主義在

道德上應該都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我們可以稍微修訂 P3 而成 P3*，且將前述的論證改寫如下：

- 論證 2
1. 如果做 X 事實上讓我們得到快樂且無傷人的話，那麼我們就應該做 X。(P3*)
 2. 做 X 事實上讓我們得到快樂且無傷人。(P4*)
 - ∴ 3. 我們應該做 X。(P5)

關於利他主義，我們可以歸納其行為後果可能有底下幾種：

1. 利他卻傷己。
2. 利他且利己。
3. 利他無傷己且無利己。

上述第二種情況，亦即利他且利己，向來被倫理學家稱為「互惠的利他」，且被演化論科學家詮釋為「利他行為具有實然的科學根據」，普受學院及社會大眾的歡迎。就倫理學的角度來看，互惠的利他具有相當合理的道德根據。關於第一種情況，亦即利他卻傷己，雖然傷到自己，卻利於他人的快樂幸福，就快樂的量來計算，也不算是「淨負」。因此，利他卻傷己的行為，向來有「美德」之譽，我認為也非浪得虛名。若是如此，那麼第三種情況，亦即利他無傷己且無利己，我們應該也能夠抱持肯定的道德評價。

關於效益主義，基本上它比較像利他主義，而非利己主義。由於它牽涉到許多相關人士的快樂幸福，因此會衍生出不同於一般利他主義的特別問題。

邊沁在 1823 年版《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裡，以加上註解的方式，修訂了他在 1789 年第一版書裡所謂的「效益原則」(the principle of utility)，改用「最大量的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或 greatest felicity)，作為分析的架構。⁴邊沁認為，「最大量的幸福」更能夠清楚而具體地說

⁴ Jeremy Bentham, *op. cit.*, p.1.

明原先的「效益原則」，因為「最大量的幸福」顯示要考慮「所有相關人士的最大量的幸福」(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ose whose interest is in question)，注意到幸福的「最大的比率」(the largest proportion)。他特別提到，這是人類普遍欲求的行動之唯一正確且適當的標準，而且也是政府在運用其權力，以及發揮其功能的行動標準。⁵按照這個修訂後的「最大量的幸福」原則，我把前述的論證 1 改寫如下：

- 論證 3
1. 如果做 X 事實上產生最大量的幸福，那麼我們就應該做 X。(P3**)
 2. 做 X 事實上產生最大量的幸福。(P4**)

∴ 3. 我們應該做 X。(P5)

我認為，論證 3 確實是邊沁的主張。論證 3 遭遇許多批評，本文不打算全面處理每一個批評，而將縮小範圍聚焦在「分配正義」的問題上。一個行為 X 可能成就 10,000 人的幸福，卻造成 100 人的傷害。我認為，邊沁「最大量的幸福」原則，的確有這個難題存在。那麼，我們是否要準備放棄邊沁這個原則呢？我並不這麼認為。政府的施政往往會牽涉到許多人的快樂幸福，雖然相關人士的快樂幸福可能是衝突的，換言之，有些人獲利，有些人受害；然而，如果每個施政方案都可能會有受害者的話，例如興建焚化爐，那麼，在所有可能方案中，採取「受患者最多或受患者最少」的方案，仍然是頗為合理的選擇，而效益主義正是提供這樣的行動判準。我認為，透過「補償受害者」的方式，可以維持效益主義的合理性。

總結關於效益主義的進路，我相當贊成白克維斯特 (Bykvist) 的主張，亦即，效益主義確實會遭遇某些難題，但是我們可以針對這些難題去稍加修正，而不用全部拋棄效益主義。⁶我也贊成他所言：「效益主義

⁵ Ibid.

⁶ Krister Bykvist, *Utilitarianism* (London: Continuum, 2010), p.2.

是個簡單而有力的理論。它告訴你，在各種可能的情況下，去遵循同樣的這個原則，亦即『最大化整體的幸福』。」⁷

葉保強在《企業倫理》一書說明該書之特色，在於採取一個揉合經驗描述與規範分析的進路。⁸我十分贊成這種平行兼顧的論述策略，我更認為，採取效益主義的進路來探究國家政策與幸福人生，是一個頗為合理的選擇。

三、正向心理學的探究與啟發

關於快樂與幸福人生有何關聯，這個問題，在哲學界淵源長遠，自古希臘以來，就爭論不休。近十年來，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在心理學界興起，也加入這個議題的探索與爭論。由於正向心理學融合哲學的理論思辯，以及心理學的實證研究，因此，這種跨領域的進路，對哲學界而言，應該可以視為合作的伙伴。底下我將借助正向心理學對「幸福人生」的探究成果，當作回應傳統幸福人生哲學問題的借鏡與啟發。

首先，我將討論「快樂」究竟是單純的概念？還是多元複合的概念？正向心理學在探討「美好人生」的思想根源時，追溯到希臘時期的三個主要哲學派別：伊比鳩魯學派的享樂主義、思多葛學派的苦行主義、以及亞里斯多德的幸福主義。⁹鮑姆嘉納（Baumgardner）及克羅瑟斯（Crothers）認為，正向心理學融合以上三個學派，標定一個共通點，「那就是主張生活的主要目標就是追求快樂」。¹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關於「主觀幸福安樂」（subjective well-being，簡稱SWB）的研究。¹¹

⁷ Ibid., p.78.

⁸ 葉保強，《企業倫理》，第二版（臺北：五南出版社，2008年），頁5。

⁹ Steve R. Baumgardner and Marie K. Crothers 著，李政賢譯，《正向心理學》（臺北：五南出版社，2011年），頁27。

¹⁰ 同上，頁33。

¹¹ 同上。

我們可以這樣來思考。如果「快樂」是單純的概念，那麼照理說，我們應該可以運用歸納法，將各種看似不同的快樂都歸納成，或說化約成單純的「一種」概念，並以此來定義「快樂」。這個想法雖然很吸引人，但有「正向心理學之父」美譽的塞利格曼（Martin E. P. Seligman）在《真實的快樂》這本書裡，卻將此問題擱置一旁，拒絕給予答案。他說：「有一個問題可能在你讀這本書時一直出現：究竟什麼是快樂？定義快樂的字句比任何一個哲學問題的都多，快樂這個字是最被誤用、濫用的字之一，我只要隨手一拈就可以填滿整本書的空白。但是我不想再替這些定義添上我的定義。」¹²

針對塞利格曼這個主張的一種可能的哲學回應是：釐清快樂的定義，分辨以往哪些快樂的定義是正確的，仍然是哲學的一個重要任務。然而，我懷疑我們能夠提出一個讓大家都滿意的判準，用來檢驗哪些快樂的定義是正確的或錯誤的。我推測，很有可能在長遠的文化論述當中，「多元的」快樂都已被視為快樂的一種，而我們也認為這些各式各樣的快樂論述，各有其合理性。比如，享樂主義觀點下的享用美食，或是苦行主義觀點下的粗茶淡飯，說它們都含有快樂的成分，似乎也頗有道理。類似的，我認為「善」也可能是多元的概念。以此觀之，穆爾認為善是單純的（simple）概念因而無法定義，¹³也許不正確。

其次，我要討論「滿足某種狀態」，比如擁有上億的金錢，是否就等於「快樂」？關於這個問題，正向心理學的研究成果，提供了豐富的思考空間。塞利格曼設想一種「快樂機器」，使用它能夠讓人得到快樂。他接著問受訪者，如果有這樣的機器，願不願意買一台來用？結果受訪者表示寧可不要這樣的機器。塞利格曼舉例說，許多億萬富豪雖然擁有金錢，卻仍然心靈空虛不快樂。因此他結論說：「正向的感覺是來自長處與美德，自己賺來的才是真正值得的快樂。」¹⁴

¹² Martin E. P. Seligman 著，洪蘭譯，《真實的快樂》，二版（臺北：遠流出版社，2009年），頁 48。

¹³ G. E. Moore, *op. cit.*, p.59.

¹⁴ Martin E. P. Seligman 著，洪蘭譯，前引書，頁 39。

關於這點，鮑姆嘉納及克羅瑟斯區分「客觀測量」與「主觀測量」，並引用迪勒（Diener）的論述，說明主觀幸福安樂（subjective well-being），是衡量幸福不可或缺的元素。他們認為，傳統上企圖用來衡量幸福的許多客觀生活的統計指數，比如年收入、失業率、平均壽命、罹患重大疾病人數、離婚率，只是描述某些「事實」，並沒有說明人們對這些事實的「感覺」。¹⁵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得知，正向心理學證明個人對某些客觀生活狀態的主觀感受，是衡量幸福人生不可或缺的元素。這種主觀感受，事實上就是情緒主義所謂的主觀評價。史蒂文生（Charles L. Stevenson）針對具有命令意涵與倫理意涵的語句，提出所謂的「運作模式」（“working models”）如下：¹⁶

(1) 「這是錯的」意指「我不贊同這；你也跟我如是做吧。」

（“This is wrong.” means *I disapprove of this, do so as well.*）

(2) 「他應該做這」意指「我不贊成他沒做這；你也跟我如是做吧。」

（“He ought to do this.” means *I disapprove of his leaving this undone, do so as well.*）

(3) 「這是善的」意指「我贊同這，你也跟我如是做吧。」

（“This is good.” means *I approve of this, do so as well.*）

我認為，儘管史蒂文生討論的議題是關於善的意義，而正向心理學討論的是關於幸福的衡量，但兩者的探究有其共同點，那就是，關於善與幸福的意義，都含有「主觀的評價」這個重要的成分在內。所謂客觀的生活條件，不等於或不一定能推論出主觀的幸福感，也印證了穆爾所指出的「實然」與「應然」在概念上的不等同。我們可以說，所謂的幸福感，是個人對於某些生活條件的「後設評價」（meta evaluation）。長壽的幸

¹⁵ Steve R. Baumgardner and Marie K. Crothers 著，李政賢譯，前引書，頁 28-30。正向心理學雖然強調「主觀測量」的不可或缺，並沒有否定「客觀測量」的重要性。

¹⁶ Charles L. Stevenson, *Ethics and Langu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5), p.21.

福感，是個人對「長壽」的後設肯定；「美食」也是對食用某種食物的後設肯定。因此，本篇論文都將採取這種後設評價的角度來詮釋快樂與幸福，並簡化將快樂與幸福視為可以等同代換的概念。

接著，我要分析正向心理學關於「什麼是幸福人生？」以及「得到快樂感覺的要件有哪些？」這兩個問題的探究。在分析之前，要先說明的是，正向心理學雖然區分客觀生活狀態與主觀感覺的不同，然而，在一般的論述中，通常將「快樂」與「幸福」聯用，或將二者等同代換。我支持這樣的用法。因此，我將把「幸福人生」、「快樂人生」與「美好人生」視為意義等同，可以互換。

前面提到，正向心理學之父塞利格曼主張「正向的感覺是來自長處與美德，自己賺來的才是真正值得的快樂。」他的觀點，普獲正向心理學家的贊同。為了看清塞利格曼這句濃縮後的格言的深義，我借用哈佛大學身兼哲學家與心理學家班夏哈（Ben-Shahar）論四種漢堡模式，作為分析的架構。他假設有「四種類型的漢堡，分別代表某個獨特的生活型態，描繪了不同的人生態度和行為模式。」¹⁷

第一種漢堡叫垃圾漢堡，食用者是享樂主義型的人。第二種漢堡叫素食漢堡，食用者是拼命三郎型的人。第三種漢堡叫低級漢堡，食用者是虛無主義型的人。第四種漢堡叫理想漢堡，食用者是快樂開朗型的人。享樂主義型的人，吃的是美味卻有損健康的漢堡；他們好逸惡勞，短視近利，不顧後果，因此往往先得其利，後蒙其害。拼命三郎型的人，吃的是有益健康卻乏味的漢堡，他們擅於為長遠的目標打算，寧願為將來的健康，而犧牲眼前的享受。虛無主義型的人，吃的是既乏味又有損將來健康的漢堡，這是四種漢堡當中最糟的一種；他們無法從眼前的食物中得到樂趣，也無法從未來的目標得到滿足。快樂開朗型的人，吃得

¹⁷ Tal Ben-Shahar 著，譚家瑜譯，《更快樂：哈佛大學最受歡迎的一堂課》，二版（臺北：天下雜誌，2012年），頁 45。

是既美味又健康的漢堡，既能享受當下食物的樂趣，也能符合未來健康的目標。¹⁸

讀者可能會認為班夏哈將素食歸類為乏味的食品，是一種偏見。我猜，班夏哈應該是葷食的熱烈擁護者。從四種漢堡類型，我們可以歸納正向心理學所主張的幸福人生的要件，包括設定目標、肯定目標的意義，努力實踐去達成目標，而在追求的過程與結果當中，享受樂趣。鮑姆嘉納及克羅瑟斯說：「幸福快樂乃是基於努力自我實現而產生的。在自我實現的過程當中，個人在生活當中，會努力發揮自己的才能，並且尋求滿足自己重視的需求與價值觀。幸福／快樂的古希臘字『eudaimonia』就是由『eu』（美好）與『daimon』（真實自我）兩個字根組合而成；換言之，實現真實自我就能夠完成美好的人生。」¹⁹班夏哈說，為了探索快樂，他除了接受心理學的訓練，也努力研讀哲學書籍。²⁰我認為此說甚為有理，因為哲學擅長人生意義的探索，而心理學擅長實證科學的檢證。

班夏哈在書中第二章題為「兼顧現在與未來」，對四種漢堡類型的前面三種提出批評。他說：「拼命三郎、享樂主義、虛無主義者都犯了一個謬誤，對於現實情況和快樂真諦，以及享受幸福人生的重要條件都有錯誤的解讀。拼命三郎犯了『目標的謬誤』，以為達到某個重要的目標就能保持快樂。享樂主義者犯了『短視的謬誤』，以為天天及時行樂，罔顧未來目標，就能長期享有快樂。虛無主義者的謬誤是錯估現實，以為一個人無論怎麼做都得不到快樂，因為他們不了解『追求目標』和『及時行樂』這兩件事可以並行不悖，也是讓人逃出痛苦牢籠的第三種選擇。」²¹

¹⁸ 同上，頁 45-47。

¹⁹ Steve R. Baumgardner and Marie K. Crothers 著，李政賢譯，前引書，頁 34。

²⁰ Tal Ben-Shahar 著，譚家瑜譯，前引書，頁 34。

²¹ 同上，頁 59-60。

我十分贊同正向心理學所主張的兼顧現在與未來的快樂。我還認為，這個觀點可以印證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論的許多觀點。我們可以設想，一個支持永續發展論者 A 在做 X 行為時，如果他能夠同時因為 X 所具有的永續效益而讓他享受最終的快樂，又能夠從自我覺察的永續行動裡讓他「樂在其中」的話，將會符合班夏哈最贊成的第四種漢堡類型的人；而那種快樂，才是真實的快樂與幸福人生。

關於美好的人生來自真實的自我實現這點，我認為有必要加以分析，以免誤導。按照前述，正向心理學既然指出主觀評價以及自己去設定目標的重要性，那麼，所謂的「自我實現」就不宜被詮釋為一種內在且既定的人生目標之達成。我認為，與其去論述潛能或基因，倒不如說亞理斯多德的幸福論、儒家的立己達人論、永續發展論，這些偉大的思想，為我們在尋找工作意義與設定人生目標的時候，提供了多元豐富又營養的可能菜單。換言之，幸福人生終究是透過個人的主觀偏好去選擇某種菜單，然後深信不疑地去品味這種菜的樂趣。

除了主觀選擇菜單以外，正向心理學還強調「努力以赴」的重要性。班夏哈提到一個有趣的心理學實驗，受試者是一些大學生。主持實驗的人會付錢給這些大學生，但要求他們閒閒沒事幹。經過四到八小時之後，所有的受試者都感到悶悶不樂，他們寧願自己花力氣去賺錢，即使薪水比這個實驗還低，也不願意繼續做這個實驗的懶惰工作。²²我認為，這就是塞利格曼前述所謂「自己賺來的才是真正值得的快樂」。

我們或許會問，強調幸福人生的主觀評價之正向心理學，會不會助長利己而忽視利他？研究顯示，努力以赴去幫助他人，比自己吃巧克力更具有「滿足感」。²³因此，塞利格曼強調發揮個人長處與美德的重要性。²⁴

²² 同上，頁 55-56。

²³ Martin E. P. Seligman 著，洪蘭譯，前引書，頁 40-41。

²⁴ 同上，頁 41。

四、成立國家公園的意義及其難題

美國的黃石國家公園，成立於 1872 年，是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園。²⁵回顧美國歷史的一些重要事件，有助於我們理解成立黃石國家公園的歷史背景。

儘管維京人、西班牙人與法國人，都比英國人更早來到美國；然而，真正大量湧入美國的移民，仍以英國人為主，時間是十七世紀初，地點是美國東北部的新英格蘭地區。²⁶1775 年，北美殖民地與英國爆發戰爭。1776 年，大陸會議發表獨立宣言，正式展開脫離英國統治的獨立戰爭。²⁷經過幾年的交戰，英國在 1783 年宣布敗戰，美國贏得勝利，展開獨立建國的第一步。²⁸

雖然贏得關鍵的一役，但在 1803 年以前，美國的領土事實上局限在密西西比河以東的十三州。1803 年，美國向法國購買路易斯安納廣大的土地以後，美國領土才跨越密西西比河，涵蓋了美國的中部地區。接著，在 1818 年到 1853 年間，透過巧取豪奪，美國又從英國、西班牙和墨西哥手中，取得直達太平洋的大片土地。²⁹至於阿拉斯加的土地，則是美國在 1867 年向俄國購買的。³⁰

歐洲移民自從來到美國，與原住民印地安人狹路相逢以後，印地安人由於缺乏合縱連橫的組織，武器落後，再加上無法抵抗歐洲人帶來的傳染疾病，導致印地安人節節敗退。³¹到了十九世紀末，美國白人的勢力已遍及整個美國，而傳統上所謂最後的邊境（the last frontier）已不復

²⁵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National Geographic Guide to the National Parks of the United States*, 6th edit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2009), p.354.

²⁶ James Miller and John Thompson, *National Geographic Almanac of American Histor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2006), p.20.

²⁷ *Ibid.*, pp.104-109.

²⁸ *Ibid.*, pp.110-115.

²⁹ *Ibid.*, pp.118-119, 143.

³⁰ *Ibid.*, pp.176-179.

³¹ *Ibid.*, pp.20, 180-185.

存在。³²隨著白人西進拓荒與印地安人敗退之際，印地安人獵捕野牛的荒野景象，逐漸被白人的農礦各業的土地開發所取代。³³

在十七世紀，大部分的美國移民對於未開墾的西部，懷著與現實西部不太相符的浪漫想像。對於居住在新英格蘭文明地區的美國移民來說，蠻荒西部可能是展開新的人生的夢想之地，或是避難所。³⁴這是主流白人對西部的浪漫想像，但還有一些非主流的浪漫想像，卻是緬懷逐漸凋零的印地安人與荒野。

有「國家公園之父」美譽的繆爾（John Muir）曾說，現今有個讓人樂見的趨勢，那就是去荒野漫遊。成千疲倦的、神經錯亂的、過度文明的人們正開始發現，上山就是回家；荒野是必需品；山間公園與保留區是有用的，不只可以作為木材的泉源，而且是生命的泉源。³⁵對荒野的浪漫情懷，我們也可以從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54 年出版的《湖濱散記》嗅出氣息。儘管身在麻塞諸塞州這個文明的地區，梭羅居住的瓦登湖（Walden Pond）湖畔，仍然有種荒野的氣氛，因為最近的鄰居都遠在一英哩之外。³⁶

納許（Roderick Frazier Nash）在《荒野與美國人的心靈》一書說，荒野是美國文化的基本成分。³⁷邁可路易斯（Michael Lewis）描述荒野的景象：在這些地區走上好幾天，都不會遇到任何人或人為的建築物。而這些荒野，大多由國家公園來管理。³⁸美國人對荒野的熱愛表現在，開著休旅車，穿越數百英哩，不惜耗費每十五英哩一加侖的汽油，也要

³² Ibid., pp.186-189.

³³ Alan Brinkley, *American History: A Survey*, 13th edition, Vol. II (New York: McGraw-Hill, 2009), pp.440-447.

³⁴ Ibid, p.453.

³⁵ John Muir, *Nature Writings* (New York: The Library of America, 1997), p.721.

³⁶ Henry David Thoreau, *Walden*, edited by Jeffrey Cram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1854]), p.1.

³⁷ Roderick Frasier Nas, *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4th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xi.

³⁸ Michael Lewis (ed.), *American Wilderness: A New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

去拜訪國家公園。³⁹ 路易斯評論，說「美國人喜歡荒野」是個過於簡單的說法，因為遊客開車蜂擁而入，有可能嚴重傷害荒野。⁴⁰

事實上，有此憂心的不只路易斯一人。被尊稱為「土地倫理之父」的李奧帕德（Aldo Leopold），在《沙郡年記》一書裡，老早就表達深切的擔憂。他對荒野的擔憂有兩個側面，一個是感慨荒野的快速縮減，⁴¹ 另一個是感慨觀光道路不斷地延伸，降低荒野的品質。⁴² 李奧帕德認為，開車去荒野休閒旅遊，破壞了荒野中的孤獨感；而對某些人來說，孤獨感是荒野所具有的稀世價值。⁴³

1869年5月10日，美國兩家鐵路公司，中央太平洋公司與聯合太平洋公司，聯手將美國鐵路從舊金山貫穿到紐約。⁴⁴ 當黃石國家公園於1872年成立時，橫貫鐵路已經為前來拜訪的遊客，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

1870年，一支為數19人的探險隊來到黃石公園，目睹不可思議的間歇泉與瀑布。大多數的探險隊員認為，這些風景必定可以吸引眾多遊客前來拜訪，極富商機。事實上，另一家鐵路公司西北太平洋公司，曾試圖爭取黃石公園旅遊的經營權。⁴⁵ 西北太平洋公司，繼中央太平洋公司與聯合太平洋公司之後，建造第二條東西橫貫鐵路，很快就使得黃石公園更容易到達。⁴⁶ 當時，赫吉士（Cornelius Hedges）力排眾議，擔心私人經營會降低旅遊品質，主張黃石公園應該由國家來管理。⁴⁷

³⁹ Ibid., p.4.

⁴⁰ Ibid.

⁴¹ 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1949]), p.188.

⁴² Ibid., pp.165-166.

⁴³ Ibid., pp.171-172.

⁴⁴ James Miller and John Thompson, *op. cit.*, pp.176-177.

⁴⁵ Roderick Frasier Nash, *op. cit.*, pp.109-111.

⁴⁶ James Miller and John Thompson, *op. cit.*, p.178.

⁴⁷ Roderick Frasier Nash, *op. cit.*, pp.109-110.

歷史證據顯示，當黃石公園於 1872 年成爲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園的時候，儘管也將野生動植物的保育納入考慮；然而，「全民共享旅遊」仍然是其最優先的考慮。⁴⁸邁爾斯（Miles）認爲，在美國這樣一個個人主義盛行的社會裡，基於公共福祉（common good）的理由，而將私人利益排除在外，顯示國家公園的設立，背後有一股理想主義的衝動。⁴⁹我認爲，考慮公共福祉，定位在全民共享，這些想法都十分符合效益主義的主張。

當黃石國家公園於 1872 年成立時，關於經營理念究竟應以人類的休閒遊憩爲第一優先考量？還是以動植物的保育爲主？這個問題，長久以來一直爭論不休。「遊樂場或樂園」（playground or paradise）的爭論，十分鮮明地反映兩者之間的衝突。⁵⁰到了 1916 年，美國的國家公園管理法出爐，標示了管理的方向：「在此區域內，保存風景、自然與歷史事物、以及野生生物，並以這樣的方式，使其不致遭受破壞，而提供享樂給當代及未來世代。」⁵¹

就今日的眼光來看，1916 年美國的國家公園管理法，由於兼顧動植物的生態保育，以及人類的休閒遊憩，使得國家公園的成立，不但符合效益主義，同時也符合永續發展的目標。繆爾認爲，黃石國家公園這個奇境，每年夏天吸引數以千計的遊客前來觀賞奇景。整個荒野因爲有快樂的動物生存其中，而朝氣蓬勃。⁵²李奧帕德的土地倫理觀，就是要將人類的倫理關懷，擴展到動植物和土地之上。⁵³由於國家公園顧及動

⁴⁸ John C. Miles, *Wilderness in the National Parks: Playground or Preserv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9), pp.3-4.

⁴⁹ *Ibid.*, p.4.

⁵⁰ *Ibid.*, pp.3-4。這個歷史上的用語，更準確來說應是「人類的遊樂場或動植物的樂園」。

⁵¹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Organic Act, URL = <http://www.nps.gov/parkmgmt/organic-act-of-1916.htm>. (2011/9/1 瀏覽)。

⁵² John Muir, *op. cit.*, pp.744-745.

⁵³ Aldo Leopold, *op. cit.*, pp.202-204.

植物、生態平衡與後代子孫，使它也符合永續發展的目標，以及企業倫理「三重基線」(triple bottom line)的要求。⁵⁴

現今許多國家在國家公園的規劃上與管理上，都模仿美國的想法與做法，企圖兼顧生態保育與休閒遊憩。我國的國家公園法在第一條立法宗旨上明訂：「為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野生物及史蹟，並供國民之育樂及研究，特制定本法。」⁵⁵關於生態保育與休閒遊憩之間的衝突難題，國家公園法則透過「分區管理」的方式，劃分「一般管制區」、「遊憩區」、「史蹟保存區」、「特別景觀區」、以及「生態保護區」，以收兩全其美之效。⁵⁶

我認為，分區管理方式，標示出國家公園區域內五種不同的類型，不但為生態保育與休閒遊憩兩難問題，提供一個可行的兼顧之道；同時，這五種類型也照亮了國家公園的意義與價值。

前面提到，正向心理學強調「設定目標」與「肯定目標的價值」，是尋找人生意義的具體實踐方式；而努力以赴去達成這些目標，則是得到快樂的途徑。因此，我認為，點出國家公園的意義與價值，可以照亮國家公園與幸福人生的關聯。底下我將借用美國生態學家凱勒(Kellert)論九種自然的意義與價值的模式，對比出上述五種國家公園區域的意義與價值。

凱勒歸納人類看待自然的意義與價值，總共有九種觀點。第一種是「實用的」觀點，把自然看成是取得實質利益的對象。獵殺動物與採摘植物，都是這種價值觀下的行動產物。第二種是「休閒遊憩的」觀點，到山間或海邊郊遊旅行，都是基於這種觀點而採取的行動。第三種是「生

⁵⁴ 關於永續發展，參見李永展，《永續發展：大地反撲的省思》，二版（臺北：巨流，2003年），頁3-33。關於三重基線，參見 Marc J. Epstein, *Making Sustainability Work: Best Practices in Managing and Measuring Corporate Social,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Impacts* (Sheffield: Greenleaf Publishing Limited, 2008), p.2.

⁵⁵ 國家公園法，2010年12月8日修訂，URL=<http://glin.ly.gov.tw/web/redirect/redirect.do?method=fullText&html=http://lis.ly.gov.tw/lghtml/lawstat/version2/01117/0111799111200.htm>。（2012/2/11 瀏覽）

⁵⁶ 參見國家公園法第十二條。另一種兼顧的模式是所謂「生物圈保留區」模式，將待保育的動植物劃在同心圓的最內層，其外圍的一層是緩衝區，最外層是過渡區，亦即遊憩區。參見楊秋霖，《台灣的生態旅遊》（臺北縣：遠足文化，2007年），頁112。

態學或科學研究的」觀點，以生態系統或科學研究的視野去看自然。第四種是「美學的」觀點，以審美的角度去欣賞動植物或自然景觀。第五種是「象徵的」觀點，藉由具體的自然事物去比喻抽象的概念。第六種是「支配的」觀點，把自然看成是等待人類去征服的對象。第七種是「養寵物的」觀點，認為透過馴化野生動物而把牠們當成寵物，間接有助於激發善待他人的愛心。第八種是「演化同源的」觀點，從演化論的角度去看人類與其他動物在演化上的親密關係。第九種是「否定的」觀點，把自然都想像成可怕的事物，像狼、蛇、狂風與死水；由於對這些可怕事物的負面評價，導致人類對自然生出敬畏之情。⁵⁷

儘管凱勒這九種人類看待自然的價值觀的分類與標題名稱，都可以稍加修飾而使其更加理想，但我認為瑕不掩瑜。凱勒的歸納，仍然頗有助於我們思考問題。其中，「實用的」觀點是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以及「經濟自利的」觀點，向來飽受生態學家與環保人士的批評。「支配的」觀點是一種「君臨天下的」觀點，向來不受反威權人士的歡迎。「否定的」觀點是一種對自然抱持「敬而遠之的」觀點，凱勒分析其弊病是可能衍生出對某些可怕動物的非理性撲殺，但也有「生出敬畏之情」的正面功效。⁵⁸

對照國家公園的五種區域類型，我們更清楚看出，「遊憩區」與「特別景觀區」都可以對應到「休閒遊憩的」與「美學的」價值觀；「史蹟保存區」也可以對應到「休閒遊憩的」價值觀；「生態保護區」基本上可以對應到「生態學或科學研究的」價值觀，但也可以聯結到「演化同源的」觀點。

在概觀國家公園之後，接著我將聚焦在陽明山國家公園與台江國家公園。我將分析二者的共同點及其差異，並探討這兩個國家公園的成立，跟幸福人生的關聯。

⁵⁷ Stephen R. Kellert 著，薛綉譯，《生命的價值：生物多樣性和人類社會關係》（臺北：正中，1998年），頁 10-29。我將這九種價值觀的標題略加修飾，使它更貼近凱勒的論述。

⁵⁸ 同上，頁 27-29。

五、陽明山國家公園與台江國家公園

在臺灣本島的六個國家公園當中，陽明山國家公園以及台江國家公園，或者包括墾丁國家公園，相對地都比玉山國家公園、太魯閣國家公園及雪霸國家公園，受到較長久及較多人為的開發。我認為，這主要是受到地形的影響。⁵⁹

臺灣共有五大山脈：中央山脈、雪山山脈、玉山山脈、阿里山山脈、以及海岸山脈，山地面積佔全島的三分之二以上。⁶⁰高聳的中央山脈加上雪山山脈，從東北角的貢寮一直延伸到最南端的墾丁，就足以將臺灣的西部與東部阻隔殆盡，難以跨越。⁶¹玉山國家公園，面積 105,490 公頃，包含海拔 3,952 公尺全臺第一高峰的玉山在內，海拔超過 3,000 公尺的山共有 30 座。⁶²太魯閣國家公園，面積 92,000 公頃，海拔超過 3,000 公尺的山共有 27 座。⁶³雪霸國家公園，面積 76,850 公頃，包含海拔 3,886 公尺全臺第二高峰的雪山在內，海拔超過 3,000 公尺的山共有 51 座。⁶⁴

1697 年，康熙 36 年，浙江旅遊探險達人郁永河從福建廈門渡海，經由金門、澎湖，到達臺南的鹿耳門港。⁶⁵接著，他描述說先到安平城，再橫渡台江抵達赤崁城。⁶⁶他此行的目的，是奉命要到陽明山採硫磺。⁶⁷當時，距離清廷降伏明鄭最後餘朝勢力，已經 14 年。安平與赤崁二城，曾經是荷據時期與明鄭時期的首都，加上廣大腹地的嘉南平原的地理因

⁵⁹ 關於地形與生態系統，參見徐美玲，《台灣的地形》（臺北縣：遠足文化，2008 年）及李培芬，《台灣的生態系》（臺北縣：遠足文化，2008 年）。關於國家公園的地形與海拔高度，參見內政部營建署，《生態寶庫：臺灣國家公園的生物多樣性》（臺北：營建署，2010）。

⁶⁰ 徐美玲，前引書，頁 59。

⁶¹ 同上，參見全島山脈地形圖，頁 88-89。

⁶² 游登良，《國家公園與世界遺產》（臺北：華立圖書，2010 年）頁 405-406。

⁶³ 同上，頁 409-414。

⁶⁴ 徐朝聰總編輯，《雪霸國家公園》（臺中：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1996 年），頁 4-16。

⁶⁵ 郁永河原著，楊蘇之譯注，《遇見三百年前的臺灣：裨海紀遊》（臺北：圓神，2004 年），頁 182--190。

⁶⁶ 同上，頁 190。

⁶⁷ 同上，頁 182-183。

素，使得臺南府城素有「一府」之美譽。郁永河所見之府城，一片繁華富庶之景象。⁶⁸

相反的，當郁永河由陸路北上陽明山，沿路所見大部分都是荒蕪之地。他描述「自竹塹迄南崁八九十里，不見一人一屋」。⁶⁹這番景象，對照今日新竹與桃園的熱鬧情形，⁷⁰確實有天壤之別，不可同日而語。

由於 1694 年的地震，導致臺北盆地地層下陷，海水倒灌，史稱「康熙臺北湖」。⁷¹郁永河從關渡划著船進入陽明山，他的朋友張大幫他在湖邊搭建二十間茅草屋。郁永河跟原住民凱達格蘭人達成協議，由凱達格蘭人幫他採硫磺，每筐硫磺跟他換七尺布。⁷²

陽明山在郁永河的描繪下，是個「人跡無幾，瘴癘所積」之地。⁷³根據尹章義的考證，臺北盆地在郁永河抵達時，還沒有漢人來此移墾。但是到了乾隆初年，整個臺北平原已完全被漢人開發。⁷⁴光緒元年十二月，1876 年 1 月，清廷增設臺北府，轄大甲溪以北包括宜蘭在內的區域，大甲溪以南則為臺灣府所轄，從此「北台灣自成一個行政體系，與南台灣分庭抗禮」。⁷⁵儘管在此時，臺北府有「臺北」之名，但初期的臺北府之行政中心卻在竹塹，而非臺北。⁷⁶光緒十一年，1885 年，臺灣建省，首任巡撫為劉銘傳。⁷⁷建省之初，省會仍然不在臺北。直到光緒二十年，

⁶⁸ 同上，頁 222-223。

⁶⁹ 同上，頁 212。

⁷⁰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 2010 年底的統計資料，桃園縣的人口有 2,002,060 人，新竹縣的人口有 513,015 人。
URL=<http://www.ris.gov.tw/professional> (2012/02/03 瀏覽)。

⁷¹ 郁永河原著，楊蘇之譯注，前引書，頁 113-114。

⁷² 同上，頁 213-214。

⁷³ 同上，頁 216。

⁷⁴ 尹章義，《臺灣開發史研究》（臺北：聯經，1989 年），頁 10。

⁷⁵ 參見施雅軒，《台灣的行政區變遷》（臺北縣：遠足文化，2003 年），頁 77-80。

⁷⁶ 參見尹章義，前引書，頁 410-411。

⁷⁷ 參見劉耿生編著，《清德宗光緒事典》（臺北：遠流出版社，2005 年），頁 169。

依臺灣巡撫邵友濂之議，臺灣省省會才設在臺北，「從此確立臺北的首府地位。」⁷⁸

由於臺北與臺南開發的歷史長遠，再加上地勢相對平坦，使得陽明山國家公園與台江國家公園園區內的土地，幾乎被開發殆盡，甚少荒地。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最高山七星山，海拔只有 1,120 公尺。台江國家公園園區位於嘉南平原上，沒有任何山脈，地勢更為平坦。儘管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夢幻湖生態保護區裡的臺灣水韭，號稱國寶級植物；⁷⁹而台江國家公園則宣稱黑面琵鷺生態保護區，具有「國際級的」重要性；⁸⁰但我認為，除此二者以外，陽明山國家公園與台江國家公園，在生態保護上的重要性並不突出，遠遠不如玉山國家公園、太魯閣國家公園與雪霸國家公園。

事實上，陽明山國家公園素有「臺北的後花園」之美譽，休閒遊憩應該是它最主要的特色。根據陽明山國家公園網站資訊，遊憩據點包括遊客中心、陽明書屋、小油坑、二子坪、大屯自然公園、冷水坑、擎天崗及龍鳳谷等處。⁸¹事實上，每年春天的花季與海芋季，以及四季皆宜、據點眾多的民營溫泉，更吸引成千上萬的遊客蜂擁而入。曾華壁說：「每年有超過一千萬以上的人次，親臨陽明山國家公園，而且一天幾近二十四小時，都有不同人群和不同性質的活動在進行，因此其『可及性』及『可親性』是世界國家公園所少有者。」⁸²如果我們以所謂的「大臺北」，亦即包括臺北市、新北市、以及基隆市在內，總共接近七百萬的人口來

⁷⁸ 尹章義，前引書，頁 438。另參見連雅堂，《臺灣通史》，上冊（臺北：黎明文化，2001[1921]年），頁 139。

⁷⁹ 黃淑芳、楊國禎，《夢幻湖傳奇：台灣水韭的一生》（臺北：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1991年），頁 21-22。

⁸⁰ 參見內政部，《台江國家公園計畫》，URL = http://www.tjnp.gov.tw/chinese/filesys/file/01_chinese/openinfo/0_0_b21a753bb2605cc47ef084512b0d643e.pdf（2011/08/27 瀏覽），頁 1-4。

⁸¹ URL = http://www.ymsnp.gov.tw/nweb/index.php?option=com_tourmap&view=tourmap&id=1&gp=0&Itemid=122。（2012/03/28 瀏覽）

⁸² 曾華壁，《戰後臺灣環境史：從毒油到國家公園》（臺北：五南出版社，2011年），頁 75。

看的話，⁸³那麼我們就可以理解陽明山國家公園在「休閒遊憩」及「美學」上的重要意義。按照前述，這些重要的人生意義，也是幸福人生的可能來源。

相形之下，台江國家公園雖然也有「六孔碼頭」與「南灣碼頭」兩個遊憩區，⁸⁴然而，由於交通不便，腹地人口不多，消費能力較低，休閒型態較不多元等因素，使它的人潮遠不及陽明山國家公園。

台江國家公園的成立過程，有一點跟陽明山國家公園差異頗大，那就是，陽明山國家公園完全由政府所規劃，而台江國家公園卻非如此。曾華璧以「國家強力主導」與「多元複合勢力主導」這兩個不同的環境治理模式，對照出其間的差異。⁸⁵由國家所強力主導的國家公園，可能會忽略在地居民的權益。⁸⁶

1993 年，東帝士集團申請在七股建七輕廠，燁隆集團則打算在七股設煉鋼廠。⁸⁷在政黨輪替、地方首長變動、環保人士、以及立場相異的民意代表與在地居民的多元角力下，這兩個設廠案終歸失敗。⁸⁸取而代之的是台江國家公園的成立。

台江國家公園列出其五大核心價值，分別是「歷史」：先民移墾歷史場域、「自然」：多樣生態資源之濕地、「產業」：漁、鹽產業襲產、「共生」：與「地方」共生發展、以及「國土」：國土美學之發展使命。由於與地方共生，它宣稱台江國家公園是第一座「由下而上」而成立的國家公園。⁸⁹

我認為，台江國家公園這樣自豪的宣稱，從某個角度來看，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它照顧到七股地區漁民、鹽民與農民永續經營其傳統產

⁸³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 2010 年底的統計資料，前引資料，臺北市的人口 2,618,772 人，新北市的人口 3,897,367 人，基隆市人口 384,134 人，合計 6,900,273 人。

⁸⁴ 參見林玲總編輯，〈台江全區地圖〉，《台江國家公園》（臺北：營建署，2009 年），頁 9。

⁸⁵ 曾華璧，前引書，頁 230-241。

⁸⁶ 同上，頁 204-206。

⁸⁷ 同上，頁 136。

⁸⁸ 同上，頁 135-156。

⁸⁹ 參見內政部，〈台江國家公園計畫〉，前引資料，頁 1-10。

業。⁹⁰如果我們把它詮釋成「尊重在地居民的利益與感受」的話，我也認為不但說得通，而且值得肯定與讚美。回顧「蘭嶼國家公園」及「馬告國家公園」這兩個由中央政府所主導的國家公園計畫案，都因在地居民的強烈反對而告終，⁹¹我們更可以理解台江國家公園自豪的歷史背景。

然而，當我們換個角度來看，假設當初大多數的七股居民基於就業生計考量，而支持七輕案與煉鋼案的話，那麼「局外人」，包括絕大多數非當地居民的環保人士在內，是否有充分的道德理由，去認為自己的環保價值觀，可以凌駕於在地居民的就業生計價值觀之上？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棘手的道德難題。曾旭正在《台灣的社區營造》一書裡分析，所謂的「社區」並非自然的產物，而是在地居民基於共同需求，而營造出來的一種「社區感」。⁹²雖然凝聚社區居民的共同意識與共同利益，在生態旅遊上有其不可輕忽的重要性；⁹³然而，一旦社區居民的利益互相衝突時，它對生態旅遊的負面影響也相對嚴重。⁹⁴

由國家強勢主導的模式，雖有缺點，但也有優點。國家以政策保護公共財，是國家對國土永續發展的正面貢獻。⁹⁵匹斯特認為，李奧帕德的土地倫理觀，為政治上支持生態保育的健全決定，提供足夠的效益主義的理論基礎。⁹⁶

由國家主導所成立的國家公園，著眼於保護公共財，以永續發展為行動綱領，都顯示其鮮明的效益主義的色彩。那麼，效益主義所經常面臨的分配正義難題，是否註定無法化解？我認為，情況並沒有如此糟糕。有一些成功的案例，為效益主義的困境，提供了可能的化解之道。

⁹⁰ 參見曾華璧，前引書，頁 147-148。

⁹¹ 游登良主編，《臺灣國家公園史：1900-2000》（臺北：內政部營建署，2002 年），頁 131-132 及 214-216。

⁹² 曾旭正，《台灣的社區營造》（臺北縣：遠足文化，2007 年），頁 14-15。

⁹³ 參見楊秋霖，前引書，頁 181。

⁹⁴ 同上，頁 14-15，作者以阿里山為例，說明社區居民如果利益相衝突，朋友可能反目成仇。

⁹⁵ 參見曾華璧，前引書，頁 206-211。

⁹⁶ Erwin P. Pister, "A Pilgrim's Progress from Group A to Group B," in J. Baird Callicott (ed.), *Companion to A Sand County Almanac*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 pp.221-232.

嘉義縣東石鄉四股社區與鰲鼓濕地，在台糖沒落以後，許多居民以養殖漁業為生。由於生活艱困，人口不斷外移。農委會林務局在當地居民的支持下，展開大規模的造林計畫，其中部分地區規劃為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部分地區則為鰲鼓平地森林遊樂區，不但可以提供野生動物的棲息，又可以滿足人類觀光與休閒遊憩，是個國家與在地雙贏頗為成功的典範。⁹⁷由於在地居民的支持與積極參與，符合正向心理學「主觀評價」與「努力以赴實踐利他美德」的原則，因此不但不會損及在地居民的快樂幸福，同時能夠將此快樂幸福，與全民、後代子孫與動植物共享。

六、結論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了解，成立國家公園有其重要的意義與價值。藉由正向心理學的探究與啟發，我們知道設定目標、肯定目標的意義與價值，努力以赴去達成目標，兼顧現在與未來長遠的快樂，並實踐利他美德，才是真實的快樂幸福。

我們可以這麼說：個人若是肯定國家公園的意義，並在拜訪國家公園時，不但能夠樂在其中，同時又能理解國家公園在促進永續發展上的價值的話，將有助於理解並感受國家公園與幸福人生之關聯。

藉由效益主義的道德思考，我認為有助於說明，國家公園為全民、後代子孫與動植物，都可能帶來快樂幸福的感受。從陽明山國家公園與台江國家公園的實例中，我們不但可以檢驗這種幸福感，同時又能夠思考其難題的可能化解之道。

⁹⁷ 參見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魅力台灣樂活誌》（DVD），第 13 集（臺北市：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2010 年）。

參考書目

- 尹章義，1989，《臺灣開發史研究》，臺北：聯經。
- 內政部，《台江國家公園計畫》，http://www.tjnp.gov.tw/chinese/filesys/file/01_chinese/openinfo/0/0_b21a753bb2605cc47ef084512b0d643e.pdf。
(2011/08/27 瀏覽)
- 內政部戶政司，2010 年底臺灣各縣市人口數，
<http://www.ris.gov.tw/professional>。(2012/02/03 瀏覽)
- 內政部營建署，2010，《生態寶庫：臺灣國家公園的生物多樣性》，臺北：營建署。
- 李永展，2003，《永續發展：大地反撲的省思》，二版，臺北：巨流。
- 李培芬，2008，《台灣的生態系》，臺北縣：遠足文化。
- 林玲總編輯，2009，《台江國家公園》，臺北：內政部營建署。
- 施雅軒，2003，《台灣的行政區變遷》，臺北縣：遠足文化。
- 郁永河原著，楊蘇之譯注，2004，《遇見三百年前的臺灣：裨海紀遊》，臺北：圓神出版社。
- 徐美玲，2008，《台灣的地形》，臺北縣：遠足文化。
- 徐朝聰總編輯，1996，《雪霸國家公園》，臺中縣東勢鎮：內政部營建署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 國家公園法，URL = <http://glin.ly.gov.tw/web/redirect/redirect.do?method=fullText&http://lis.ly.gov.tw/lghhtml/lawstat/cersion2/01117/0111799111200.htm>。(2012/02/11 瀏覽)
- 曾旭正，2007，《台灣的社區營造》，臺北縣：遠足文化。
- 曾華璧，2011，《戰後臺灣環境史：從毒油到國家公園》，臺北：五南出版社。
- 游登良，2010，《國家公園與世界遺產》，臺北縣土城市：華立圖書。
- 游登良主編，2002，《臺灣國家公園史：1900-2000》，臺北：內政部營建署。

- 陽明山國家公園遊憩據點，URL = http://www.ymsnp.gov.tw/nweb/index.php?option=com_tourmap&view=tourmap&id=1&gp=0&Itemid=122。(2012/03/28 瀏覽)
- 黃淑芳、楊國禎，1991，《夢幻湖傳奇：台灣水韭的一生》，臺北：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 楊秋霖，2007，《台灣的生態旅遊》，臺北縣：遠足文化。
- 葉保強，2008，《企業倫理》，二版，臺北：五南出版社。
- 劉耿生編著，2005，《清德宗光緒事典》，臺北：遠流出版社。
- 魏宏晉，2010，《台灣的國家公園》，二版，臺北縣：遠足文化。
- Steve R. Baumgardner and Marie K. Crothers 著，李政賢譯，《正向心理學》，臺北：五南出版社。
- Tal Ben-Shahar 著，譚家瑜譯，2012，《更快樂：哈佛最受歡迎的一堂課》，二版，臺北：天下雜誌。
- Stephen R. Kellert 著，薛綸譯，1998，《生命的價值：生物多樣性和人類社會關係》，臺北：正中出版社。
- Martin E. Seligman 著，洪蘭譯，2009，《真實的快樂》，二版，臺北：遠流出版社。
- Bentham, Jeremy, 1907[1823],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Brinkley, Alan, 2009, *American History: A Survey*, 13th edition, Vol.II, New York: McGraw-Hill.
- Bykvist, Krister, 2010, *Utilitarianism: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London: continuum.
- Epstein, Marc J., 2008, *Making Sustainability Work: Best Practices in Managing and Measuring Corporate Social,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Impacts*, Sheffield: Greenleaf Publishing Limited.
- Leopold, Aldo, 1968 [1949],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wis, Michael (ed.), 2007, *American Wilderness: A New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les, John C., 2009, *Wilderness in the National Parks: Playground or Preserv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Miller, James and John Thompson, 2006, *National Geographic Almanac of American Histor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 Moore, G. E., 1993[1903], *Principia Eth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uir, John, 1997, *Nature Writings*, New York: The Library of America.
- Nash, Roderick Frasier, 2001, *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4th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2009, *National Geographic Guide to the National Parks of the United States*, 6th edit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Organic Act, URL = <http://www.nps.gov/parkmgmt/organic-act-of-1916.htm>. (2011/09/01 瀏覽)
- Pister, Erwin P., “A Pilgrim’s Progress from Group A to Group B,” in J. Baird Callicott (ed.), 1987, *Companion to A Sand County Almanac*,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Stevenson, Charles L., 1945, *Ethics and Langu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horeau, Henry David, 2004 [1854], *Walden*, edited by Jeffrey Cram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National Parks and Happiness of Life: Examples of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and Taijiang National Park

Tsuo-Ming Hsu^{*}

Abstract

There are eight national parks in Taiwan. According to the time of their establishment, these parks are Kenting National Park (1982), Yushan National Park (1985),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1985), Taroko National Park (1986), Shei-pa National Park (1992), Kinmen National Park (1995), Tongsha Atoll National Park (2007), and Taijiang National Park (2009).

Although the two purposes — ecological preservation and tourism —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parks are widely known, paper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national parks and happiness of life are still few. I will discuss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national parks and happiness of life in this paper, by the examples of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and Taijiang National Park. I will take the approach of utilitarianism to reveal the important relation of national parks and happiness of life in the value and meaning on one hand, and try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utilitarianism on the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and Core Curriculum, Tamkang University

other hand. In the discussion of happiness of life, I will use the research effects of positive psychology to illuminate solutions for the problems.

**Keywords: national park,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Taijiang National Park, ecological preservation, tourism,
happiness of life, utilitarianism, positive psychology**

寵物對人類健康所可能帶來的正面影響 ——兼論寵物飼養的道德爭議

李凱恩*

長久以來，動物便是人類最親密的朋友。的確，人類與動物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動物可帶給我們各式各樣的福祉，而我們對待動物的各種舉措（practices）也會對動物福祉產生極大的影響。在人類與動物之間的種種關係中，存在著一種很特別的所謂「寵物關係」——人類把某些特定的動物當成寵物，甚至，時至今日，這種寵物關係仍相當普遍地存在於人類與某些特定動物（特別是狗與貓）之間。若順著「福祉」（well-being）的構思進路，我們或許會問：這些被飼養的寵物對（當代）人類的健康所可能帶來的正面（甚或負面）影響為何？這個問題正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主要重點。無疑地，「健康」是我們人類福祉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在有些情境下，「健康」甚至是其它人類福祉的先決條件或必要條件，故此，這個論題是一個直接關乎人類福祉的問題。於探討此一關乎人類福祉的論題之後，本文將進一步探究寵物飼養的一些道德爭議，特別是：飼養寵物是否為道德所允許的（morally permissible）。

—

無疑地，動物在人類的文化領域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諸如：習俗（customs）、傳說（legends）以及宗教（religions）。原始人類發現，人與動物的關係對於他們的生存而言實具有重要的關聯；其次，在以狩

*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副教授

獵及採集爲主的社會中，寵物飼養也是很稀鬆平常的事。而時至今日，寵物更是被大量的飼養。¹

一般而言，具有小孩的家庭較常飼養寵物，不過，單就美國而言，寵物的數目卻多過小孩的數目；而且，約有 62% 的家庭擁有寵物，這些家庭共擁有超過七千七百萬隻的狗和九千三百萬隻的貓。²在英國也有大約一半的家庭擁有寵物，這些家庭共擁有超過六百萬隻的狗和九百萬隻的貓，而這些寵物大多被視爲家庭成員中的一份子。³反觀台灣，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台灣大學獸醫系費昌勇教授所作的調查報告，2011 年全台灣共有家犬 1,241,910 隻，家貓 302,846 隻。⁴依以上的數據所示，寵物的數量不管是在美國、英國或台灣，不可謂不大。一直以來，我們都相信：寵物可以爲我們提供伴侶關係、支持、娛樂來源。此外，根據最近的相關科學研究發現：牠們也能促進我們的健康。⁵以下分別舉其大項以闡明：寵物如何得以對人類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康與其它面向的健康）帶來正面的影響。

關於「寵物被用於促進人類健康是始於何時？」此一問題實不可考，不過，早在 1919 年美國內政部長 F. K. Lane 便建議華盛頓特區的 St. Elizabeths Hospital 使用狗來幫助其精神病院住院患者。其後，美國 Army Air Corps Convalescent Hospital 也曾於 1944 年至 1945 年大規模使用寵物去幫助那些經歷戰爭而受到心靈創傷的病患。⁶不過，當代對於

¹ “The Health Benefits of Pets,” NIH Technology Assess Statement Online 1987 Sep 10-11. (2011/12/10 瀏覽)

² Allen R. McConnell, Christina M. Brown, Tonya M. Shoda, Laura E. Stayton, and Colleen E. Martin, “Friends with Benefits: On the Positive Consequences of Pet Ownership,”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1(2011): 1239.

³ Jane McNicholas, Andrew Gilbey, Ann Rennie, Sam Ahmedzai, Jo-Ann Dono, and Elizabeth Ormerod, “Pet Ownership and Human Health: A Brief Review of Evidence and Issues,” *BMJ* 331(2005): 1253; and Deborah L. Wells, “The Effects of Animals on Human Health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2009): 523.

⁴ URL= http://animal.coa.gov.tw/html/?main=9h&page=09_resources_a02. (2011/12/10 瀏覽)

⁵ Deborah L. Wells, “The Effects of Animals on Human Health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2009): 523-536.

⁶ “The Health Benefits of Pets,” NIH Technology Assess Statement Online 1987 Sep 10-11. (2011/12/10 瀏覽)

「寵物如何得以對人類健康帶來正面的影響」則具有更清晰、鮮明的圖像。

當代學者 James Serpell 主張，擁有寵物對人類的健康具有正面的影響。⁷以下我們將分析及闡明：寵物對人類健康具有哪方面的正面影響。

首先，心理因素（psychological factors）能夠引發心血管系統（cardiovascular system）的強烈且立即的反應；而寵物能夠忠心的伴隨其主人，故而亦可對其主人之心理穩定度（psychological stability）有所助益。基於以上兩點，我們似乎可以進一步推斷：寵物或許可對其主人之心血管疾病預防有些助益。此一推斷基本上為 Deborah L. Wells 及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所認可。⁸的確，W. P. Anderson 等學者曾於 Melbourne 作了一項臨床研究發現，擁有狗或其它寵物的人，相較於那些沒擁有寵物的人，其心血管疾病危險因子（例如，三酸甘油酯、心臟收縮壓）明顯較低。⁹而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則舉例支持此一推斷如下：經由觀察及測試一群自願參加實驗的大學生發現，當實驗者把不熟識的狗帶到這些大學生面前時，他們的心臟收縮壓（systolic blood pressure）比較容易降低¹⁰；而血壓升（或飆）高比較容易誘發冠狀動脈心臟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故而，「寵物

⁷ James Serpell, "Beneficial Effects of Pet Ownership on Some Aspects of Human Health and Behaviour,"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84(1991): 717, 719. See also Jane McNicholas, Andrew Gilbey, Ann Rennie, Sam Ahmedzai, Jo-Ann Dono, and Elizabeth Ormerod, "Pet Ownership and Human Health: A Brief Review of Evidence and Issues," *BMJ* 331(2005): 1252.

⁸ See Deborah L. Wells, "Domestic Dogs and Human Health: An Overview," *British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12(2007):146; and "The Health Benefits of Pets," NIH Technology Assess Statement Online 1987 Sep 10-11. (2011/12/10 瀏覽)

⁹ W. P. Anderson, C. M. Reid, and G. L. Jennings, "Pet Ownership and Risk Factors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 157(1992): 298-301.

¹⁰ 無疑地，當實驗者把大學生自己的狗帶到其面前時，則效果將會更好；因為，可能有些大學生會在接觸到不熟識的狗時，感到某種程度的緊張。See A. H. Katcher, "Interactions between People and Their Pets: Form and Function," in *Interrelations between People and Pets*, edited by B. Fogle, third edition (Springfield, III: Charles C Thomas Pub Ltd, 1981), pp. 41-67; and Deborah L. Wells, "The Effects of Animals on Human Health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2009): 524.

擁有」與「人類健康」之間是有關聯的。¹¹總之，接觸寵物能夠大大地影響心跳、血壓……等生理計量（physiological measures）。¹²Erika Friedmann 等學者則於 1980 年更進一步指出，寵物擁有者在心臟病發作一年後仍然存活的機率遠較非寵物擁有者為高。¹³（到了 1995 年，Erika Friedmann 與 S. A. Thomas 估算「寵物擁有者」與「非寵物擁有者」在心臟病發作一年後仍然存活的機率比大約是「8.6:1」。¹⁴）較近的一項臨床研究也發現：當患有心肌梗塞時，寵物擁有者之存活率遠高於非寵物擁有者之存活率。¹⁵

另一方面，許多研究主張，寵物可以為坐在輪椅上的生理障礙者帶來某些健康上的好處，其原因大致如下：比起夫妻、兄弟姐妹甚或治療人員，寵物往往可以提供坐在輪椅上的生理障礙者更持續且更可靠的社會刺激來源（a source of social stimulation）。¹⁶就一般而言，比起正常人，（明顯的）生理障礙者較容易被他們的熟識者（或陌生者）所忽視或避開，但若有寵物在其身邊，則生理障礙者將會吸引他們的熟識者（或陌

¹¹ “The Health Benefits of Pets,” NIH Technology Assess Statement Online 1987 Sep 10-11. (2011/12/10 瀏覽)
See also Deborah L. Wells, “The Effects of Animals on Human Health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2009): 525.

¹² James Serpell, “Beneficial Effects of Pet Ownership on Some Aspects of Human Health and Behaviour,”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84(1991):717.

¹³ See E. Friedmann, A. H. Katcher, J. J. Lynch, and S. A. Thomas, “Animal Companions and One Year Survival of Patients after Discharge from a Coronary Care Unit,” *Public Health Rep* 95(1980): 307-312.

¹⁴ See E. Friedmann and S. A. Thomas, “Pet Ownership, Social Support, and One Year Survival after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the Cardiac Arrhythmia Suppression Trial (CAST),” *American Journal of Cardiology* 76(1995): 1213-1217.

¹⁵ “The Health Benefits of Pets,” NIH Technology Assess Statement Online 1987 Sep 10-11. (2011/12/10 瀏覽)

¹⁶ 相同地，Allen R. McConnell 等學者論及：「Loneliness and social rejection are painful to experience ..., but one's friends and family may not always be present to provide immediate comfort.... How do people satisfy their social needs in the absence of supportive individuals? ... pets can ... contribute to the fulfillment of social needs...」, Allen R. McConnell, Christina M. Brown, Tonya M. Shoda, Laura E. Stayton, and Colleen E. Martin, “Friends with Benefits: On the Positive Consequences of Pet Ownership,”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1(2011):1251.

生者)更多的注意與關心,故而也會有較多的互動機會。¹⁷的確,根據 L. A. Hart 等學者的研究,若某位坐在輪椅上的生理障礙者帶著寵物狗一同去逛街,則他平均將和大約八位陌生人友善的接觸;如果他單獨去逛街,平均而言,他僅可與一位陌生人友善接觸。¹⁸

Jane McNicholas 等學者則更進一步主張:寵物可以促進我們與他人的社會互動 (social interactions),而社會互動可減輕寂寞之感 (feelings of loneliness) 及緩和社會孤立 (social isolation)。無疑地,這一點對於生理障礙者與老人而言,顯得特別重要。¹⁹

寵物不僅可以促進其擁有者某方面的生理健康(如上所述),寵物亦有助於其擁有者的心理健康。很多研究顯示,寵物可以:緩和不幸生活事件(如,離婚、喪偶)的作用;減低焦慮(anxiety)、寂寞(loneliness)與沮喪(depression)的程度;增加自主(autonomy)、適任(competence)與自尊(self-esteem)等感覺。²⁰以上這些心理益處,大半是**直接**來自於寵物所帶給其擁有者的伴侶關係(companionship)。例如,狗的熱情親切、忠誠與無條件的愛當可大幅度地增加其主人的自我價值與自尊等感覺。另一方面,由於寵物(特別是狗)可增加其擁有者與他人的社會互動,因而可**間接地**促進其擁有者的心理健康。²¹的確,正如 D. L. Wells

¹⁷ "The Health Benefits of Pets," NIH Technology Assess Statement Online 1987 Sep 10-11. (2011/12/10 瀏覽)
See also Jane McNicholas, Andrew Gilbey, Ann Rennie, Sam Ahmedzai, Jo-Ann Dono, and Elizabeth Ormerod, "Pet Ownership and Human Health: A Brief Review of Evidence and Issues," *BMJ* 331(2005): 1253.

¹⁸ See L. A. Hart, B. L. Hart, and B. Bergin, "Socializing Effects of Services Dog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throzoos* 1(1987): 41-44; and Deborah L. Wells, "The Effects of Animals on Human Health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2009): 527-528.

¹⁹ Jane McNicholas, Andrew Gilbey, Ann Rennie, Sam Ahmedzai, Jo-Ann Dono, and Elizabeth Ormerod, "Pet Ownership and Human Health: A Brief Review of Evidence and Issues," *BMJ* 331(2005), p. 1253. See also Deborah L. Wells, "Domestic Dogs and Human Health: An Overview," *British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12 (2007): 150.

²⁰ 此外, T. F. Garrity 等學者進一步研究發現,「精神病患與他們的寵物之間的情感深度」和「這些精神病患的沮喪程度」成反比。T. F. Garrity, L. Stallones, M. B. Marx, and T. P. Johnson, "Pet Ownership and Attachments as Supportive Factors in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Anthrozoos* 2(1989): 35-44. See also Deborah L. Wells, "The Effects of Animals on Human Health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2009): 527.

²¹ See Deborah L. Wells, "Domestic Dogs and Human Health: An Overview," *British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12(2007):149.

所主張的，遛狗遠比單獨散步更容易與陌生人交談，因為牠們是很好的社會潤滑劑（social lubricants）。²²

顯然地，導盲犬可以帶給視障者莫大的生活便利，不過導盲犬卻也可以為視障者帶來極大的心理助益。的確，導盲犬可降低視障者之孤立感（the feelings of isolation）並可大大地增進其社會信心（social confidence）、獨立性（independence）與社會身分（social identity）。²³

我們對於老人常常會有如下的鮮明圖像：一個老翁孤寂地和他的狗併坐在屋簷下遠望天空；一位老太太抱著一隻小貓坐在窗前的椅子上。老人確實與寵物有一層親密的關係，而寵物確實也會為老人健康帶來正向的影響。由於老人是個快速成長的族群，因而這個議題顯得格外的重要。

依照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的說法，擁有寵物將有助於那些沒有獲得適當社會支助的老人（例如，喪偶且無依的老人）對抗「沮喪」（depression）；此外，擁有寵物亦可減少老人對於小毛病（minor health problems）的照料需求。²⁴的確，許多相關研究指出，當我們攜帶動物訪問安養院或健康中心等機構中的老人時，我們會為（至少）一部分的老人帶來心理上的益處。例如，當訪問者攜帶寵物來與安養院或健康中心等機構中的老人接觸時，他們往往會有以下的傾向：微笑、講更多的話、碰觸人與物、更機警及專注、經歷更多的幸福和更少的沮喪。²⁵此外，擁有狗的老人可減少臀部骨折的發生率（incidence of hip

²² See Deborah L. Wells, “The Facilitation of Social Interactions by Domestic Dogs,” *Anthrozoos* 17(2004): 340-352; and Deborah L. Wells, “The Effects of Animals on Human Health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2009):527; and Deborah L. Wells, “The Effects of Animals on Human Health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2009): 527-258.

²³ See Deborah L. Wells, “Domestic Dogs and Human Health: An Overview,” *British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12(2007): 150.

²⁴ “The Health Benefits of Pets,” NIH Technology Assess Statement Online 1987 Sep 10-11 (2011/12/10 瀏覽); and James Serpell, “Beneficial Effects of Pet Ownership on Some Aspects of Human Health and Behaviour,”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84(1991): 717.

²⁵ “The Health Benefits of Pets,” NIH Technology Assess Statement Online 1987 Sep 10-11. (2011/12/10 瀏覽)
See also S. E. Bolin, “The Effects of Companion Animals During Conjugal Bereavement,” *Anthrozoos*

fractures)，這或許是因為這些老人花較多的時間休閒散步（recreational walks）。²⁶

寵物與另外一個族群——兒童——亦常被聯想在一起。的確，在我們的眼簾，常會出現以下的畫面：一個天真活潑的小男孩，正與他的小狗在公園的草坪上追逐嬉戲。事實上，如前所述，具有小孩的家庭較常飼養寵物，而寵物確實也伴隨很多人度過快樂無憂的童年。除了帶給兒童娛樂及伴侶關係（companionship）之外，寵物尚能為兒童帶來什麼好處？

兒童常常會將各種的「社會屬性」（social attributes）歸屬於他們的寵物身上。例如：愛（love）、感情（affection）、伴侶關係（companionship）、親密（intimacy）等。這些社會屬性有些也會被兒童用來描述他們與其他特定人員的關係。例如，兒童常會使用「伴侶關係」來描述自己和兄弟姐妹之間的關係；而「愛」、「感情」則較常被兒童用來描述自己和祖父母之間的關係。由於兒童與其寵物之間有這一層關係，故此，正如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所主張的：接觸寵物（exposure to pets）有助於兒童建立（與維持）與同儕（或大人）之間的關係，而「良好的同儕關係」對於促進兒童的心理及人格發展而言具有相當的影響。²⁷此外，根據 Andrew T. B. Edney 的研究，寵物亦可幫助兒童增進其社會能力（social competence）、非語言傳達（non-verbal communication）能力，並提升自尊、減少害怕。²⁸我想，以上所述或許是寵物對兒童所可能帶來好處中之最為顯著者。除了這些大項之外，仍

1(1987), pp. 26-35. See also Deborah L. Wells, "Domestic Dogs and Human Health: An Overview," *British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12(2007): 150; and Deborah L. Wells, "The Effects of Animals on Human Health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2009): 528.

²⁶ James Serpell, "Beneficial Effects of Pet Ownership on Some Aspects of Human Health and Behaviour,"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84(1991): 718, 720. See also Deborah L. Wells, "Domestic Dogs and Human Health: An Overview," *British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12(2007): 147.

²⁷ "The Health Benefits of Pets," NIH Technology Assess Statement Online 1987 Sep 10-11. (2011/12/10 瀏覽)

²⁸ Andrew T. B. Edney, "Companion Animals and Human Health: An Overview,"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88(1995): 705.

有其它好處，如：許多研究指出，兒童若在出生與一歲之間接觸寵物過敏原（pet allergens），則可減緩罹患氣喘及過敏性鼻炎的機率。²⁹

寵物除了對老人、兒童、生理障礙者、視障者或心臟病患者等族群有上述之健康助益外，綜合而言，寵物對於一般（健康成年）人亦有以下之健康助益。依 Allen R. McConnell 等學者之研究，擁有寵物之一般（健康成年）人至少有以下的好處：身體較強健、較有自尊、比較不會感到寂寞、較負責盡職、比較不會心不在焉。³⁰

雖然飼養寵物對人類健康可以有上述的益處，但飼養寵物也可能會為我們帶來一些不利，如：傳染（infections）、過敏（allergies）、損傷（injuries），甚至寵物攻擊等。此外，有些老人有時由於太愛其寵物（捨不得與之分手），而拒絕遵照醫生的指示前往住院治療，或拒絕暫住安養中心。³¹但總體而言，正如 Wells 在做過一連串相關探討後所主張的：「Pets are good for us!」³²

二

雖然寵物可為我們的健康（及福祉）帶來正面的影響，但基於倫理的立場，我們似乎得再思考另一較後設的問題：飼養寵物是否為道德所允許的。然而，若想較適確地回應這個問題，我們得處理另一個更基礎的議題——動物對待。關於「動物對待」議題，笛卡爾（René Descartes）有以下的說法。

²⁹ Jane McNicholas, Andrew Gilbey, Ann Rennie, Sam Ahmedzai, Jo-Ann Dono, and Elizabeth Ormerod, “Pet Ownership and Human Health: A Brief Review of Evidence and Issues,” *BMJ* 331(2005): 1252.

³⁰ See Allen R. McConnell, Christina M. Brown, Tonya M. Shoda, Laura E. Stayton, and Colleen E. Martin, “Friends with Benefits: On the Positive Consequences of Pet Ownership,”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1(2011): 1245.

³¹ *Ibid.*, pp. 1252-1254.

³² Deborah L. Wells, “The Effects of Animals on Human Health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2009): 523, 536.

笛卡爾主張，動物不具有任何意識（consciousness）。他闡明此說如下：動物只是一部機器，故而無法察覺任何的聲音、氣味、冷熱等；也無法經驗任何的疼痛、快意、饑餓、口渴等。雖然動物在刀割時會哀叫、在躲避烙鐵時會激烈扭動，但這並不表示牠們在這些狀況裡已經驗到疼痛。動物就像一部時鐘，雖然可以比我們更精準地報時，但卻沒有意識。³³

Tom Regan 使用以下引文來闡揚笛卡爾之觀點：

那些奉行笛卡爾主義的科學家們毫不在意地毆打小狗，並且嘲笑對這些小狗心存憐憫的人……。他們說道：這些動物其實只是時鐘；牠們被毆打時所發出的哀嚎其實只是一條小彈簧在被觸動後所發出的聲響；事實上，牠們全身皆無任何感覺。他們把動物的四足釘在板子上，然後[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對牠們施以活體解剖，以觀察其血液流動，並展開興致勃勃的討論。³⁴

依照笛卡爾之上述說法，甚至連我們一般所理解的「虐待動物」亦非道德上的不當行為；故而，對他而言，飼養寵物當然為道德所允許。然而，此一說法幾乎不被任何一位當代的動物倫理學者所接受。伏爾泰（Voltaire）曾對笛卡爾之上述說法提出有力的反駁，如下：

這隻狗的忠誠與友善比人高明甚多，但卻有野蠻人將牠抓住、釘在桌上，並[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活生生地把牠剖開，好讓你得以觀察其腸系膜血管。但是，你將會發現，牠竟然有與你一樣的感覺器官。[笛卡爾主義者，]請回答我：難道大自然在這隻動物身上安置感覺彈簧的目的是要讓牠沒有感覺嗎？³⁵

有別於笛卡爾，康德（Immanuel Kant）反對「殘忍對待動物」，其主要理由如下：對待動物殘忍者將會慢慢形成一種習慣，以致他們也會傾向

³³ See 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2), p. 200.

³⁴ Tom Regan,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 5.

³⁵ 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2), p. 202.

於殘忍地對待人類；故而，折磨動物的人也將（或可能）會去折磨別人。依此，我們並不直接關心「動物所受到的殘忍對待」，我們真正在乎的是「養成不利於人類的習慣」。³⁶更且，依照康德的說法，即便我們將某一動物折磨至死，我們也沒有對此一動物做出不道德的行為。的確，康德曾明白地指出：

我們對動物沒有直接的義務。動物沒有自我意識，其存在只是為了達到某一目的的手段。這個目的便是人。³⁷

由於康德主張，我們對動物沒有直接的義務；故而，對康德而言，飼養寵物是為道德所允許的。康德上述的說法亦不被當代動物倫理學者所接受，其主要理論缺失在於：在面對「殘忍對待動物」議題時，只考量（與這些動物相關之）人類的傷害（或利益），卻完全沒有考量這些動物本身之傷害（或利益）。³⁸

雖然笛卡爾與康德之上述說法頗有問題，但這並不表示：他們所（隱涵）認可的說法「飼養寵物為道德所允許」亦有問題。事實上，當代最有名的動物倫理學家 Peter Singer 與 Tom Regan 亦（隱涵）認可「飼養寵物為道德所允許」。

在探討「動物對待」議題時，Singer 提出「利益平等原則」（the equality of interests principle），此一原則可簡要表述如下：

- （1）動物具有利益（interest），其利益必須被考量。
- （2）當不同個體的利益對這些（不同）個體而言皆有等同重要性時，這些利益皆具有相同的重要性或價值，而不管這些個

³⁶ See Peter Singer, "All Animals Are Equal,"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edited by Michael E. Zimmerman, J. Baird Callicott, George Sessions, Karen J. Warren, and John Clark, third edition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2001), p. 41.

³⁷ Immanuel Kant, *Lectures on Ethics*, trans. L. Infield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3), pp. 239-240.

³⁸ See Tom Regan, "Animal Rights, Human Wrongs," in Michael E. Zimmerman, J. Baird Callicott, George Sessions, Karen J. Warren, and John Clark, eds.,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3rd 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2001), pp. 41-42, 48.

體是誰：王子或乞丐，天才或白痴，白人或黑人，男人或女人，
人類或動物。

(3)「動物的利益對其自身而言」經常與「人類的類似利益對其自身而言」一樣重要。

(4)故而，我們必須給予「動物的利益」相同的考量。³⁹

依照利益平等原則的說法，我們必須給予每個動物之利益相同的考量，問題是：具有利益者並不僅止於動物（植物也有利益），為什麼我們必須給予每個動物之利益相同的考量？究竟賦予某生物「平等考量其利益」之權利的根由為何？對這個問題，Singer 回答：「感受痛苦的能力」（the capacity for suffering）。較具體而言，Singer 是以「感受痛苦的能力」作為判定「某一生物具有利益，故而需給予它們平等考量」的唯一判準。依此，Singer 試圖證成：動物具有感受痛苦的能力（因而具有利益），故此，我們必須給予「動物的利益」相同的考量。換言之，在道德上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定：動物所感受到的疼痛之重要性，不及人類所感受到的等量疼痛。⁴⁰

簡言之，依照 Singer 的說法，「人類與動物都是平等的！」故而我們絕對不可以「殘忍對待動物」，就好像我們絕對不可以「虐待人」一樣。不過，這個說法並沒有明白主張「我們不可以飼養寵物」。

Regan 在探討「動物對待」議題時，則提出「動物權」學說如下。Regan 主張：由於動物與人類一樣具有「固有價值」（inherent value），因而動物亦與人類一樣具有不被傷害的權利；由於動物亦與人類一樣具

³⁹ See Ibid., pp. 44-45; and Peter Singer, "All Animals Are Equal," in Michael E. Zimmerman, J. Baird Callicott, George Sessions,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edited by Karen J. Warren, and John Clark, third edition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2001), p. 31.

⁴⁰ See Peter Singer, "All Animals Are Equal,"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edited by Michael E. Zimmerman, J. Baird Callicott, George Sessions, Karen J. Warren, and John Clark, third edition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2001), pp. 26-39.

有不被傷害的權利，因此，我們有不傷害動物的義務。⁴¹顯然，「固有價值」概念在 Regan「動物權」學說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Regan 之「固有價值」是一個絕對概念 (categorical concept)，只有有無之分，而沒有程度之別。然而，我們如何得知人類與動物皆具有固有價值呢？Regan 以為，決定個體是否具有固有價值的標準在於，個體是否是一個生命主體 (the subject-of-a life)⁴²，生命主體這個概念所指的並不僅是單單活著，根據 Regan 的說法，若要成為一個生命主體，則個體必須滿足以下條件：他們要有信念與欲望；有知覺、記憶、未來感；並擁有一種伴隨著快樂與痛苦的情感生活；要有主觀面的偏好利益與客觀面的福利利益；且具有追求欲望與目標的能力；在時間流中亦可展現出身心的同一性；並得以擁有個人的福祉 (welfare)。總之，具有以上特徵的個體才算是一個生命主體，也才具有固有價值。⁴³

依照 Regan 的說法，「動物與人類都具有 (不被傷害的) 權利」，故而我們絕不可「殘忍對待動物」，就好像我們絕不可「殘忍對待人」一樣。不過，這個說法並沒有隱涵「我們不可以飼養寵物」。

當代學者 Singer 與 Regan 在動物倫理學的學說，可謂大大地超越笛卡爾與康德的說法，故而也較為合理、可被接受。Singer 與 Regan 分別就不同的視角而提出動物保護的理據。他們都主張，我們絕對不可以「殘忍對待動物」；但事實上，他們也都 (隱涵) 認可「飼養寵物乃是道德所允許的」這個說法。

Tom L. Beauchamp 與 James F. Childress 曾提出「不傷害原則」(the principle of non-maleficence)，此一原則要求我們「有意地抑制足以引發傷害的行為」(intentionally refraining from actions that cause harm)。⁴⁴若

⁴¹ Tom Regan, "Animal Rights, Human Wrong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edited by Michael E. Zimmerman, J. Baird Callicott, George Sessions, Karen J. Warren, and John Clark, third edition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2001), pp. 50-51.

⁴² *Ibid.*, p. 48.

⁴³ Tom Regan,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 243.

⁴⁴ Tom L. Beauchamp and James F. Childress, *Principles of Biomedical Ethics*, 5th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15.

將「不傷害原則」(擴展)應用於「動物對待」議題時,⁴⁵則可進一步支持 Singer 與 Regan 之上述主張(或隱涵):我們絕對不可以「殘忍對待動物」;但飼養寵物卻是道德所允許的。其理由如下。

依「不傷害原則」,因殘忍對待動物將會傷害這些動物,故而是道德所不允許的;然而,飼養寵物並不會對寵物造成傷害(很多家庭甚至將寵物當作是家裡的一份子),故而是道德所允許的。在此,需要強調的是:寵物是動物、是道德容受者(moral patients)而不是人類,故而,只要不對其造成傷害,我們的任何舉措(practice)便可為道德所允許。總之,我們往往只把寵物當作親密的伴侶、朋友,別無其他目的。至於「可否使用導盲犬」這個問題,我想,只要不涉及慘忍、不人道的訓練過程,依照「不傷害原則」是沒有問題的。在此,我們或許會進一步問道:人類是否得以把野生的貓狗等動物,從自然界帶回飼養,並予以馴化、配種而成為我們的寵物?⁴⁶這個問題很複雜,有待其它機會予以探究。

總結而言,本文主要探討以下兩個問題:

- (1) 寵物是否可以為(當代)人類的健康帶來正面的影響?
- (2) 飼養寵物可否被道德所允許?

經由以上的探討,我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是:

- (1) 是!
- (2) 可以!

⁴⁵ 在此,我僅取「不傷害原則」之形式意涵,而不涉及 Beauchamp 與 Childress 是如何理解「不傷害原則」及如何規定其適用範圍。

⁴⁶ Richard A. Posner 在探討動物權議題時,亦提出了同樣的問題。See Richard A. Posner, "Animal Rights: Legal, Philosophical, and Pragmatic Perspectives," in *Animal Rights: Current Debates and New Directions*, eds. Cass R. Sunstein and Martha C. Nussbau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57.

參考書目

- Anderson, W. P., C. M. Reid, and G. L. Jennings, 1992, "Pet Ownership and Risk Factors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 157: 466-468.
- Beauchamp, Tom L. and James F. Childress, 2001, *Principles of Biomedical Ethics*, 5th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lin, S. E., 1987, "The Effects of Companion Animals During Conjugal Bereavement," *Anthrozoos* 1: 26-35.
- Edney, Andrew T. B., 1995, "Companion Animals and Human Health: An Overview,"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88: 705-708.
- Friedmann, E., A. H. Katcher, J. J. Lynch, and S. A. Thomas, 1980, "Animal Companions and One Year Survival of Patients after Discharge from a Coronary Care Unit," *Public Health Rep* 95: 307-312.
- Friedmann, E., and S. A. Thomas, 1995, "Pet Ownership, Social Support, and One Year Survival after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the Cardiac Arrhythmia Suppression Trial (CAST)," *American Journal of Cardiology* 76: 1213-1217.
- Garrity, T. F., L. Stallones, M. B. Marx, and T. P. Johnson, 1989, "Pet Ownership and Attachments as Supportive Factors in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Anthrozoos* 2: 35-44.
- Hart, L. A., B. L. Hart, and B. Bergin, 1987, "Socializing Effects of Services Dog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throzoos* 1: 41-44
- Kant, Immanuel, 1963, *Lectures on Ethics*, trans. L. Infield,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 Katcher, A. H., 1981, "Interactions between People and Their Pets: Form and Function," in B. Fogle, ed., *Interrelations between People and Pets*, 3rd, Springfield, III: Charles C Thomas Pub Ltd.

- McConnell , Allen R., Christina M. Brown, Tonya M. Shoda, Laura E. Stayton, and Colleen E. Martin, 2011, “Friends with Benefits: On the Positive Consequences of Pet Ownership,”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1: 1239-1252.
- McNicholas, Jane, Andrew Gilbey, Ann Rennie, Sam Ahmedzai, Jo-Ann Dono, and Elizabeth Ormerod, 2005, “Pet Ownership and Human Health: A Brief Review of Evidence and Issues,” *BMJ* 331: 1252-1254.
- Posner, Richard A., 2004, “Animal Rights: Legal, Philosophical, and Pragmatic Perspectives,” in *Animal Rights: Current Debates and New Directions*, eds. Cass R. Sunstein and Martha C. Nussbau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1-77.
- Regan, Tom, 2001, “Animal Rights, Human Wrong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edited by Michael E. Zimmerman, J. Baird Callicott, George Sessions, Karen J. Warren, and John Clark, 3rd 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 Regan, Tom, 2004,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erpell, James, 1991, “Beneficial Effects of Pet Ownership on Some Aspects of Human Health and Behaviour,”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84: 717-720.
- Singer, Peter, 2001, “All Animals Are Equal,”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edited by Michael E. Zimmerman, J. Baird Callicott, George Sessions, Karen J. Warren, and John Clark, 3rd 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 Singer, Peter, 2002, *Animal Liberatio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 Wells, Deborah L., 2004, “The Facilitation of Social Interactions by Domestic Dogs,” *Anthrozoos* 17: 340-352

Wells, Deborah L., 2007, “Domestic Dogs and Human Health: An Overview,” *British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12: 145-156.

Wells, Deborah L., 2009, “The Effects of Animals on Human Health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 523-543.

《應用倫理評論》稿約

- 一、本刊為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應用倫理研究中心所發行之學術刊物。本刊原名為《應用倫理研究通訊》季刊，自民國九十八年起改名為《應用倫理評論》半年刊，每年四月與十月定期出刊。
- 二、本刊以推動應用倫理之研究為宗旨，除發表與應用倫理學議題相關之哲學論述外，亦歡迎相關之規範倫理學的理論研究，以及其它專業科系就理論評介與實踐經驗作多元的探討。本刊開放投稿，竭誠歡迎海內外學者專家賜稿。
- 三、本刊除致力為應用倫理學之專業學術研究提供發表的園地外，並期許能為應用倫理議題的理性討論建立跨領域交流的公共論壇，本刊之學術專論因而依論文的性質分為二類：
 - (一) 研究論文：開放投稿，刊登符合本刊之宗旨的專業學術研究成果，論文字數以一萬字為原則。
 - (二) 專題論文：以本刊編輯或特約編輯主動邀稿為主，但亦歡迎讀者自行投稿，專題論文之主題將提前預告，專題論文字數以六千字為限。
- 四、本刊設有審查制度，所有稿件皆需通過審查方予刊登。研究論文一律送請兩位以上的校外學者專家進行雙盲匿名審查。專題論文部分，則由本刊編輯與特約編輯組成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
- 五、本刊隨時接受來稿，惟專題論文請於專題徵稿截止日期前來稿。來稿請勿一稿兩投。本刊保留對來稿格式與文字的刪改權。
- 六、研究論文來稿，請包括首頁、中英文摘要與關鍵詞、正文及註釋、參考書目等，稿件詳細的寫作格式，請參閱本刊撰稿體例。
- 七、作者需自負文責，論文中牽涉版權部分（如圖片或較長之引文），請事先取得原作者或出版者之書面同意，本刊不負版權責任。
- 八、來稿經審查通過採用，將通知作者提供修正稿及定稿電子檔案，並簽署著作財產權讓與書乙份。凡經本刊收錄刊登之論文，即視為作者同意將

稿件之著作財產權讓與予本刊出版者所有，惟著作人仍保有未來集結出版、教學等個人使用權利，如需轉載刊登，須經本刊同意。

九、來稿刊出後，隨即致贈研究論文作者當期《應用倫理評論》兩本及抽印本二十份，專題論文作者致贈當期《應用倫理評論》三本，不另贈抽印本。

十、來稿請以電子檔用 E-Mail 傳送，寄至 ncu3121@ncu.edu.tw 中央大學應用倫理研究中心收，信件主旨欄註明《應用倫理評論》稿件，本刊收到後會給予正式確認回函。

《應用倫理評論》撰稿體例

註明*記號者，表示只適用於「研究論文」

- 一、來稿請以電腦橫式撰寫，並以 Word 電子檔寄至中央大學應用倫理研究中心（E-mail: ncu3121@ncu.edu.tw）。
- 二*、稿件內容順序：首頁、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正文（含註腳與圖表）、參考書目、附錄。
- 三*、首頁需載明：
 - (1) 稿件屬「研究論文」或「專題論文」
 - (2) 中英文論文題目（題目字數以不超過20字為原則）
 - (3) 中英文作者姓名
 - (4) 中英文服務機關名稱與職稱
 - (5) 聯絡方式（通訊地址、電話、傳真、e-mail 等資料）
- 四*、摘要頁需包含中、英文之題目、摘要（各300字以內）與關鍵詞（以不超過5個為原則）。
- 五、正文之章節劃分：請依序以一、（一）、1、(1)表示。標題層級以四層為限。
- 六、外來人名，可直接以外文原名出示，如“John Rawls”；若有中文通譯，如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康德等，亦可只直接使用；其他人名，若使用中譯，請用拉丁字母把外文姓名附列於首次出現的譯名之後。例如：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而同一人名再次出現時，只須寫出譯名，不需再附加外文原名。
- 七、遇有外文專門術語而尚未有通譯者，或雖有通譯而另作新譯者，均請於譯名首次出現時用拉丁文字母附列原名，如：「涉利者」(stakeholder)／「利害關係者」(stakeholder)。同一術語再次出現時，只須寫出譯名，不需再附原名。

八、引文體例：

- (1) 引用外文文獻之文字，在正文中必須譯成中文；如有需要，可於內文中討論原文或於註腳中列出原文。
- (2) 凡首次引用之文獻均需於註腳中註明完整出處，體例如第十條所示。惟第二次（含）以後出現之相同文獻，可以「隨文註」方式註明文獻出處，亦即，在引文之後以學術上認定的縮寫格式註明之，例如：「（李凱恩，2004: 11-12）」。
- (3) 若引文在四行以內者可直接納入正文，例如：「企業的『良知』是其委託人善良的自然道德的延伸。不管委託關係的內容是什麼，社會所有人一樣要以一定的道德義務彼此對待」（Goodpaster, 1991: 68）。
- (4) 若引文過長，超過四行以上，請另行以獨立引文的方式另外成立一段落，並以標楷體表示之，且該段落左邊界縮排三個中文字寬並排齊。例如：

企業被視為一個生產組織，它的存在是為了滿足消費者及工人的利益，增加社會的公業。要達到這些目的，企業要依靠自己的一些特別的優勢及減少不利的因素，這是企業作為一個生產組織的道德基礎。社會契約亦可用作生產組織表現的度量工具，即是說，當這些組織滿足了契約的條件時，則他就做得很好。當它們作得不好時，社會在道德上就有理由責難它。（Donaldson, 1982: 54）

九、引用論文或書籍（含電子書及電子檔案），中文書籍請用《》表示，例如：《儒家生命倫理學》；中文論文請用〈〉表示，例如：〈動物權：一個佛教向度的解讀與解釋〉。外文書籍請用斜體字表示，例如：*Ties That Bind – A Social Contracts Approach to Business Ethics*。外文論文請用雙引號表示，例如：“Business Ethics and Stakeholder Analysis”。

十、註腳一律採用頁底註方式。註腳序號請用阿拉伯數字，全文連續編號，置於標點符號之後；若是針對個別名詞說明者，則註腳序號緊隨該名詞之後。註腳格式如下：

- (1) 在註腳中引用的文獻若為期刊論文，註明之內容依序為：作者姓名，

文章名稱，期刊名稱與卷期數（年份），頁數。（外文期刊依循慣例）其寫法如下：

葉保強，〈全球環境管制體制急需建立：從海牙會議失敗談起〉，《應用倫理研究通訊》第24期（2002），頁8-10。

T. Donaldson and Lee E. Preston, "The Stakeholder Theory of the Corporation: Concepts,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 (1995): 65.

(2) 在註腳中引用的文獻若為專著，依序為：作者／編者姓名，書籍名稱（出版地點：出版者，年份），頁數。其寫法如下：

朱建民，《知識論》（台北：國立空中大學，2003年），頁25。

Peter Singer, *One World: The Ethics of Globalization*, second edi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27-129.

十一*、參考書目請列於文末。參考書目包括中文及外文參考文獻者，請先列出所有中文參考文獻後，再接著列出所有的外文參考文獻。

(1) 中文參考文獻，請先依作者筆劃序，同一作者再依成書年代之順序排列。在參考書目中，中文專著、期刊論文與專書論文，撰寫格式分別如下：

朱建民，2003，《知識論》，台北：國立空中大學。

葉保強，2002，〈全球環境管制體制急需建立：從海牙會議失敗談起〉，《應用倫理研究通訊》第24期，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哲學研究所，頁8-24。

莊世同，2008，〈合法性與整全性——對德沃金法治觀的審視與反思〉，輯於王鵬翔（編），《法律思想與社會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頁45-84。

(2) 外文參考文獻，請依作者姓名之拉丁字母序（即所謂 alphabetical order）排列：姓氏居先，名字（可用全稱或簡稱）在後；姓名相同者，依出生年月為序；同一作者之著作，依出版年月為序；同一作者同年同月出版之著作，則依書名之拉丁字母為序。在參考

書目中，外文之專著、期刊論文與專書論文，撰寫格式分別如下：

Rawls, John, 1993,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onaldson, T. and Preston, Lee E., 1995, “The Stakeholder Theory of the Corporation: Concepts,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 65-91.

Clouser, K. D. and Gert, B., 1999, “A Critique of Principlism,” in *Meaning and Medicine: A Reader in the Philosophy of Health Care*, edited by James Lindemann Nelson and Hilde Lindemann Nelson, New York: Routledge, pp. 156-166.

十二、引用網路下載資料，不論於註腳或參考書目中，請採用以下格式註明出處（惟外文作者之姓名寫法在註腳中與參考書目中有別）：

王家祥，2003，〈我所知道的自然寫作與台灣土地〉，文學園地網，
URL=<http://ecophilia.fo.ntu.edu.tw/read/read/1997-0910h.html>。

（2010/01/11瀏覽）

趙祥，1997，〈謝林的美學〉，智庫網，URL=<http://www.GK.com/chzao.htm>。

（2009/03/24瀏覽）

【於註腳中】

Ron Harton, 2000, “What is Nature Writing,” Naturewriting Website,
URL=<http://www.naturewriting.com/whatis.htm>.（2008/09/28瀏覽）

【於參考書目中】

McClintock, James I., 1994, *Nature’s Kindred Spirits*, Naturewriting
Website, URL=<http://www.naturewriting.com/whatis.htm>.

（2011/10/24瀏覽）

十三、引用、評論學位論文，請採用以下格式註明出處：

【於註腳中】

吳明益（研撰），李瑞騰（指導），《當代台灣自然寫作研究》（中
壢：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06）。

【於參考書目中】

吳明益（研撰），李瑞騰（指導），2003/06，《當代台灣自然寫作研究》，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應用倫理評論》

訂閱單

發行公司：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連絡電話：+886-2-23926899

服務信箱：ylib@ylib.com

傳真專線：+886-2-23926658

遠流博識網：http://www.ylib.com/

訂閱金額

圖書館／機關團體					個人				
	新台幣	亞太	美洲	歐洲		新台幣	亞太	美洲	歐洲
一期	\$ 800	US\$ 62	US\$ 65	€ 53	一期	\$ 400	US\$ 38	US\$ 41	€ 34
一年	\$ 1600	US\$ 111	US\$ 114	€ 92	一年	\$ 800	US\$ 62	US\$ 65	€ 53
期刊費用：	期 ~ 期				數量		金額		總金額
郵寄費用：	*台灣單冊郵寄處理費 55 元				數量		金額		

注意事項

1. 期刊將在付款後兩個營業天內寄出。
2. 價格及建議出版日期恕不另行通知可能變更。
3. 機構團體是指圖書館、政府機構、公司使用者及公司以個人名義訂購。
4. 個人訂戶是指單一個人使用而非以營利為目的者。
5. 對於有意或無意扭曲「個人訂戶」一詞者，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保留法律追訴權，並得求償損失。

訂閱者資料

機關名稱 / 個人姓名：	
發票抬頭：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電子信箱：	
收件地址：	

付款方式

<input type="checkbox"/> 郵局劃撥	帳號：01894561	戶名：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input type="checkbox"/> 支票付款	公司：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00 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二段 81 號 6 樓
<input type="checkbox"/> 銀行匯款	戶名：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第一商業銀行 建國分行	
	帳號：193-10-110981 (代碼：007)	
<input type="checkbox"/> 信用卡		
發卡銀行	<input type="checkbox"/> MasterCard <input type="checkbox"/> Visa	
信用卡號		
信用卡有效期限	西元	年 月 卡片背面末三碼
持卡人簽名	須與信用卡背面簽名相同	
付款後請傳真或回函本訂閱單，即完成訂閱		

Applied Ethics Review Subscription Form

You may subscribe to the journals by completing this form and sending it by fax or e-mail to

Tel: +886-2-23926899 Fax: +886-2-23926658 E-mail: ylib@ylib.com

Website: <http://www.ylib.com/>

Price

LIBRARIES / INSTITUTIONS				PERSONAL			
	Asia/Pacific	US/CA	Europe		Asia/Pacific	US/CA	Europe
1 Issue	€ 62	US\$ 65	US\$ 53	1 Issue	€ 38	US\$ 41	US\$ 34
1 Year	€ 111	US\$ 114	US\$ 92	1 Year	€ 62	US\$ 65	US\$ 53

Vol. _____ ~ **Vol.** _____ **Copies** _____ **US\$** / **€** **Total** _____ *All Price include postage

PLEASE NOTE

- Issues will be sent in two business days after receiving your payment.
- Please note that all orders must be confirmed by fax or email.
- Prices and proposed publication dat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 Institutions include libraries, government offices, businesses, and for individuals where the company pays for the subscription.
- Personal rates are available only to single-user personal subscribers for personal and non-commercial purposes.
-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reserves its right to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to recover any losses arising from any intended or unintended misrepresentation of the term "Personal Subscriber".

BILLING INFORMATION

Company / Name:	
Tel:	Fax:
E-mail:	
Shipping Address:	

INTERNATIONAL PAYMENTS

Direct Bank Transfer	
Beneficiary	YUAN LIOU PUBLISHING CO., LTD.
Address	6F, NO.81, SEC.2, NANCHANG RD., TAIPEI 100, TAIWAN
Bank Name	FIRST COMMERCIAL BANK CHIEN KUO BRANCH
Account No	007-193-40-002183
Swift Code	FCBKTWTP
Bank Address	NO.161, MING SHENG E. ROAD, SEC. 2, TAIPEI, TAIWAN

Pay by Credit Card			
Card Type	<input type="checkbox"/> Visa <input type="checkbox"/> MasterCard <input type="checkbox"/> JCB		
Card Name			
Card Number			
Expiry Date	_____ / _____	CVV number	
Signature			